

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 金春明 /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金春明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金春明主编.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10

ISBN 7-216-03139-3

I. 评…

II. 金…

III.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书评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 052690 号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金春明 主编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印刷: 孝感市印刷厂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 516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 1—3 120
书号: ISBN 7-216-03139-3/K·340

经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 20.625
插页: 4
印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印刷
定价: 37.10 元

前 言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剑桥中国史》第十四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和第十五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以下简称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是由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资深专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 K. Fairbank 约翰·金·费尔班克）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编的，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相当权威性的代表作。正如费正清本人在《总编辑序》中所说：“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而本书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的中文译者更直截了当地认为，这部书，“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在国际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大概也因为如此,这部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著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当然译者不同)出版,这种情况也比较罕见。当然也引起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关注。社会各界关注者众多,以致在一次全国性的书展中,这部学术专著竟成为十大畅销书之一。学术专著一般是很难成为畅销书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尚没有中国人自己写的国史专著出版,而且大家也希望知道外国人如何看待和评价新中国吧。也可能有更复杂的因素促使此书畅销。书的销量越大,影响面也就越广。这自然也引起我们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关注。

我们认为,这部专著确是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著作中比较优秀的一部,颇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例如,较充分地搜集和运用了西方现有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成果;在整理和分析史料方面,应用了西方比较新的研究方法;视野比较开阔,研究领域包括思想、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文学、农村、城市等多方面;还专门有一章研究1949年后的台湾,明确将其作为中国的一个“分离的省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材料丰富,也有不少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对历史事件有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差异,特别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异,该书中也有些重要观点和分析评价是我们难以赞成和接受的。由此也产生了进行学术探讨的强烈愿望。

恰逢国家社科规划“九五”课题指南中,列有“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课题,我们便鼓起勇气申报,而且幸运地被批准了。“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题组建立后,全组同志首先认真通读这两卷剑桥史(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为主),并适当核对英文原著,然后进行了多次集体研讨。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困难比原来设想的要大。主要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引用的大量西方学术著作,中国尚没有译本,一时也难以找到;西

方的一些学术思潮,我们接触不多,比较生疏;特别是国内当前对国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等第一手重要史料尚未解密;很多问题中国学者自己也正在研讨,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可借鉴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也不够丰富,等等。尽管如此,我们感到有些问题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必须担负起中国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在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方向上前进。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本书的特点是评析别人的学术专著。因此,它必须密切地联系评析对象中涉及的问题,提出论点,进行分析,从中阐明我们自己的观点。这并不是说,评析对象涉及的所有方面,我们也必须一一评析。而是在肯定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们认为需要商榷的问题,加以评析。这就不同于一般学术专著所具有的较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但由于评析对象是一本学术专著,必须大体上关照到它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这就又使得我们这本专著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过具有若干被动性的特点。长于针对性,而非历史的和逻辑的完整性,这可以说是评析类图书的特点所决定的。本书亦不能例外。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既然是学术评析,会有不同意见和看法是理所当然的。好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两位教授,也并不认为他们的意见就是最后的结论,从而为学术探讨和交流留下了通道。他们在第十四卷的序中说:“不过,我们知道,我们的看法很可能是暂时的——这不完全是由于主要的资料仍没有公布(因为很可能有些材料永远不会公布);也不是因为我们评述的事件距今天太近(因为历史学家的评价,无论时间距离上多么有利,总要不断地予以修正);而是由于试验远未结束,但又只有在它接近完成(今后一个世纪?)时,对最早的这几个十年才有可能得出完整的看法。”这样立论的角度应该说是比较客观而有道理的。因为确实存在这些客观困难。不过,历史资料和档案的公布,总是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和各种因素的变化而

越来越丰富。各种历史事件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而使人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是众所公认的常识。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50周年之际,来评论已经相距几十年前的事件,不应该说是“太近”了。至于说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作为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历史试验来说,确实还远远没有完成,特别是就其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而言。但请不要忘记,这一伟大历史试验的发展进程是有阶段性的。就其第一步目标,打碎旧世界,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而言,是确定无疑地完成了。接下来的建设新国家的任务,也已经是确定无疑地完成了。虽然经历了各种曲折和风浪,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个世纪中一直坚定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任何人难以否定和封杀的巨大存在。这就在客观上为我们科学而公正地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3年的这一段历史创造了条件(这里我想到一件小事:两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起止时间是1949—1982年,共33年。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叫《建国后三十三年》,起止时间完全一样,出版时间是1987年。这真是一种无意中的巧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西方的同行一道进行学术交流,采取商榷的态度,互相交换意见。既充分地肯定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充分阐述我们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指出我们认为对方不足或不正确的地方,以求得在交流与商榷过程中的共同提高。这也是我们要评论这部学术专著的根本目的。

当然,我们也同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两位教授持有同样的态度,也并不认为我们的观点就是最后的定论。因为确如二位教授所说,作为历史学者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评价,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资料的披露而要对自己的认识“不断地予以修正的”。在这里我们诚恳地表达一种心愿,希望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国外的专家学者对我们的这本专著不吝指教。

最后,还有一点不能不说到的,当我们这部书出版时,作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之一的费正清教授,已经看不到了。他已于1991年8月14日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享年84岁。他已经不能看到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不再能听到这位智慧头脑的声音。我们只能为此而感到深切地遗憾。

本书的撰写工作分工如下: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撰写前言、第一章;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孙慧荣,撰写第二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博士朱地,撰写第三章;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王红续,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潘正祥,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博士江英,撰写第四章;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博士张志明,撰写第五章;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博士陈述,撰写第六章、第七章;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泉、助理研究员刘新,撰写第八章;中共海南省委党校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兼职教授李振霞,撰写第九章;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博士张志明,撰写附录(一);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周敬青,撰写附录(二)、附录(三)。金春明审定全部书稿。

金 春 明

2000年12月于海口



金春明，男，1932年生。现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目前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有：中国共产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理事等职。是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党史党建组成员。主要研究成果有《“文化大革命”史稿》、《“文化大革命”论析》、《“文化大革命”简史》（合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建国后三十三年》、《不平凡的七十年》（合著）、《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主编）、《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合著）、《“四人帮”沉浮记》、《新中国编年史》（撰写其中“文革”十年）等专著。各种论文约二百篇。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	1
第一节 不是“王朝循环”而是开历史新篇	2
第二节 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何在	21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46
第二章 中国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	67
第一节 社会改造的开创性实践	68
第二节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个问题	101
第三节 苏联模式与中国实际	117
第三章 50 年代几次思想政治运动评析	146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46
第二节 50 年代中期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相互关系的 基础	165
第三节 知识分子与 1957 年开门整风	181
第四节 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由整风 转向反右	209

第五节	关于“大跃进”的缘起·····	227
第四章	新中国对外关系略析·····	245
第一节	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	246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参加朝鲜战争·····	269
第三节	中国为什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87
第四节	为什么要炮击金门·····	298
第五节	中印边境冲突为什么会发生·····	316
第六节	中苏同盟为什么会破裂·····	325
第七节	怎样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新理论·····	339
第八节	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方法论评析·····	346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	360
第一节	“文革”成因的再反思·····	361
第二节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政治联盟” 之辩·····	383
第三节	关于“文革”后果的评价·····	397
第六章	毛泽东思想遗产的正确评估·····	408
第一节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	409
第二节	毛泽东探索的中国建设道路是不是乌托邦·····	416
第三节	对毛泽东犯错误原因的分析·····	424
第四节	其他若干观点·····	429
第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435
第一节	“为继承权而斗争”不是 1969—1982 年 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	436

第二节	被忽视的伟大历史性的转折·····	447
第三节	被忽视的历史主题·····	464
第八章	“分离省份台湾”的历史真实 ·····	479
第一节	台湾的历史地位·····	480
第二节	正确评价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社会的 发展·····	482
第三节	中外人士对“二二八事件”的不同认识·····	489
第四节	台湾经济、政治的发展 ·····	499
第五节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扮演的角色·····	519
第六节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的责任·····	532
第九章	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	537
第一节	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史学研究的挑战·····	537
第二节	历史和逻辑、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问题 ·····	556
第三节	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 问题·····	568
第四节	历史观和方法论理解上的几个误区·····	581
附录(一)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若干史实辩证 ·····	610
附录(二)	解开林彪是否被挟持之谜 ——兼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 有关记述 ·····	630

附录(三) 林彪外逃中一个插曲的真相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关

“九一三”事件的一则史实辨析 642

后 记 649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的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是由这部书的两主编之一、哈佛大学名誉历史教授费正清亲自执笔写成的。这一章在全书中的地位很重要。借用作者本人的话，可以看作是阅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最佳入门”，因为它“可能会给读者提供一个关于本卷所表现的当前撰写水平的有益的认识”^①。

这就是说，这一章实际上是全书的一个总序论，对全书具有总体上的导向性。作者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几个历史阶段谈起，然后深入到文化传统、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而且从现代化的大视角考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原因等。其中颇多细致地深入分析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表现了作者多年研究中国历史的深厚功底。但是，可能由于作者也承认的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也受到的“西方文化的约束”，加上对中国历史实际了解的局限，因此，有些观点和结论及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注：全书正文引用版本相同)，第1页。

其逻辑方法是我们所不能接受和赞同的。特别是，费正清教授本意可能是在这一章中讲清楚中国所以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再统一的原因，但很遗憾，他虽然涉猎方面很广，却没有抓住要害，也没有能够讲清楚中国所以能够实现再统一的真正原因。从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也难以有正确的认识和适当的表述。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专门列出一章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问题。

第一节 不是“王朝循环”而是开历史新篇

“王朝循环论”是在第一章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名词。费正清教授说：“我们讨论问题最好的出发点是王朝循环的理论与实践”^①，并且认为，“在中国人对现代史的了解中，王朝循环是在支撑中国的几大理论之一的基础上提出的”^②。该书别的章节的作者也多次使用这个观点作论述的依据。如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新王朝而被广泛接受，有权树立自己的正统”等等。这说明“王朝循环论”可能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的共同观点。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个观点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王朝循环”的历史终结而不是继续

“王朝循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种现象：隋代的杨家王朝灭亡了，唐代的李氏王朝取而代之。唐代的李氏王朝灭亡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了,经过一段时间又有宋代的赵家王朝的建立。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满族等少数民族也曾入主中原而建立王朝。虽然也有魏、蜀、吴三国并立、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等分裂的年代,但就总体而言,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二千年间,统一是主流,统一年代占据四分之三以上的历史进程。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或者说是中国历史独有的一种现象。就这样,从统一而分裂,从分裂而再统一,一个新王朝代替一个旧王朝,王朝的名称改变了,统治的形式也多少有一些变化,但封建王朝的实质并没有变。于是,这种现象就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新的理论,称之为“王朝循环论”。

费正清教授对这种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同西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说:“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差异呢?费正清教授把它归结为不同发展道路的结果,即中国“是通过内向爆炸而发展的,而西方则是外向爆炸的产物”^②。这可能是有道理的。不过为什么中国要“内向爆炸”,而西方却“外向爆炸”?这个原因,费正清教授没有作更多分析。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则称之为不同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同发展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15页。

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①这大概就是费正清教授所说的西方的“外向爆炸”吧!而中国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农业自然经济则倾向于自给自足、闭关保守。因此,只能“内向爆炸”。这大概就是费正清教授所说的外向与内向之差的根本原因吧。不过,中国与西方、1和50的巨大差异是否仅仅是由于这个原因而造成的?由于问题的巨大而复杂,恐怕还需要作多方面的认真研究,暂时还难以得出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过费正清教授的下述观点我们是赞成的:“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②

这就是说,“王朝循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中是存在的。但是,请注意,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并不能说是代表一种特殊的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虽然它在一部分学者中间很流行,但并不一定是客观真理,也并不是公认的定论。因为,王朝的更迭并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或下降的过程。同样是封建王朝,汉唐盛世代表了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上升阶段,而到明末和清代却进入了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晚期,进入了衰落阶段。在一个大的质的规定性前提下,又有若干具体的小质变,显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单就此而言,“循环”二字的概括也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问题还在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254~255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5页。

能否从这样一个并非公认的抽象论点出发,而不是从中国近现代的具体实际出发?我们认为,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必须从该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应从一个抽象的命题或论断出发。对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从“王朝循环”这样的抽象论点出发研究中国历史的作法,我们是不赞成的。特别是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中国近现代史,用这样的观点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认为是更不妥当的。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件事,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

首先,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古代自秦以后的各个王朝不管如何更迭,但其经济基础都是一样的。都是以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尽管不同朝代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有某些调整或改变,但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一直没有根本变化。木犁和耨头一直是主要的生产工具。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就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形态。因此,尽管人民进行了不断的反抗斗争以至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但结果还是创造不出新的社会形态。这就出现了循环的局面,一个新王朝的建立,只能是旧的生产方式的因袭,只能是旧王朝的某种略有改变的翻版。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①

但是,近现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有了质的改变。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的:“由于外国资本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① 这样,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有了以纺织、面粉、机械、采矿等为主要行业的现代机械大工业;已经有了铁路、轮船、电报、电话等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已经有了以上海、广州、天津、大连、武汉、青岛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现代化设施的大中城市。虽然在全国广大地区,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的数量还不小,但却突破了两千年封建自然经济笼罩一切的传统格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这是进步的,是和古代有本质区别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意义是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正是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产生了近现代的中国革命与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的根本不同的特点,成为近现代中国不可能再出现新的王朝循环现象的决定性的因素。

其次,中国近现代的社会阶级结构与中国古代已有质的区别。虽然封建社会的基本阶级结构——地主与农民的两极对立,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封建势力与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仍然十分强大,但中国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这就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相伴而生的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从19世纪末就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维新活动,企图以日本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明治维新为榜样,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但遭到以西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镇压而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终于领导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遗憾的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次革命没能进行到底。皇帝虽然被推翻了,但是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中国并没有能够挣脱封建主义的统治而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尽管如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好,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目标都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摆脱封建主义的新社会,而不是重建一个封建王朝。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一是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种压迫,因此富于革命性和反抗斗争精神,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二是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就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三是中国无产阶级同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这些特点使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人数的比重,使它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绝不可能再去建立一个封建旧王朝。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因此,“王朝循环论”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不可能有任何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在讲到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时,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变化,就是出现了一个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这是与封建社会中的士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阶层。其特点是:(一)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外,大部分知识分子感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到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而有很大的革命性;

(二)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近代的科学知识,思想比较新潮,政治感觉比较敏锐;(三)他们在近现代中国的革命斗争中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①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当然也是不能允许新的封建王朝出现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同中国历史上曾经循环出现过的封建王朝,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相似之点。

先说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平分土地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地消灭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运动。就其规模和彻底性而言,都超过了被称为西方反封建最彻底的法国 1789 年的大革命。新中国的经济是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结构。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五种经济成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由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都从根本上消除了建立新的封建王朝的经济基础。

再说政治制度。新中国建立的政治制度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如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②。这样的政治制度与封建王朝截然不同,而且其发展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1 页。

② 同上书,第 677 页。

途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绝不会允许出现什么封建王朝的循环。

再说社会结构。封建王朝一般都是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缺少了地主和农民,任何封建王朝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可是,地主阶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被消灭了(在中国的老解放区 1947 年的土改中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在其他地区也于 50 年代初的土改中不复存在了)。这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没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倒还是存在的,不过他们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中被强制依附于土地,面向黄土背朝天、终日劳动不得温饱的农业奴隶,而是有了基本生活资料、当家做了主人的个体农业生产者。这样的农民也已经不再是封建王朝的社会基础。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一点:“王朝循环论”在西方也许是一种流行的观点,但在中国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所普遍不赞成的。早在 1994 年 6 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邀请北京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的十多位学者参加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对“王朝循环论”普遍提出了批评意见:“学者们指出,所谓‘王朝循环论’,根本抹杀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阶级实质,和它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进步意义,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不难看出,‘王朝循环论’的观点,同历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革命的解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看不到近代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是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因而寻找一些所谓理论上的解释,如本书中所说,中国有一种传统的要求统一的内聚力,有官僚统治的传统等等。从而主观地推论,一个软弱分裂的王朝覆灭了,新的中央王朝又取前者而代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只是一个王朝循环的续篇。”中国学者认为:“这种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实际,这反映出西方学者的重大政治偏见。”^①总括以上各点,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绝不是中

^①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1994 年第 6 期。

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不断循环的封建王朝中新的一个环,而是彻底砍断了这种历史循环的链条,挖掉了造成王朝循环现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宣告了“王朝循环论”的历史终结,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二 引发中国改革和革命的不是所谓“1901年的和解”

费正清教授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近代历史变化时,作出了一个颇令人难以理解的论断:“1901年的和解引进了20世纪改革和革命的新时代。”^①这里所说的“1901年的和解”到底指什么?这是必需首先要搞清楚的。

翻开20世纪的中国史,一开头就是血淋淋的十分凄惨的一页:英、德、日、俄、美、法、意、奥等八国联军攻占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关于这场战争,列宁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不如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水淹和枪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更不用说抢劫皇室、住宅和商店了。而俄国政府以及奉承它的报纸,却庆祝胜利,欢呼勇敢的军队的新战功,欢呼欧洲的文化击败了中国的野蛮,欢呼俄罗斯‘文明使者’在远东的新成就。”^②胜利者自然要索取报偿。接着就是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在1901年的中国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那么,费正清教授的“1901年的和解”只能是指中国政府同八国联军签定的《辛丑条约》了。可是,那怎么能算“和解”,谁同谁“和解”,又是怎样的一种“和解”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条约的内容就知道了。

《辛丑条约》本身共12款,另有19个附件,其主要内容包括六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9页。

个方面：

(1)清政府承认“纵信”义和团的错误，向各国赔礼道歉。派专使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并为被杀的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在北京建牌坊。并许诺要严厉惩罚得罪外国的中国官员，奖励和提拔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官员。

(2)中国向八国赔偿白银 45000 万两，分 39 年还清，年息 4 厘。本息折合白银 98000 万两。

(3)将北京市的东交民巷地区划为使馆区，界内由各国驻兵管理，中国人概不准居住。

(4)拆毁中国设在大沽口的炮台及京师至山海关各通道之各个炮台。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 12 个重要地区。

(5)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与参加“与诸国仇敌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对境内发生的“伤害诸国人民”事件，必须立即镇压，否则立即革职，永不叙用。

(6)外国认为各通商章程中应修改之处或其他应办的通商事项，清政府应概允商议。另外，原设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名为外务部，班列各部之首。如此等等。

外国的侵略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依仗大炮洋枪等新式武器放肆地打杀中国人，一路杀人放火打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但是，赔礼道歉的不是外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中国官员领导人民卫国抗敌的，不但无功反而有罪，要受到严厉惩办；投降卖国的官员反而有功，要受到提拔重用。中国的国格和民族尊严何在？有何公理和正义可言？

中国的政府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驻扎军队，修筑炮台，保卫自己的边防，保卫自己的首都，已有的边防设施却要全部拆毁。而外国军队却可以在中国的首都和交通要道的 12 个地区驻扎军队。使中国首都成为不设防的城市，完全受制于外国。在外国军队的炮火

威胁之下,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又在何处呢?

当时中国的人口只有4亿,而赔偿的白银本息合计多达9亿8千万两,每个中国人不论大人和小孩每人赔银2两半。可是贫穷的中国农民一年辛苦到头也不一定能够挣上2两白银。压榨之狠毒真可说是达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西方列强一贯宣扬的博爱和人道又表现在哪里呢?仅此几点就足以说明,《辛丑条约》是非常苛刻而恶劣的不平等条约。它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一步加深和强化了对中国的控制,进一步确定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这个条约成为中国人民头上沉重的桎梏,把整个中国推入了绝境。这一切都极大地激怒了中国人民,增强了他们的仇恨,哪里有一点点“和解”的味道呢?如果把这样的条约硬说成是一种“和解”,那只能被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的莫大污辱,是一种黑白不分、是非不辨的地地道道的民族的偏见。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学者不该染上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傲慢的老爷式的武断。

一位中国历史学者在自己回顾20世纪的专著中,这样概括了《辛丑条约》的影响:“八国联军侵略的直接后果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它用条约制度最后确定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条约是侵略者惩罚观点的体现,规定有:严惩肇事者,赔款高达4.5亿两白银,北京至沿海和山海关的通路不得设防,外国驻北京使馆有驻兵权等项。中国清政府财政完全受列强控制,军事直接受列强威胁,政治受外国使团左右,主权属性已所剩无几。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辛丑条约》是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象征。中国在20世纪开始几十年的一系列事件都和这个条约密切关连。”^①

在搞清楚什么是“1901年的和解”之后,接下来要搞清楚的是,到底是什么把中国“引进了20世纪改革和革命的新时代”?

20世纪对于中国确实是一个改革和革命的世纪。世纪之初就

① 王海光:《从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有着反抗清政府的多次局部的地方性的反抗和起义,包括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一直到全国范围的推翻皇帝的辛亥革命。接着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起点的五四运动。然后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间还有一个八年抗日战争。近半个世纪连绵不断的激烈的武装斗争,也是世所罕见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中国人“好战”吗?绝对不是。是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榨和侵略太残酷了,使中国人民终年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不能不奋起反抗,以求生存和发展。而《辛丑条约》的苛刻条款是加重中国人民苦难的又一副沉重枷锁。所以,把中国引入20世纪革命的绝不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和解”,而是新的加重的压迫引起的更激烈的反抗,而是阶级仇和民族恨的沉重积累引起的革命更加强烈而不断地爆发。直至中国人民取得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推翻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彻底胜利,建立起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改革和革命史。

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都已在不断探讨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并不断提出一些按照某些西方逻辑而得出的结论。例如说,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人口太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是由于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是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煽动等等。1949年美国发表的由国务卿艾奇逊主持编写的美中关系白皮书,就是一个代表。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当时就写下一系列文章,对美国白皮书进行透彻而深刻的批判。当时艾奇逊虽然没有提出“和解”一词,但他把美国用从《辛丑条约》中分得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开办中国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作为“友谊”的一个事例。这与“和解”说似有某些相似之点。而毛泽东当年对白皮书的批判,今天用来回答“和解”说,还是很恰当的。

毛泽东说:“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

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①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引发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矛盾,强调在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中国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两个基本矛盾中,前一个矛盾常常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20世纪前半叶的革命斗争,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而引发的。他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②

总之可见,第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1901年的和解”。不平等的《辛丑条约》绝不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和解”,而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空前沉重的大灾难。它所能激发起的中国人的感情绝不是“和解”,更不可能是“感激”,而是更加强烈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第二,不是“和解”引进改革和革命,而是压迫引起反抗。《辛丑条约》进一步激化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者这两个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激化了的矛盾必然以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斗争长期而激烈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0页。

^② 同上书,第1513页。

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①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 毛泽东不是朱元璋

朱元璋是六百多年前的明朝的开国帝王，是从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而创建了自家的封建王朝的农民出身的皇帝。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中国人看来，这两个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毛泽东不是朱元璋这样的命题，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需要论证的。但是，费正清教授的看法不同。他在好几处强调毛泽东与朱元璋的共同点和相似之处。他说：“毛泽东有点冒失地把自己比作秦始皇（也许是为了恫吓一些文人学者），但他的事业更明显地可与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的事业相比。”^②他在列举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处决了他的丞相胡惟庸，杀了开国功臣沙场老将蓝玉等事例后说：“在毛泽东执政的 27 年间，他把矛头指向他的同志，并且为了防止‘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弊病，几乎毁了中共，这与明朝创建者 37 年的统治有某些惊人相似之处。”^③（这里似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某些误解之处，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及）因此，费正清教授得出一个结论：“在 1949 年，毛泽东及其中共的同事作为革命的胜利者，意识到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和一个新时代的新需要。他们重新缔造历史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突破中国过去政治的衡量标准。但中国远不是毛泽东号称的可以在上面随意谱写新事物的‘白纸’。相反，甚至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3 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34 页。

③ 同上书，第 35 页。

泽东关于他的新政权的主张也具有一个新天子的特点。”^①这就是说,毛泽东虽然意识到了“新时代”的“新需要”,也想“突破中国过去政治的衡量标准”。但很遗憾,中国的传统太厉害了,所以,毛泽东还只能是一位“新天子”。这大概也是在“王朝循环论”的观念指导下,必然要得出的一个具体论断吧!这样,费正清教授就迫使我们不能不与他讨论毛泽东是不是朱元璋的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不是“王朝循环论”中的又一位“新天子”。

如果硬要找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之点,也是可以列出几条的。比如,两个人都是出身于农村,家境贫苦,从小参加过农业劳动等。但接下来两个人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就完全不同了。朱元璋是到寺庙中当小和尚学到了一点文化,内容完全是古老的;而毛泽东则是进的新式学堂,接受的是根本不同于科举时代以读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式教育,是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广泛涉猎了近代西方文化,从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达尔文进化论,一直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等等,最后坚定地选择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如果说受旧式封建教育的朱元璋,只能写出“天为帐幕地为毯,日夜星晨伴我眠。夜深不敢伸长腿,怕把山河一脚穿”这类诗句,表达要当主宰天下的封建帝王这样的最高理想的话,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毛泽东则写出:“天翻地覆慨而慷”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样的创造无产阶级新世界的壮丽诗篇。这说明,仅仅是出身类似,并不能说明人的理想和思想本质。

又比如,朱元璋曾经是农民运动红巾军的领袖,是一代“农民王”。而毛泽东也曾被人称之为中国当代的“农民王”。不过虽然都有过“农民王”之名,两个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却是完全不同的。朱元璋领导的是古代的农民运动,披着宗教迷信的外衣,没有科学的理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6页。

论和现代的政党为指导,也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老式农民运动,其结果只能是或者被统治阶级镇压和收买,遭到失败的下场;或者打进了京城,推翻了旧的统治者,自己取而代之,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少数农民运动的领袖上升为统治阶级,而广大农民依旧处于被剥削压迫的地位。总之这样的农民运动常是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而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则完全不同。毛泽东是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党的一个负责人,然后才去领导农民运动的。并且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批共产党人在搞农民运动。并且在农民运动中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因此,这样的农民运动是在现代政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以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曾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说,这样的新式农民运动,“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①。这种现代的农民运动只能出现在20世纪的中国,只能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使它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同盟军。它已经不再是封建社会里改朝换代的工具,而是打破“王朝循环”,开创历史新篇章的主力军。不看到这种时代和阶级本质的变化,而只做某些形式上的类比,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用这样非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不但不能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反而是十分有害的。

再如说,新的中国建立之后“杀功臣”,被费正清教授认为是毛泽东同朱元璋“有某些惊人相似之处”的主要例证。其实在我们看来,建国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以至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某些领导人的错误处理,同朱元璋的“杀功臣”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逐一叙述和评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领导干部被不适当惩处的案例。因为每一个具体案例,例如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十分曲折而复杂的。好在这方面中国已经陆续出版了多本专门著作,披露了比较详细的史料,可供参考。我们只想指出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两个人的主观动机是完全不同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确实杀了一些功臣,其中有的该杀,有的误杀,有的确实是冤案。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是要保持新政权的形象,清除腐败;二是要为自己的家天下顺利传替扫清障碍。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巩固朱家的封建王朝。

而毛泽东则完全不同。他终生警惕的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纯洁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凡是他认为会危害这个革命根本利益的,都要坚决清理之。这其中有些是正确的,必需解决的,如三反运动中处以死刑的刘青山和张子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搞武装政变的林彪集团等。也有些是情况判断有误而错误定性的冤案,如1959年的彭德怀,1966年的刘少奇等。本来是正确的主张被误认为是“修正主义”,这种错误的发生当然同毛泽东本人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过分警惕性有关,也同由此产生的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不信任有关。这也说明没有永远正确不犯错误的领袖。但是,这同为了某种私利而有意制造冤案,杀戮功臣,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干部被整的问题,邓小平有一段话是说得比较公正的。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队伍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他又

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一开头就是要整他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 he 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①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没有家天下的问题，不存在建立和巩固毛氏王朝的问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想当党的主席，首先反对的是毛泽东；不同意把自己的侄儿毛远新选为党中央委员的是毛泽东；“四人帮”企图在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批判后，把张春桥推上国务院总理的宝座，粉碎这种图谋的又是毛泽东。这正是作为无产阶级领袖的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把朱元璋同毛泽东等量齐观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

第二，两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也是不同的。朱元璋完全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传统方式，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个人说了算，完全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不允许任何违抗的绝对命令。毛泽东的行为方式则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是在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和发扬民主。他明确宣称打破中国历史周期率（同“王朝循环”含义相近的一种观点）的最好方法，就是走“民主新路”。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无可讳言，毛泽东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以个人专断代替了党的集体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和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冤假错案。对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文化大革命”的亲自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当然是难辞其咎的。这一点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301页。

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写得很清楚的。不过，即使在这个特殊时期里，对许多重要案件（包括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冤案）的处理，也不是由毛泽东个人下一道“圣旨”，而是经过相应的组织机构（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组是一种违反法定程序成立的破坏法制的非正常组织，但总是一种组织机构）的审理，提出报告和处理意见，再由某一权威机构集体决定的。当然在那种特定条件下，这种集体决定必然要遵照毛泽东的意志，而很少可能作出违反他的意愿的决定。例如给刘少奇作出错误处理决定，就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根据有毛泽东等人批示的事先整理好的材料通过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同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留很深有关；也同当时的个人崇拜盛行有关。尽管会议很不正常，根本不能进行冷静客观的讨论，提不同意见的人也受到迫害，但总还是走了一番集体决定的过场，保留了一点形式上的民主。

有人认为，有没有这种最后决定权的形式上的差异是不重要的。因为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而“最高指示”就是绝对命令，就是圣旨，无人敢违抗，也违抗不了。这种看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有两点重要的差别是不应忽略的：第一，要不要通过集体讨论决定的形式，表现了最高统治者头脑中有没有民主的基本观念。封建王朝的君主是没有这种观念的。朱元璋当然也可以举行御前会议，听取将军和大臣们的意见，但最后决定权属于自己。他可以召开这种会议，也可以不召开，会议对于皇帝并非是决定问题的必备程序。而对于一生倡导民主集中制的毛泽东则并非如此。他认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 这个对党内民主意义的评价，今天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来也可能是不够充分的,但总是可以说明毛泽东的头脑中是有民主观念的。虽然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晚年还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就其一生而言,民主思想是主要的。有没有民主的观念,对于一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反映了不同阶级本质和不同宇宙观的大事。第二,有没有这种民主形式并非是不重要的。因为,保留了集体讨论和决定的形式,也就是保留了一种可能性,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纠正个人错误的可能性。当然,毛泽东在世时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性。但是,1935年1月的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依靠集体力量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统治;1979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依靠集体力量纠正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使党的工作实现根本性转折的实例,充分说明保留这种民主决定问题的组织形式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从出身经历、意识形态、阶级本质、终身事业和奋斗方向等多方面的情况,都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毛泽东根本不同于朱元璋,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本质不同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不是旧式的“农民王”,也不是“王朝循环”中新一轮的开创者,而是中国历史新篇的开创者,这是不允许有任何含糊的。

第二节 共产党胜利和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何在

研究历史文化传统,是为了说明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用很长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传统、现代化的作用、地方控制的问题等等之后,费正清教授不能不谈及这一章中最要害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再统一的担当者不是曾经执掌全国统治权的中国国民党,而是曾经饱受残酷压迫的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我们看

来,这本来应当是这一章所要阐明的最核心的问题。但是很遗憾,费正清教授在这方面却着墨不多,而且没有能够充分显示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独特的位置和深邃的造诣。这使我们不能不联想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美国发生的那场关于中国问题的激烈争斗。

在当时的美国国会和政府中曾激烈争辩一个问题:“是谁丢失了中国?”在中国人看来,这个问题是十分奇怪和令人难以理解的。首先,人们丢失的只能是自己的东西。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美国怎么能“丢失”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否有些美国人自命为中国的主人,那不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吗?其次,把中国“丢失”给了谁呢?是中国人自己。是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驱逐了外国侵略者,打败了本国的剥削者、压迫者,自己当家作了主人。就是说,中国并没有“丢失”给任何人,而是合法的主人收回了合法的权利。所以,“谁丢失了中国”这类问题本身,就充满着帝国主义老爷们狂妄自大的错误立场和荒谬偏向。既然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掀起了反共狂热,那么就不能不付出代价。而被拉出来作为替罪羔羊的则是一批美国自己的外交官。这是曾被誉为“美国驻国外的一批最能干的年青外交官”,包括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的一批中下级官员(包括费正清教授本人)。他们不幸地被当成“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成为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的对象。他们普遍受到公开和秘密的传讯审查,有的丢官、有的被调离机要部门、有的改行或失业,经受颠沛流离之苦。这股反共反华风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之后,才逐渐缓解。这是号称全世界上民主国家之首的美国,在20世纪中叶制造的一大冤案。对此,美国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之士也有所反省。例如美国参议员,曾任国会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在1971年就曾说:“那些驻在中国的外交官为自己的国家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们的国家并不总是很好地对待他们。由于他们报告了国民党的事业行将失败,由于他们报告了他们在延安和其他共

产党控制区的耳闻目见,他们就受到了像不那么文明的时代传递坏消息的信使一样的对待。由于传递坏消息,他们被看作是不久要落在国民党政权头上的大灾难的鼓吹者,甚至是制造者。”^①

这场反华反共的大歇斯底里对于美国的影响是很大、很深的。以至“提到中国状况的时候,要是不引用蒋委员长嘴里说出来的话,就要受到怀疑”^②。甚至到六七十年代,美国外交官中精通中文的人已经没有了。费正清教授本人后来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个人了解的情况可以证明,在50年代初……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普遍传讯,在公众中造成使人不敢对中国抱现实想法的结果。我认为这种结果发展成对中越关系产生了不现实的想法,使我们在那里陷入困难。”^③这就是说,这种反华反共浪潮的影响,同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有直接关联,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也许是这种影响造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的空白;也许是这种影响给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造成的心理阴云经久未散;也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费正清教授在分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胜利而中国国民党失败这个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的核心问题上的不少论点,是难以令人满意,甚至是很难令人赞成的。下面我们将对费正清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几个主要论点,逐一加以分析和评论。

一 “成熟的政治条件”是什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在“探讨中共1949年接管政

① 转引自伊·卡恩著《中国通》(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权的情况”时说：“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不但历史支持这种接管，而且 20 世纪出现的新因素也帮助接管。”^① 西方学者能够肯定 1949 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容易的。可惜这里用的动词是“接管”，而不是我们习惯的“解放”。“接管”只是表明政权的更替，新的国家管理者代替旧的国家管理者；而“解放”的含义则更广泛更积极，也更能表明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发生的这场伟大变革的深刻意义。用词的选择当然表明作者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这说明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评价同我们是有较大差距的。不过从总体上看，费正清教授还是比较客观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受“历史支持”的。这同我们习惯用的“历史的必然”或“历史的要求”，程度上也是有差距的。不过一位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能够提到“历史支持”的高度，肯定 1949 年中国的革命，也是值得称赞的。

那么，费正清教授从哪些方面来肯定“历史支持”呢？他是从“传统的角度”和“现代的社会角度”，还有“从外国技术的角度”三个方面作论述的。研究像中国革命这样的大事变，当然可以有多种角度，费正清教授提出的这三个角度，当然都是需要的。问题在于不应仅仅停留在角度，更重要的是论述它包含的内容。因为角度只是方法，内容才更能表明实质。而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表述的内容而言，我们感到颇有值得认真分析研究之处。让我们首先从他论述的第一个角度作些研究。

什么是“传统的角度”呢？作者说：“首先，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条件成熟了。自 1911 年以来，中国人民很少过安宁的日子，所以普遍渴望安定。在此期间，中共在 1921 年以后已成为一个一体化的政权。它已经历了 1923 年至 1927 年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的四年革命斗争；经历了 1927 年至 1937 年十年反对国民党人的战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36 页。

争;经历了1937年至1945年抗日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八年时期;经历了1946年至1949年反对国民党人的四年内战。这26年不间断的斗争以及江西和后来的华北统治经验,已为中共夺取政权和行使权力作好了准备。”^①这段引文可能长了一点,但它却是费正清教授所谓“政治条件成熟了”的全部内容。概括起来只有两点,一是人民“渴望安定”,二是中国共产党已经“作好了准备”,仅此而已。从我们的角度看来,这样的认识和分析,不仅没有抓住要害,深入事物的本质,而且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理由未免过于单薄了。人民“渴望安定”,是不是历史事实呢?当然是的。在20世纪前半叶中,大约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像中国一样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之苦。因此,中国人民“渴望”安定与和平是非常自然的,完全在情理之中的。问题是,如此“渴望安定”的中国民众,为什么竟然会支持内战的一方,而打倒内战的另一方呢?这是费正清教授没有回答的,而这个问题才是所谓“政治条件成熟”的要害。

中国亿万老百姓,从抗日战争胜利后十个月的实践中认清了谁是人民渴望的代表者,谁是人民渴望的破坏者。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刚胜利后就发表宣言,号召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强烈心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冒着巨大的危险亲赴重庆,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谈判,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为推动全国和平避免全面内战迈出了重要一步;是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努力和重大让步,促成了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议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使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使中国出现了和平民主的新曙光;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奔走四方,积极努力,对促成政协召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6~37页。

开和各项协议的达成作出重要贡献,如此等等。可是,另一方的中国国民党又怎样呢?蒋介石一方面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和平建国,一方面派飞机运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密令各地国民党军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国民党代表在重庆同共产党代表签订“双十协定”的同时,国民党的军队却奉命进攻山西上党地区等解放区;国民党代表在公众面前签字于1月10日停战协定,而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当局已下令各地国民党军在停战实施之前尽量抢占战略要地,以至到处炮火连天;国民党的政协代表在《和平建国纲领》上签字,国民党的特务却奉命破坏陪都重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大会,并对各界代表大打出手,制造较场口事件;甚至连上海市民的和平请愿团也在本国的首都南京,遭到国民党政府军警宪特的野蛮袭击,造成全国震惊的下关惨案。身遭殴打重伤住进医院的是数十名上海民众代表,而实际上遭到普遍殴打的却是亿万渴望安定与和平的民众之心。正是如此残酷的客观现实教育了广大民众,使他们认清了是非真相,下决心支持和帮助安定与和平的维护者中国共产党,共同努力去打败安定与和平的破坏者中国国民党,以最终实现大众内心多年积累的渴望。正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说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已为“夺取政权和行使权力作好了准备”,这个话也没有说错。1949年“接管”政权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成熟的革命政党。不过也可以反过来问一下,中国国民党难道是一个没有斗争和行使权力的经验,没有准备的政党吗?当然不是。中国国民党斗争的历史比中国共产党长很多。如果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算起,国民党的历史比共产党长27年。讲斗争经验,除了两党共同经历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外,国民党还经历了反清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经历了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和段祺

瑞的斗争,经历的斗争也比共产党多。而且国民党在二十多年中是中国的执政党,有充分的执掌全国政权的经验,而这是共产党所没有的。如果说准备,那么国民党政府是在获得了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又接收了日伪军的一百万人的军事装备和大量物资,物资准备远远优于共产党。在美机美舰支援下调兵遣将,自认为在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而准备十分充分的情况下,蒋介石才下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的。当时蒋介石曾信心十足地宣称要在3~6个月内全部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如果说准备,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双方都做了准备,而且国民党准备得更充分,行使政权的经验也更多一些。但斗争的结果,却是准备不那么充分、经验也相对少些的一方,打败了准备更充分、经验也更多的一方。这就说明准备和经验是重要的,但不是在最终决定胜负中最重要的。

我们认为在谈到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对两党作比较研究时,最重要的是弄清两党不同的阶级本质。而费正清教授大概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他也对两党的状况作分析,但这种分析竟丝毫也不涉及阶级本质、阶级利益和阶级代表性。例如,他认为:“国民党作为一个专政的党,在重新统一和统治中国的竞争中落后了,主要原因是:它是一个较老的组织,与更早期的世界观和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国民党始于1912年或更早,而共产党则始于1921年或以后。因此,国民党的失败常常反映出共产党成功的原因。”^①人们不禁要问:“较老的组织”就一定要失败吗?早成立的政党就一定要败给晚成立的政党吗?遍观世界各国的政党史,恐怕都难以找出这样的实例,也得不出这样的逻辑结论。例如,印度的国大党成立时间远远早于印度共产党。而国大党长期统治印度政坛,从40年代末独立,一直到90年代初;而印度共产党至今仍未执掌过全国政权。可见一个政党成立的早晚,对并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49页。

不是决定这个政党的命运的关键。

那么关键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国民党同共产党是不同阶级的政党,因而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国民党在成立之初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实现中国独立和现代化的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但是,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并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之后,这个党逐渐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代表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利益和要求,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背道而驰,这样最终也就民心丧尽极端孤立,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焉得不亡!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之时起就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为之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始终不渝。

这才是两党区别的本质所在。

正如毛泽东在著名的《愚公移山》中说的:“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①这通俗的比喻道出了深刻的道理,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政权更迭的决定因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不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乡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和一部分开明士绅也都心甘情愿地在共产党领导下结成最广泛的反美反蒋的爱国统一战线,一起去打倒国民党,这才是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的条件成熟的根本标志。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二 何谓“民族主义已经成熟”

民族主义问题是费正清教授在所谓“从现代的社会角度看”中提出的中心问题。他说：“从现代的社会角度看，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成熟，更因中国普遍存在的文化主义、文化特性意识和以往的优越感而高涨起来。社会结构中的深刻变化已经削弱了扩大的父系家族世系对妇女和青年的控制。军人、工商业者、教师、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出版商和新闻工作者、甚至革命者和党派成员的新的职业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承认。”^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谈到的这些现象都是存在的，而且在客观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看来，费正清教授使用“民族主义”一词并不包含着贬意。问题是这些变化着的因素都能够纳入“民族主义成熟”这一命题之中吗？如何理解“民族主义”概念和它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客观历史作用，特别是能否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归之于“民族主义”问题，我们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应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民族主义，而且各个阶级和阶层的民族主义也是各不相同的。除了通常使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农民的民族主义等之外，还可以有各种特指的民族主义。比如一生同沙皇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族主义”作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多的革命导师列宁，就曾使用过诸如“现代民族主义”、“黑帮民族主义”、“市侩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一直到“粗暴的野蛮的政府民族主义”、“虚伪地掩饰起来的精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7页。

致的民族主义”之类的概念。可见,民族主义确实是一个种类繁多的概念。

不过,尽管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既同为民族主义,总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共同内涵。但是,这个特定的共同内涵如何科学的界定和表述却颇不容易。翻阅几种辞典,其中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和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科学社会主义词典》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是基本上一致的。大意如下: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纲领、原则与政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抹杀阶级矛盾,以全民族的代表自居,把本民族(实际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煽动、驱使本民族群众排斥、歧视、压迫以至掠夺其他民族,企图以民族矛盾掩盖和取代阶级斗争,藉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谋取资产阶级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这样的概括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也比较准确的。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主干。搞清楚它,也就基本上搞清楚了民族主义的实质。但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个定义似乎难以概括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共同本质。为此,我求教于革命导师列宁。列宁说:“任何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都希望使本民族享有种种特权,或者为本民族谋取特殊利益。”^①这里的“民族特权”和“民族特殊利益”两个概括非常好,非常深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民族主义的本质。应该说,任何民族主义,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提出什么口号,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纠纷甚至发动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目的都是一个:保持或获得本民族的特权,保持或获得本民族的特殊利益。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正是在这种对民族主义本质的最深刻地分析和揭露的基础上,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即使它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是最‘公平的’、‘纯洁的’、精致的和文明的民族主义。”^①因为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是,所有各民族无论大小都一律平等,反对任何民族压迫和民族特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这两个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的口号,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②因此,随便把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说成是民族主义政党,或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民族主义运动,在我们看来都是不正确的,是一种不能允许的根本性质上的混淆和严重的曲解。

不过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将一般的原则随意搬用于各种不同的具体事物,而是主张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对民族主义也同样。还是列宁指出的:“抽象地提出民族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③因为,在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占支配地位的20世纪,人类社会中实际出现了两类居于不同地位的民族:“劳动者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占少数的压迫民族,即大国的(帝国主义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和有特权的民族;以及占绝对多数的被压迫民族,即附属或半附属的和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④这就是说,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承认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己的翻身解放的民族运动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并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因为这种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28页。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2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6页。

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方向一致而又互相配合的。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民族运动并不等于就是民族主义。民族运动由于所处国家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不同,由于国际条件的差异,可能是各不相同。例如,印度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领袖,被称为“圣雄”的甘地,他一方面提出了废除种姓制度、解放妇女等进步要求,同时又以“非暴力”原则限制工农群众的斗争。他领导了几次大规模的以反英的不合作为主要形式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印度独立作出重大贡献。又如,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国民党的领袖苏加诺,他曾领导反对荷兰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军的民族解放战争,成为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第一任共和国总统。又如,埃及民族运动的领袖纳赛尔,参加过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又领导了推翻封建君主法克鲁王朝的斗争,后来当选为埃及共和国的总统。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领导者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家,作为指导思想的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由于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因此,都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和声援。

中华民族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被压迫民族,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自然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关注。例如早在19世纪50年代,革命导师恩格斯就热情讴歌了民族热情高涨、但只能以落后手段反抗英国侵略的中国南方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说:“我们不要像骑上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恩格斯从这

场人民战争中“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而在20世纪初，革命导师列宁同样热情地肯定了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他说，孙中山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②中国人民的这些革命斗争，当然都是民族解放运动，也反映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特点。但是，如果把对这些运动的评价转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的革命斗争，那就不恰当了。因为这种革命早已不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了。两种革命虽然只有新、旧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

费正清教授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名家，大概不会不知道这两种革命的本质差别吧。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断定中国革命1949年的胜利是“民族主义已经成熟”呢？

一是可能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缺乏了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一些西方政府和某些西方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民族主义政党、小资产阶级激进政党或者农民党，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机关——共产国际中，也有些领导人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连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也曾抱怨过，中国革命胜利后还被斯大林怀疑为铁托主义或“半个铁托”嘛。当时的所谓“铁托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在当时是要被开除户籍的弥天大罪。抗日时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些“中国通”们，也有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不同，是民族主义政党的看法。费正清教授在判断1949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

的中国革命时,会不会仍受着这种长期存在的不正确看法的影响?

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当时出台的一些外交政策产生了误解。根据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①。为此而采取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帝国主义在华开办的宣传机关,如美国新闻处、美联社等;立即统制全国的对外贸易,取消了外国大公司的进出口权;改革海关制度,把海关大门的钥匙掌握在中国政府手里等。这一系列比较激烈的措施,曾被概括为“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目的只是为彻底摧毁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真正实现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世界各国民族一律平等。这里并没有任何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而只是取消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收回了中华民族应有的权利,也并没有追求任何中华民族的特权。可是这些措施却遭到一些西方媒体的误解,以及故意的歪曲污蔑,被称之为狭隘民族主义,闭关自守,拒绝接受西方先进事物等等。从这种误解出发,当然也会把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成熟。

三是出于西方文化固有的偏见,而把民族运动误认为是民族主义。因为任何民族运动都必然具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从思想文化到表现形态无不具有民族的特点,有时甚至还会发生某些排斥外民族、损害外民族群众利益的过激行为。中国革命是不是民族运动呢?当然是的,而且是20世纪影响全球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其规模之宏大,声势之壮阔是无与伦比的;其内容之深刻与彻底是史所罕见的;其影响之巨大而深远也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底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胜利转折点时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明确指出的：“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从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①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出现某些逆流和漩涡，发生某些不适当的行为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也就是说，难免有些民族主义的影响和表现。但如果据此而对中国革命的整体性质作出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结论，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相结合。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但中华民族又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是个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②总之，中国人民在1949年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但它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胜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可以说是这种结合的一个光辉的典范。因此，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民族主义已经成熟”，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从理论上说也是十分不妥当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0～521页。

三 何谓“日本和中共打败国民党”^①

这个看起来十分荒唐的结论，却出自西方学者写的郑重的历史著作之中，而且是作为第一章中的一则小标题，令人十分难以理解。不过这个小标题不可能是作者偶然的笔误，因为紧接着有如下一段论述。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观点的论证：

“日本人入侵中国这一事实，对敌对的两个政党专政的命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1931年起，入侵使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因建军和建立军事工业以防御敌人而肩负重担。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的入侵需要中国由一个军人来领导。蒋介石成了掌权者，对社会命运的种种考虑就被撇到了一边。日本人征服中国的企图对中共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共产党人已被赶出江西并在长征中幸存下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他们在华北边区的贫困的根据地里可能会被饿死。总之，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②这里除了第一句话，说日本人人侵对两党的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论断可以成立之外，其余的每句话都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下边就让我们逐句来评论一下吧。

首先是国民党政府对待日本侵略者的态度问题。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战争。依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关东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沈阳市。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下令中国军队不准抵抗，以至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军就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是蒋介石把3000万东北人民和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之下，违抗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49页。

令,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抗日游击战,曾经发展到很大规模。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屡遭挫折,不过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国民党内的一些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又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和破坏而失败。1933年,日本侵略军又进攻热河省和察哈尔省,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进行了英勇的长城抗战和察北抗战,但又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如此等等铁的史实说明,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面前,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先攘内”的投降卖国的政策,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是在攻打和对付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和抗日同盟军。而根本没有建立和发展抗日的国防军,更没有作出任何发展军事工业以防御敌人的全面计划。我们认为,所谓“建军和建立军事工业以防御敌人而肩负重担”,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一种缺乏事实依据的溢美之词。说得不好听一点,可能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根据不实材料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或者就是一种带偏见性的主观虚构。

日本入侵中国,中国就一定要“由一个军人来领导”吗?这也并非定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各主要参战国政府的战时内阁,有由军人领导的,如日本,但更多的当权者并非军人。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邱吉尔都非军人,德国的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过兵,但并非职业军人,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爱穿军装其实只是一个反动政客。就是苏联的斯大林,虽然获得了大元帅的军衔,但也并非职业军人出身。只有法国的戴高乐确是一名职业军官,但原本并非政府首脑而只是国防部的一位副部长,是自己带头组织法国的反法西斯阵线,才成为法国流亡政府首脑的。可见,战时内阁并不要求必须要由一名军人来领导。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实际上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但并非正式国家元首。

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43 年去世后,蒋介石才兼任国民政府主席。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一位军人领导,完全是由当时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不知道作者为什么把“军人来领导”看作是“最重要”的一条,令人费解。

说蒋介石为了领导抗日战争而把“对社会的命运的种种考虑就被撇到了一边”,这也是对蒋介石政府的一种缺乏事实为证的主观的辩护词,是根本难以成立的。其实,抗日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国实现民主和社会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了抵抗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民主,需要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为各抗日阶级和党派共同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可是蒋介石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广大工农群众需要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以便有力量去抗战。中国共产党已经主动放弃了激烈的土地革命政策,改平分土地为减租减息。而这项反封建的最起码的社会改革,又是中国国民党的导师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所包括的,是民生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介石口头上也承认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但在实践上却顽固地站在大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根本拒绝执行。所以,并不是抗日战争的客观形势迫使蒋介石撇开社会改革的考虑。而是客观形势提供了难得的改革机遇,但蒋介石的反动阶级本质决定了他根本不愿意去考虑和实行任何社会改革,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这才是本质。

以上可见,费正清教授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三句话的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而接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两句话的论断,同样也是难以成立的。

“日本人征服中国的企图”,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命运,当然是有重要影响的,但说成是“决定性”的未免有点过分了。如果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没有发生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那么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吗？不知费正清教授将如何回答？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说，这个问题是十分清楚的：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必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之中。而外部的各种因素，包括日本侵略中国，只是加速或延缓革命胜利的条件。早在1930年1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毛泽东就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而精彩的分析。他说：

“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互相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予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日，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于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

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①

可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或者说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根本矛盾和党建立在对矛盾的正确分析基础上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制定,是广大群众对革命的坚决支持,而不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到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红军发展到30万人的胜利实践,也充分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的曲折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上犯了路线错误的结果。在这里费正清教授把事物的因果关系、主次关系完全搞颠倒了。

“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中国共产党人是否会在“贫困的根据地”里“被饿死”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也许是费正清教授太多虑了。首先,中国之大是没有任何地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不可以去的。没有任何理由断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一定要被困死在贫困的陕北根据地之中。红军长征胜利后曾进行的渡黄河东征,向北和向西的发展,以及关于打通国际交通线的计划等,都非常能说明问题。红军的活动是不可阻拦的。从这方面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就是铁的证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102页。

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①。费正清教授说,红军长征的胜利只是一种“幸存”,请问,别人、别的队伍为什么不能“幸存”呢?例如,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队伍为什么毁灭于大渡河边呢?难道这种“幸存”的背后不也反映了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而夺取最后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吗?

其次,对待贫困,共产党从来就是有办法的,绝不会听任敌人围困而“被饿死”。在江西、国民党军的碉堡政策没有困死饿死中国工农红军。导致红军被迫退出江西而长征的,主要是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但也不能阻止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就是最好的例证。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最大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又说:“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②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善于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被任何敌人采用的任何恶毒的办法“困死”、“饿死”的。

费正清教授正是从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方面都作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分析判断,才得出“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895页。

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这同样是个错误的结论。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企图灭亡和独霸中国,这确实造成了形势的大变化。首先是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使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超过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而上升到首位。在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中,中日矛盾又上升到首位,使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就为中国人民寻求国际援助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其次,使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各阶级以至各阶层均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威胁,是奋起抵抗保卫祖国还是俯首屈服甘做日本的顺民和奴隶,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选择前者,而非后者。这就为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客观的基础。这就是说,日本武装侵略中国本身是一件大坏事,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暴行,也是对全世界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但坏事也会产生另一方面效果,这就是带来了客观形势的变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但是,这种客观机遇对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一样的。机遇是平等地摆在两党而前,并没有偏爱哪一个党。而且相对来说,由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对于这种机遇的把握上本应更为有利。但是结果却是国民党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把握这种机遇,反面是只在全国很小的地区掌握政权,实力也远远不如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很好地把握和利用了这种机遇,这是为什么?这才是评价日本侵略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关键。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著名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用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再适当不过了。毛泽东说:

“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

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的武器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是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绝。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办法，自己解决布匹和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员，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

充分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情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①

事情就是这样十分明白地摆在那里：日本侵略造成了中国形势的大变化。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但也提供了民族振兴的机遇。灾难和机遇，平等地摆在中国各阶级和各党派面前，关键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它。正确地认清形势，制定正确的政策并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必然取得重大成效。而错误地认识形势，制定错误的政策，采取消极抗日祸国殃民的错误办法，也只能造成自己的灾难。前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后者是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国民党。不同路线造成不同结果，这就是客观的历史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日本和中共打倒国民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打倒自己。日本侵略是一种历史罕见的巨大罪恶，又何功之有呢？日本侵略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死对头，又怎么可能出现“日本和中共”携手“打倒国民党”之类的事情呢？这里提一件往事可能是有益的：日本投降后，日本侵华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却被蒋介石包庇下来，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罪犯的应有惩处，反而成为国民党军队同共产党作战的高级顾问，为国民党打内战出谋划策。蒋介石同日本侵略者是什么关系，还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说日本人帮助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不是你们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吗？不错，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是讲过类似的话，不过其真实含义同费正清教授的论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例如，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些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7～1049页。

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部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又说:没有日本人没有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只要把上下文联系起来看,所谓“帮助”不过是一句带有毛泽东语言特色的幽默的反话。也是为了解脱客人的尴尬而表现出来的一种主人的宽宏大度。当然这种幽默的反话绝不是违反原则的。因为,这种所谓的“帮助”,同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要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和坏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变为好事的辩证观点,是可以相通的。所以,如果把毛泽东的话理解为赞许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那就完全弄颠倒了。

像费正清教授这样资深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讲来讲去讲不清楚的问题,有些原来处于被压迫民族地位的国家的学者却可以讲得很清楚。比如墨西哥的《永久》周刊,在一篇题为《中国走向2000年》的文章中,对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的两党斗争,就作了一段颇为概括而精彩的论述:

“到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主宰本世纪的两大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大政党都明显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它们的思想基础却截然不同,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利益。曾在日本侵华时联合起来的这两大政治力量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内战。应该指出,共产党依靠农民群众发展壮大起来,而国民党依靠的是最腐败者云集的城市阶层。在内战于1949年以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时,国民党逃到了台湾岛。”^①

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利益”,有不同的“思想基础”,又依靠了不同的阶级,这些都说到了问题的本质。一个曾经遭

^① 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年1月2日,第8版。

受过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的一份普通的报刊文章作者,能够认识的客观事实,而一个西方大国的资深学者却看不到,讲不清,这是为什么?大概也只能从“思想基础”和“社会利益”方面去找原因了。

总上可见,费正清教授虽然提出了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原因的问题,并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论述,其中也有些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就总体而言,是没有能够讲清楚的。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还有颇多不符合历史实际,也很难令人赞同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是使我们感到十分遗憾的。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1949 年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中一件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事件。但是很可惜,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第一章中,除了从中国再统一的角度略有论及外,对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基本上没有论及。不知是作者的认识问题,还是由于某种考虑而有意回避对新中国作出正确的评价?中国从四分五裂面重新统一,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前仆后继。随着 1997 年的香港回归和 1999 年的澳门回归,只剩下分离的省份台湾省,而祖国统一大业日趋接近完成。费正清教授肯定中国再统一的积极意义,并从再统一的角度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仅止于此,就显得十分不够了。为此,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单独设立一节,从我们的认识角度出发,比较概括地阐述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深远意义的认识。以就教于西方的同行。

一 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最集中也是最好的论述,是1949年开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上的开幕词。毛泽东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①

很可惜,费正清教授对这一方面的伟大意义似并不完全认同。他在第一章中承认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损害了它的主权”,“也促使国民党虚弱下去”^②。这里只点名提到了英国人控制的上海工部局,而没有提其他国家。并惋惜地认为这些不平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0页。

等条约“在 1943 年才废除”似乎太迟。按照他的这种说法,似乎帝国主义奴役压迫中国的问题,在 1943 年后就不再存在了。这实际上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一种无力的辩护。

1943 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确实曾同一些国家共同签署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议,英美法等国宣布放弃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但那实际上只是一种为了产生宣传效果而由美国导演的一幕喜剧。1943 年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大转折的一年。以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为开端,发生一系列改变世界形势的重要事件。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存在二十多年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不复存在了。7 月,英美联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7 月 25 日,意大利发生政变,法西斯党首墨索里尼倒台。9 月 30 日,意大利政府向盟国投降。德、日、意三国同盟倒掉了一边,不再是三足鼎立。10 月 19 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有四亿中国人站在我们一边”的宣传需要,极力造成一种美、英、苏、中四强的形式。于是,在没有通知中国外交部长参加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只好临时由中国驻苏大使代为签名,于 10 月 30 日发表所谓“四强宣言”。稍后,蒋介石又被邀参加了开罗会议,在著名的《开罗宣言》上签了字;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一起照了相。有人说,这是蒋介石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既然中国已经被列入所谓“世界四强”的位置,还保留着种种不平等条约就很不像样子了。所以才在美国的导演下演出这么一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喜剧。但是,它对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要废除的外国租界都在沿海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当时都在日本侵略军的占领之下,是宣称放弃这些特权的英、法、美等国所管辖不到的。德、日、意三国当时败局已定,作为战败国将来自然是要交出这些特权的。至于沙俄的特权,早在 1917 年十月革

命后,列宁领导的苏联政府就已经宣告自动放弃了。所以,这场喜剧的实际作用,只是给蒋介石扮装的“四大领袖”涂上一层油彩,增添了一条华丽的佩带。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图独占中国,并同蒋介石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甚至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大学生引起群众强烈抗议,这样影响重大的事件,号称已经取消治外法权的中国当局竟不敢审判美国兵(这个美国兵回国后竟被宣判无罪)等事实,更使人们看透了这件事的实际价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学界对蒋介石政府同外国签约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普遍不予重视,在不少中国现代史教课书中对这件事甚至不屑一提。所以,如果用这类事件减弱中国从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下获得彻底解放的辉煌胜利,是毫无作用,根本不能得逞的。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人说好就有人说坏,有人赞成就有人反对。像中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奴役这样的事,对亿万中国人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对中国的朋友来说也是如此。有一位拉丁美洲国家的外长赞扬:“这个国家(指中国)多年来在国际权力关系中一直被排除在外,或者低人一等。现在他又重新取得了参与、影响以及确定国际政治立场和决定的权利。”^①这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反应。可是美国的反应却完全相反:“在美国,作为对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应,关心‘共产党威胁’的情绪达到了最高峰。”^②费正清教授说的是事实,因为他本人也是所谓“共产党威胁”狂潮中的受害者。但是,作为中国人还是感到很难理解,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取得了胜利,同美国中间又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在美国的土地上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兵一卒,怎么会“威胁”了美国呢?这是用正常人的思维根本难以理解的,只能说是一

① 委内瑞拉外长埃斯科瓦尔·萨洛姆的谈话,《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4页。

种不理智的冷战思维造成的歇斯底里。而其根源可能在于中国的解放,不仅直接损害了美国在中国的物质利益和特权,而且打击了美国称霸全球的狂妄野心。这大概同美国南北战争胜利后,南方奴隶主们对丧失奴隶感受的切肤之痛相类似吧?

这种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有时会使本该受人尊敬的高级官员发出不体面的胡言乱语。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1950 年 1 月 12 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长篇讲话中,就充满了这种胡言乱语。他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①笔者 1950 年时正在东北的长春市和沈阳市,对于艾奇逊所说“重要的事实”既无所闻,又无所见。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怎么能看见和听见呢!如果说,美国的间谍伪造了假情报,这也可能是常有的事,但是位居美国决策层,身居高位的国务卿总该有点头脑、作点分析吧。可悲的是这位国务卿出于无知和偏见,竟然在大庭广众的场合,公开散布这些离奇的谣言,在国际外交史上创下了愚蠢的新记录。这又一次证明了反共反华的歇斯底里可以使人丧失理智。当然这只是西方的某些政治家。相比之下,西方的学者们要冷静和理智得多。不过,恐怕也难以完全不受这种反华潮流的影响。这也可能是影响美国学者客观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的原因之一。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摆脱帝国主义控制方面的历史性意

① 转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见 1950 年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

义,西方的舆论也是不否认的。比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在1999年10月1日为中国的国庆而写的社论中就说:“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胜利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今天,中国可以声称它取得了一些可以引为自豪的成就。普通的中国公民现在享有的健康、营养、教育和生活水准比这个中央王国漫长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高。北京还可以声称,自帝国主义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把屈辱性的条约强加于清朝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①应该说这个评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邓小平曾对这个问题作过很准确的评述。他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的感受。”^②

二 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更不是“王朝循环”,也不是历史上多次有过的再统一,因为它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格局。不再是少数剥削者统治和压迫大多数被剥削者,而是整个翻了一个个,变成绝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原先的统治者被打翻在地,成了专政的对象;而原来的被统治者,翻身解放,从奴隶而一跃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正如毛泽东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

① 转引自1999年10月4日《参考消息》。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①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根本变化和根本特点。

对于这个与中国传统政治格局根本不同的历史性大变化,费正清教授不仅没有明确指出,并给予肯定,而且似乎还有意抹杀这种本质的区别。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独裁的政党,共产党也是一个独裁的政党,都搞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于是造成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②。所以,在费正清教授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过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已。这显然只是从某些表面形式上看问题,而抹杀了专政的不同本质,因而是十分错误的。

其错误之一是没有分清专政的性质。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类不同性质的专政,这就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最广大的工农劳动者和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即占全民族 95% 以上的大多数共同一致对只占百分之几的少数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最进步的最民主的专政。它充分保证了广大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应有的权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5 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9 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根本大法,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在以后通过的历次宪法(包括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等)中,都明确写入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和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的条款。这是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客观事实,得到了最高级的法律肯定,是全国人民意志的最权威的科学表达。虽然在实践中,在某段时间、某些地方和单位贯彻宪法,保障人民权利方面有各种缺点和不足之处,但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基本的事实是不能否定的。

其错误之二是,没有搞清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分歧的本质和要害在哪里。这个本质和要害并不是费正清教授所讲的由哪个党“一党专政”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封建主义的问题。即是彻底消灭封建主义为中国打开走向民主和现代化之路,还是维护封建主义而使中国永远维持贫困落后和被欺侮被损害的悲惨地位的问题。这里的核心是如何对待封建土地制度,也就是如何对待农民、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正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的。20年代大革命时期,两党斗争的焦点是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支持了农民翻身分配土地的正义要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两党打了十年内战,争论的焦点仍是农民土地问题。所以这十年也称为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为了民族大义,暂缓推迟了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平分土地运动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成为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一个关键。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

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他尖锐地指出：“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的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①可见，两党分歧的本质和要害并不是由哪一个党搞“一党专政”，而在于是否支持农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支持农民推翻封建主义，改革土地制度。中国共产党正是坚定地站在广大农民一边，支持农民反封建的正义斗争，领导他们开展斗争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才获得了战胜国民党政府的伟大力量。这个反封建的问题才是国民党同共产党分歧的要害和斗争的焦点。

这里附带说一下，顽固地反对农民土地要求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一直到在大陆上全军覆灭，如丧家之犬逃到台湾后，才逐渐醒悟到这一点。他在台湾是搞了土地改革的，当然是以很不彻底的发行债券有偿转让的方式改革了日伪时期遗留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指导思想和做法有多少毛病，但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为台湾后来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比较好的环境。

谈到土地改革，费正清教授同我们的看法也是有分歧的。他说：“取消土地私有制及由国家管理劳动力这两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唐初的‘均田制’，这一制度的均分土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有效地分配劳动力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往的造反者常常是平均主义者。”^②追溯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当然是应该的。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中的平均主义传统也确实存在的，而且相当浓厚和顽强，这是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不过必须注意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作具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2页。

分析,既要看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又要看到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别性。因为,20世纪40—50年代的土地改革,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它同唐初的均田制和后来农民运动中的平均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对新中国土地改革的本质和特点讲得非常透彻。他说:“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因为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贫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①。这就是说,中国实行土地改革的目的,既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贫困农民,更不是像费正清教授所说,“主要目的是通过有效地分配劳动力来增加政府的收入”^②,而是着眼于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条件、开辟道路。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同古代唐初的均田制以及近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等的本质区别所在。很遗憾,这个本质特点恰恰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没有能够给予重视和说明的。而不懂得解放农民的重要历史意义,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劳动人民当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3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2页。

家作主的社会大变化的光辉里程碑。

三 为中国向现代化过渡奠定了基础

中国近代屡遭西方列强的掠夺和凌辱,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文化落后,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落后就要挨打。不甘屈服和不甘落后的中国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和文明,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征程十分艰难而曲折。正如墨西哥《永久》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上半叶是社会和政治的一段漫长的“分娩”期。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为摆脱那些妨碍了它在文明方面长期领先的种种羁绊而进行了卓绝的斗争。”^①而结束这个充满痛苦和灾难的“分娩期”的标志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和新起点。

在中国这样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而又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当时的提法是工业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方面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生存环境的改善;又包括社会组织方面,以及人们的观念形态、文化习俗的现代化等等。费正清教授对这个问题也是十分关心的。他谈到了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也涉及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深刻变化,谈到了父系家族对妇女和青年控制的削弱等等。还花了较大的篇幅谈到知识分子问题。这里有不少颇有价值的见解。不过。我们感到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上,费正清教授的缺欠主要是忽略了农民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大概也是西方学者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常常忽略的

① 转引自 2000 年 1 月 2 日《参考消息》。

问题。

而在中国,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中心问题,在很多事关大局的重要问题上它都是成败的关键。

应该从哪些方面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向现代化过渡奠定了基础呢?需要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们只准备就其中主要的,又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涉及的问题,谈如下几点看法:

充分认识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对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意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农村人口的多少,农民在全国人口的比例,农业生产力的水平高低,历来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而1949年的中国则是一个典型的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90%,农民是全国最大的阶级,而农业生产力则是极其落后的。比较而言,可能比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落后至少100年。因此,提高农业生产力,发展整个国民经济,使农业人口逐渐向城市人口转变,使农民逐渐变成工人和其他各种职业的劳动者,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十分清醒的。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在报告中指出: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毛泽东强调说:“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党派,都是完全必要的。”^① 我认为,不但对于政治家们“认识这一切”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一切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包括西方学者)来说“认识这一切”也是完全必要的。

农民问题如此重要,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则是彻底废除封建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如不迈出这决定性一步,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只有把农业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农业生产力才能大大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才能够实现,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够提高。当然,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并不等于解决全部问题,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中国现代化的路还很长。但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终归是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是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推动力量。这方面,费正清教授是注意到了,并花费了不少笔墨,可惜的是有时扯得太远。

1949年的中国,教育不发达,文盲多达80%。科技水平极端落后,科研机构几乎没有,专业科研人员十分稀少。“据统计,解放初期全国的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总共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多人。1949年11月,在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但全部研究机构只有22个,研究人员200人。按4.5亿人口计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只有1名科研人员。学科和门类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页。

空白点很多”^①。大学生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也是非常低的。据 1952 年的统计：“在校高校学生，我国平均每一万居民中只有 5 个，苏联是 86 个，波兰是 50 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更多了。”^②这就是说，新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一个非常低的起点出发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一次真正的腾飞，发展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由于全党的努力和重视，到 1960 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 1952 年增长了近 60 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 196.9 万人，比 1952 年增长了 3.6 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加到 30 名，比 1952 年增长了 3 倍。”^③这只是例子之一而已。因为关于教育和科技方面的问题，还有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另有专章评述，为避免重复，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水平是一个多层次的十分复杂的问题。1999 年 6 月 26 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金得主罗伯特·W·费格尔应邀在北京作了题为《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的学术演讲。他认为：“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国正处于美国 1897 年左右的水平。同样，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表明，当前，中国正处在美国 1880 年的水准。但如果我们转向教育，则两国的比较更为有利。就小学在校学生和相关的年龄组的比例而言，中国已达到美国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水平。然而，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两国的中学教育，就会看出中国已经达到美国 1970 年的水平。而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目前水平的 4 倍。如果以预期寿命作为衡量的标准，则中国已经达到美国 1966 年的水平。但是以城镇人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2 页。

② 同上书，第 500 页。

③ 同上书，第 508 页。

口的比例作比,中国则处于美国 1890 年的水平。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处于同一水平,而是若干不同的水平并存。”^①

中国人民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之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只相当于美国的 1897 年,差距多达一百多年,这不是说明中国没有进步,而是说明 1949 年的建国之初差距更大,距离更远,说明中国现代化使命之沉重和路程之漫长。同时也说明,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几百年的差距,即使中国人拼命加速度,也不是几十年就可以拉平的,更不是搞几次“大跃进”就可以轻易赶超得了的。“赶超”的雄心壮志是可贵的,是不可缺少的;而“赶超”的实际行动则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奋起直追,绝不可盲目乐观,浪漫幻想。另一些比较,比如说,小学教育水平只比美国差 40 多年,中等教育只差 20 多年,人均预期寿命只差 30 多年,则充分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平凡的成就。说明新中国在漫长的现代化路程中,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位哥伦比亚《时代报》的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一场 50 年的革命,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文章,其中一段话是说得相当客观而准确的。他说:“中国取得的成就数不胜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如此暂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以如此惊人的速度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生活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以及降低文盲率和死亡率方面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② 是否是“举世无双”? 我们不必对一位记者的评价用语作考核和计较。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终于确定的摆脱了封闭保守的古老羁绊,坚定地走上了社会现代化之路,并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之中。

① 1999 年 7 月 2 日《中国青年报》。

② 转引自 1999 年 9 月 30 日《参考消息》。

四 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当时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原辽阔,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大国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全球的各种斗争中站在哪一边,自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当然人口众多的大国,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在世界政治斗争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近代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被迫沉默,而被称为“无声的中国”。但沉寂的火山总有一天会爆发。革命的中国,特别是以崭新姿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再也不是可以不被放在视野之内的无足轻重的力量了。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1949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高峰期。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但冷战对峙格局的客观存在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所以无论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中国的动向都会直接影响到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正如法国的《费加罗报》的一篇专门评论中国建国五十周年的社论中说的:“人民中国诞生于冷战时期。对西方来说,这一事件乃是一个严重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立足了。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共产主义首先就是从根本上拒绝西方的制度。在他们眼中,西方制度也是殖民化、腐朽和侮辱的同义词。”^① 这里侧重点讲的是意识形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国际共产主义胜利,西方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起码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这当然是对的,但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直接的

^① 转引自1999年10月5日《参考消息》。

重大的改变。

众所周知,在1945年4月召开的有苏、美、英三国最高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上,讨论了打败德日法西斯之后的战后世界安排问题,除了公开发表的《克里米亚声明》,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之外,还有若干秘密协定和谅解。其中包括直接涉及对中国的安排。三大国首脑在并未征得号称“第四大国”的中国同意的情况下,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决定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使苏联在旅顺和大连以及整个东北取得“优越权益”;而苏联则承认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统治者。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在使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得特权的条件下,而把中国整个地区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纳入西方阵营的体系之中。如此重大决策事先并不征求中国的意见,也不尊重中国主权,可见当时中国的所谓世界大国地位,只是浪得虚名而已。实际上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眼中,蒋介石并无地位。可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特别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的著名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突破了三大国首脑商定的雅尔塔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使美国本来视为自己的政治盟友和附庸的中国,脱离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而去。一个五亿人口的世界大国,脱离了西方阵营而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这当然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国际政治天秤中一个有份量的法码的移位。这才是使美国政客大动肝火,掀起追究“谁失去中国”狂潮的真正原因。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当然不是说从成立之日就立竿见影马上如何的。而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变化起点。从此之后,新中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而且作用日益增强。这里需要的是历史的尺度,而不是人生的尺度。因为“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

的”^①。联系到抗美援朝和抗美援朝的战场,联系到1954年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举行的亚非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一直到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和中美邦交的逐步恢复,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作用日益得到充分的展现。至今,中国已成为解决全球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缺少的重要政治力量。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刊在悼念毛泽东逝世的专门文章中,对中国革命曾有比较中肯的评价。该刊说:“中国就在作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走过了伟大而艰难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由一个四分五裂的被奴役的国家一跃而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由毫无权利的和孤立无援的殖民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占领的牺牲品一跃而为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一个饥饿和普遍落后的国家一跃而为有组织地进行劳动,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②应该说明的是,当时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存在矛盾和对立的状态。由南共的报刊对中国作出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说中国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恐怕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吧。

五 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的被剥削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②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的高潮。这既是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长期斗争的延续，又是这些国家和人民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而促进的新觉醒的结果。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国家、民族、阶级间的大搏斗，世界上一切民族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进去，从痛苦的实践中受到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批大浪潮出现在亚洲。首先是，被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占领的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等国，纷纷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宣布独立，建立起共和国。接着，原为美、英等国长期占领的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开展民族解放斗争，迫使原宗主国放弃殖民霸权。这样，菲律宾于1946年7月建立共和国，不再是美国的殖民地。缅甸于1948年1月摆脱英国的控制，宣告独立。马来西亚于1948年2月宣告独立。巴基斯坦和印度也于1948年8月14日和15日分别宣布独立。客观上形成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批大浪潮的最高峰。其影响自然是十分巨大的。这样，长期控制亚洲大多数民族的殖民主义霸权，开始在这一地区衰退。

50年代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转移到非洲。一大批原来被英、法等国占领的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和解放。除了埃及、突尼斯、苏丹、摩洛哥等少数国家在50年代获得独立外，一大批国家在60年代获得独立。如毛里塔尼亚、马里、塞内加尔、加纳、尼日利亚、索马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刚果、肯尼亚、利比亚等数十个新的国家涌现于世界政治舞台。使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全球殖民体系终于逐步瓦解，铲除了这个奴役大多数人的祸害。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世界第一号殖民强国的英国，终于日落西山，好景不在，葬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之中。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则帝国主义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义战……凡

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① 设想,如果没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没有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牵制和分散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则中国革命受到的压力必然要沉重得多,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也要多得多;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沉重打击,对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巨大影响,对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巨大鼓舞,其他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也可能会有加倍的困难和阻力。阿尔及利亚的《非洲革命》周刊,在悼念毛泽东逝世时写过一篇社论,比较恰当地评价了中国革命对被压迫民族的激励和鼓舞作用。这篇社论说:“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长征的史诗无疑是一个新时代的觉醒和开端,中国对帝国主义和在国内所取得的胜利,加速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觉悟……中国给世界提供了可赞赏的教益。不管在政治、文化、语言方面,还是经济方面,中国人民都以身作则。这就是毛给其他第三世界人民树立了榜样。”^② 请看:“加速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觉悟”,“提供了可赞赏的教益”,“树立了榜样”,再加上鼓舞被压迫人民的斗志和增强胜利的信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在上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作了五个方面的概括。即: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劳动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为向中国现代化过渡奠定了基础;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的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增强了他们前进的信心。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② 《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和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同行们以为然否？

第二章

中国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由悉尼大学政治学讲师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执笔的第二章《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尼古拉斯·R·拉迪执笔的第三章《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大决策的研究,比较充分地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七年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作者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对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予以多角度的具体分析,力图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在一些具体的历史论述、分析和评价时,依然存在着较多缺陷,有的重大史实遗漏,有的观点错误,有的分析不够客观,有的结论值得商榷。因此,对这两章所涉及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予以评析,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的论述和估价,仍然是必要的。

第一节 社会改造的开创性实践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的同时,进行了繁重的社会改革,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继而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

一 经济恢复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

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是在旧中国的基础上起步的。要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状况,就必须对旧中国的经济加以考察。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三章中,拉迪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入手,分析了工业、农业的发展及衰退情况,指出:“中国的大部分几乎未被现代经济触动”,“现代部门的规模太小,它与其他区域和其他经济部门的联系太弱,无力促进全面的生长”。中日战争和内战使中国经济“长期的结构问题更加严重了”,“战争的破坏是重大的”,“共产党政权继承的最为沉重的包袱是极度的通货膨胀”^①,等等。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的经济面貌,对于说明新中国的经济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开始恢复的,非常必要而富有意义。但是,仅此还不够,只从生产力的状况和现代经济活动的布局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经济状态的本质。要弄清旧中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54~155页。

国的经济情况,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加以考察,不弄清这少数现代经济由谁占有和为谁服务,便不可能对旧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落后和衰败作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因此,有必要给以说明。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武装入侵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便开始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旧中国政府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政治经济特权,并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同封建势力、官僚资本相勾结,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开始以后,这种状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严重。到1936年,外国在中国的企业财产达43亿美元。其中帝国主义工业资本约占当时中国工业资本的41%,并垄断了生铁产量的80%,原煤产量的56%,发电量的76%,棉布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7%。帝国主义势力霸占的交通运输业,航运吨位占69.5%,铁路里程占90%。外国在中国开设银行约32家,资产达19亿美元,在金融业中占有垄断地位。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贷款,均需由中国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关税、盐税担保,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财政^①。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逐渐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代表的庞大的官僚资本。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这种官僚资本具有极大的封建性、买办性、军事性和垄断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为缓慢,工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因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落后和衰退的根本原因。

① 参见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承接下来的是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国民经济已濒于全面崩溃,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1936年相比:重工业生产大约下降70%,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30%,农业生产大约下降25%。全国约有1.2亿亩农田受灾,灾民达4000余万。公路、铁路、桥梁、海运、内河航运等交通运输业破坏严重,津浦、京汉、粤汉、陇海、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没有一条能全线通车,致使交通梗阻,城市物资严重匮乏。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采取滥发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使自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①,造成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投机资本猖獗。加之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民党政府对军政公教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致使军费和行政费用开支庞大,1949年国家财政收支出现了2/3的赤字。为了解决急需,国家不得不暂时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这又造成物价的剧烈波动。因此,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解决极度的财政困难,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刻不容缓的任务。

拉迪认为:恢复经济、制止通货膨胀、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将实行的制度改革打好基础,是恢复时期新政府的几个重要目标。他首先抓住当时最急需解决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肯定了稳定物价、统一财政的措施和成果。指出:物价得以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1950年建立的新财政制度规定下税收继续增加,同时削减了投资和其他非军事支出”^②。这样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其中关于成立统一的财政制度时间问题是含糊的。拉迪认为:新政府掌权后的6个月内采取的集中财政和扩大税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58页。

基础的措施,提供了打破极度通货膨胀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成立统一的财政制度。”^①事实上,在财经管理上实行高度的统一是在1950年3月初步稳定物价之后。此前的6个月,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要是通过加强对金融管理、商品市场的管理、打击投机活动、调运物资、短期紧缩通货、平抑物价等措施平息了涨价风潮。到1950年3月,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初步稳定了物价。但要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问题,就必须从平衡财政收支入手。为此,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此后,人民政府采取紧缩开支、发行公债、整顿税收等措施,迅速扭转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结果创造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1951年收支相抵并略有节余的奇迹。

要讲国民经济的恢复,不讲共产党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和经济恢复的具体成就,就不足以较为完整地反映这段历史。这在拉迪的论述中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要创造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这是符合客观需要的正确方针。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全国新老解放区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的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彻底消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56页。

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①。与此同时,党和政府积极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兴修水利,发放贷款,改进技术,制定合理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对工商业进行了全面调整,通过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生机和活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1951年与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了11.9%,商品销售额增加33.6%^②。与此同时,调整精简机构,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

由于党和政府把恢复生产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45%,农业总产值增长

①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泰韦斯在第二章中作了专节论述。他所作的叙述、分析和评价有些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也存在需要商榷的问题。一是关于土地改革发生的原因未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二是关于土地改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过变动的判断不符合实际;三是对土地改革是否提高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持怀疑态度缺乏事实根据;四是把恶霸看成是“旧名流中最暴虐的人”,认为“‘恶霸’是一个武断的称呼”以及大规模处决地主的说法是错误的。对于这些问题,孙瑞鸾撰写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动因、政策和成就——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有关部分的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5期)一文已经做了较详细的评析,本文就不再赘述。

② 参见李宗植、张寿彭编:《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

48.5%^③。钢、生铁、原煤、原油、发电量、水泥、棉纱、粮食、棉花的年产量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建设异常迅速,1952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4518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由1949年的80768公里增加到126675公里,内河通航由1949年的73651公里增加到95025公里,民用航空航线从0发展到13123公里。国内外贸易成绩显著,1952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76.8亿元,比1949年增长97.3%;对外贸易从1950年起实现了顺差,1952年贸易进出口总额64.6亿元,比1950年增加了55%。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农民的收入增加了30%,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增加了70%^①。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就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而后又多次谈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12月,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公布了总路线的内容,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

① 参见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8页。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①。同时对“相当长的时期”作了说明,设想为三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的时间,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 3 年,共 18 年。1954 年 2 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并于当年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实行,改变了原先那种先进行 15 年到 20 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对新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②。过渡设想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重要问题,但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没有作出分析,这里有必要作些探讨。我们的看法是:

经过三年的实践,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日益巩固,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积累了新的经验,这些实践成果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有了新的设想。1955 年 3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提出的^③。第一,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中国已建立起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由于没收官僚资本,使全国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 80% 成为国营资产,全国银行业基本上由国家经营,而且国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社会产品的流通过程,成为支持国家财政、稳定经济局势的主要力量,并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越性和重要地位。国营经济是现有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00~701 页。

② 关于过渡时期的提法,中国理论界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提法,目前仍处于研讨过程之中。

③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89 页。

基础工业的主体,是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依靠力量。它的发展壮大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个因素。第二,经过三年的实践,党中央和毛泽东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经验。在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和限制的同时,加强了它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联系,使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它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另一个方面看,经过建国初期同投机资本和不法资本家“五毒”(即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活动的较量与斗争,使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而对其消极破坏作用估量过重,因而明确提出改造、消灭的政策。第三,土地改革后农村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积累了许多经验。土地改革后,为了克服生产资料不足、资金短缺等困难,农民成立了季节性的简单互助组。党中央及时加以引导,于是简单协作的互助组很快普遍地建立起来,并有步骤地发展了常年互助组,试办了初级合作社。党总结这些实践的经验,认为这些互助合作形式,不仅是帮助农民克服困难、增加生产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引导农业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适当形式。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阶梯。第四,国际环境和苏联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而苏联则给予积极的援助和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又很不景气,而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的活力,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特别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制度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榜样作用。这也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应当马上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

如何评价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秦韦斯提出,这一总路线在几个

方面反映了与前一个时期的延续性。“它的特征是渐进主义；工业化和改造都要在大约 15 年的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还有，总路线仍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实行。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将继续起主要作用。过渡的最早阶段将是‘国家资本主义’，私营成分在其中日益与国营成分发生联系，但资本家仍将保持约 1/4 的企业利润。但是，由于中共统战政策的性质，改造的过程自然包括威胁资产阶级的几个方面，虽然威胁的形式不是大张旗鼓的。”“毛主席这时在把重点更明确地转到改造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①这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总路线与前一个时期的联系及毛泽东思想上的一个变化。但他认为：“1953 年采用总路线时的政治形势表明，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几年前就已产生的分歧，即究竟使社会主要集团安心的做法应强调到什么程度，控制和改造他们的做法又应强调到什么程度。”^②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总路线提出之前党内的主要分歧是什么？泰韦斯对此判断有偏误。

当时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新民主主义有五种经济成分，应该使它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等重大问题，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转变等问题的具体步骤、方式、方法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就不尽一致。比如，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认为在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之前，也可以先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地触动农民的私有制，他主张先有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94、95 页。

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在实行工业化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刘少奇的主张则与其相反。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毛泽东 1952 年就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则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等等^①。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实现革命转变的方法和步骤等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社会主要集团的安心、控制和改造问题。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即要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个体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它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为主体,以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总路线。从总体上看,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的必然性,党为贯彻实施总路线所规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方法步骤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需要。它的实施,不仅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做的结论那样:“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总路线的贯彻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强化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淡化了工业化的内容”^②。虽然也强调工业化是主体,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但实践中确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1~62 页。

② 朱阳、郭永钧主编:《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2 页。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重革命、轻建设的问题比较突出,改造进程一再“加速”、“加快”,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客观规律,以至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原定 15 年的过渡,“一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改”的任务也做得很粗,遗留下很多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另外,从今天的角度看,总路线没有提出有关实现国家民主化的要求,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超计划实现的因素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国内外学者都非常重视并作了大量的研究。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泰韦斯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进程。他指出:朝社会主义化的农业发展行动在全国解放前的华北根据地随着互助组的发展就已经开始了。1949 年以后,互助活动在新老解放区发展起来,同时建立了试验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 1952 至 1953 年大量出现。1955 年在毛泽东干预后,“运动不但越来越快地向前大发展,而且在 1956 年的春季出现了把合作社改组成高级的或完全集体化的组织的行动”^①。他认为中国的政策包括了对苏联经验的几大修正。“首先,合作化被计划成逐步的、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的过程,而不是苏联采取的突然的和混乱的形式。”中共政策设想了三步走的过程:第一步为互助组,然后是低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限制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三是“中共避免了斯大林一心一意地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最后是鉴于中国的落后的工业基础,决定“集体化应先于农业机械化,而不是两者同步发展”^②。通过比较,他肯定了中国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114 页。

② 同上书,第 114、117 页。

的政策。他的分析和概括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对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的争论,他认为“争论的中心是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毛泽东最初支持邓子恢的政策,但在1955年5月中“毛泽东转到了对合作化的步伐不满的立场上,随之发生了与邓子恢的激烈争论。当邓子恢坚持农村工作部提出的到1956年10月农业生产合作社达到100万个时,毛泽东对这条消极的道路提出警告,并且坚持130万个的目标。前后考证,似乎是毛泽东在5月下半月的倡议,而不是学者们通常引用的他的7月31日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发言,在导致政策变化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这样的分析和考证,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把毛泽东胜利的原因归结为“他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和以下几个有利因素,即毛泽东的规划“相当温和的性质和规划的论据”;“至少是在千方百计地解决农业部门所面临的严重的问题”;“在政治上,毛泽东不是一个人在说话,而是表达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精英的意见”;“毛主席目标的超额完成似乎使相反的观点受到了怀疑”^②。这样的分析比较客观,对如何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然加速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他的论述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例如,他把1955年5月中央发动的肃反运动看成“它的一个重大目的是让整个社会中反对集体化的人保持沉默”^③。而从当时的实际历史进程看,肃反和农业合作化这两个运动并无内在联系,硬把它们拉在一起,是缺乏足够事实根据的。

客观的事实是,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就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不镇压反革命,新中国的政权就不能巩固。这一任务在50年代几乎持续不断,不过每次运动的重点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18、119页。

② ③ 同上书,第120~121页。

和采取的具体形式,又因形势的不同而有所区别。1955年上半年,当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又有重新抬头之势,在工矿企业制造破坏事故,在农村纵火焚烧粮仓、森林和农业合作社的财产,杀害干部群众。仅1954年全国就发生凶杀暗害事件6300多起,广东、浙江、湖北等13个省还发生了8起反革命暴乱和14起骚乱事件,这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①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加强同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7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从1955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肃清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军队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打击反革命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保证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反革命分子当然也不会拥护农业合作化,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会搞破坏,从这个角度说,肃反运动当然也有利于农业合作化。但就肃反运动的发动和整个发展进程看,很难说它是针对整个社会中反对集体化的人。

事实上,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就已经开始了。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民个体经济是分散的、落后的,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要发展,只有社会主义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两条道路可走,但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当然不能允许广大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此党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走上了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互助合作的道路。1951年12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国各地发展了初级形式的互助组，并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全国有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建立了36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3年开始，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要求，加快了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同年12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规定：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同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发展道路，就是我们党所指出的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并指出初级社将“日益成为我们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的环节”。要求各级党委注意对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逐步试办和逐步推行的条件^①。决议拟定1954年秋收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现有的1.4万个发展到3.58万个，到1957年发展到80万个，参加农户占总农户的20%左右。于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以发展互助组为主转入以发展初级农业社为中心的阶段，全国开始大办农业初级社。1954年底，全国建立起初级社48万个，到1955年4月就已发展到67万个，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为此，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3月26日，毛泽东找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停、缩、发”的方针（即分别不同地区，采取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666页。

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4至5月,各地共收缩了2万个农业社,巩固了65万个社。

但是,从1955年5月起党内对合作化形势的估计及合作化发展速度产生了较大分歧。一种意见是以邓子恢为代表,主张整顿巩固,稳步前进;另一种意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主张全面规划,加快步伐。5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重申“停、缩、发”三字方针的同时,重点强调“发”,提出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必须改变。会议提出1956年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毛泽东主张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农业合作化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和政策。但错误地批判前段整顿合作社犯了“右的错误”,把邓子恢等同志的意见视为“小脚女人”、“右倾”,认为“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①。会后,全国开展了反右倾保守斗争,合作化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并公开点名批评以邓子恢为首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犯了右倾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就把合作化运动推向了更高速发展的阶段,形成了全国性的高潮。

从1955年夏季开始,初级社迅速向全国普及,到1956年春又掀起大办高级社的高潮。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高级社由1955年底的1.7万个发展到54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4%上升到87.8%。原来设想用18年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结果不到7年就超计划完成了,提前了11年的时间。

如此急速地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动因是什么?泰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8页。

韦斯认为,毛泽东 1955 年中期呼吁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从政治上说,“毛泽东的计划并不过于激进”,但“它的政治冲击却是激进的。毛泽东指出发展是思想意识上唯一正确的路线,以此结束了前几个月的徘徊不前的局面”。1956 年底农业集体化的完成,“更多的是由于党组织对运动的热情贯彻”。合作化得以较顺利完成,很重要的一条是“有意识地朝着渐进主义和缓和社会紧张形势的方向修正苏联的做法”,“农村有纪律的党组织也是关键的因素”。另外,“中共精心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但给大多数农民带来好处,而且也使全体农民除了合作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行政压力、公式化的号召、强制和物质成果的有力结合在“高潮”时期开始发挥作用^①。这样的分析和见解,反映了作者力求以严谨和求实的研究态度对待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其中的一些分析也是有较强的说服力的,但是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农业合作化运动之所以超计划实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 1955 年中期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是直接的动因,而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则是决定性的因素。1955 年春季毛泽东鉴于农村灾情严重、粮食统购任务紧张的严峻形势,支持放慢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步伐。四五月间,他外出视察工作,沿途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农村形势好的一面,缺点和问题方面的真实情况被某些地方负责人有意地粉饰掩盖了。这种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调查研究,影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分析和判断。从 5 月开始,他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来自各方面的对农村形势的估量。他认为农民生产是积极的,不少地方同志对办农业社是积极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农村工作部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120~123 页。

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①。因而感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不真实,开始对邓子恢的工作由支持转向尖锐地批评,并发动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严厉批判,决定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于是,稳步前进的方针被放弃,全国在一片反右声中迅速出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由于对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造成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导致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形势估计的失误。一是急于改变所有制,过高地估计了所有制的改造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毛泽东认为,要改变中国农业的落后状况,就必须引导个体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农业与工业化的矛盾。因此,希望通过加快所有制的改造来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则。二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泽东主观地认为,土地改革后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有发展合作社的要求,中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事实上,农民既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更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毛泽东把很大程度上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积极性”,把个体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道路,对农民发家致富的要求当成“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加以批判。这种根本性理论分析的倾向性偏差,必然导致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 50 年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泰韦斯认为,1956 年底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是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它是把绝大部分中国人置于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之下的社会和制度改造的一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70 页。

个巨大成就”，“中共领导人发展了他们自己的途径和方法”^①。拉迪的看法则不同。他在第三章中提出：“1955至1956年的集体化运动对中国的农业问题甚至没有提供部分的解决办法。直接的后果是，随着集体化出现的各项政策引起了农业严重的短期破坏。”“合作化对已提高了的农业的发展或生产力似乎没有作出贡献。”^②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够的，还缺乏全面的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存在两重性，巨大成就和严重缺欠并存。因此，只有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如实地指出缺点和失误，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完成，在中国农村实现了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把5亿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推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的看来，这场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社会的大动荡和生产力的破坏，而且为农村以后的进步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必须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失误，以致于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在合作化高潮中，不少地方采取政治强制和行政手段，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在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理体制中，存在着公有化程度过高、生产结构单一、集中过多、统的过死、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问题，不利于社员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农业合作化后的二十多年历史看，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但不能因此就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简单地结论否定，要作具体的分析。应该看到，农业合作化后，在广大农村对土地の利用合理规划，开展大规模水利灌溉、农田基本建设和田间林网化等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13页。

② 同上书，第176、177页。

等,就有了条件并得以逐步进行,机器耕作、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也可以逐步推广了,从而使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仍然只在原来的小块土地上作文章,这个变化是难以想象的。农业合作化完成的1956年,尽管农业受灾,全国仍增产粮食176亿斤。1957年与农业合作化前的1952年相比,粮食总产量达到3900亿斤,棉花总产量达到3280万担,分别增长了19%和26%,平均年增长速度为3.7%和4.7%;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6.77亿亩,扩大了5867万亩;农用拖拉机达24629台,增长了12.3倍;大牲畜繁殖头数达8382万头,增长了9.6%;生猪存栏1.459亿头,增长了62.5%;水产品总量达312万吨,增长87%。在“一五”期间,国家发放农业贷款76亿元,对农田水利事业的投资41.8亿元,建成大型水库13座,兴建了大量的中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全国新增灌溉面积2.18亿亩,相当于1952年全部灌溉面积的69%^①。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农业合作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合作化也奠定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培养了大批基层经济和行政管理人才,为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和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58年后,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一系列“左”的错误的发展,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太大的进步,这虽与农业合作化后形成的生产管理体制有关,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合作化对农业的发展没有作出贡献的说法是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① 参见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85页。

三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应遗漏

手工业的改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一部分,就不能称其为三大改造。但在一些论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章和著作中,对这一方面内容或是轻描淡写,或是一字不提,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手工业改造的问题。这“对于建国初期拥有 2000 万手工业劳动者,手工业产值相当于工业总产值的 31% 的格局,应该是不相适应的”^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部史学专著,对于中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介绍,造成遗漏,同样是不应该的。

手工业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明时期,手工业已高度发展,在当时的全世界中占有领先的十分显赫的地位。由于旧中国的近代工业十分落后,机械大工业领域有限,许多行业依然是手工业的天下,手工业仍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这是中国经济构成中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特点。因此,不能用看待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手工业地位的观点,看待中国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供应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活跃市场、吸纳劳动力就业、为国家出口创汇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 1952 年初步统计,全国城乡个体手工业从业人数达 1930 余万人,手工业的产值 100 亿元,手工业产品占农民所

① 顾龙生:《中国手工业改造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 60%~70%，有的达到 80%^①。

但是，个体手工业经营分散，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生产盲目保守，劳动生产率低下。这种个体的私有制生产关系限制了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采用，难以适应国家日益发展和人民生活要求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个体手工业者作为小私有者和小商品出售者，时刻滋长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必须对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一任务早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确定下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同时，在一些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并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中，有重点、有步骤地组织手工业合作社，进行典型试办。1951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制定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到1952年，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由1949年的300多个发展到2700多个，社员从8万多人增加到25万多人^②。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手工业合作社进入了全面大发展的阶段。1953年11月20日至12月17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四年来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的经验，提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组织形式是由低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小组、过渡形式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改造的方法是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在步骤上，是从小到大，从低级逐步过渡到高级。会议还根据总路线的要求，提出了手工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计划。拟在1954年内，参加各种形式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由1953年的30万增加到90万，到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页。

1957 年发展到 500 万,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期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

然而,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手工业与大工业、农副业之间,手工业内部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现象,产供销发生困难。为此,1954 年 12 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提出,对手工业供产销和改造要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1955 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摸清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整顿、巩固、提高现有合作组织,适当发展新社。

1953 年至 1955 年上半年,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稳步前进,发展比较健康,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3 年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 4629 个,1954 年增加到 111741 个,1955 年达 20928 个;而从业人员也从 27.1 万人发展到 59.6 万人和 97.6 万人,由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 3.5% 上升到 6.7% 和 11.9%^①。

1955 年夏季以后,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手工业改造的步伐也急剧加快了。1955 年 12 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制定了加速手工业改造步伐的规划。要求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必须与国家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适应,在 1956 年和 1957 年两年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于是,1956 年初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出现了整个行业和整个地区组织起来的情况,许多手工业者越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供销合作社而直接参加了手工业合作社。1 月 12 日,北京市手工业全部实现了合作化。随后,天津、南京、武汉、上海等城市也都

① 参见李宗植、张寿彭编:《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9 页。

宣告完成了手工业合作化。截止 1956 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经过调整为 9.91 万个,社(组)员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 92%^①。至此,中国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伟大变革,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综观中国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大批的手工业合作社发展成为地方工业,成为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利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合作化后,手工业生产改进技术和装备成为可能,一批生产合作社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生产能力。1956 年,全国手工业总产值达 117 亿元,提前完成“一五”计划要求的指标;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达 4.3 亿元,90%的社员都增加了收入,工资水平比 1952 年增加 66%^②,手工业者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劳动条件,都得到了改善。

但是,在手工业改造的高潮中也存在着急于求成、盲目求纯等缺点。某些地区不顾手工业生产、经营的特点,盲目办大社,过早过急地集中生产和统一核算盈亏,导致吃“大锅饭”、出“大路货”。结果造成产品花色种类减少,质量下降,原有的一些协作和供销关系中断,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党中央从发动手工业改造高潮开始,就估计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要求予以注意。在手工业合作化的后期,各地对手工业合作社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着重解决集中和分散的问题,把很大一部分合作社分改成合作小组,实行单独核算。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手工业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过于单一化的问题,没有得到根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9 页。

② 参见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9 页。

本的解决。

四 对民族资本主义和平赎买的意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建国初期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并逐步加以改造,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造道路,完成了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但是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泰韦斯只是指出“到1955年秋,合作化取得重大进展的日益明显的迹象容许毛泽东及其同事将他们一部分注意力转向对工商业的改造”。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争论与建立农业合作社速度的争论相似,在1955年秋才出现全面一致的意见,“即现代部门的社会主义化必须与合作化保持一致”。“从10月底到1月,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接见一些著名的资本家,表面上征求他们的意见,其实是为了加深他们对加快改造步伐的必要性的认识”。“以后发生的一切与超额完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标的情况相似”^①。到1月底,所有大城市中心的改造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这样的论述过于简略,难以反映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概貌,这与其在新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它对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同时还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似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1955秋后才开始重视工商业的改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以较为详尽的阐述并作出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经营上的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24页。

困难,国家采取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这实际上就把私营工商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2年底,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收购产品的产值占私营工业总产值的56%,私营工业中有997户实行了公私合营。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等地调查后,向中央提出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情况和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①。党中央对这个报告十分重视,6月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确定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党中央当时设想,再用3年到5年的时间,可以基本上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然而,“一五”计划实施以后,为保证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1953年夏秋以后,国家扩大了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和包销范围,对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及棉纱、棉布等人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陆续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这就从生产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两头上卡住了私营工商业,使它们不得不接受改造,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程。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以上的

① 《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6~267页。

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3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因此,从1954年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从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形式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后,利润分配实行“四马分肥”,把企业的盈利分成四份:国家所得部分34.5%,企业公积金30%,职工福利基金15%,资方红利20.5%^①。到1954年底,全国公私合营企业达1746户,私营批发商基本已为国营商业所代替。

公私合营的企业,一般是规模较大和生产经营较好的企业,而绝大多数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国家优先照顾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处境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统一安排、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方针。1955年,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出现了部分行业的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5年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也开始大大加速了。同年10月,毛泽东邀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希望私营工商业者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1956年1月,全国掀起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1月10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和42个私营商业行业13973户座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行

① 大概是“四马分肥”这句中国成语并没有相应的英文成语吧,泰韦斯把它理解为“资本家仍将保持约1/4的企业利润”。虽然不算准确,但大体还是可以的。也许换成企业利润这块大蛋糕被分成四份,虽然大小并不均等,但资本家获得的总是四份中的一份,就更合适了。

业公私合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到 1956 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的 99%、商业户的 82.2%、运输业的 99%、饮食业的 86%、服务业的 77% 都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为了做好全行业合营工作,1956 年 2 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对财产清理估价的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这些文件要求各地根据“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定股,对资方从业人员要“量才录用,适当照顾”,规定私股定息的息率为年息一厘到六厘,后又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

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的实行,使私营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使用、管理和支配,资本家不再拥有支配权和管理权,实际上企业已基本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了。这标志着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马克思、列宁曾设想和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向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把这种理论设想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时期内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的两重性。与此相联系,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拥护《共同纲领》、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有唯利是图、剥削工人、追求高额利润的一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殊性,就使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成为必要和可能。因此,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这种特殊的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活用理论,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社会主义

改造的实践中,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统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变企业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再把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次,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十分有利。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剥夺而是实行了“四马分肥”、定息、高薪等赎买政策,通过有偿的形式促使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1950年到1955年,资方分得利润14亿元。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股金共为24亿元,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算,到1966年9月定息取消,国家付给私股股东定息约12亿元。再加上1956年到1965年资本家高薪所得的8.5亿元,国家支付给民族资产阶级的赎金共计34.5亿元。这样既避免了因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引起经济上的破坏和混乱,而且保存和发展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积累以及提高对企业的管理水平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家花34.5亿元把整整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赎买过来,既照顾了资本家的利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资产阶级对改造的抗拒和破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减少了向社会主义和平转变的阻力。再者,在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过程中,把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在消灭资产阶级的同时,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党和国家对资产阶级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通过企业改造的实践改造他们的思想,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在前进中动摇,在动摇中前进”后,愿意接受改造并将其掌握的技术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对私营企业原有的71万资方人员和10万左右的资方代理人,本着“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都安排了工作,一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在政府和有

关部门担任了相当的领导职务,从而达到了消灭剥削阶级、改造剥削者的目的。

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如何评价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近些年来已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评价不一。我们认为,总体上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①但是,也存在着缺点和偏差,主要是改造的速度过快、公私合营的面过宽、改组合并过多、程度过于彻底,对相当大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不当,以致在长时期内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和影响。这些问题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五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需正确评估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允许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已成为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因此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一些人士开始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历史问题,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亦异常活跃。有基本肯定论者,有半肯定半否定论者,有否定论者,甚至有人断言三大改造“搞早了”、“搞错了”,等等。是非功过,众说纷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那么,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和评价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得失?我们认为,盲目地全盘肯定和轻率地彻底否定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具体地如实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结果出发,并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加以客观地分析、总结,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一节中,泰韦斯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简单的不负责任的否定态度,而是比较客观地研究和分析了当时的客观环境、背景和条件。他认为,经过1949年到1952年的巩固与重建阶段的工作,国家已牢牢地为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他列举了经济发展、党组织力量增强、群众团体壮大的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因而认为中共抓住有利时机,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是值得称道的,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更为广阔的视角。在对社会主义改造展开论述当中,作者把笔墨的重点放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这无疑是必要的,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分析却过于简单,对手工业合作化只是一笔带过,这样畸重畸轻的概述历史,就会损害历史的全面性,难以正确地表现这一阶段历史的完整性。

因此,虽然作者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就给予了肯定,然而就对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来说还缺乏全面性的分析和评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已基本确立。为此,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是“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虽然在改造过程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在政策的执行中也出现过局部的偏差”。但是,“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

解决了”^①。这确实是不容争辩的事实。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正式的结论：“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时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②这个时隔1/4世纪、经过广泛而认真的反思总结后重新作出的结论，既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成果，又更具体地指出其缺欠，应该说是客观的，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

用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改造的得失，成就应该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首先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成绩是史无前例的。一是它将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将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而消灭了中国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实现了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中国社会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二是作为一场涉及亿万人民的社会制度大变革，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和生产力的破坏，而且是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人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实现的，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第218～21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建设准备了条件。这确实是一个奇迹,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三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并把资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但是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确有一些失误和偏差,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急于求成、盲目求纯,认为公有制越纯越好,把个体农民、手工业者统统组织起来,把私营工商业不分主次统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早地彻底消灭私有制,就脱离了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

二是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就是由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视商品经济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时刻要产生资本主义,都必须消灭,强调要使资本主义绝种。没有认识到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以至取消了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

三是在农村经济的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某些经验,片面强调统一经营、集中生产,分配中平均主义问题突出,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不加区别、不分行业特点、“一刀切”地组织起来,使得部分产品质量下降,花色品种减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不便。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合并过多,强调统一生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的过多过死,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尽妥当,错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者作为私方人员对待,有的拿了很少的定息

却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①,不少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歧视和打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失误不仅使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发生了某些本可以避免的曲折,而且导致长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

出现以上失误和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这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可兹借鉴的经验不多。在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急剧而巨大的社会变动中,缺点和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从主观方面看,主要是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准备,认识水平不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受到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没有深刻理解和坚定贯彻变革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两个方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列宁晚年虽曾有过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但列宁去世后被斯大林当作一种暂时的“退却”策略而加以放弃,建立起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唯一榜样和选择。人们通常认为,苏联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搞社会主义就得照苏联模式做。中国共产党也认为这种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不

① 全国 86 万资本家中错划的约 70 万,1979 年经过复查为错划者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

可避免地要学习和仿效苏联的模式。当时发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全部的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

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遗留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在1956年底前后就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如提出合作社实行生产责任制;适当给农民一些自由;可以既消灭资本主义又允许搞一些资本主义,可以开夫妻店等等。但是,这些可贵的探索不久就被一系列政治运动所打断,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才有了历史性的飞跃,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在几十年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不应该忽略的。

第二节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个问题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党和国家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凡事开头难,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要迅速转上计划经济的轨道,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心,克服千难万险,到1957年实现和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经济建设任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成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如何看待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客观依据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主持编制的。从1951年春开始,历时四年,五易其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稿。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同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最后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并正式颁布实施。五年计划搞了近五年,说明了学习经济工作之艰难,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之坚韧毅力与决心。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拉迪把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第三章中的重要一节,是从“一五计划”的成就、战略、农业发展、工业增长、苏联援助的重要性和作用几个方面进行阐述的。他用几近2/3的篇幅来论述农业的发展和改造问题,深入分析了“一五”期间农业增长指标、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及对“一五”计划的影响。相对而言,对于“一五”计划中心的工业基本建设叙述有些简单,使人有厚彼薄此之感。其中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确出现了关于主要资源分配问题的争论,因为计划赖以制订的重大前提证明是虚假的。”“在进行编制工业发展计划时没有谨慎地研究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被假定只受制于生产资料这一部类的能力。对日益扩大的工业劳动力需要的食品供应或纺织工业需要的纤维作物等农业原料的不容置疑的必要增长率则没有认真考虑。”^①这就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客观依据问题。那么,中国“一五”计划制定的前提是“虚假的”,还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就成为研究这段历史所必须回答的问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66~167页。

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的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这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确定的。

根据上述任务，计划规定：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支出总额为 766.4 亿元，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 1600 个，限额以下的建设单位 6000 个以上^①。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 427.4 亿元，占总支出的 55.8%。具体分配为：工业部门 248.5 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 58.2%；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 32.6 亿元，占 7.6%；运输和邮电部门 82.1 亿元，占 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 12.8 亿元，占 3%；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 30.8 亿元，占 7.2%；城市公用事业建设为 16 亿元，占 3.7%；其他为 4.6 亿元，占 1.1%^②。

计划规定：各个经济部门的增产比率 1957 年同 1952 年比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51.1%，平均每年递增 8.6%；工业总产值增长

① 国家为便于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设单位，规定出各类基建单位的投资限额。如钢铁、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车辆制造等的建设单位的投资限额为 1000 万元；有色金属、化工、水泥等建设单位投资限额为 600 万元；电话、电力、采煤、石油、纺织等为 500 万元；橡胶、造纸、制糖、卷烟、医药为 400 万元；陶瓷、食品工业、其他轻工业为 300 万元。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14～418 页。

98.3%，平均每年递增14.7%。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递增17.8%，消费资料的生产平均每年递增12.4%；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增长23.3%，平均每年递增4.3%。其中粮食增长17.6%，平均每年递增3.3%；棉花增长25.4%，平均每年递增4.6%^①。国家职工平均工资将提高33%，农民的购买力将提高一倍。

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既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又基本上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

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在没有编制长期计划经验、地质资源情况不清、统计资料极少、人才知识不足、建设经验又很不够的情况下开始的，只能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逐步摸索和积累经验。甚至在计划编制之初“注意工业多，注意农业、手工业少”^②，提出的部分计划指标曾存在着不切合实际的偏高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考虑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计划赖以制订的重大前提是虚假的。

首先，编制计划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比较明确的，即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力求使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按比例协调发展，特别是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避免彼此脱节。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明确指出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建设，“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419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①。强调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具体了解情况,作周密的调查统计,是正确制定计划的基础。要求对1952年生产的实际数字、企业的利润、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状况及由此而来的预计数字,进行统计分析,以便得出各种恰当的生产技术财务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编制1953年和五年发展计划。

其次,计划是在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制订的,各项指标的数字是在参照1950年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前提下,经过多方面调查和分析才提出的。从“一五”计划中主要计划指标的比值来看,也是以1952年为基准的。由于计划是在实施中制定,制定中实施,因而计划执行中积累的实际经验和出现的问题就成为修改和完善计划的重要依据。如工农业增长速度问题,开始编制计划时曾参照1950年至1952年的增长速度提出工业平均年增长20%和农业平均年增长7%,后来根据1953年和1954年两个年度计划执行的情况及苏联的建议,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最后修改确定为14.7%和4.3%,这大体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第三,在编制计划时,就十分注意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一五”计划的文件中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工业,但决不能够减轻发展农业的意义。相反,实际生活已经更加证明农业对于发展工业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业的相应发展,我们的工业化事业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需要,如果工业农业生产之间失去平衡和日益脱节,就势必造成很大的困难,严重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50页。

地影响工农联盟,而致打乱国家的整个建设计划。”^① 尽管投资分配的重点是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少了一些,对农业的丰歉和生产、生活资料供求因素考虑不足,但并未完全使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从“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农业 4.5%,轻工业 12.9%,重工业 25.4%。这表明,重工业发展得很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也不太慢,三者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是合适的。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②

第四,计划的编制是在苏联政府的具体帮助下进行的,充分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期间,征询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斯大林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建议将工业年平均增长 20% 的速度降到 15% 或 14%,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其后,李富春率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意见。1953年4月,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指出:首先建设重工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 14%~15% 为宜;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基础的工作,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要十分注意农业的发展;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等等。参考苏联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9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4 页。

方面的建议,“一五”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①。

因此,从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拉迪的所谓前提“虚假”的论点缺乏依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 第一个五年计划战略方针的选择

“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建设的战略方针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列宁关于生产资料的增长必须先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设想,经过对中国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而确定的。拉迪在论述中提出:“采用包括筹措大量资源以用于制造业的苏式的全力工业化战略和忽视农业的这些做法,似乎没有在中共党内引起争论。没有证据表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曾经出现任何类似 20 年代苏联关于工业化问题的争论。”在争论中,普列奥勃拉津斯基的“大力推动”工业化的理论与布哈林的工农业均衡发展的理论针锋相对,相反,前者“关于在农业的强制积累基础上迅速工业化的观点却在中共党内得到广泛的支持,这对当时世界上号称有农业渊源的唯一的共产党大执政党来说,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件”^②。显然,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事实上,要把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编制计划之初,在党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对此有过各种考虑,党内和党外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主张。早在 1950 年,刘少奇就曾提出过先抓农业和轻工业、后抓重工业的主张。他认为,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大体步骤应该是:首先必须恢复中国的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6~288 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166 页。

经济,“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生产机器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循着这样的道路前进”^①。当时有关部门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在计划编制和开始实施的过程中,党内一些同志,也包括一些党外有识之士,呼吁政府“施仁政”。他们认为中国经过22年战争,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经济亟待恢复,人民生活亟待改善,不应该多搞重工业,而应该多搞些轻工业。有人甚至提出私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分工合作,公私两利。对此,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如何看待“施仁政”问题。他把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称为“小仁政”和“大仁政”,强调两者必须兼顾,但“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②。因此,在计划编制之前和编制之初,党内外对于是否重点发展重工业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并非像拉迪所说的那样似乎党内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拉迪还提出“-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类似于苏联1928至1937年盛行的那种资源筹措和分配的类型”。他从投资率突然猛增、绝大部分投资资源投放到工业中特别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中、优先发展规模很大和资本密集的制造业三个方面,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4页。

②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比较、说明了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与 30 年代苏联的战略相似^①。的确,从“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的建设中可以找到很多与苏联当年做法的相似之处。然而,对于中国为什么要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拉迪却没有作任何分析。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只是在搬用苏联的做法。而真实的情况是,虽然斯大林曾倡导和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中国在作抉择时不能不受苏联的影响,但是中国并不是简单地“拿来主义”,主要还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确定这一方针的。

实现国家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客观现实是旧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几乎没有任何重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以 1949 年为例,现代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17%。建国后经过三年恢复,到 1952 年中国工业虽已恢复并已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3.1%,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 19.5%;现代工业在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 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中只有 35.5%。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但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印度。例如,1952 年的人均钢产量,中国为 2.37 公斤,印度为 4 公斤,美国为 538.3 公斤;人均发电量,中国为 2.76 度,印度为 10.9 度,美国为 2949 度。毛泽东曾形象地描述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只有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从根本上改变。

从当时轻工业的发展状况看,中国的轻工业虽有一定的基础,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164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9 页。

但因原料供应不足、市场销路狭小,设备能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1951年的轻工业设备利用率,面粉37%,卷烟47%,火柴40%,胶鞋34%,榨油28%,造纸62%^①。因轻工业的增长主要不是受基本建设规模的影响,而是受到市场和原料的制约,在农业和重工业提供的原料不能大大增加前,即使增加轻工业的投资,也不能发挥投资效果。所以对轻工业暂时投资少一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的。另外,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着眼,虽然轻工业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又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但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就没有机器制造业的原材料;没有机器制造业,就无法提供发展轻工业的装备;没有能源和交通运输,整个经济就无法运转。依靠进口,这在当时又办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轻工业求近利亦不可得,只有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所需要的,是具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明智决策。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两大阵营冷战对峙,风潮迭起,中国的周边环境亦十分严峻。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政治上采取不承认主义,经济上实行禁运封锁,工业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不可能从它们那里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会大力支援中国,但它们自身的经济也十分窘迫,并无太多余地,而像中国这样大国的工业化,依靠任何国家都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入侵中国领土台湾,中国被迫抗美援朝。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依然敌视新中国,实际上还同中国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

① 参见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保证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一五”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也是势所必然之事。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在执行“一五”计划的过程中日益显现出来。据1954年12月上海、天津、江苏等省市的报告,当时上海的工业设备利用率一般只达50%至80%,有的在40%以下;天津印染设备利用率只达2/3,面粉设备开工率只达43.5%^①。另一方面,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各工业部门在供需和生产协作配合上,呈现一种日益全面紧张的形势。突出表现在:地质工作薄弱;煤、电、油供应紧张;钢铁、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建筑材料等产品,数量不足,品种不够,规格不多,质量不高;机械工业还远远不能以最新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需加快建立和发展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重工业,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使工业给农业以更大的支持,才能大力发展轻工业。因此,在“一五”计划中,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为1:7.3,这超过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6的倾斜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五年间,重工业的产值增长了210.7%,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25.4%。飞机、汽车、冶金、重型机器、精密仪表等一批过去没有的工业部门,纷纷建立起来。

实践证明,这种看似“不寻常”的决策,正是从中国特定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环境出发,而采取的正确决策和可能的最佳选择。

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与欠缺

在“一五”计划的指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中国经

① 参见吴群敢:《试论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几个问题》,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

济建设迅猛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基本完成,“一五”计划规定的各项任务及指标到1957年超额实现,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有显著增长,从而初步改变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落后面貌,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拉迪承认“一五”计划“是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资源和经验,能够维持始于恢复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完成在1949年至1952年底期间谨慎地开始的制度改革”。它的特征是明显的加速度,同50年代大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值得称赞的”^①。他列举了国民收入、人均寿命、学生入学率、国民收入等方面的统计数字,用以说明“一五”计划的成就。指出,到1956年,提前完成了私营部门的制度改革,95%以上的农户被组织进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效地消灭了土地、耕畜和农具等的私有制。在他看来,“一五”期间的农业取得了中等良好的成绩;工业发展不但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而且“还着手解决地区的不平衡问题”,使“人均产值的省际差别大为缩小”,“确实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格局”^②。同时,他还注意到农业产量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期望相比,增长率是低的;棉纺、丝织业、粮食加工和制鞋业由于缺乏原料,“大部分都远没有发挥其生产能力”^③。他的分析既肯定了“一五”计划的成就,也注意到存在的问题,因此是比较客观的。但从总体上看,又显得不够全面和充分。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作如下的补充。

从“一五”执行的结果看,所取得的建设成就是空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61~162页。

② 同上书,第182、184页。

③ 同上书,第182页。

第一,基本建设成效显著,工业布局趋向合理。五年中,国家对基建投资共 493 亿元,超过原计划 15.3%,加上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建投资总额 588.47 亿元;新增固定资产达 460.3 亿元,相当于 1952 年底全国拥有固定资产原值的 1.9 倍,其中新增工业固定资产 200.6 亿元。施工建设的工矿单位 1 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 921 个,比原计划增加 227 个。到 1957 年底全部投产的有 428 个,部分投产的 109 个。飞机、汽车、发电设备、冶金、重型机械、精密仪表制造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纷纷建立起来,开始改变中国工业体系残缺不全的状况。在新建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上,沿海地区占总额的 41.8%,内地占 47.8%;限额以上的 694 个工业建设单位,472 个分布在内地,222 个分布在沿海地区,工业布局开始从沿海向内地拓展,先后在内蒙古、西北、华北各地兴建了一大批新的工业城市,开始改变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的状况,初步建立了新的工业布局的骨架。

第二,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工业结构有所改善,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一五”计划规定的 46 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有 40 种全部完成了产量指标(除原油、机车、食用植物油、火柴、卷烟、糖 6 种产品外)。1957 年工业总产值达 783.9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128.3%,平均每年增长 18%,超过计划规定的 14.7% 增长速度。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重工业产值增长 210%,平均每年增长 25.4%,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 35.6% 提高到 48.3%;轻工业产值增长 83%,平均每年增长 12.9%;钢产量 535 万吨,增长 29.6%;原煤产量 1.31 亿吨,增长 98%;原油产量 146 万吨,增长 230%;发电量 193 亿度,增长 166%;机床 2.8 万台,增长 1 倍左右;全国工业工程技术人员 17.5 万人,增长 2 倍;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52%,12 个工业部门的工业产品成本降低 29%。

第三,农业生产有较快增长,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五年间

国家用于支援农业的资金达 99.6 亿元,加上农业贷款 23.5 亿元,合计 123.1 亿元。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农业总产值由 461 亿元增加到 573 亿元,完成原定计划的 101%,增长 25%,每年平均增长 4.5%;粮食产量由 3278 亿斤增加到 3901 亿斤,增长 19%,平均每年增长 3.7%;棉花产量由 130 万吨增加到 164 万吨,增长 26%,平均每年增长 4.7%;水产品由 167 万吨增加到 312 万吨,增长 87%,平均每年增长 17.4%;全国农用拖拉机由 2006 台增加到 24629 台,增长 12.3 倍;农业机械总动力达 12.1 亿瓦特,增长 5.7 倍;化肥的施用量达到 37.3 万吨,增长 3.8 倍。五年内,一共完成水利建设的土石方工程约 76 亿立方米,先后建成 13 座大型水库;全国耕地面积、灌溉面积、机耕面积得到扩大,还基本上建成了全国性的气象台站网。

第四,交通邮电事业发展迅速,密切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一五”期间,用于交通邮电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90.15 亿元,占全部基建投资总额的 15.3%。1957 年与 1952 年相比,全国铁路通车里程 29862 公里,增长 22%;公路通车里程 25.46 万公里,增长 1 倍;内河通航里程达 14.41 万公里,增长 51.6%;民用航空里程达 2.64 万公里,增长 101.5%;邮路总长度增长 72.3%,电信线路长度增长 137.4%,邮电业务量增长 72%。到 1957 年底已经基本上达到乡乡通邮,70%的乡可通电话。

第五,文化教育科学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高等院校由 1953 年的 181 所,到 1957 年为 229 所,增长 26.5%,五年共招生 56.3 万人,毕业生 26.9 万人。五年内,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 111.9 万人,毕业生 84.2 万人;普通中学共招生 874.9 万人,毕业生 430.5 万人;小学共招生 5898 万人,毕业生 1852 万人。1957 年在校学生 6428 万人,比 1952 年 5110 万人增长 25.7%。到 1957 年,全国共建科研机构 580 多个,研究人员 2.8 万人,比 1952 年增加 2 倍多。“一五”期间,国家财政除 1956 年有赤字外,其余各

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五年内,国民收入总额增长 53%,人均国民收入增长 36.5%;全国消费基金增长 36.8%,人均增长 21.6%。1957 年底,中国职工人数达 2451 万人,比 1952 年增加 55.1%。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由 1952 年的 446 元提高到 1957 年的 637 元,增长 42.8%;农民收入增加近 30%。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1957 年达 102 元,比 1952 年的 76 元提高 34.2%。城市居民储蓄余额由 1952 年的 8.6 亿元增加到 1957 年 35.2 亿元,增长 3 倍以上。五年国家投资新建职工住宅 2816 万平方米,为职工支付劳动保险金、医药费、福利费达 103 亿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大飞跃。它所取得的各个领域的实际成就,令举世瞩目,体现出在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具有优越性。

“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的总体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但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出现了 1953 年“小冒进”和 1956 年的“冒进”问题。1953 年是执行“一五”计划的第一年,由于财政预算上的偏差,不适当地扩大了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有些部门和地方建设计划到处铺开,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出现了 21 亿元的财政赤字,粮食、物资供应紧张。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增加收入,紧缩开支,迅速扭转了冒进倾向。1956 年随着三大改造高潮的到来,经济建设再次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是基建规模过大,将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原来的 694 个追加为 900 个,基本建设投资达 140 多亿,比上年增长 62%;职工人数增加过快,原计划当年新增职工 84 万人,实际增加 230 万人;信贷突破计划,银行原定农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贷款增加 14.1 亿元,结果却增加 29.7 亿元,超过计划 15.6 亿元;农业生产急于求成,生产指标一再追加,1956 年 5 月粮食、棉花产量要求分别比上年增长 9.1% 和 18%。结果,冒进现象造成社会供需比例失调,财政赤字 18.3 亿元,原材料供应不足,商品供不应求,国民经济各方面都很紧张。中央和人民政

府发现问题后,积极采取“反冒进”措施,压缩指标和增长速度,从而使冒进偏向逐步得到纠正。两次冒进,由于发现及时,纠正较快,没有严重影响“一五”计划的完成。

再就是“一五”时期对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总的来看安排处理是适当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苗头。一是在农、轻、重关系上,重工业发展过于突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不够稳定。由于中国的农业基础比较薄弱,生产技术又很落后,维持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有些力不从心的。特别是在农业歉收的年份,农产品供需矛盾就更加紧张,轻工业生产也常常因缺乏农产品原料而开工不足,发展受到影响。1954年农业歉收,1955年上半年地方工业生产能力就明显受到制约,棉纱只达75%,棉布、食油只有62%,面粉只有56%,卷烟仅达24%。1956年农业歉收后,1957年全国棉纱生产能力利用率也只有83%。同时,对从重工业方面开辟轻工业原料来源注意不够。“一五”期间,重工业中原料工业产值增长近2倍,而轻工业以工业品为原料的产值比重只是从1952年的12.5%上升到1957年的18.4%,影响了轻工业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再从重工业生产结构的安排上来看,对为农业和轻工业服务的问题重视不够。“一五”期间,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化肥、农药和农机等建设项目的投资只占全部重工业投资的3.3%,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中,拖拉机厂只有1个,化肥厂只有3个。1957年的重工业产值中,直接用于农业的工业部分只占13.5%。五年内,钢材产量增长近3倍,而轻工业产品所用的钢材只增长1倍。如果在计划安排上适当压缩一点基本建设规模,多安排一些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部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会更好些。二是在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上,强调发展内地工业,对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作用重视不够。为了改变原有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国家把基本建设投资的44.1%用于沿海,55.1%用于内地。特别是在武汉、太原、西安、包头、兰州五大城市新建了一批重工业项

目,这对加速内地工业的发展很有必要。但是,对沿海原有工业基地的投资力度相对有些不足,没有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五年内国家对上海市的投资仅 12.28 亿元,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2.08%,比同期上海市上缴国家的固定资产折旧费还少。像轻纺工业基础较好、机械工业也有一定基础的天津和青岛,由于没有给予充分的投资进行改建和扩建,以致几乎没有太大的发展。此外,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也存在着重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则注意不够的问题。这些缺欠在“一五”计划实施后期已逐渐显露出来。

第三节 苏联模式与中国实际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被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唯一可效仿的模式,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及发展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样,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把苏联模式作为学习和借鉴的榜样,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一度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但中国又有自己的特点,决非苏联模式的全盘照搬。

一 接受苏联模式原因的方方面面

所谓苏联模式,一般是指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初,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指导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总和,也称“斯大林模式”,或称“传统模式”。新中国成立后,50 年代全面向苏联学习,特别是在建设方面照搬苏联的经验,这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第一篇的标题就是“模仿苏联模式”,在第二章总论中,泰韦斯专门用“苏联模式”这个题目探讨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他认为,“在1949至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普遍一致的。这个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的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中国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外交政策中决定‘一边倒’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二)“更加根本的是靠近苏俄的长期意识形态倾向。这不但包括自己是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共同运动中的一部分的意识,而且还在基本的组织原则和实践中反映出来”。(三)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切的使命感。领导中共取得1949年胜利的那些人不仅仅是农村的革命者;他们既是寻求社会主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大力实现一个‘富强中国’梦想的搞现代化的人。他们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对各种发展问题缺乏经验”。“由于发展的愿望,以及苏联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有的唯一榜样,决定走苏联的道路几乎是势在必行的”。此外,中共领导人接受向城市的发展战略和对输入的苏联策略可能与中共传统发生矛盾几乎没有认识进一步推动了这个决定^①。这就从国际因素、意识形态、历史使命等几个方面比较客观地说明了中共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

但是,除了上述因素外,我们认为其他一些因素也同样是重要的。

一是思想理论上准备不足,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这与夺取政权相比,任务更加艰巨而复杂。中国共产党虽然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65~67页。

是军事斗争的胜利者,但对经济工作却十分陌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①。长期的革命斗争使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比较精通,并在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达到了较高的运用水平,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学习则还很不够,理解和认识的水平也十分有限。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得非常快,使得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旧中国在这方面又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利用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仅有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又不足以指导全国性的大规模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特别是在工业建设方面的经验尤为缺乏,对于“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②。这对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为严重的困难。要克服困难,就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当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搞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不仅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且成为世界上唯一公认的社会主义可以设想的模式。那时和那时以后,苏联的领导人和理论界把苏联的模式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典范,世界上无论是反对社会主义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也无不是这样以为。因此,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经验和模式就成为中国唯一可以学习的榜样。1949年6月,在中国革命胜利即将来临之际,毛泽东高屋建瓴,抓住时机,正式宣布了“一边倒”的方针,提出了“苏联共产党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的号召^①。

二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强制推行其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和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曾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苏共一直在共产国际中居于领导支配地位,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都必须接受和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实际上是接受和服从苏共的领导。这就使得苏共领导人在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上常常以“老子党”、“领导党”自居,把苏共的经验和理论当作普遍真理强行搬到各国,干涉他党他国的事务。共产国际解散以后,1947年成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苏共依然以“领导者”自居,自视为“领导中心”、“指挥中心”,要求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的利益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最高利益”,在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上遵照苏联模式,在国际活动及外交上服从于苏联的世界战略策略,不允许各国进行独立的探索。斯大林还声言,对苏联经验的任何轻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当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决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走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被苏共宣布为“背叛了马列主义”、“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阵营”,把南共开除出欧洲九国情报局,随后又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掀起了清除所谓“铁托分子”的浪潮。对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斯大林和苏共长期以来采取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真正的革命^②。因此,在这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背景下,中国在设计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不可能不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②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由此可见,中国接受苏联模式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既是主动的,又包含多方面的原因,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一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相当的消极后果。

二 中国对苏联模式的仿效与借鉴

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对社会主义的美好憧憬,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专门讲了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他强调:“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①。从此,举国上下掀起了一个广泛的、大规模的学习苏联的热潮。

对于中国向苏联学习的情况,泰韦斯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样写道:模仿苏联模式,学习苏联理论,聘请苏联专家在关键的部门担任顾问,派学生和专家去俄国,翻译出版大量的苏联教科书。决定性的因素是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则上是紧紧地仿效苏联模式。但是,苏联政府的模式和援助的重大影响没有消除中国的独立思考^②。他指出:“中共领导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64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98页。

人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1949 年以前毛泽东的革命纲领的精髓是面向中国实际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他也不准备放弃这个原则。”但“改变模式的愿望在不同领域中和不同时期内有所不同。党在自己有能力的领域(如在农村政策方面),普遍采用有中国特色的方法——虽然甚至在这些领域中,苏联的模式依然有一定影响。相反,在中共没有经验的领域,它的创造性就有限了”^①。他认为:第一,“事实上不存在单一的苏联模式。虽然所仿效的制度和经济方面的基本类型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体制的类型,但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历史中的一系列时期和实践却大有选择的余地”。第二,“即使大规模实行苏联方法的强烈愿望可能存在,但是缺乏必要的技术资源的情况能够严重地限制苏联方法的采用”。第三,“在改变具体的苏联做法时,中共不一定拒绝苏联的建议”^②。这样的分析大体上概括了中国仿效苏联模式的基本情况。然而,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中国仿效和借鉴苏联模式的最主要表现又是什么?若不对此加以分析,就难以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同苏联模式的内在关系与区别。

中国所仿效的所谓斯大林体制模式,主要是在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包围、战争危机四伏、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四五十年代得到巩固。它的重要特征是:经济上表现为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管理方法的高度行政化。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所有制的基本形式;中央制定详细生产计划,通过指令性指标的形式逐级下达,企业没有自主经营管理权;管理经济以行政手段为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片面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政治上表现为高度集权的党领导体制,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种体制具有统制经济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65~66 页。

② 同上书,第 68 页。

的特点,适合战时的需要,使苏联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成了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照斯大林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短时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显示出相当的生机与活力。但是,这种体制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很快就暴露出种种弊端。经济生活上决策权的高度集中使地方和企业缺少经营的活力和动力,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人民所得实惠不大。政治生活上的不民主及个人专权使国家机构官僚化,迷信个人崇拜,结果造成经济、政治发展的停滞,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50年代,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有些方面是以借鉴为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有些方面则是盲目照搬了苏联的经验。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总体目标模式来说学习苏联,追求“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唯一经济基础”,即“使资本主义绝种,使个体经济绝种”。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后期,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目标模式盲目建立起大批高级社。另一方面,就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方针、步骤和形式来说,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借鉴苏联的经验,对待富农采取不是消灭而是限制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是没收而是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避免了社会的大动荡,从而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比苏联好得多的效果。但在经济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由于缺乏经验,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建立现代工业、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物资分配、劳动工资等方面的体制,照搬苏联的经验比较多,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联的经验有许多在中国是适用的,也有许多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为此,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

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①

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成为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形式,这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伴随着“一五”期间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进行,以苏联的经济体制为模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步形成。这种体制表现在:

(一)计划体制上,实行以直接计划为主、直接计划与间接性计划(即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195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随后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和县相继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机构。国家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下达指令性指标;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企业实行间接计划,主要通过经济政策、行政等手段把它们的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直接计划的范围越来越大。从1953年到1956年,国家计委统一管理、下达计划的产品,由115种增加到380多种。

(二)财政体制上,建国初期经过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将财权集中于中央,由中央统收统支。1951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即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财政。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全国划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和县三级财政,由中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层层负责,但绝大部分资金集中在中央手里。“一五”期间,在财政总收入中,中央占80%,地方只占20%;在财政总支出中,中央支配的占75%,地方只占25%。

(三)基本建设体制,基本建设项目以中央各部为主进行管理,重点项目由国家统一管理,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部直接拨款,地方的基本建设、项目由中央各部确定,少数地方项目由地方直接安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排。在“一五”期间预算内基本建设拨款中,属于中央项目的占79%,属于地方项目的仅占21%。同期基本建设投资的90%是国家投资。

(四)工业体制,国营企业原来基本由各大区负责管理,1954年大区撤销后,主要工业企业陆续收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形成以“条条”为主的企业管理体制。到1957年,中央各部直接管理的企业从1953年的2800多个增加到9300多个,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49%。国营企业的利润和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国家,企业所需由国家财政拨款。

(五)物资管理体制,从1953年起,全国开始实行中央统一计划分配物资的制度。其中,按生产资料的重要程度,又分为国家统配物资(如钢材、木材、水泥、煤炭、汽车等)及各中央部门主管分配的部管物资。凡属中央统一分配物资的企业,纳入国家物资分配计划,实行统筹统支,平衡分配。对于企业建设所需的统配、部管物资,基本上按照企业的隶属关系进行分配。到1957年,统配、部管物资由1953年的227种(统配112种、部管115种)增加到532种(统配231种、部管301种)。

(六)劳动工资体制,建国初期国家实行“介绍就业与自行就业相结合”的劳动就业体制,劳动管理权限上以各大行政区管理为主,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后逐步过渡到以中央集中管理为主。特别是随着“一五”期间经济建设的发展 and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家逐步扩大了统一分配的范围,从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到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工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公私合营时对原私营企业职工也由国家统一安排。从此,自行就业、自谋出路就基本上被统一分配所代替。1957年初,国家规定,各单位一律停止自行从社会上招工,对多余的正式职工、学徒不得裁减。这样就形成了统包统配和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的劳动体制。在工资管理上,建国初期没有统一的工资制度,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1954年各

大行政区撤销后,中央劳动部着手实行工资统一管理。1955年,供给制改为工资制。1956年,国务院颁布工资改革方案,对党政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标准、定级、升级等,均按全国统一规定执行,地方、企业无权决定。

此外,还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商业体制和物价体制,以及中央集中管理的外贸体制。

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初建时,并不像后来那么高度集中,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如对国民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原则,财政上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原则,重视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发挥税收、信贷及价格在生产和流通中的调节作用等等,这比苏联的计划体制灵活了许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种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固然受到当时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然而从客观上看也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一五”计划建设规模前所未有,任务艰巨,而国家的建设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和经验都比较缺乏。特别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和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投资大,技术复杂,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非地方所能承担,必须由中央及有关部门集中统一规划管理,资金、物资集中使用才能保证重点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一五”期间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总的来说是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保证“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出现了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中央集权过多、国家对企业统管过多过死、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过小等问题,不利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一系列消极后果。这种弊端在“一五”计划后期已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从政治方面看,尽管苏联的影响是存在的,但中国并没有简单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同

苏联不同的特点。泰韦斯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章的论述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是正统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一起在其中为统治阶级。“在采用这个概念时,中共摆脱了流行的苏联关于国家形式的正统观念。”“在更广泛的政治观念方面,国家形式当然与苏联国家形式完全一样——专政归根到底仍是共产党专政。”^①他强调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地维护与过去的延续性,制定了明确的国家结构。这部宪法基本上是遵循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模式,但在少数几个重大事例中因不合国情而没有接受苏联的做法,如设立国家主席、抛弃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分离的假设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他看来,中国的实际组织形式上是一种党和国家两种等级系统平行的制度,在宪法中没有提到的党则是权力的最终所在。最终决策权操于党中央之手,同时在地方一级,党委比人民政府权力更大。党的书记身兼行政要职的做法与苏联有几个更明显的等级系统的情况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国家机构关系和政法工作制度基本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各种群众组织也起着一种重要的辅助作用^②。这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党和国家体制与苏联模式的联系和不同,分析是比较客观的,但又明显地存在不足。那么新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是遵循苏联宪法的模式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一部根本大法,作为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规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106~112页。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族人民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闭会时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员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主要原则为：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报告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内，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均由上级人民政府委任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及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以《共同纲领》为基础，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离的部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就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从上述规定的各项基本制度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制度和苏联既同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范畴,又与苏联有很大的不同。

一是从国家形式表述和内涵看,苏联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苏维埃制度。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二者相同之处,但人民民主的范围和专政的对象又有很大不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中,资产阶级不属于人民,是专政的对象,而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人民不只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专政的对象。为此,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所创造的一种新型的专政形式,它突出了国家政权的主体是人民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以及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特点。

二是从政党领导体制看,苏联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斯大林在1927年就明确宣布苏联实行一党领导制与“党的垄断”,不允许其他政党分掌权力。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9页。

协商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重要组织形式。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不学俄国的一党制,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1949年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协商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决定了政务院等国家机关的领导人选。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了各级政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同共产党一道管理国家,体现了中国政党制度同苏联以及英美等国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既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共产党的友党,是参政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新中国一项长期的、基本的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三是在民族问题上,苏联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有一百多个民族,其中非俄罗斯各民族几乎占总人口的半数左右。十月革命后,除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民族也分别建立了具有完整主权的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此列宁提出民族国家联邦化方案,主张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联合为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共和国联盟。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1924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组成。1936年宪法进一步重申各民族平等和自愿联合原则,有权自由退出,实行联邦院和民族院的两院制。这时联盟成员除俄罗斯联邦外,加入的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等加盟共和国。因此,苏联是各民族国家的联合形式。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有 56 个民族,其中非汉族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 6%,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广大,占全国总面积的 50%~60%。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在人民政协筹备会期间就解决民族问题是实行苏联的联邦制还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征求主管民族工作的李维汉同志的意见。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李维汉分析了中国的具体情况和苏联的不同,认为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实行联邦制,而应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①。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提出建立统一的共和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接受,并在《共同纲领》中作出明确规定。继而 195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对民族区域自治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成为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项基本的制度,实践证明它是成功的。

四是在国家机构中,国家元首的职能,苏联是由最高苏维埃的最高领导来履行的,中国则设立了国家主席一职来代表国家。国家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四年,其职责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和国防委员会人选,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由此看来,新中国在建立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更多地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借鉴苏联的经验,而在经济建设方面,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比较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代表人民利益的宪法。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整个宪法贯穿着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规定了中国的政

① 参见杨胜群、田松年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

治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要达到这些原则,又规定了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有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等具有灵活性的具体条文。二是体现了中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这部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参考和借鉴了外国特别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但主要是总结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给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中,曾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各中央委员阅看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1918年苏俄宪法,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法国1946年宪法等主要参考文献,以便于政治局讨论^①。毛泽东强调它“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②。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本质上同苏联的宪法有一致性,所依据的大原则大致相同。但它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充分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和过渡时期的特点。因此,泰韦斯关于这部宪法基本上是遵循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的模式的说法,是欠妥当的。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三 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新探索

斯大林模式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典范。但是斯大林模式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追求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性,否认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经济管理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忽视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分配中平均主义问题严重,以致于经济发展缺乏活力,物资匮乏,人民生活改善缓慢,引起群众不满。党内过“左”斗争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也造成了党内危机,从而积累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各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使各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经过短期快速发展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有的甚至发生动乱以至危机,这就迫使各国党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开始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独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1955年底起,中共领导人也开始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与探索。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泰韦斯认为,中共领导人1956年为新形势制定政策时,开始以一种更自觉的批判态度审查苏联模式。对苏联模式的系统检查和对苏联体制缺陷的批判是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中发展起来,但这种紧张关系并非导致对模式的复查的根本原因”。对苏联缓慢发展速度的逐步加深了的了解显然为重新评价苏联模式创造了条件^①。这就从国际背景和苏联模式自身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反思苏联模式的原因,这无疑是两个重要的原因。与此同时,还应看到中国自身的一些因素。

从国际大背景看,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探索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30页。

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随后,苏共中央于6月30日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纠正斯大林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等方面的错误。由于秘密报告被美国搞到抢先发表并加以利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这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时陷入被动局面。对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来说,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揭露如此重大的问题,必然要造成思想混乱,加剧了苏联与受苏联模式束缚的东欧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东欧国家内部的矛盾。在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和突破苏联经济模式束缚的呼声和力量。然而公开揭露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端,特别是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批判,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打破神化主义和思想解放的契机,使人们对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毛泽东说:“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斯大林的错误,引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密切注意,使他们更进一步看到了苏联经验的局限性,开始重新审视苏联模式,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从国内因素看,1956年初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党和国家开始准备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建设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工农业生产增长迅速,经济效果明显,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看,则存在着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建设模式的缺点。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当中,苏联的经验一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适合中国的东西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并为党中央所察觉。为此,1955年底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以苏联经验为借鉴”的问题。而到1956年,新中国已经有了七年建设的历史,如果从1953年执行“一五”计划算起,也已经有了三年的建设实践,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经验,这就为中国的探索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到来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为这种探索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苏联经验的全面反思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走怎样的道路的独立探索。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泰韦斯在“修改苏联模式”一题下对中国的改变作了探讨。他强调“在关于怎样修改苏式管理方法的整个辩论中,当时的苏联的发展是一个促进因素”^②。他重点分析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指出虽然毛泽东在提苏联的缺点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但在“号召调整现行做法的一些领域,所提的变革也是温和的,并且保留了苏式的制度结构和经济战略”^③。他通过分析限制管理过分集中的一些作法、工厂管理制度和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工作中的一些变化以及接受其他外国思想源泉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32页。

③ 同上书,第130页。

新态度等,来说明对苏联模式的修改。在他看来,“在整个1956年和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着重点仍放在向苏联学习,但是以一种摒弃苏联实践的落后面的有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去学习”。“直到1957年后期,苏式的结构和战略基本上依然保持适当的位置”^①。这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中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恰当地说明了1957年后苏联模式在中国的地位。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个是在1956年和1957年里,着重点是仍然放在向苏联学习上,还是放在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上?一个是中国对苏联模式的修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从1956年到1957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在对待苏联模式的问题上,着重点主要不是放在如何向苏联学习上,而是放在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反思上。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开始重新认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1956年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多次指出,对苏联的经验要作分析,要打破迷信。他说: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②。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因此“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③。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明确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30、134页。

② 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③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这就向全党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随后,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毛泽东说,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要批判地接受,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人家的东西,有的能照办,有的不能照办,不要把人家错误的东西搬过来。在我们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遇事要有分析,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②。6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强调对苏联经验要采取学习和批判的态度,既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照搬。于是,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始了对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检查纠正。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再次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公开指出: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这些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是无价之宝,但“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更不要说失败的经验”^③。而后不久,毛泽东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一次强调:“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② 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202页。

③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① 这年10月,毛泽东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讲: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以上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这一时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如何对待苏联经验问题上,重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全面的反思,检查纠正学习苏联经验中教条主义的倾向,破除对苏联建设经验的盲从迷信,提倡独立思考,从而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探索。

中国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反思、检查修正以及突破是与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要体现在探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当中。1956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毛泽东连续听了34个部门的汇报。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情况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的基础上,最后汇总成10个问题,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的前三个问题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开辟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第四、五个问题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后五个问题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苏联建设模式的弊端是:在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上,“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在对待农民的政策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①。为此他提出重点投资重工业的同时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还提出几个党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宣布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在4月28日总结发言中,他针对苏联不允许学术观点自由讨论的作法在中国的某些影响,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些思路和想法与苏联的经验有很大不同,借鉴了苏联的教训,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1956年下半年,围绕着中央提出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各个部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讨论,总结经验,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探索的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和一系列讲话中。“八大”根据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制定了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作出初步改进体制的正确决策。

在改进经济体制方面,大会采纳了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意见,决定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9~30、31、34页。

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根据李富春提出的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建议，大会决定凡需要全国统一平衡的各项重要指标纳入国家计划，凡列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分成指令性的、可以调整的、参考性的等三类指标。地方性的、局部性的指标，由各省市自治区或各部门自行平衡和安排，其他许多次要的产品不做计划。根据薄一波提出的在经济与财政、积累与消费关系上实行“三条杠杆”的方针，大会决定实行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后来人们通称为“二、三、四比例”）。大会还针对苏联企业管理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路线所引起的弊病，决定在工业企业中建立以党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以后，邓小平建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邓子恢提出在合作社内部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是巩固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央还确定农业合作社实行民主办社制度。

在政治方面，大会决议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求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行政管理职权，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以充分地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大会还提出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一次作出“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的规定，指出“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对党员的民主权利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文。在此前后，党中央已开始考虑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周恩来提出要使民主扩大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

办法,可以学习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在将来适当的时机不再继续担任党的主席,还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连选只得连任一届。为此,“八大”党章中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的条款。

这些富有创造精神的新的方针和设想,是探索改进中国体制的重要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的一些思想框框,对党的事业和中国的发展有着长远的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中国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然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不要加以区分的问题上,在相当长时期内,斯大林理论上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实践上将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起来,导致苏联自30年代以来,把党内和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发生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高级将领,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处决或流放,大批无辜的人受到牵连伤害,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为此,毛泽东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斯大林在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①。鉴于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发生的政治动乱以及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现象,党中央从1956年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① 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1957年6月正式发表时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深刻地阐明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的,但还不巩固、不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加以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处于突出的地位,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去解决,不然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并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就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作法。

在此期间,各方面的调整 and 改革工作也在进行。1956年5月到8月间,国务院召开了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主管体制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全国体制会议,对当时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如何改进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1957年1月,中央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负责进一步研究落实这一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调查、讨论、修改,在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决定把工业、财政、商业管理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11月,国务院通过后正式公布。与此同时,开始健全工业企业与农业合作社

内部的民主管理制度,调整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合并过多、规模过大、统得过死等问题,并对改进经济管理进行一些研究、试验。在思想文化领域,1956年8月中宣部会同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在青岛组织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开展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摸索经验。10月中央批准了中宣部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唯心主义课程讲座的报告,随后许多高校设立了这一门选修课。1957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范围内开始了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历史的道路并不是直线的平坦的。中国共产党想突破苏联模式并不等于就能马上突破苏联模式,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并不等于很快可以找到这条道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多次挫折和失败,才找到了指引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也不可能一帆风顺。由于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缺乏足够认识,对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还没有弄清楚,总以为苏联的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都有一些中国自己的特点,力图突破苏联模式,但在指导思想上从未想放弃苏联模式,而是要完善这种模式。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在健全、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其存在的弊端,而不是要发展商品经济。正如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所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①。因此,1956年前后的新探索还没有能找到突破苏联模式的根本办法,总体上未能跳出苏联模式的大框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派

① 转引自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斗争的开展和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不但使探索的进程中断了,就是已经提出的一些好的方针、政策、方法、思路也未能坚持和实行下去。

四 如何认识苏联模式的深远影响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泰韦斯指出苏联的影响在中国起着广泛的作用。“虽然主要领导人始终认识到(即使认识程度时大时小)有必要使苏联经验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但一般官员和普通群众却被对苏联经验的公开强调所压服。尊称苏联为‘老大哥’的宣传手法以及像‘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类口号难以鼓励批判性的仿效,结果在许多领域中出现了盲目照抄的情况。”“在整个1949至1957年时期,苏联的各种影响以多种复杂的方式在对中共的政策和中国社会起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过程并非党的领导人所能控制,更重要的倒是,它反映了他们有意识的选择。当这些领导人——或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在1957年以后认清了与苏联道路决裂的必要性时,他们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虽然许多苏联影响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①这样的评价是颇有见地的。

事实上,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新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外有帝国主义包围封锁、内部百废待兴而经济基础又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仿效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把有限的物力、财力、技术力量集中起来,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生政权、快速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其本身所固有的权力过分集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68~69页。

中、政企不分、否定商品经济、排斥市场机制、平均主义等弊端日益暴露出来,造成体制僵化、经济不活、效率低下和政治上中央过度集权。虽然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要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误入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等歧途,失去了突破苏联模式的大好时机,不但没能使中国摆脱苏联模式,相反把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加重了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使得以后的二十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提高,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重新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力实行改革开放,逐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苏联模式。认识到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这意味着苏联模式被彻底突破,这种模式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已成为过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应该看到,长期以来苏联模式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以不同的表现方式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依然是当今中国进行体制改革所要破除的思想障碍和所要改革的主要内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第三章

50 年代几次思想政治运动评析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一些西方学者似乎很难理解,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为什么极为关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们往往认为,一系列的思想运动,旨在建立执政党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控制和思想统治,而这种统治的广度与深度,是由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调节的。

遗憾的是西方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方面权威学者写成的著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未能摆脱这种西方习惯性的偏见,也将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与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相提并论,认为“这些运动都进行得极为激烈,并引起了社会上的严重紧张和忧虑”。

这部著作写道:

在表面上,一般民众觉得镇反运动是吓人的,但也是

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有外来威胁的时候。但是1951年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笔者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

在后面这部著作又写道:

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执行了互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它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入细致。

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这种互相矛盾的态度使得政策发生摇摆:在镇压时期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

那么,“镇压时期”和“松弛”时期又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作者接着写道:

这种政策的转变有时决定于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有时又决定于国际事件。政策的转变也有自己的原动力。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直到知识分子不愿生产成果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

威胁时为止。^①

在这几位西方学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陷入了一个难以跳出的怪圈之中:思想改造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愿生产成果,于是不得不放松思想统制;而思想统制的放松最后又会威胁到党的政治控制,所以不得不开始新一轮思想改造。

这样一种观点在西方可能是流行的,甚至是公认的,但用它来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不符合实际的,至少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忽略或歪曲了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毛泽东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其二,建国初期思想运动的总体效果究竟如何?我们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可以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任务的提出

思想教育和改造问题,既不是在建国初期才第一次提出,也不是仅仅针对知识分子而言。实际上,早在1929年,针对中共党内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状况,毛泽东就提出了思想教育问题。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写道:“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②在这篇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原则的大问题,即为了实现党的伟大使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共产党员和革命队伍中的一切人。当时虽然没有用“思想改造”这种提法,但他所说的“纠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89、92、2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正”和“肃清”错误思想,与后来所说的“思想改造”的涵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以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改造说明了共产党员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他说,原来他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后来,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逐渐熟悉工人农民,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①。显然,毛泽东是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首先就经历了思想感情的改造。由此可见,思想改造的任务,毛泽东首先是对共产党员提出的,其中也包括了自已。

毛泽东不仅认为共产党员需要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而且还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也需要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即提出了“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的任务,这只不过是“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强调了思想感情改造的任务。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②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已成定局时,毛泽东即提出了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问题,并将其列为新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在1949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的论文中,毛泽东写道:“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② 同上书,第851~852页。

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①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重要观点。由此可见,在全体人民中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所设计的新中国蓝图上的重要一笔。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也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

毛泽东正式向全体人民发出思想改造的号召,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土地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号召:“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②一年多以后,当毛泽东看到他的这个建议在一些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开始变为现实时,非常高兴,认为“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当时正值全国土地制度改革全面展开之际,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③就思想改造的迫切性而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把知识分子摆在全国人民各阶层的首位。显然,毛泽东特别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一方面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阶层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建设中将要发挥其他阶层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是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2页。

③ 同上书,第184页。

他认为知识分子受旧社会的影响深,思想复杂,不改造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体估量有关。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就是在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下展开的。

二 运动从学校开始

这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发源地是北京大学,而发起人则是于1951年6月1日开始担任北大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当时马寅初曾谈起过他到北京大学后所发现的问题和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学习和改造思想的经过。马寅初于1914年至1927年曾在北大教书,此次重返北大,发现北大的学生和大部分教员思想都有进步,都愿意使北大不断进步,成为新中国人民的大学。但是,他也发现北大还存在不少缺点,自由散漫就是一个缺点。他认为,自由散漫作风的思想根源是北大教职员政治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性都不高,还没有把“从个人立场出发”变为从“人民立场出发”。这种思想状况,给当时的院系调整等项改革工作造成了阻力和困难。马寅初认为,要推进学校的各项改革工作,“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师生都能真正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思想改造,使我们自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①。为此,在1951年暑期,马寅初发动教职员学习了40多天。用马寅初的话说,这次学习“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

暑假学习的效果使马寅初等北大领导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们切身感受到思想改造的重要作用。为此,他们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这次学习运动的目标是经过

^① 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思想改造来推进学校的改造；学习的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搞好这次学习运动，马寅初于9月7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周恩来将此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北大的行动十分赞赏，他在信上批示道：“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周恩来对北大的决定也给予赞扬和支持，指示教育部认真加以研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教育部专门开会，对这次学习的目的和内容作了研究。教育部认为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决定把这一学习运动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为了统一领导两市高校的学习运动，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委员为钱俊瑞、曾昭伦，各高校主要领导马寅初等21人为委员。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天津市成立了“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高校也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参加此次学习的京津两市的高等学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辅仁大学、北方交通大学、华北大学工业学院、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津沽大学、中国矿业学院、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医学院、河北水产专科学校、外国语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共20所院校。

周恩来对于北大的学习运动非常关注。9月29日下午，他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3000余名高等学校的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报告讲了七个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谁服务问题；思想问题；知识问题；民主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在报告中，周恩来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论述了

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方法、途径等问题,深深打动了与会者的心。周恩来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①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论述了知识分子解决立场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人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立场问题,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周恩来详尽地论述了这个过程,即最开始是确立民族立场;而要求得民族的解放,就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也就是各个革命阶级共同的立场;最后,再由人民的立场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周恩来指出:“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②

周恩来的报告在高校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的信心和决心。马寅初说:“周总理讲了5小时之久,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问题愈深入愈动人听闻,讲到最后一段时,周总理恳切地详尽地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验,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过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② 同上书,第218页。

程。”^①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说：“我这次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以后，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深感从前那些在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要重新估定。又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有好些话正中我的毛病，真是搔着痒处，我更觉得要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从头学起。”^②北京大学教务长张景钺说：“周总理为我们作报告时一开头就指出：要求学习就是要求改造。他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明白我们的学习就是为了改造，我们学习收获的多少，要用改造的深浅去衡量。若是在思想上原封不动，学习就等于白学。我一定要开动脑筋，将学习与个人的思想联系起来以求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③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说：“自从听了周总理亲切感人的报告后，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新中国一切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还不诚心诚意来改造我们的思想，学校的教育工作就会变成‘误人子弟’的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对自己来说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行为。”^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金岳霖在他的晚年曾谈到他对周恩来讲谈的感受：“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来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来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钟头。对听众来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周总理这样高地位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开展起来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著名学者龚育之评价说：周恩

① 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②③ 195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

④ 1951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来的报告,“它的特点,不在理论和政策上的创新,而在周恩来以知识分子一员的身份,向广大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现身说法,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①。周恩来与毛泽东一样,都把自己看作知识分子中的一员,而且都有过思想改造的艰苦经历。由此可见,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动,其出发点并非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控制”,而在于引导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自觉地端正立场、改造思想,以更好地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服务。

周恩来的报告,为高校知识分子学习运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此后,一个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内容、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肃清各种错误思想、推进教育改革的学习运动迅速在京津两市各高校展开。

三 向全国各界扩展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他预祝这一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同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短评,短评介绍了京津高校学习运动的经验,并发出号召:“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具有示范的作用。希望中央教育部能够把这次学习运动的经验,及时地推广到全国各高等学校中去。”毛泽东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短评的发表,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此后,这场学习运动就逐渐扩展到全国各高等学校和其他各界知识分子中。

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项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提出了九项工作,其中第九项工作是: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广大人民,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有系统地组织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会议同时还通过关于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该决议提出三项工作,第三项即为推动思想改造运动^①。

11月2日,民主建国会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开展会员和工商界思想改造运动。11月25日,民建总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章乃器在天津主持“新世纪座谈会”,作了“工商界与思想改造”的启发报告,这场学习运动由此扩大到了工商界。

11月13日,中国民主同盟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共开了15天,于11月27日闭幕。在大会上,民盟主席张澜首先讲话,他鼓励全盟同志努力执行当前政治任务,巩固团结。民盟副主席沈钧儒接着作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传达报告,他号召盟员学习政协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推进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大运动作为民盟的中心工作。他的这个号召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与会代表还一致认为,民盟盟员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在知识分子中带头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在1957年事件中被打成“章罗同盟”的章伯钧和罗隆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罗隆基还以民盟总部宣传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作了《六中全会以来组织宣传工作报告》。与几年后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项群众运动,是完全拥护的。他认为,民盟在过去一年中参加和推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特别是在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工作和捐献武器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盟员有978人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各地盟员都参加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检举了反革命分子。由于参加群众工作,盟员思想

^① 1951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认识一般都提高了一步^①。可以看出,对于中共中央以思想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作法,在当时罗隆基也是赞同的。民盟的这次会议表明,毛泽东关于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号召,在民主党派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会议号召北京市的文艺工作者进行学习,以期达到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的目的。会议还决定利用此次北京学习运动的经验,进一步在全国文艺界普遍开展这一学习运动。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有800多名文艺工作者参加。在大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讲。胡乔木在报告中着重批评了文艺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他说,在目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以至妨碍了文艺工作的前进。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也是劳动人民,但它不能领导国家前进,因此也不能领导文艺运动的前进。小资产阶级群众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才有光明的前途。胡乔木还指出,我们的文艺不应该降低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平来为他们“服务”,而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②。

在大会上,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详细说明了由于领导上的放松或放弃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文艺思想战线产生了思想界限不清的混乱现象,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在某些文艺机关中居于领导地位。周扬认为,诸如有些领导者对于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思想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没有组织和领导文艺工作者政治学习与思想改造工作;没有

① 1951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1951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反对文艺界存在着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和严重的自由主义作风；没有反对电影《武训传》的制作、放映和对《武训传》的赞扬，没有展开批评文艺工作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等等，都是这种事实的具体表现。周扬号召一切文艺工作者都要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去批判各种错误文艺思想，树立起革命的文艺观^①。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丁玲、欧阳予倩、老舍、李伯钊、黄钢、瞿希贤、华君武、李广田等8位著名文艺界人士。

这次大会还决定了文艺界整风的学习方法，即：通过听报告和阅读文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自己检查思想与作风，讨论改进工作的办法。全国文联还决定成立“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由丁玲任主任委员，沈雁冰、周扬、欧阳予倩、阳翰笙、陈沂、沙可夫、田汉、袁牧之、李伯钊、蔡楚生、马思聪、吕驥、老舍、江丰、梅兰芳、李广田、林默涵、严文井、吴雪、朱丹等20人为委员。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也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毛泽东对于文艺界整风极为关注。11月26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所写的批语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在中央的号召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并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即1952年5月时，掀起了高潮。

12月18日，中国科学院也举行了思想改造学习的动员大会，郭沫若院长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出号召：“要以对祖国的热爱，对

^① 1951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国家有用人力物力的热爱,来努力学习,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

鉴于全国各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已初步展开并取得积极的效果,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于1952年1月7日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决定》,以便加强对于各民主党派人士、各级政府、人民团体和协商机关中的无党派人士,政府和企业机关中的专家、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改造工作的领导。这个文件还规定了思想改造均以自愿为原则,学习的基本内容包括:“1. 学习理论,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以求了解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得正确的革命观点;2. 学习政策,即学习共同纲领、中央和各大行政区的重要政策文件;3. 整风,即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同时还决定1952年的整风学习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

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

四 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体效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开头的问题上了。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极力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主要目标并不像那几位西方学者所说,是为了确立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统制”和“政治控制”。实际上,只要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十分清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控制知识分子,是旧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复了千百年的事情。而为了达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太宗李世民语)的目的,历代统治者或者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样硬的一手,或者用“开科选举,金榜题名”那样软的一手,惟独不搞什么思想运动。因为任何思想

运动,包括“五四”运动那种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的思想运动,它的主体即知识分子都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动性。没有任何主动性而仅剩下被动的状况,只能是思想专制,而不可能形成思想运动。历代专制统治者奉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将会对这一政策造成致命的冲击。所以,专制者历来对于思想运动都十分恐惧,对任何知识分子自主性的举动,往往采取镇压措施。从这一点上讲,依靠思想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历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采取控制政策,有根本性质的区别,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这种思想改造,没有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区别,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①这就是说,这种思想改造是包括了所有人在内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那么,这种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用那部西方权威著作的语言:“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此毛泽东曾从两个方面作了说明:

一是从共同的事业需要共同的语言来说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顺利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毛泽东曾提出了不要四而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为此,毛泽东建议:“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①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时候的要求显然是很低的,仅仅是“不反对我们”即可。到了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共同语言”的高要求。在开门整风前夕,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②这个“共同语言”,就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标。

二是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需要来说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③在这里,毛泽东将思想改造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已经指明:不论是共存还是监督,都有一个政治前提或政治基础问题,这个前提和基础,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建立牢固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基本途径就是思想改造。当然,上面引用的这段话,有些内容是三个月后修改时加上去的,但通过思想改造来为民主党派监督执政党创造政治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235页。

条件,却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显然,不论是从“共同语言”来看,还是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需要来看,都与那位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思想统制”和“政治控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从上述两个目标来检验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其效果究竟如何呢?是不是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所断言的,“党力求扩大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思想运动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生产成果的积极性呢?不可否认,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存在着某些偏差,有些偏差甚至很严重,例如一些单位违背了自觉、自愿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原则,采取了强制压服的方法和手段,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感情。在几年以后的开门整风运动中,北京大学教授傅鹰曾回忆说:“潘光旦先生的不跳论最近在学术界出了名,其实我们知道的潘先生一向都是爱跳的,今天不跳是有他的难言之隐。思想改造的时候,潘光旦的思想检查十二次不被通过,也算得是个重点人物。为了整他的思想‘暗流’,最后甚至动员到他的家属,想用儿女情长逼一个学者承认自己不甘心承认的错误。方法用到这一步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了。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地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地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过气来。”^①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回忆说:“我到校时,在全国高等学校教师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教师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成绩很大。但做法上有些粗暴,不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②违背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原则,自然难以达到

① 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

② 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共同语言”的目标。如果缺乏全面估量,只看到这种缺憾,那位西方作者的结论也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不应以偏概全。

从总体上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建国初期的思想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就。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面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对于这种巨大的变化,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欢迎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在开门整风运动的前夕写了一篇题为《从“放”想起》的文章,文中写道:“当然,几年来在几次狂风暴雨的社会改革运动中,的确也使不少知识分子头昏眼花、气衰力弱,感到北风可畏、寒气逼人。但是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几次运动与其比作凛冽的严冬,不如说初春里几阵风雪。北风虽劲,但究竟已是初春天气,非但不应阻杀生机,而且反有很大的消毒杀毒的作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春暖花开时节,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在讨论中好几位教授说:‘今后和风细雨的思想改造,很好,但是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震动一下也是必要的。没有过去的震动,也很难有今天的和风细雨和百家争鸣。’作为一个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仔细想想,我欢迎和煦的南风,也感激过去的几阵北风。”^①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这种认识可能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对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质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深感欣慰。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

^① 195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周恩来还指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40%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80%左右。此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同共和国刚成立时相比——当时毛泽东的要求仅仅是“不反对我们”——显然是一次质的飞跃。

尽管此后毛泽东又回到“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论断上^②,但他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政治状况的质的飞跃仍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1957年初曾多次指出了这个事实。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③他还说:“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④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毛泽东才对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在人民群众包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批评监督下,共产党将会整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向前大进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学习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及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项运动,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77~27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224~225页。

④ 同上书,第268~269页。

在性质、目的和作法上都是有重大区别的。把这一运动与1957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一概而论,甚至笼统地加以全盘否定,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二节 50年代中期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相互关系的基础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一书中,作者对于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十分关注,用了较多的篇幅对这一专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之所以把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作为他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重点,主要是因为这些运动提供了说明执政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关系的背景材料。也就是说,作者是围绕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思想政治运动的。作者的这一研究思路,与中国学者的研究思路不同,也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推翻一个旧社会,到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的历史转折。随着这个历史转折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也迫切地需要作出重大的调整。其中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影响最大的,就是知识分子问题,即如何处理和解决党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党的大量工农出身的干部对于新的历史任务还相当陌生,需要有一个适应和提高的过程,即是说,需要用各种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另一方面,党所承担的新的任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迫切地需要吸收知识分子阶层参加进来,而这些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与新社会的要求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就是围绕着解决

这两方面的问题面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50年代思想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研究共和国初期的思想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它的独到之处。在国内研究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建国初期思想政治运动的文章、著作,还是不多见的。

但是,这部西方的权威著作从一个比较独到的角度出发,却在许多问题上得出了并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的结论。例如,这部著作对于50年代中期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征做了如下的论断:

毛泽东假定知识分子本质上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与制度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他断定,他们甚至对像党的整风那样敏感的事情,也能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样就没有考虑到以下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以来,一直受到沉重的压力;他们所设想的自己的利益常常受到严重的侵害;他们与党的干部的关系特征是互不信任。当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推到整风的前列时,他实际上要求他们执行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大胆地批评他们常常害怕和厌恶的党的当权派,可是在批评时又要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①

把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特征归结为“互不信任”,说“他们常常害怕和厌恶”党的当权派,未免过于简单、武断了。上述论述至少忽略了以下的基本历史事实:到了50年代中期,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与党的一部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3页。

分干部尽管还有某些方面的摩擦,但从总体上和从根本利益上已经趋于一致;在此前提下,1957年的开门整风,收到了积极的、良好的效果,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反右派斗争的干扰,毛泽东所倡导的“民主新路”或许在当时就会获得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 50年代思想政治运动的主旋律

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和平建设时代执政党如何领导知识分子阶层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领导者的角度看,是执政党如何领导和如何善于领导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其二,从知识分子本身的角度看,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成为建设新社会的主力的问题。概括地说,也就是毛泽东早在1939年12月就提出的“工农干部的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的问题^①。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50年代思想政治运动的主旋律。

最早倡导这一主旋律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思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工农干部知识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即向党的干部提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加强学习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的要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向全党提出了“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的任务^②。向哪些人学习呢?几个月后,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6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

年的文章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①所谓“内行”的人，当然首先是指知识分子。建国后，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毛泽东不仅十分强调学习的任务，还提出了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要求。1950年8月1日，在《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毛泽东提出：“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②毛泽东在当时还提出了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55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时，对子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写道：“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③显然，毛泽东积极主张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不仅仅在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的加入来改变党员队伍的成分结构，促使整个党的知识文化层次的提高，向着胜任领导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毛泽东提出的上述任务，实际上也就是党的干部知识化的道路。

此后突如其来的反右派运动使毛泽东改变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许多观点，但是他所提出的党的干部知识化的观点，却始终没有放弃。1958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二十一条写道：“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

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毛泽东重提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那段关于学习的话,要求从1958年开始,“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第四十七条中指出:“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①。可以看出,尽管毛泽东把右派关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议论归结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仍然清醒地认识到,要领导好知识分子,党的干部就必须成为业务上的“内行”。可以说,党的干部知识化,是改善他们的执政本领和他們与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关系的根本条件。

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革命化。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本身也存在一个如何适应新社会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如果在思想上与新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知识分子就不可能主动、积极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阶层的主动、积极地参与,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为此,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央及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51、360页。

“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于这种帮助作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①当然,周恩来所列举的一系列帮助措施,其中有些已被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有些甚至适得其反。但是,这一系列帮助措施的基本出发点,即“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却是正确的。

总之,党的干部的知识化和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是50年代知识分子问题的两个紧密联系的基本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推动了50年代的思想政治运动,其中也包括了1957年的开门整风。

二 当时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基本状况

如果说在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共产党的干部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阶层相互间还存在着互不了解的状况,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很融洽的话,那么,到了50年代中期,经过新社会的社会实践、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和党内的思想教育运动,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页。

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领导集体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知识分子政策。

到了5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问题出现了新的情况：随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浪潮的兴起，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突出；经过新社会的实践和教育，我国知识分子阶层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新的变化。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①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显得极为重要和紧迫。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建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谈到了自己对于知识分子受到伤害这种情况的忧虑，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②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由周恩来负责。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指出：“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② 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页。

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① 周恩来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论断,成为中共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依据。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根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精神,对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待遇等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文件提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12年内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从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根据上述目标,文件提出,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拟出关于各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培养专家的数量和质量全面规划。文件还提出了实现这些规划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为了解决许多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行政性质问题,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专家局。国务院专家局于同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对于知识分子政策的重大调整,为进一步改善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第二,党员的成分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知识分子党员的比例有所提高。

50年代中期,党员结构的变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和专家。培养自己的专家,是毛泽东一贯所关注和倡导的大事。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一些领导干部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言,讲透了问题,毛泽东对此很满意,表扬说:“有点专家的味道了。”毛泽东号召:“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①

另一方面,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知识分子阶层与工人、农民群众一起,成为共产党的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党的历史上,伴随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组织发展工作的重点也往往需要调整。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党组织发展工作的重点随之转向了农民群众,以至于到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党员。那么,当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特别是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之后,知识分子阶层也必然要成为党组织发展的重要的群众基础。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了这一发展的必然趋势,及时提出了在知识分子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积极发展党员的任务。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个文件中,中央批评了以往在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中央组织部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定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下达。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到1962年应该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据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统计,当时知识分子党员的人数已达125万余人,占全部党员的11.7%。根据这一发展趋势,1956年9月1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改变党中央委员会成分结构的设想。他指出:“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①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邓小平在八大上即指出:“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②为了更为顺利地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中共八大还取消了原来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人党手续的办法。

在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时,毛泽东曾提到了政治信仰方面的“共同语言”,他认为如果有了这方面的“共同语言”,我们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而在这里,当执政党的一部分领导干部逐渐成为科学家或专家的时候,他们与知识分子又有了对于科学文化方面和业务上的“共同语言”。这后一种“共同语言”,扩大了两个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

阶层之间沟通的渠道。

第三,在政治上追求进步,已经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主流。这个主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主义从陌生、疑虑逐渐转向认同、向往和追求。在共和国成立前夕,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尤其是相当数量的高级知识分子,向往的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崇美症”几乎成为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通病。如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储安平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则使世人明白,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线。”^①这一段话,不过是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当时,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向往“第三条道路”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这些知识分子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开始被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所吸引。费孝通所写的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比较形象地反映了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变化。这篇文章发表在1957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它用了一句古诗“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来形容当时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文章写道: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之前,许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是比较陌生的,当他们搞清了社会主义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是倾心向往的,“但是未免发觉迟了一步,似乎前进的队伍里已没有他们的地位”,于是,就有了一种寂寞之感,即“当一个碰到一桩心爱的事而自己却又觉得没有份的时候,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意味”。当然,这段话是对当时知识分子政策的比较婉转的批评,但仍然明确无误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他们已经把社会主义当作“一桩心爱的事”而倾心向往。

二是越来越多的旧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从刚开始时的

①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杂志2卷2期。

“不反对”逐渐转向佩服和拥护。同对待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一样，在共和国成立前后一段时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也是持中立的观望的态度。毛泽东在1949年8月14日所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曾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①前面提到的储安平可以说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在1947年3月所写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就有如下的一段文字：“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只有自由主义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②这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是当时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这部分知识分子，一开始毛泽东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是“不反对我们”即可。

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新社会的教育和影响下，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也或迟或早发生了变化。在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储安平即改变了政治态度，公开放弃了“第三条道路”。1949年11月，他在题为《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的报道中写道：“在我们讨论政府的时候，从行政的观点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党的党员，当他在政府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②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杂志2卷2期。

作时,他应当按照行政组织的系统,发生领导与服从的关系;但从政治的观点来说,无论是哪一个党的党员,或者是没有党派的人士,无论他在哪一个政府部门工作,在政治上,他是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的。”^①他到《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后,于1957年5月7日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再次表明了这种态度。储安平说:个别同志有这样一种想法:既然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那么就应该办成“反对党”的报纸,这可能是不了解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其性质是有根本的不同,他们是有在朝在野之分,他们的反对党的主要政治目的是要把对方搞掉,取而代之。而我们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民主制度,我们的政党没有反对党,民主党派都是参加政权的,有事大家协商,所以,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纸,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鉴于这种认识,储安平提出,《光明日报》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储安平对于民主党派参政地位的看法,还是很深刻、准确的,从而也证明了他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态度。

当时许多单位的统计数字也说明了知识分子政治状况的这种质的变化。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40%左右;这两部分合占80%左右。在这80%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

^① 《观察》杂志2卷2期。

分之几。周恩来认为：“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知识分子中间要求入党的人数也多了起来。例如，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 1920 人，申请入党的有 605 人，占 31.5%；天津 6 所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教师 291 人，申请入党的有 106 人，占 36.4%；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131 人，申请入党的有 53 人，占 40%^①。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到了 50 年代中期，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信仰方面与执政党的干部有了“共同语言”。

以上三个方面，以及两种“共同语言”，构成了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相互关系的基础或基本特征。

三 调整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

到了 50 年代中期，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成为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阶层相互关系的基础。但是，由于传统和习惯的影响（既包括民主革命的传统和习惯，也包括旧社会的传统和习惯），在这种关系中，也存在着不和谐的一面，或者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说法，存在着“互不信任”的情况。1956 年初，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即指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② 费孝通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用了乍寒乍暖、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来形容这种摩擦或“隔膜”现象。费孝通认为，1956 年以来，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3、179、180 页。

② 同上书，第 175 页。

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逼近一看,问题还是不少的。当然,问题总是有的,但当前的問題毕竟和过去的不同了”。

在1957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对于这种“隔膜”现象作了深刻地揭露和批评。全国人大常委张治中在大会上反映说:“据我们的接触,在机关、学校、企业中党员与非党人士亲同一体,水乳交融,互相推重,互相帮助的很多,但是相反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有些党员同志有时态度生硬些,言语简单些,和非党人士谈不拢,因此不能了解别人。据各方反映,有些党员与非党人士生活都不在一块,甚至连游览娱乐都分开进行。几位党员同志在一起谈话,一位非党人士进来了,谈话就马上停止,反之,几位党外人士在一起谈话,一位党员进来了,谈话也同样马上停止。有人形容这是‘一鸟投林,众鸟压声’。有人反映,有些有关会议不能参加,有关文件看不到,政策纲领传达不及时,使非党负责人员掌握无分寸,容易出漏洞,还有人说,‘现在党群关系有皮骨而无肉,许多知识分子想接近党而不得其门’,‘党群关系如隔一堵高墙’。”^①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也认为,当时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他说:“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双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罗隆基还举了一些事例来说明党员方面的责任,如“少数教授埋怨评级不公平重政治不重学术,党团员等级高,党外人等级低。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少数教授埋怨选拔不公平,选青年不选老年,党团员机会多,党外人士机会少。”罗隆基认为,尽管这种反映是少数,但也值得领导干部主观努力,进行检查,看行政工作中是否有协商不足、民主不

^① 1957年3月9日《人民日报》。

够的缺点,看是否在无意中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①。

党的干部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的“隔膜”现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1957年4月19日,在开门整风前夕,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汇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其中即包括了“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这一项内容。可见,毛泽东果断地发动非党知识分子帮助党的干部整风,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调整党的干部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在5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况,但这种情况绝不是主流;二者关系的根本特征是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基本状况是相互间有很大进步的较好的团结与合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得出的“互不信任”的总评,虽不无道理却失之偏颇。这样以偏概全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① 1957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第三节 知识分子与 1957 年开门整风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1957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年头。在这一年里,共和国经历了一场由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的大转折,从此中国逐渐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在这场大转折中,我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为激烈的冲击,他们的命运也随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转折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翻云覆雨的变化,引起国内外很多人的关注,也陆续有一些专著出版,但个中原因,至今仍然令人迷惑不解,于是,众说纷纭,产生了种种假设、推断或臆测。如前些年香港曾出版了一本题为《阳谋》的书,即认为:“从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一月,占据毛的头脑、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国‘党内外’那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尽管事实上它并不存在。”“毛需要把那些‘蚂蚁’们请出来,然后聚而歼之。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们请出来。他决定利用‘双百方针’。”^①于是,就有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这本书的作者丁抒于199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双月刊4月号上,题目是《不是阳谋是什么?》。这篇文章对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1957:大转弯之谜》一书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异议。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的动因。他写道:在国内,有关毛泽东发起反右运动的讨论,基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是为了保持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他想跳出黄炎培1945年提到执政党兴而复亡的‘周期率’。有论者指出:‘甚至在他晚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包含着这样的良好的愿望。希望

① 丁抒:《阳谋》,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4月修订本再版,第109页。

通过这样的自下而上的‘大革命’，重新锻造党，使它从根本上摆脱周期率的支配。”可惜的是，‘一个正确的命题，最终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果。’”他认为这个观点不过是诠释了中共中央 1981 年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结论。在这位作者看来，反右运动不过是毛泽东酝酿已久的一场“阳谋”。中国大陆出版的一本关于 1957 年事件的纪实文学作品也这样写道：“党号召大家讲话，号召鸣放，号召大鸣大放，号召——用 15 天之后的语言——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场大‘阳谋’开始了。”^①似乎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的动因，就是为了将右派们“聚而歼之”。按照这种观点来分析 1957 年的事件，一切都显得很简单了：并不存在什么大转弯，整风就是为了反右。

但是，在世界上颇具影响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却持另一种观点。这本书写道：

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当相信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的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②

显然，按照这本书的观点，毛泽东在发动开门整风时，并没有任何“引蛇出洞”的念头，直接的和根本的动机就是对付党内的官

①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1 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65）》，第 264 页。

僚主义。到底哪一种观点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呢？客观地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和发展逻辑，接近于历史原貌。不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论断，又有对复杂问题过于简化而不够全面的缺欠，故需作若干补充。

一 “双百方针”的政治意义

从50年代中期毛泽东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自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反复考虑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苏联的错误？显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对于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仅仅从执政党自身去解决问题，效果有限，往往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如建国后的一系列整治措施，都难以收到长远的效果。因此，毛泽东决心进一步引进外部的力量，对执政党施加更大的压力。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主动号召社会各阶层畅所欲言、公开揭露和批评自己的缺点错误，这种作法，不论在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还是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因此，很自然地会被认为是标新立异。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在当时就引起了许多异议、疑虑和猜测。

在国际上，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的新政策都引起了政治家们的注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这一方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有些植物结的果实味道是苦的或者有损人的健康，还有一些植物长起来不受人的控制而会使它周围的作物的根因得不到养料而干死。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

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①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赫鲁晓夫所见略同。在他看到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于1957年6月25日和7月2日两次回答了记者的有关问题。他说:“我把这篇讲演看了好几次。这一类的讲演是要多读的,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不能十分确定它们的意义。”“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不论杜勒斯与赫鲁晓夫的立场如何不同,凭着政治家的敏感,他们都意识到了“百花齐放”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作风与领导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赫鲁晓夫不赞成让各种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而杜勒斯则希望由此成为中国“自由化”的开端。

其实,毛泽东对“双百”方针的政治意义是讲得很清楚的。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提出来的,真理只有在同谬误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他还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

^① 《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

揭露矛盾,解决矛盾。”^①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说道:“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②

在这里,毛泽东将“双百”方针提到了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高度,赋予了它更为深刻的政治意义。当时,周恩来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956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即指出,我们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政治上只有单方面的意见,是很危险的。显然,周恩来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适用于学术问题,而且也适用于政治决策。由此可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当时所关注和思虑的焦点是:如何打破不能批评执政党的迷信,在中国造成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

实际上,毛泽东关于“放”的想法由来已久,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早在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发表的演说中即指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279页。

解释。”“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①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关于历史“周期律”问题时，再次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而易见，所谓“内外夹攻”，所谓“民主新路”，与50年代中期的“双百”方针具有本质上相同的政治意义。由此也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想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割断这种渊源、把它与以后所发生的“引蛇出洞”硬扯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 毛泽东批评党内对于“双百” 方针的消极抵触情绪

关于毛泽东发动开门整风的观点、动机和过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下面一段论述：

到2月份(1957年)，毛泽东断定，如果党的整顿不致被完全侵蚀，就需要采取大胆的行动，于是他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进行干预。在讲话中，毛泽东恢复了1956年的基本上抱有信心的看法。胜利已经取得，主要的任务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810页。

注意制度中的缺陷。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支能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忠诚的力量。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团结,缺点可以用非破坏性的方式予以克服。但是当毛泽东透露整风又定在1957年时,他又提出关于整风方法一些新的和令人不安的思想。不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被定为批评的指导思想,而且知识分子被邀请在向党提批评时担任主要角色。这样,百花运动就从鼓励学术争论的手段转变为进行整风的一种方法。^①

这一段论述中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说明或探讨:一是党内对于中共中央新的方针存在一股抵触或消极情绪,毛泽东不得不作了两次重要的讲话进行干预;二是知识分子被邀请在向党提批评时担任主要角色,百花运动从鼓励学术争论的手段转变为进行整风的一种方法。

“双百”方针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极大的争议,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一股消极抵触情绪。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言:

毛泽东的这种创新方式遭到不少反对,虽然对反对的确切情况依然不甚了了。……在日常负责管理知识分子的中下层干部中,的确出现了普遍的反对。这些官员的直接权力和特权摇摇欲坠,所以与更加超脱的最高领导的看法不同。由于担心运动的过程会失去控制,这些干部不去鼓励知识分子进行“鸣放”,而是不加区别地攻击他们的批评意见。^②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140页。

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内高层领导和中下层干部看法不同的原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不一定准确,但是,当时党内中下层干部存在一股消极抵触情绪,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57年初所发生的一场对于“双百”方针的争论。

1957年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中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四位高中级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

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文章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以及将来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同志,但他没作任何评论。及至1月下旬,毛泽东明确批评了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同志对党是忠心耿耿的,是为了党的事业的,但文章则不堪领教。2月16日,毛泽东又指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不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义。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老干部真正拥护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是少数,要认真说服,要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的统一。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又多次提出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

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篇文章,当然不仅仅因为它的观点是错误的。更引起毛泽东忧虑的是,持这种错误观点的人在党内决不是少数,这些人和他们僵化的思想方法已经成为推行“双百”方针的主要障碍。就在毛泽东批评这篇文章的时候,一些人却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和推崇。2月17日《辽宁日报》发表了署名于铁的文章《警钟——读陈其通马寒冰等“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认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一篇表现了鲜明党性的警钟般的文章,文中提出的几个问题,特别是保卫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那种精神,是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深思的。2月2日《吉林日报》发表了《省市文艺工作者座谈当前文艺工作情况》的报道,同时发表了许行的文章《必须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及寒江的文章《我的不同看法》。许行认为,陈其通等同志针对当前文艺工作中的混乱情况,起来捍卫社会主义思想、捍卫文艺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就不能说是“过于偏激”、“有宗派主义情绪”、“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而应该说是必要的、适时的,同时也是正确的。2月28日,《旅大日报》转载了陈其通等的文章,编辑部并加了按语:“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2月21日《辽宁日报》报道)。”同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地方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看法居然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很耐人寻味的。

实际上,在3月份以前,毛泽东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谈过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大部分地方同志不可能了解到这一情况,甚至有些地方还传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所以,一些地方报纸也才会发表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文章。但是,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

《人民日报》，却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那么，它又是怎样表现的呢？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从1月8日至2月28日的50天里，《人民日报》没有发表过一篇有关的文章，也就是说，《人民日报》自从发表了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之后，就偃旗息鼓了，似乎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与自己完全无关了，从而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地方报纸在进行着一场有关党的方针的重大讨论，而党中央的机关报却放弃了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呢？当然不会是稿件方面的原因，这份报纸后来承认，1月至2月期间，它收到有关信、稿20余件；显然也不是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例如让地方报纸充分争论，等等，因为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保持沉默，党中央主席总要知道的，而事实是，毛泽东在2月27日对《人民日报》的沉默态度表示了不满。因此，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赞同陈其通等人的观点，但又不能公开与毛泽东对立，所以只能采取沉默态度了。这说明，“双百”方针的实施，在党内确实遇到了阻力。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的不满。他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提纲里写道：“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四个人”指陈其通等人。着重号为毛泽东所加）毛泽东的批评想必引起了《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震动，两天后，《人民日报》打破50余天的沉默，发表了署名陈辽的批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

在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56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青年作家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描写了北京市某区党委会里，一个青年干部同区委组织部一个副部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作斗争的故事。小说发表后，也在文艺界

引起争议,一些人认为,小说把反对党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主题,是完全错误的。马寒冰在《文艺学习》1957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部不真实的作品》的批评文章,认为官僚主义现象在边远地区也许会有,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可能存在这种现象。曾以“小人物”身份向“大人物”发起挑战的李希凡,此时也认为,小说反官僚主义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从对这篇小说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在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中,存在着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他们热衷于一家之言,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在感情上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格格不入。

2月16日,毛泽东在小范围内谈论文化思想问题。他说道:王蒙的小说写得相当好。王蒙是很有希望的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毛泽东还说,反官僚主义是应该的,只是作者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评官僚主义是批不倒的。毛泽东不同意马寒冰、李希凡等人认为北京有中央就不会有官僚主义的观点。他说,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能说服人的,中央就有官僚主义嘛!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道,马寒冰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不能发生官僚主义现象。不晓得这道理来自什么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我看得不多,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我没有看过这样的马列主义,中央也出官僚主义,也出过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王明、高岗、饶漱石,怎么能说批评不得。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也包含了党内斗争方面的考虑。或者说,毛泽东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当作了执政条件下揭露、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手段。

3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林默涵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一篇引起争议的小说》的评论文章,对王蒙小说作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文章一方面指出了小说存在的缺点,认为“小说的作者是抱了一种热情来描写

生活中的新旧斗争的,并且直接批评了党的机关中的消极现象。可是,由于作者在理解生活和描写生活上面都存在着缺点,他虽然比较深刻地写出了消极的事物,却没有写出真正能够战胜旧事物的积极力量,因而作品给人一种不健康的灰暗感觉”。另一方面,文章也明确指出了小说所蕴含的积极意义,认为:“反对官僚主义以及其他一切妨害我们的事业发展的消极现象,是当前的重要斗争任务。这种斗争,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有力的反映。王蒙的这篇小说,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但他提出了这样的尖锐的问题,并且表现了他的勇气和才能,就是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林默涵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等消极现象,究竟能不能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对待“双百”方针的态度。一些人平常也说些拥护“双百”方针的话,但一碰到批评党委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现象这样尖锐主题的文学作品,就感到十分刺耳和刺眼,于是就粗暴、武断地一笔予以抹煞。王蒙的小说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林默涵批评了这种作法,认为“这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对文艺创作的发展不利的”。

很明显,林默涵的意见决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反映了党中央的一个基本精神:中共中央提倡和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揭露和批判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

这一基本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得到充分的体现。3月6日至3月13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这次党的会议邀请了党外同志参加,如陆定一所说的,“党与非党同志,大家共同提问题,共同研究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还向各地党委负责人提出:“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

好处,没有坏处。”^①党外同志参加共产党的会议,与共产党人共同商讨宣传工作的大政方针,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它向全国人民表明,执政的共产党,决不是一个有着一党私利的宗派团体,即使是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工作,共产党也是以坦诚的态度听取各方意见的。这种做法,与中共中央“放”的方针是协调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如同党内对于“双百”方针的认识存在分歧一样,少数党的地方负责干部在这件事情上也受到宗派主义情绪的支配,他们没有请党外同志进京参加会议。陆定一在会上批评了这种行为。

3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讨论,“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实际上,由陈其通等人的文章而引发的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无非是两种意见,或者主张放,或者主张收。这是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或者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已经不再局限于科学文化工作领域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們少犯错误。“一切工作”当然包括了党的建设,也就是说,在即将发起的整风运动中,同样要贯彻“双百”方针。

3月13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放”的方针。他以匈牙利事件为鉴戒,指出,采取压的办法,只能使人民内部矛盾趋于激化。“（匈牙利）犯了那么多错误,群众上街游行,本来这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是他（指匈牙利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要去压,结果变成对抗性的了。中国虽然没有格罗,但是教条主义思想则近乎格罗的办法,打击群众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情绪。”^① 当时所谓“近乎格罗的办法”的主要表现,就是抵制“双百”方针。从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围绕“双百”方针所展开的一场讨论的舆论导向就基本上扭转过来了。

最后的结论是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作的。4月9日,《文汇报》刊登了《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两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报道。关于这场讨论,周扬作了如下的结论:“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强调在文学艺术战线上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同时指出了目前文艺上的一些的确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这是好的,应当肯定的。但这篇文章包含一些重要的错误。第一,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后的文艺界的情况,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看不到积极现象(这是主导的方面),把一些次要的,个别的消极现象不适当地夸大了。第二,就以他们所指摘的消极现象而论,他们的批判也是缺乏分析的,而且有些现象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消极现象。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描写家庭和爱情生活的作品和讽刺作品的增多,这些都不能说是消极现象;其中虽有某些消极成分,但就主要方面说,是积极的,健康的。第三,对待他们所认为错误的思想,不是采取说理的态度,而是采取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上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周扬在这里已经把中央的精神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一个新的方针的提出和贯彻,决不是经过短时间的讨论和一两次会议就能达成完全的统一和一致的。认识和实践发展的曲折,都是不可避免的。

^①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6页。

三 毛泽东发动知识分子揭露和批评执政党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不发动党外人士对执政党和政府工作展开批评,如果不造成这样的一种社会压力,共产党的整风就不易收到效果。那么,在中国社会中,哪一个社会阶层能够较为敏锐地觉察到问题,从而对执政党实施较高水平的监督呢?显然,在经济文化普遍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只有知识分子阶层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知识分子被邀请在向党提批评时担任主要角色”的根本原因。而当时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把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考虑到知识分子的特性了。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知识分子的知识既然达到了‘高’的水准,他的年龄也必定活到了‘老’的阶段,他就是中国旧社会里所谓的士大夫阶层中的‘士’。中国的‘士’对政治亦有他的积极的一面,例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士’不是甘心寂寞,不问政治的人,就看领导者怎样能够使他们发挥积极的一方面为国家服务而已。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有这样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合则‘士为知己者死’,不合,则‘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对这类自高自大的‘士’,亦确有一套领导的艺术,即所谓‘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等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陇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①

^① 1957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这一段文字,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说是罗隆基自我心态的一种写照,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的心态。但牢固地持有这种传统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对于这种传统观念,我们很难简单地判定其是非,问题完全在于是什么样的领导者,往什么方向去引导它。

在中国社会进入大变动时期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借助的力量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特性的知识阶层。毫无疑问,要调动其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必须消除以往的隔阂和顾虑,为他们提供一个畅所欲言、能够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共中央根据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制定的一项崭新的知识分子政策,而把这一方针发展成为共产党整风的一种方法,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意。

但是,在中共中央发布“4·27”指示时,许多党外人士心中还是很有顾虑的。当时社会学家李景汉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共产党今天是个执政党,他们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这是当然的事。同时,他们一向又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人,这无论从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看,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忽然要来一个运动,要从前的改造者、执政者来接受被整人的意见,接受批评,这实在是反常的事,从古今中外看,哪一个执政者会这样做呢?”^①说共产党一向是整人的、改造别人的,当然不失偏颇,但从这番话中仍可以看出这样一层意思:以往的执政者没有主动接受批评,而共产党这样做了,这固然说明了共产党的伟大;但是,面对这种“反常的事”,一些人心中也不免要嘀咕:共产党果真是诚心的吗?或者如某些人所断言的,是诱人陷入罗网的“圈套”?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党外人士真正发动起来,首先就得打破他们的顾虑。为此,在整风指示公开发表之前,毛泽东召集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

^①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谈话中,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并希望他们向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毛泽东肯定了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尤其是对高教部和教育部的批评意见,他说,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毛泽东在这里再次表述了他的“内外夹攻”的思想,说要找出办法,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这样的会,在报上登一下,就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还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妥,他们在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遗憾的是,这个非常适宜的协议,很快就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激烈展开而中断了。

这一年的五一节也很有特点,中共整风成为宣传报道和庆祝活动的主要话题。5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同时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开始整风的消息。该报第7版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为这篇文章加写了一段编者按,按语说:“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显然,毛泽东通过这篇文章和这一按语,再次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欢迎各界人士对中共的缺点错误展开批判。

在五一节的庆祝活动中,中共领导人也一再地提起整风这一话题。4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招待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一千多位来宾。在祝酒词中,周恩来说道:“在你们访问我国期间,你们将会看到新中国的人民这几年来的和平劳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注意解决在我们前进道路上所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也决心要继续向各国人民吸取智慧和经验。我们希望,在座的各国同志和朋友将能够就你们的所见所闻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提出意见,使我们能够得到教益。”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代表团时,又对他们说:“我们正在整风,请你们多提意见,帮助我们。”^①让各国来宾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在建国以来的历次庆祝活动中可能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共实行开门整风的消息。五一节这一天,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彭真在游行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共中央认为我国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同时改造自己,因此,中共中央已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他还说,中共中央正在提倡各级领导干部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就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②。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整风指示发布的最初一段时期内,对于邀请党外各阶层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执政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是诚心诚意的,而

①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②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

且,为了真正把各阶层人士发动起来,中共中央也作了最大的努力。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努力确实收到了成效。在五一节期间,中央整风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并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与那种把整风只归结为一种有预谋的“引蛇出洞”的观点相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显然更接近于历史的原貌。

四 开门整风的成效

但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认为:“当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推到整风的前列时,他实际上要求他们执行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任务:大胆地批评他们常常害怕和厌恶的党的当权派,可是在批评时又要本着‘和风细雨’的精神。”^①这个结论,与历史事实又不是那么符合了。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虽然历时仅有5个多星期的时间,但在此期间兴起的自由批判的浪潮,对执政的共产党却是一次极其严格的锻炼和考验。当时在各种座谈会上,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党内外各阶层人士发表出来的种种意见,虽然如毛泽东所套用的唐代诗人王勃的诗句那样: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但是,认真分析当时的种种言论,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一时期的鸣放言论,绝大部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有许多意见甚至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这些意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于党和政府关系方面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处理好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早已提出,但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一般说来,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3页。

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实质上讲,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中产生的,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当然也是国家民主生活不足的必然表现,因此,这种现象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思想觉悟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各阶层人民思想觉悟得到普遍的提高,这时候,人民群众增长起来的议政、参政的政治积极性,就必然会同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这种模式发生种种矛盾和冲突。1957年开门整风中各界人士在这方面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意见,就说明了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比较严重。在5月10日的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明确提出了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要直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①。民革中央的另一位常委刘斐在5月30日的发言中分析了党政不分的原因与解决的办法。他说,现在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而且越到下级,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而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很不正常。刘斐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建国不久,法制尚不完备,某些高级干部和许多中下级干部法制观念薄弱,以及缺乏民主作风等原因所造成的。党中央对这方面的情况注

① 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以下所引言论,均见1957年5月、6月上旬的《人民日报》,不再一一注明。

意不够,也不无影响。他提出,要改变这种情况,除开进行思想整风外,还必须在一般党员干部之间加强法制思想教育,迅速制定必要的法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以划清党政关系。而且党员应以身作则,尊重国家机关的职权。刘斐还进一步指出,党和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让国家机关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关于党群关系方面的尖锐批评。

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的形成,固然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有极大关系,但从思想根源上讲,还必须指出,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宗派主义观念的反映,即中共党内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不喜欢“五湖四海”,而热衷于“清一色”;他们只相信共产党员,而不信任党外群众。这种“清一色”在政府工作中表现为以党代政,而在党群关系中,则无形中在这部分党员干部与他们所联系的群众之间筑起了一道“墙”,挖了一条“沟”。这种“墙”“沟”现象,是当时党群关系中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开门整风运动中各界人士所批评的一个重点。

党群关系中的“墙”“沟”问题,并不是在1957年开门整风中才提出来的。早在一年多以前,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组织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所谓“隔膜”,与后来所用的“墙”“沟”,程度不同,但含义是一样的。根据当时各界人士的反映,党组织或党员与党外群众之间的“墙沟”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部分非党干部有职无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中国共产党内就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情绪,

受这种情绪支配,他们对中央的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针很不理解,总以为安排一些非党人士担负领导职务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是属于照顾性质的。从这种狭隘的宗派观念出发,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就必然会将一切权力和工作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而使非党领导干部有职无权,成为摆设。在开门整风中,对于一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宗派主义作法,许多党外人士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与生活上的特殊化现象。当时有一部分党员干部认为,既然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那么,共产党员在政治待遇和物质生活方面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这种“特殊”观,及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不仅不能展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反而极大地降低了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引起了群众的严重不满。

一些党员干部居高临下,不信任或看不起非党人士。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①。但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一些党员干部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总以为群众觉悟低,非党人士落后,因此他们的言谈举止总表现出一种高傲,使党外人士难以接近。

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为什么它的一些组织和党员与群众之间还会产生“墙”与“沟”呢?当时无党派民主人士陈叔通曾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作了这样的分析:从党员方面来说,由于对非党员有气不过、看不起和惹不得的情绪。他说,尽管党对党员一再进行了教育,说明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能以功臣自居,但是有些党员总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之看不起非党人士。怎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么叫惹不得呢?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些好。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群之间有了“墙”和“沟”。陈叔通的分析,确实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进城后的思想状态。

各阶层人士所反映的“墙”“沟”现象,证明了中共八大的一个论断的正确性,即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在八大召开时,也许有一些党员还不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开门整风中,充分揭露的矛盾却足以引起这些党员的震动与警觉。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批评和建议。

1957年是我国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应该如何去走,这不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潜心思索的问题,也是一切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党外民主人士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一年所展开的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针对过去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发表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茅以升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全盘计划化和全国统一化,同时也需要高度纪律性,以求方针政策的贯彻。但是,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和教育的基础都很薄弱,而科学又十分落后,因此,在制定一个计划时,由于因素太多,而且资料收集不易,就很难做得尽善尽美。纵然制定的时候是对的,等到各地实行的时候,情况又变了。这是一个高度科学性的工作,在我国现有科学水平上是很难做得完美的。茅以升主张,在做计划时,要分别轻重,预留伸缩,规定出哪些是必须由中央集中的,哪些是可以容许有“自由市场”的,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哪些是可以有伸缩的,尽量把事权下

放,并且把集中和分散的比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加以调节。

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对于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我们今天各部门的管理制度恰恰不足以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沈志远指出,由于管得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他认为,过多过死的集中、管理和一切都包办下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消极作用甚至为害作用是不可计量的。因此,如何正确地使计划管理与自由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党的领导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了。他希望通过这次整风,不但要消除寄生在党和政府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

5月11日、12日的《人民日报》连载了北京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论文《联系中国实际来再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马寅初在论文中论述了我国经济建设中八方面的平衡关系,其中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间的平衡、原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平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平衡、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平衡、工业企业和运输企业间的平衡、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平衡、大型和中小型工业的平衡、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他在论述这些平衡关系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例如,在论述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平衡时,他指出:“过去,由于中央对计划指标的掌握有过多过繁的地方,这就多少束缚了地方的主动性。……我们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我国国民经济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在过

渡时期中,由于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的变化是很快的;另一方面,我国的幅员广阔,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央还不可能对各个地区的情况掌握得很准确,因此,国家也不可能对各项计划指标不分主次地都采取严格控制的办法,而必须允许地方在国家统一的计划的指导下,保持必要的灵活性。”在论述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平衡时,马寅初既强调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方针,又明确指出,我们也不能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而降低轻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重要性,它们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维持平衡。马寅初在最后的结论中还指出,第一个五年前四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但这并不是说年度计划的安排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推动下,1956年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成绩很大。但是基本建设规模偏大,人员招收多了一些,学生也招多了,工资基金和事业费用也就必须多增加,结果,国家财政多支了一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都紧张。根据1956年冒进的情况,马寅初提出,1957年的计划,在去年大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这不是冒退,而是转向正常的发展。

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党外人士对于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是极有帮助的。以后的实践证明,上述批评意见大都是富有启迪意义的真知灼见,如果认真采纳,肯定会对实际工作有相当补益。

第四,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批评与建议。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与当时法制的健全有很大的关系。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对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党外人士首先对我国在一定程度存在着的无法可依的现象提出

了批评。5月16日,民革中央常委黄绍闾在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对我国的立法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我国立法工作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指出,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此外,应该注意那些过去因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致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的负责人,如果不及时处理,并向人民作交代,就无异给整风运动带来一个极大的讽刺。在中国政法学会召集的首都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5月26日、30日、31日、6月4日召开),法律出版社编辑纪清漪批评了立法工作进展太慢的现象。她说,刑法典的起草工作早就听说在做了,可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至今仍未公布。据说,这是为了使立法者少犯错误,但结果呢?使得广大司法者“无法可依”,量刑幅度很难掌握,错判也在所难免。再如诉讼法典的拟订,是否还没有条件呢?不是这样的,据说也已有人在做,可是连下楼梯的响声还未听见。北京大学教授芮沐在发言中批评了我国立法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他说,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立法机关,规定人大常委会可以颁布部分性质的法律,可是现在国务院所属各部却自己制定了许多法律性的文件、指示,而下面也都把它们当作法律遵照执行。他认为这样太分散了,应该有一个总的机关统筹一下。

但是,在当时是不是“有法”就“必依”呢?也不是的。许多党外人士也指出了一些领导干部“有法不依”的现象。在5月30日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革中央常委刘文辉在发言中即批评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党和国家很早就注意保护公民权利的问题,我国宪法第九十七条就明文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控告权和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普通公民处在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之下,是否都能有效地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控告权呢?国家机关

对公民权利因干部违法侵犯而受到的损失,是否都依照宪法给予了赔偿呢?他认为事实上还有问题,特别是对公民权利被侵犯的损害赔偿,好些机关都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这些现象都说明了,社会主义法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执政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是很不明确的。在首都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的兰州大学副教授吴文翰指出,宪法虽已公布,可是至今仍有一部分领导人员对法律持虚无主义的观点。认为以党代政是当然的,党的命令高于法令,党员个人的言语自认是“金科玉律”。这都是违反法制的。

第五,对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偏差的批评。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些政治运动,对解决当时十分紧迫的一些重大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运动成绩斐然,但也确实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其中比较严重的是对胡风事件的处理和几乎同时发动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在开门整风运动中,一些党外人士批评了这些“左”的偏差。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说,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他建议,在1957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方面分往各地检查,分别作出处理。有的党外人士对肃反运动中的一些具体作法也提出了批评。如财政部参事室参事陈盛兰回忆说:肃反运动中要求我们写材料。我们写了,领导上却不太相信,写得不详细,就说我们不依靠组织;我们为了把材料写得认真些,只得向有关人打听,组织上又说是“通风报信”。真弄得进退两难。陈盛兰对于肃反事先定比例的作法也很有意见。他说,财政部的“三反”和肃反有些扩大化。如“三反”时预定“老虎”为25%,肃

反时则定为5%。事先订百分比的作法是否科学?事实证明确有主观主义。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自由批评的环境中,相当多的各界人士确实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切中时弊的批评意见。对此,当时党中央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57年5月14日,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该版刊出了上海市中小学教师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指出:“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①这种情况说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开展对于执政党干部缺点错误的批评,对于非党知识分子来说,并非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所言,是“一项不可能做到的任务”。

这部西方权威的学术著作承认,毛泽东发动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是为了对付党内的官僚主义,这样,它就与那种把开门整风归结为“引蛇出洞”的观点明显区别开来;但是,它又认为,毛泽东关于发动非党知识分子来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设想和实践,除了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反右派运动之外,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实际效果,这个结论又与历史事实有较大出入,实际上低估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

了毛泽东关于“内外夹攻”、“民主新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开门整风等一系列开创性的设想、思想和实践的成效和深远意义。这部著作之所以得出了一个片面的结论，是因为它简单地以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否定了开门整风的成效。从以上所述的历史事实中不难看出，1957年的悲剧实际上并不在于开门整风没有成效；恰恰相反，正因为开门整风获得了极大的成效，知识分子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空前地激发起来，毛泽东向往已久的对于执政党“自由批评”的政治空气已经初步形成，从而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健康顺利的进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却由于多种原因而不幸地中断或夭折，才使人痛惜不已。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①但是，自从破坏了开门整风已经初步形成的“自由批评”的政治空气，实际上就逐步转上了与这个科学目标背道而驰的轨道，一直到爆发“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也没能盼到他所设想的这种政治局面。这也许正是1957年事件的悲剧意义所在。

第四节 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 由整风转向反右

前面我们提到，在“引蛇出洞”论者看来，1957年并不存在什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么大转弯：“开门整风”就是为了反击右派。因此，如果我们上述的结论能够成立，即开门整风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内外夹攻”、“民主新路”等思路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而与后来的“引蛇出洞”并无内在必然联系。那么，我们就必须回答如下的问题：既然毛泽东诚心诚意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而且整风又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他为什么又毅然决定打破自己向往已久的、刚刚形成的宽松的政治环境，转向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呢？这个问题，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全部历史事件的一个关节点，不解开这个关节点，1957年的历史就会显得扑朔迷离，令人迷惑不解。

但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显然没有把握住这个关节点。

这部著作写到：

“百花”运动的发展势不可挡，大大出乎党的预料之外。党曾经提出和确定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框框，至少在最初时期是如此。但是，尽管党限制了范围和规定了批评的条件，它也不能充分控制所引起的反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超过了对个别官员的批评，而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批评。它释放了比党所预计的更多的被压抑的不满和牢骚。批评的不断扩展、独立小集团的组合以及特别是学生们反对党当局的示威游行，使党决定停止运动，因而在6月8日发起了对它的参加者的反击，把这些人称做“右派”。政策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也由于连续的经济困难所致，共产党政权把这些困难主要归因于知识分子批评的有害影响，他们的批评削弱了谋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心全意的热情。党想把不满情

绪从对政府移向知识分子。^①

这一段仅有的关于大转弯之谜的论述,把从“和风细雨”转向“急风暴雨”归结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原因,而前者过于简单,后者则过于牵强。

众所周知,在当时并不存在什么“连续的经济困难”,1957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年份之一。况且,即使存在“连续的经济困难”,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突然爆发出来。所以,它的这个解释显得苍白而无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从开门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呢?

一 毛泽东改变整风主题的根本原因

在4月30日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但是,仅仅过了20余天,毛泽东就重新返回到他自己宣布已经结束的时代,又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果断地改变了原定的整风主题,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现在还缺乏有充分说服力的能够直接说明这一问题的充足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毛泽东说明他自己认识变化的材料。但从当时的形势变化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出促成这种转变的一些动因。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4月30日以后的形势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即:从“左叶事件”、“五一九运动”以及各种尖锐的批评意见中,毛泽东得出这样一个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68页。

结论：一些曾经主张过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借着共产党开门整风的机会又死灰复燃，企图摆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有在中间群众中扩大其影响的趋势。这显然违背了毛泽东等发动开门整风的初衷。

在历史上，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都曾倡导过“第三条道路”。在反右派运动中，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曾揭发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伯钧和罗隆基仍然在做着中间路线的迷梦，要把民主同盟引导到反动的第三条道路上去。……章伯钧就在华东、西南、西北布置军事活动，满以为有枪杆子，就可以称王称霸，至少可以同人民政权和蒋介石三分天下。罗隆基就勾搭美帝国主义，要美国扶植中国所谓‘第三种势力’。罗隆基曾经向司徒雷登建议：‘美国买了蒋介石这匹马，赌输了，还是买民主同盟这匹马罢，可以保你赢回来。’”^①还有人揭发说：“他（章伯钧）对于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始终是不愉快的，他引用马歇尔的话说，中国‘亡国’不是亡于中国共产党，而是亡于中国民主同盟。他说，中国民主同盟当时给了美国一种错觉：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可以走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不会跟苏联走，由于有了这种错觉，美国在当时就放松了军事力量的补充，使蒋介石很快垮台。从这里说明，他对蒋政权在大陆上的覆灭，是惋惜的，对中间势力的企图没有得到实现，是有余恨的。”^②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吴晗还揭发了罗隆基在1948年提出的一纸准备交给中共中央的政治纲领，主要包括：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罗隆基起草了这份政治纲领后，曾拿到上海盟内讨论，遭到史良、许广平、楚图南等人的反对。但罗隆基仍

① 1957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② 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然让吴晗带到华北解放区,要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出。由于当时沈钧儒没有在华北,而在东北解放区,所以吴晗没有把这份政治纲领交出来。如前所述,作“党天下”发言的储安平,也曾经以“自由思想分子”自诩。

在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发表之后,毛泽东曾对那些倡导“第三条道路”的“自由思想分子”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①但是,对于这些“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毛泽东并没有太多的担心。他相信,人民革命的洪流终究会把这些人也卷入进去的。他满怀信心地接着写道:“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

毛泽东的这个预料是准确的。例如储安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政治态度即发生较大变化。当时其他的“自由思想分子”也不再提什么“中间道路”,表示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但是,一些揭发材料证明,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并不那么心悦诚服。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第三条道路”的破灭总有些不太甘心。如1956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上传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曾说道:“现在许多人都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活力。为什么还有活力?就因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1486页。

朝党和在野党。光绪皇帝为什么完蛋？就因为没有民主。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完蛋？就因为还有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是：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是活力。这在我们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他们就叫做‘哇啦哇啦’。所以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互相抑制、互相监督的作用。”^①这说明，在中国的民主人士中，总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承认。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5月中旬所指出的“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反右派斗争大气候的影响，当时的揭发材料中可能有一些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的全貌。如当时的揭发大都片面地强调了民主党派的一些领导人在历史上走“第三条道路”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他们曾经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进步历史的一面，这就容易使人得出片面的结论。况且，由历史问题直接推论出现实的政治态度，否定了其间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高潮影响下的发展变化，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实际上，这些人对于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或多或少地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但不管怎么说，与“第三条道路”斗争的这段历史，却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毛泽东早就注意到了的。由此也就可以推断出，当毛泽东听到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其他类似的言论时，必然会要联想到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他不能不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没有改造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不是想借着共产党整风的机

^① 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会,重新打出“第三条道路”的旗号?

毛泽东的这种担心,随着开门整风中出现的三种特殊情况而加重了。

第一,一些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士,以自己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为资本,向共产党对于文化、科学事业的领导提出了挑战。

毛泽东在1949年就向全体共产党人提出了学习的任务,希望党员们通过刻苦的学习,能够很快地掌握领导建设工作的本领。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多数来自农村,文化基础很低,他们的文化素质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就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而从主观上讲,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人,长期满足于当外行,当政治领导,没有努力地学习领导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共产党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的严重弱点。在开门整风中,一些人士(主要是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了这方而的弱点。如在5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召集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上,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的一位教师就反映说,领导对教学业务抓得不够。教学改革已经四年,校长到现在还是讲“我是一个外行”。她每年到中央开会,回校后便照搬下来。今年中央没开会,校里的教学工作就没有很好安排^①。毛泽东就是在看了这次会议的发言摘要后,写下了“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批语。在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的广州座谈会上,华南工学院教务长冯秉铨发言说,有不少党的领导干部不懂高等教育的特点,不懂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连这方而的常识都没有,我们说要办一所高等学校,他们却要开一个百货商店,这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怎么能够样样都听他们的呢!^②这些,确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作方而存在的

① 1957年5月10日《解放日报》。

② 1957年5月19日《光明日报》。

一种偏向,值得引起党的负责干部的严重关注。

但是,在开门整风中,当一些党外人士,抓住共产党这方面的弱点大作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口号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关注,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想以自己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来与共产党重新作一番政治上的较量。也就是说,共产党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却又处于相对的劣势;相反,那些在政治上居于绝对劣势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却又占有相对的优势。这样,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然要扬长避短了。具体地说,就是抽象地肯定共产党的领导,而又在实际部门具体地否定或摆脱这种领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向薄弱环节进攻的挑战,当然是很严峻的了。

第二,上述情况必然带来争夺中间派的问题。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的人士,肯定是孤立的;但是,他们在知识分子阶层的中间派中,却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些人士在开门整风中的积极活动,使这种影响有扩大的趋势。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争取中间派的问题。他在1940年说的一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他在1957年的决策,是很有启发的。他指出: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

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①

尽管1957年的情况同194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1957年的右派,不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难以与共产党相抗衡,不能与1940年的顽固派(即蒋介石国民党)相提并论;50年代的中间派也不同于抗日时期。但是在争夺中间派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却有某些相似之点。在1957年,毛泽东深感担心的是:右派虽然数量不多,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活动很有可能将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拉过去,甚至一部分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一九运动”^②中也被裹进去了。毛泽东由此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建国7年来,共产党对于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多数人(中间派)的领导权是不巩固的。毛泽东深知,从实力上说,粉碎右派的进攻并不是一件难事,而真正的困难在于教育和争取中间派。按照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想法,在右派一冒头的时候,就应该一棍子将它打回去,当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样做达不到争取、教育中间派的目的。毛泽东主张,不要急于反驳右派言论,要让其充分暴露,任其“走向反面”,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予以有力的驳斥,这样才能够使中间派人士受到深刻的教育。由此可以看出,对右派的大规模反击,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是粉碎右派的进攻,二是争取和教育大多数的中间派人士。后来,毛泽东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在7月份说道: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748页。

②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由此在高等院校中逐步形成了以“四大”(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为主要形式的鸣放高潮,高等院校的开门整风运动开始陷入失控局面。

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

他还说:“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群,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①

也就是说,在右派充分暴露之后,以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击退他们的进攻,这对于中间派人士是一次最为深刻的教育。这也正是毛泽东主观决策的真正含义所在。

第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开门整风运动就是要造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内外夹攻”的局面。但是,开门整风中实际形成的“内外夹攻”,却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一部分共产党员已经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而是与社会上的右派相呼应,向党发起了进攻。这种现象,也使毛泽东深为担心。

在5月份的开门整风中,执政党周围初步形成的自由批评环境,对于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一部分党员也开始对党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甚至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了措词尖锐的批评。这种党内自由批评的现象,在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客观地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一件好事,因为它进一步解放了全党的思想,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了党内监督。但是,任何群众性的批评都不可能每条意见都是正确的,党员群众也不例外。由于一些党员发表出来的意见,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种错误倾向,在客观上与社会上的错误言论起到了相互呼应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8、551页。

配合的作用,所以这种现象也就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例如,在5月上、中旬的“左叶事件”中,为《文汇报》写出《尊重新闻记者》这篇措词尖锐、笔调别致的社论的著名记者彭子冈,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对报纸的阶级性问题提出不同看法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以及主张新闻应该抢先的《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都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道:一部分共产党员,“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毛泽东所提到的“他们”,当然包括了上述几位共产党员。

在开门整风中,一些共产党的负责干部甚至成为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内应”,可能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惊。反右派斗争发动之后,他曾谈到这个情况:“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起义文人’。”^①清华大学的“起义分子”,指的是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后来该校党委会议揭发说:“在右派分子进攻最猖狂的时候,袁永熙和受他影响的同志里应外合地配合右派分子,到处点火,向党进攻。袁永熙向党进攻是有‘策略’的。他在这段时期的党委常委会议上不发一言,借口到基层去参加会议,逃避正面争论,并劝受他影响的同志‘不要和他们(指党委领导同志)争,等一等再看’。但在下面他却大肆活动。他进攻的主要手法,就是故意挑起党员对党委领导核心和坚持党的方针的同志的不满情绪,把进攻的矛头引向这些同志。他用不同的说法诬蔑了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如说:‘某某在常委会上气鼓鼓,某某憋着一肚子气。’‘某

^①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9日)。

某人压力大,很紧张,不敢放。’‘某某人应该在这次好好整一整’,‘这些人就是不虚心,不肯检讨’。”^①这些揭发材料,后来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与事实不符。但在当时,这些材料对毛泽东却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也正是后来毛泽东把注意力由党内的官僚主义转向修正主义的深刻原因。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开门整风中死灰复燃的曾主张过“第三条道路”的势力,他们的观点已经不像1949年那样,仅仅是残存在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头脑中的思想意识问题了。在1957年,这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有了一个突破口,即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和科技界;也具有自己潜在的群众基础或争取对象,即动摇不定的中间派;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共产党内具有“修正主义”思想、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党员干部的配合行动。这样,党内党外的右派们对这条道路的鼓吹,就不再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政治斗争问题了。毛泽东后来说道:“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分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分。”^②

由于对受西方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中间势力和党内状况,都作了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严重估计,从而夸大了敌对势力进攻的严重性,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转换斗争目标,开展一场所谓反击资产阶级嚣张进攻的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自然就否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原定的主题。

① 195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9日)。

二 毛泽东决策的几个促成因素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大规模反击右派的决策,除了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除“第三条道路”的影响,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一根本性思考作为动因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也起到了程度不等的促成作用。

第一,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当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运动时,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央的方针抱有消极的抵触情绪。对于这种情绪,党外人士也有所觉察。据费孝通回忆,“六六六”会议的前一天,章伯钧就对胡愈之、曾昭抡、钱伟长和他说:“我们要跟毛主席走。”意思是说共产党内有分歧,上放下不放。当时,这种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并有所夸大。前面提到的清华大学党委的“起义分子”袁永熙就曾说过:“毛主席受到很大压力,国内告急,电报雪片飞来,都要求收。”北京大学个别学生甚至编造了胡耀邦“谈话”的小道消息。据中宣部6月4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反映: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叶子望前天写了一篇非常反动的文章,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这篇文章已油印在校内外散发,据北京市委昨天了解,矿业、石油等六所学校学生中已在传阅,震动很大。文章内容歪曲了胡耀邦同志在接见团三大代表时的谈话,说胡耀邦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现在的家很不好当,苏联赫鲁晓夫当的也不容易,我国的毛主席现在处境也很困难,党内有人想不要毛主席”。据此,加以引伸发挥,大肆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受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受到了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并说这些人中间也包括陆定一和彭德怀等同志在内。在文章中呼吁维护毛主席、反对党内的保守势力。

叶子望提到的胡耀邦“谈话”情形,最先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

潘家威透露出来的。潘家威在《整风运动中北大党委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写道：

“1957年5月24日下午16点35分到17点13分正当团代会通过改名为共青团之后，团中央书记接见我班六个团员。由于团代会很忙，他没有对我校问题作具体分析。他谈了些情况，作了些原则性的指示。

书记首先谈到‘当家难’。‘难啊……难啊……’书记说：‘朝鲜金日成当家，苏联赫鲁晓夫当家，……中国毛主席当家，我看啊，中国这个家最难当——穷，落后，六万万人口！’他说，我们要改正错误，又要让敌人不钻空子。书记谈到，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说如果没有主席，就不需要整风了。……”

潘家威还写道：

“毛主席最初提出整风时遭到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反对，甚至有人退出会场，大家都听了传达，不必多说。还有传说在我们最熟悉的领导人中也有不表示赞成的。”

胡耀邦确实接见了北大的几位团员，但从当时党内的情况看，他根本不可能与几位青年人谈到“有人要毛主席下台”这样的话。后来叶子望也承认，这句话是他从胡耀邦谈到党的历史上三次大的风浪这件事中推测出来的。由于这句话毫无事实根据，所以毛泽东看了有关叶子望的材料后，批示说：“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显然不完全是谣言本身，更重要的是谣言传播出去所造成的影响。很明显，这种谣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它并不完全是凭空编造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根据”，即党内在整风问题上客观存在的消极抵触情绪以及胡耀邦谈话。所以，这种谣言传播出去，必然要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好像共产党已经面临分裂了。这种谣言同时又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为在大多数党员和群众看来，当时存在消极抵触情绪的党员干部，竟然要毛主席下台，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这种谣言散播开

来而得不到及时的澄清,也将会把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的党内矛盾推向激化。对于这种谣言的危害性,陆定一当时就意识到了。他在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时写信请毛泽东看一看关于叶子望的材料。陆定一认为:右派正在进行大阴谋,值得注意。因此,此次人大,可能出现一种激烈斗争,包括我们现在还估计不到的东西,例如提出胡风案,对某些同志的人身攻击,等等。

对于这种严重情况,毛泽东不能不有所考虑。当然,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提倡“内外夹攻”,主要是针对党内的不良倾向的。但是,他在批判党内不良倾向时,从来都没有忽略根本立场这一问题。他在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时就指出:“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①因此,当毛泽东觉察到右派企图利用共产党的矛盾,在党内制造分裂时,他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个大局出发,必然会对整风运动作出新的部署。恰如1956年12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指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也就是说,当右派的进攻威胁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时候,毛泽东可以对党内某些错误倾向作些让步或松动,以使全党统一到对敌斗争的大目标上来。等到对敌斗争的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再“和风细雨”地解决党内矛盾。

第二,为了维持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

在工作和学习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搞好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各级党组织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为了保证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毛泽东和中央一开始就强调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和风细雨”问题,即避免任何过火的斗争方式,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二是“整风工作两不误”,即避免离开工作和

^①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

学习岗位整风,而要将整风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工作中整风,用整风促进工作。毛泽东和中央强调的这两点,是整风主题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整风目标的根本保证。

但是,在“五一九运动”兴起之后,“大民主”的冲击波却严重地干扰了高等院校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对于校党委维持正常的学习秩序的作法极为不满,极力主张停课搞运动。前面提到的潘家威指责校党委说:“整风学习两不误,校委会通过决议,一切照常进行,还要关起门考政治……不是很明显么——要把群众运动搞垮。”该校“百花学社”成员公开向校团委书记声称:“我们现在是和你们争取群众,到了时机我们就要改造学生会,改造共青团和党委会。”清华大学的情况更为严重一些,据该校一位副校长说,“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而当时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的行动。4月2日,林希翎在校内贴出布告,说她要当众宣读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布告贴出以后,在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有些学生要求听。校党委知道后向林希翎做了劝说工作,林同意不宣读了,党委并向学生作了交代。但6月3日夜林希翎却又在赶写秘密报告的全文。该校党委深深怀疑,林希翎很有可能把秘密报告的全文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都和这一秘密报告的披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篇报告虽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作过传达,“美国之音”也作了广播,但在中国一般公众中还不广为人知。现在,当人们对波匈事件记忆犹新的时候,林希翎又要在大学生中把这一报告公布出来,会产生何种后果,是领导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第三,为了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尽管当时苏联共产党没有公开表示出来,但从赫鲁晓夫对待“双百”方针的态度上,我们不难推断出,苏共是不赞成中共的开门整风的。他们怀疑中国是在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他们尤其反

感的是,中共竟然让那些“反苏”言论自由地鸣放出来。原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拉赫马宁所写的《苏中关系 1945—1980》一书也证实了这一点。书中写道:

反苏言论构成了右派进攻的最重要部分,而右派得到了发表反苏言论的广泛可能。例如,中共的一个省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大量引用了一个叫金玉海(译音)的人的言论,此人号召“收复被苏联侵占的土地”,在“复仇的口号下,为反苏流尽最后一滴血”。……在《长江日报》上引了一个右派分子钟玉文(译音)的话,说“海参崴和蒙古是中国的领土”。然而,中共领导继续实行自己的“等待”方针,不去揭露右派的反苏谰言,这决不是偶然的。……

由于中国当局纵容,右派分子就试图从宣传走向直接挑衅。例如,1957年2月在西安,有一百多人手持反苏标语闯进苏联专家居住的旅馆院内。1957年5月,反苏分子打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期间进行挑衅。

……右派言论出了单行本,作为政治学习材料加以推荐。这一切都说明,1957年民族主义分子利用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和反苏言论,在中国人民的广大阶层中散布了反苏谰言。但是,毛泽东集团却竭力用不参与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①

当然,拉赫马宁在书中用的是中苏交恶时的语言,但从中也不难推断出,当时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于中共听任反苏言论鸣放

① (苏)奥·鲍里索夫、鲍·特·科罗斯科夫:《苏中关系 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2~73页。

出来,是存在着很深的猜疑和不满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来华访问的伏罗希洛夫作些解释。所以他在5月25日会见这位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介绍了他所制定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后一条,即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明显是针对那些对苏的不满言论而言的。这样,对于随后到来的大规模反击,从这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说明:如果对于右派言论不实行坚决的反击,那就会加深苏共的猜疑和不满,有损于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团结,而这种团结,在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是极为重要的。后来,毛泽东在1958年3月10日的成都会议上,也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他说: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说要看一看。讲话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并在二十三日作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

有了。^①

从上述的种种因素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作出大规模反击的决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客观依据的,他的许多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却失误了。其一,当时各种言论大多数是善意的,真诚希望共产党把作风整顿好,把新中国建设好。其中偏激不当的言词在所难免,少数人出于不同的立场和动机,发表了一些不适当的言论,但也并非都是与社会主义为敌,主要还是思想斗争,当然其中也包含了某些政治斗争的成分。但是,毛泽东却认为这种思想上的交锋主要是敌对阶级间的政治斗争,这势必会对全国政治状态估量失误。而全局性的不符合实际状况的严重判断,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其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思想教育,这是一项长期任务。但毛泽东却试图通过一二次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迅速地使人们从思想上转过这个弯子。过急地转弯子常常会人为地激化矛盾,造成不良后果。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失误,也就使得大规模的反击必然要走人扩大化的歧途。

由此可见,1957年的大转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决不是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叙述的那样简单。至于说什么政策上的大转变是为了把人们对于经济困难的不满由政府移向知识分子,更纯属无稽之谈了。

第五节 关于“大跃进”的缘起

“大跃进”是5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为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发起的一场具有深刻政治意义的生产运动。对于这场运动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缘起、失败,以及它对于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直是共和国国史和中共党史学者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对这个问题也很关注,并对“大跃进”的缘起作了一些深刻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分析尽管不尽准确,但从中我们仍可以得到一些启迪。当然,也要作一些补充和澄清。

一 “大跃进”决策的初衷:“走自己的路”

虽然“大跃进”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直接后果,但是,它的根本原因和历史渊源却要复杂、久远得多,远不是一场“反右派”运动所能解释得了的。在这个问题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显然更深入了一步。这部著作写道:“许多种力量促成了共同采取名为大跃进的政策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苏联发展策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问题。这是些以经济问题为其核心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问题。”^①紧接着,作者详细分析了中国不同于苏联的社会经济条件。把“大跃进”的决策与仿照苏联模式所产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根本动因,这可以说是这部著作从比较广阔的视角作出的比较深刻的分析。

新中国诞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承担起领导中国各方面建设的历史重任。中国的建设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已得出的结论。而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新中国最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应该承认,苏联的建设模式,对于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走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15页。

上大规模建设的轨道,到最后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是起到了相当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言,中国在两个方面不同于苏联,一是中国农产品的人均产量远远低于苏联,“因此,苏联能够讨论如何保证最适当地支配稳定的农业剩余产品,中国则必须研究一种办法首先生产并增加这种剩余产品,然后做到控制其分配”。二是从执政党的社会成分上看,农民出身的党员在中国党内达到70%,而在苏联则不到30%。这就是说,苏联可以用剥夺农民的办法来优先发展重工业,而同样的办法在中国就要遇到很大的阻力,或者说根本就行不通。对此,毛泽东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后来他曾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①

但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尽快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所必须的条件,对于苏联和中国来说,却是相同的。这些条件主要有两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农业生产,尽快在农村建立起原材料基地、粮食市场和工业消费品市场。苏联的做法,实际上是先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优先实现第一个条件,然后再创造第二个条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则应该努力做到两个条件相辅相成。毛泽东曾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② 如何做到既集中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又能够维护农民的利益,在较少资金投入的条件下促进农业生产?这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就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道难题,也是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所要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

毛泽东为解决这道难题所设计的最初方案就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从劳动形式上看,农业合作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协作”。即使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仅就形式而言,“协作”就能够提供比个体劳动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曾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力量的总和有着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工人的机械力量的总和,与这些单个工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升高重物、转绞车、清除障碍物等)所发挥的机械力量有着本质的差别。在这些场合,共同劳动的结果是个人劳动所不可能达到的,或者只是在很长的时间或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是通过协作创造了一种只是作为集体力执行职能的新生产力。”^①毛泽东显然领会了马克思这段话的意义:在农业机械化还相当遥远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只能用“协作”这种办法来创造“一种只是作为集体力执行职能的新生产力”。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这一主要目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一再予以强调和说明。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也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比互助组更能够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业的劳

① 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6~327页。

动,合理地统一使用劳动力,因而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的效率。”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强调:“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用合作化的办法来弥补机械化方面的弱点,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是毛泽东大力提倡合作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于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愿望与对提高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和程度的要求,都同样那么迫切。联系到当时关于先机械化还是先合作化的争论,显然毛泽东的主张更切合中国的实际。

到“大跃进”决策的前夕,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可以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56年,在遭受严重水灾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仍达到582.9亿元,比1955年增长4.9%。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比5年前增长19%;棉花总产量达到3280万担,比5年前增长26%。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证明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同时,这个结果似乎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显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独辟蹊径,以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提高的办法,避免苏联在这方面所走的弯路,解决发展重工业与发展农业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7年11月13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这篇社论写道: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

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他们不了解所谓“冒进”是没有实际条件,因而是没有成功可能的盲目行动。而我们在1956年的跃进却完全不是这样,是有很多可以实现的条件,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否则,就无法说明,为什么1956年我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粮食产量却超过了大丰收的1955年一百多亿斤。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赏。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重看这篇社论后,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大跃进”这个口号最早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关于农业生产的社论中提出来,并且在农业战线最先实践,绝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大跃进”决策的最深刻的根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把“大跃进”与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与毛泽东关于“走自己的路”的思路联系起来,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二 “大跃进”的渊源:再现“大生产”运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有一个观点:“大跃进”运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年代。这部著作认为:“在最根本的层次上,产生大跃进策略的动力是来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中的非常深远的思潮。从前,革命一旦面临似乎是难以应付的成败关头时,一批创造性的以广泛动员各种力量为核心的军事和政治的政策保住了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年代里非常自然地倾向于把在野的时代理想化,把它看成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党真正贴近群众,

官僚主义和社会等级现象并未玷污革命的理想主义,动机良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克服了似乎不能克服的遭遇而生存下来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由于毛厌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政治结果和对他所渴望的工业迅速发展机会似乎构成威胁的农业基础这一薄弱环节,毛和顶层领导的其他许多人看来要回头注意延安精神(及其方法),把它作为他们的希望的源泉。动员群众、社会平等、抨击官僚主义、藐视物质上的障碍——对中国革命的奠基者来说,这些办法将会再次拯救革命。”^①把“大跃进”的决策与恢复和发扬中国革命的传统联系起来,是这部著作的又一深刻之处。

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与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是毛泽东很长时期以来就潜心思索的一个问题。新中国诞生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 在新中国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泽东又提出:“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③ 1957年3月,在开门整风前夕,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发扬革命传统的问题。他向全党号召:“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④ 可以看到,每当革命和建设到了关键时刻,毛泽东都要强调地提出恢复和发扬革命传统的问题——他把革命传统当作了克服困难、完成新的历史任务、争取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③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8月12日)。

④ 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9日)。

更大胜利的万能法宝。革命的传家宝不能丢，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注意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使传统不断创新，为革命精神找寻适合变化的新形式，那也可能产生负面的效应。现在回头看，这方面当时似乎注意不够。

当“反右派”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可以说是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撰写的题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论，这篇社论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来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加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的建立。”社论认为，这个物质基础的建立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这是右派还敢于进攻和中间派还在动摇的一个客观原因”。所以，加速这个基础的建立又成为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11月6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就在访苏期间，当赫鲁晓夫提出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目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这种强烈愿望。但是，在这里也不能排除毛泽东的另一层用意。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开门整风运动，是一直持

怀疑态度的。毛泽东本人也很清楚,“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①。那么,毛泽东在苏联提出15年赶上英国的行动口号,就有可能包含着这样一层用意:以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来向一切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证明,中共的方针是正确的。因此,在经济上来一场“跃进”的愿望,对于毛泽东来说也就更为强烈而迫切了。

然而,毛泽东十分清楚,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找到实现这个口号或目标的途径或手段。在毛泽东看来,虽然实现这个目标有物质条件方面的限制,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可能成为克服物质方面缺乏的巨大力量。在党的历史上,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发挥群众的创造力来克服困难、度过危机,不乏成功的先例,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当时,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样一种办法。”^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成功的经验,所以毛泽东在宣布“15年赶上英国”时,能够胸有成竹地说:“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把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和经过所谓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焕发出的冲天干劲,看作是实现赶超目标的最可靠的根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

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

来,客观条件方面的限制,可以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突破。由此也就决定了“大跃进”的显著特点:精神力量的绝对化和群众的最广泛的参与。在谈到“大跃进”的策略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大跃进”的第一个策略就是:“靠充分动员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以弥补工业和农业两者资金的缺乏。这个办法在农业地区尤其重要,动员群众在那里将会导致基本上是自筹资金的发展,从而解决成为障碍的农业问题以求得快速全面的发展,为城市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源(尤其是食物)。而这又可使中国得以实现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而第二个策略,就是为中国经济的主导部类制定“宏伟目标”^①。这两个策略,恰恰是“大跃进”的显著特点的表现。这种依靠精神力量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策略,与十多年前的“大生产”运动不无相似之处,只是在涉及的范围和领域都极度地扩大而已。

此后,在发动“大跃进”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都把全民参与作为实现赶超目标的前提条件加以强调,都把“精神”、“气概”等主观的东西当作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因素加以倡导。1958年1月31日,毛泽东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写道:“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②显然,毛泽东所说的“生产高潮”,其基础就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过的题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继续强调群众的这种精神力量。社论写道:“我们民族已经觉醒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起来,正在大大发扬旺盛的革命精神,已经做了并且还要做出更加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情。”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信心十足地说:“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人民群众的蓬勃的革命精神,也感染了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毛泽东一直“不大满意”的张闻天,1958年春到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合作社的情况后,于4月26日写了一份令毛泽东非常满意的报告,谈了他的感觉。他写道:千年的陈规陋习已经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大有希望,前途无量。张闻天的这份报告,很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热火朝天的场面对领导干部的感染。后来,邓小平回顾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①处于这种真实的热火朝天的场合中,也就难免“头脑发热”了。

毛泽东在总结陕甘宁边区斗争的经验时,曾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②历史似乎又在重演。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抓住了整风反右这个“环子”之后,又开始抓住“大跃进”这个“环子”。抓住这两个“环子”,能否再次创造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对此,毛泽东是充满信心的。

这就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企图依靠革命精神和群众热情直接向共产主义冲击的历史教训。对此,列宁曾作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了很深刻的总结,他说:“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可以在工人农民现有觉悟水平上通过激发他们的热情来完成。……但是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也正出在这里。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去完成另一种任务的时候,是不能够向后看,试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① 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不管客观情况已经改变了,仍要强制搬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经验主义吧。

三 需要澄清的一个观点

需要指出的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大跃进”的缘起作了独到、深刻的分析,但是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澄清的观点。例如,这部著作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还有加强自己在整个体制中的作用这一方面的考虑。书中写道:“毛本人在这个制度中的地位可能受到所推行的经济发展的类型的影响。主席个人在政治上的精力是放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大国)、农村政策和有关革命情况变化的论争(主要是根据国家当时的基调和情况规定以多快的速度实行改革)这些领域中。城市经济,特别是财政和计划的专门事项是他了解得很少的课题。因此,在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上,毛非常厉害地抱怨说,财政部几年来送给政治局的表明见解的文件是如此专门和复杂,以至他只好甚至没有阅读就签署。这种状况自然限制了毛在这一制度中的作用,他决定加以改变,强行通过一种发展的策略,将这种作用由他所不擅长的领域转移到他认为更有信心的领域。”^② 这就是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还有一种在知识结构和领导能力上扬长避短的个人动机。这个观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0页。

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我们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这部著作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仅有的依据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财政部的抱怨。但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当时所抱怨(实际上是批评)的并不是因为计划报表的专业和复杂,而是事先不通报情况而只是送报最终成品的工作方法。后来,毛泽东将这一条列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三十三条。毛泽东指出:“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①从这一段话中,我们除了看到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干部的“强迫签字”那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方法以外,很难得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样的结论。

毛泽东曾很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工作方面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那么,这里还需要澄清的是,而对自己知识结构的缺欠,毛泽东采取一种什么态度?究竟是转换领域以扬长避短,还是加强学习、提高自己以适应新的形势?从毛泽东的一贯态度和一贯风格来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论断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党的干部知识结构和领导能力方面的缺欠,毛泽东即有所警觉,他要求全党都要加强学习以适应新的历史任务。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向党的干部提出了成为“内行”的要求,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

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①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特别论述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② 后来,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毛泽东重提他在1949年所讲的关于学习的一段话,指出:“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①以上论述中的“我们”，显然也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由此也就不难看出，毛泽东确实在“扬长”——发扬革命传统正是在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却并没有“避短”：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要领导好，就不能当“外行”，而要努力学习科学、学习技术、学习业务知识，这就是毛泽东的一贯态度。

勇于迎接挑战，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为了弥补自己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缺欠，以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历史重任的要求，毛泽东不仅继续深入研究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还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甚至包括了一些“非常专业化非常复杂”的课题。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在列车上，张治中看到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很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后来，毛泽东曾总结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渐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②在少年时期就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面对复杂、艰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课题，是绝对不会退缩的。那种认为毛泽东为了“扬长避短”而采取“大跃进”策略的观点，是对毛泽东风格的一种扭曲。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35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页。

最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上述观点能否成立,还取决于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究竟如何评价,而不在于他是否抱怨什么复杂、专门的报表。因为,按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观点,毛泽东采取的“扬长避短”的“大跃进”策略,是以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为特征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反右派运动大大损害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声誉,在城市和农村都形成了一种激进的“反知识分子”的气氛。的确,在“大跃进”的狂潮中,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蔑视科学常识和技术规范的荒唐现象比比皆是,这在一个由文化知识贫乏的广大群体组成的社会中常常是难以避免的现象,这也正是导致“大跃进”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当时中国的领导阶层的头脑也发热到了这种程度:以为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知识分子,仅仅依靠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就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恰恰相反,经历了1957年的急风暴雨,毛泽东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更加强调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更强调要有自己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在当时所谓“激进的反知识分子的气氛”中,毛泽东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规划,他指出:“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①(1957年10月9日)“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310页。

(1958年1月)对于一些单位对待知识分子宁“左”勿右的错误做法,毛泽东要求他们“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1958年12月22日)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当外行、没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建成的思想,并没有因为1957年的整风反右事件和“大跃进”的狂热而发生根本变化。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在反右派运动前后,还是有所不同的。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强调的重点不同了。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毛泽东强调的是对于知识分子团结和改造的问题,例如,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①此时,毛泽东关注的是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而在反右派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毛泽东强调的是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关注的已不再是充分发挥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的作用,而是在十年内重新建立属于本阶级的新的知识分子队伍。从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经历了1957年的事件之后的一种矛盾的心态:既对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失去了信心,又清醒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知识分子。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了1957年以后的一种复杂的情况:正确认识和“左”的错误并存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而随着阶级斗争被重新确定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知识分子政策中“左”的错误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大跃进”缘起的分析,既有客观、深刻的一面,也有不尽准确、主观臆断的一面。这部著作不是把“大跃进”作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作为中国革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命和建设的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来研究,这种方法是可取的,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这部著作在分析、论述的过程中,又把主观臆测的历史人物的个人动机作为解释重大历史事件成因的一个要素,因而又使它的某些结论缺乏足够的事实根据,难以令人信服。

第四章

新中国对外关系略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就专辟有:第六章 外交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又有: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第五章 对美开放。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也多联系或涉及外交和国际斗争的因素。应该承认,国际关系方面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许多撰稿者的强项。他们身处信息发达的西方社会,接触和可利用的资料、档案比较广泛,可借鉴的学术成果也较为丰富,又处于旁观者的地位,加上一些学者多年勤奋钻研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为我们中国学者提供颇多可资借鉴的系统分析和有启发性的独到见解,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但是,由于冷战对峙造成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长期隔离,新中国的许多真实情况,并不被西方所了解,特别是某些西方媒体的有偏见的甚至是恶意的宣传报道,造成了事实的歪曲,甚至是黑白颠倒。而且由此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固定见解,也往往成为了解事实真相的巨大障碍。在这里,旁观者并不具有亲历者的优势。正如隔岸观火,可能看得见大的轮

廓,看见人影晃动和奔忙,却难以知道人们为什么而奔忙,更难以了解救火者的心态和激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那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又是本国历史的研究者,感到有责任,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讲清我们的了解和认识,提供我们掌握的历史真实情况,以利于通过学术探讨来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因为不是写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我们不准备多考虑所谓全面性和系统性,而只是就我们感到需要表述自己意见的大事,分列为如下各节。

第一节 新中国为什么“一边倒”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非常注重研究中苏关系,辟有《中苏分裂》、《中苏对抗》两章和《一边倒:毛泽东与斯大林》、《中苏分裂的前因后果》两节,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中苏结盟、分裂、对抗的历史过程。在这两章和两节中,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也有某些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和我们不敢苟同的观点。

本节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新中国“一边倒”的原因,根据确凿的史料和我国史学界比较公认的观点,力图实事求是地、客观地予以评析。

一 毛泽东为巩固“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而倒向苏联纯属主观臆测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由东京大学教授中岛岭雄执笔撰写的关于新中国对外关系一章中提出,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原因,除了在经济方面需要苏联援助这一“总体考虑”外,还有若干特殊因素。其中一个特殊因素就是“毛泽东很可能认为采取亲苏政策

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可取的”^①。在我们中国学者看来,这种肯定性推论的说法是缺乏历史根据,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之后,毛泽东就一直在党中央发挥着主要领导作用,而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则最终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这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规定了“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个规定虽然为若干年后中共党内迅速膨胀起来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埋下了消极因素,但足以说明早在1943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就是稳固的,为党的高级干部所公认的。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及其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成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而且他的领导地位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载入党章。这样,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全党最高法规的公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名字还被载入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由全党的领袖变成全国的领袖,得到全国人民的公认。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和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权威地位的确立和不断强化,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决定的,特别是与他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的独创性发展和在实践上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密不可分。长期以来,毛泽东率领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色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与此同时,他还科学地总结了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79页。

中国革命的实践,提出了完整的系统的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确理论。一句话,毛泽东以其别人难以比拟的巨大历史功绩赢得了全党全国的衷心拥戴,成为全党全国公认的领袖。这种权威地位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特别是在1949年中国革命在全国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本人的威望也达到巅峰状态,他在党内如日中天,没有遭到任何挑战的时候,作出“采取亲苏政策”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那样的断语,更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历史事实表明,早在“一边倒”政策正式出台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就是稳固的、不可动摇的。他与王明等人不可同日而语,根本不需要依靠外部力量来扶持、强化及巩固。对于这一点,《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其他章节的作者也不否认。悉尼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在其执笔撰写的章节中就曾正确指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卓越地位就已经不容置疑;在1949年—1957年期间,毛泽东更是中共不容挑战的领袖^①。由此可见,只要从中国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不会轻易提出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而采取亲苏政策这种没有历史根据的主观推论。况且,东京大学教授中岛岭雄先生在该书中根本没有拿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只能据实指出他的说法纯属一种根据西方某些政治斗争逻辑推演的主观臆断。

二 高岗问题没有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的决定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特殊因素,是他“对斯大林和高岗之间日益增长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60页。

的亲密关系感到不安”，并为此提出了毛泽东对高岗不信任的论据，即1949年7月斯大林“不同北京领导层商量，就径邀东北共产党政府主席高岗到莫斯科，并同他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①。这种说法在中国学者看来同样缺乏历史根据，因为其论据是不确切的。

首先，高岗赴苏是中共中央的决定，不是斯大林瞒着中共中央对高岗的个人邀请。中共元老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及这一背景，他说：中共中央首脑机关1949年3月25日进驻北平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刘少奇率领由政治局委员高岗和中央委员王稼祥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访苏。6月26日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②。以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而编写的《刘少奇年谱》，也证实了这一点^③。因此，根本不存在斯大林绕过中共中央径直邀请高岗访问莫斯科这回事。

其次，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与苏方签订协议的是刘少奇而不是高岗。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一共进行了5次会谈。其中1949年7月11日应邀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④。同日，高岗提前回国。这就是所谓高岗与苏方签订协定的真实情况。在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之间保持着密电联系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得到授权，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高岗根本不可能与苏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79页。

②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③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④ 同上书，第219～220页。

联私下签定任何协定。这也是凭一般常识就能作出正确判断的简单问题。另外,就是高岗提前回国,也是他自己提出,并在他出国前即已决定了的。

再次,1949年前后毛泽东对高岗是高度信任的。中国东北与苏联接壤,赖有这样的便利,东北的解放、建设事业较内地更多地得到了苏联的援助。而自1949年起,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高岗,与苏联方面的接触更多,所受影响必然更大,也在情理之中。但直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所谓高岗“里通外国”的确凿证据。正因为东北地区解放较早,有一定工业基础,又背靠苏联,使得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经济恢复和工业建设较全国其他地区都开始得早,并取得较好的成绩。所以,1949年前后毛泽东主席数次表扬高岗,高岗也不断得到升迁。1949年9月30日,高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初,当高岗、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和习仲勋分别从东北局、西南局、华东局、中南局和西北局负责人的位置陆续调到中央工作时,高岗被安排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当时的国家计委,与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平行,直属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均在其他几位中央局书记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①。如果毛泽东在1949年7月份就已经不信任高岗,对他怀有戒心,就根本不可能让高岗一再升任要职。

能干、狭隘、跋扈的高岗后来的确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但时间是在1953年以后。按照毛泽东的话,对于高岗、饶漱石,我们“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对于高岗的阴谋,“我们是到1953年秋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冬才发现的”。1953年秋冬大大晚于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正式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而且高岗问题只是中共党内的矛盾与斗争,并不涉及对苏关系问题。

退一万步来讲,即使高岗在1949年7月访苏期间言行严重失当,引起毛泽东的不安,也不会成为促使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特殊因素。因为一项重大政策的制订,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酝酿、考虑和提出。其实,至少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决定“一边倒”。这年3月13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时郑重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路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上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①可见当时只是没有公开对外宣布而已。何况,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订“一边倒”政策时,高岗还没有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也没有成为“问题”,并没有什么越轨行为使毛泽东感到不安。所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高岗问题是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定的一个特殊重要因素的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三 “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既然为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倒向苏联纯属主观臆测,所谓高岗问题也没有影响毛泽东作出“一边倒”的决定,那么,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订“一边倒”政策的真正原因或理由是什么?中国学者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一边倒”是新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

第一,是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我们知道,国家利益是现代民族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其中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其他的国家利益才可能得以实现。1949年春夏,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既定的国际环境中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选择最有利的政策。

当时国际环境最基本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严峻对立。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下,两个阵营的盟主美国与苏联对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中國革命持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长期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发动图谋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以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被认定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组成部分”^①。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美国仍在支持毛泽东所说的“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②。不仅如此,自1948年10月起,美国开始扶植日本、武装日本,把日本纳入“孤立”、“遏制”中国与苏联的战略轨道。日本是威胁近代中国生存的最危险的敌人,单在1937至1945年间,就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消逝,中日两国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美国就和曾经杀害过无数中国人的夙仇站在一起,不能不引起以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关切和警觉。当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确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如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也的确“担心他所领导的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③。不过这种威胁不是来自《剑桥中华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② 同上书,第1473页。

③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79页。

共和国史》所说的苏联,而是来自美国。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完全统一,台湾仍然是一个“分离的省份”,这与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略与干涉不无紧密联系。

苏联与美国的態度相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长期给予同情和支持。尽管其间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曾经使中国革命蒙受过重大损失,但它毕竟是在精神和物质上对新中国民主革命予以实际支持的唯一国家。何况,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开始认真看待中国共产党,并明确表示愿意在各个方面帮助新中国。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武装干涉,因此,建国前夕,中共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当时世界上有力量同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抗衡的、并且愿意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保障的只有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敌视和站在敌对面竭力离间中苏关系的美国,将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势必要对大政方针作出战略抉择。于是,为明确昭示中共在国际斗争中的政治立场,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正式出台“一边倒”的政策,明确宣布新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势之必然。

第二,是新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

上文已经指出,新中国建立前后,所处国际环境远比今天恶劣。在当时的国际交往中,人们首先并主要着眼于国家安全利益,是必然的,是势之所需,这与今天侧重于考虑国家经济利益大不相同。所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毛泽东提出“一边倒”政策主要出于在经济方面需要苏联援助这一“总体考虑”的说法,是不准确的。经济因素不是“一边倒”的根本原因,但不等于经济因素在其中不占重要位置。经济利益是最经常性的国家利益,当国家生

存有了一定的保障时,经济利益就成了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最主要利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贵之处在于看到了经济因素的作用,不足之处是估价过高,没有恰如其分。

旧中国经济极为落后,以至在即将执政的中共领导人脑海里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符合实际且通俗易懂理解、直到今天还为人们经常引用的估计:旧中国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只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它们是落后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①。这种落后的状况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直到50年代中期,中国还是只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要想在如此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追赶世界潮流,单单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到别国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当时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中国的只有苏联。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威胁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而且在经济上封锁中国,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所以,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与苏结盟,是新中国为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紧迫需要。其实,早在1949年6月宣布“一边倒”之前,中共领导人就把从苏联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作为与苏打交道的目标之一。

例如,毛泽东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说过:“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①表明苏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承诺过要在经济上援助中国。1949年2月5日,奉斯大林之命秘密来华了解中国革命情况的米高扬,表示可给贷款3亿美元,并同意派专家来华帮助新中国搞建设。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动身秘密访问苏联,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

有了苏联的初步承诺,一向藐视困难的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满怀信心地宣布: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是很快的。他说:“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②中苏结盟之后,中国的确从苏联引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和大量技术、人才,苏联帮助中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当然,与国家安全利益相比,经济利益在当时只能退居第二位。假如国家生存和国家安全都无法保障,正常的经济建设就难以进行。即使建设了,也难以正常运行。所以,忽视甚至有意贬低经济因素的作用固然不对,但把经济利益视为毛泽东提出“一边倒”政策的第一位根本原因也是不恰当的。

第三,是意识形态的吸引。

意识形态在中共和毛泽东制订“一边倒”政策中也起了重大作用。现在不少人对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法,他们被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交往中越来越多的超越意

①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识形态的现象所迷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 50 年代那段时间内存在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亲疏的历史事实,不是疏忽就是回避。对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倒是比较客观的,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也许在作者看来这个问题没有疑义,所以只提出了论点,没有拿出证据。

中苏两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中苏两党关系在历史上就很密切,尽管也有矛盾,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党之间的向心力远远大于离心力。人所共知的史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并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而建立起来的”^①。共产国际解散前,苏共与中共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是密不可分的。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仍然继续着。据在 1940 年到 1957 年期间翻译了大量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来往文件、函电的师哲的回忆,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同斯大林的联系仍然继续着,苏方驻延安的机构和人员也没有因此有所变动”^②,中共照旧向“远方”通报情况。按照中共元老薄一波的话来说,“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③。

这种“通报”和“商量”包含着请教之意。1949 年刘少奇秘密访苏时,在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后,于 7 月 4 日用书面报告形式向斯大林通报中国革命情况,全文万余字,“指示”一词在报告中出现了

① 《刘少奇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52 年 10 月 11 日《人民日报》。

② 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6 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 页。

11次之多。其中3个“指示”是指苏方已经提出过的建议,4个“指示”是请求苏方对中国在报告中提出的各项问题发表看法。另外,报告中还有三处在提出问题后,分别用了“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应当如何进行”、“应当如何办理”这样请示性的句子作为段落的结尾,请求斯大林发表意见^①。1949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把王稼祥作为中国驻苏大使和中共中央代表介绍给斯大林的信中,要求斯大林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②。

不能说上述“指示”、“指导”都是“客套话”。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真诚地对待和尊重对中国革命有过极大帮助的苏联、苏共及苏共领导人。所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在正式宣布“一边倒”和中苏结盟前后,毛泽东没有摆脱传统观念,仍然认为“苏联及其共产党代表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和领导力量”的说法^③,还是有历史根据的。

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一边倒”中起到巨大作用,与当时中共的国外朋友很少、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很不够也有极大关联。建国前,中共除了与苏联和苏共有较多的来往外,与其他国家和政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而在与苏联和苏共的联系中,也多半是围绕着中国应当怎样进行革命这个总命题交换信息。新中国应当如何进行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独立自主、灵活地选择运用斯大林的建议,择善而行,因为中共比外国人更熟悉、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在涉及中国革命以外的问题,这种选择

① 沈志华、丁明译:《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98~108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③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79页。

的自由度就要大打折扣。正如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就迫切需要苏共和斯大林给予“指示和帮助”^①。客观、冷静地观察历史,就不难发现:苏联、苏共是当时中共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条主渠道。在信息来源单一化的客观条件下,苏联、苏共及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当时美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为了“分化中苏”,为了“使中国领导人多了解外界情况,以免只听苏联一面之词”^②,美国打算在不承认新中国的前提下,保持其在华宣传机构美国新闻处,以便进行宣传。由于美国对华采取敌视政策,这种打算自然要落空。但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了意识形态及其舆论宣传的极端重要性。

四 中苏蜜月期间的几件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缔结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迅速进入黄金时代,也就是西方通常所说的蜜月阶段。这个时期中苏亲密友好,不仅给当时的两国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也在中苏关系发展史上写下了保留良好记忆的一章。对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不否认。当然蜜月时期也并非没有任何矛盾,可惜,剑桥史的撰稿者提出的几件事,均难以成立。

① 沈志华、丁明译:《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08页。

②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

(一) 苏联支持而不是反对中国争取恢复 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50年1月,为“要求联合国驱逐国民党的中国代表团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苏联确实做出过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举动。这一没有奏效但却坚决表明其立场的重大外交行动,却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借用当时某些观察家的话,加以另外的解释,怀疑苏联这样做的真实目的“实际上是想继续把北京拒之联合国门外”^①。我们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苏联想把新中国拒之联合国门外的说法,是没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判断,难以令人信服。事情的真实情况是: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中国是联合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根据公认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有权派出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参与它的工作。但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却长期为已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并失去实际统治权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所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谋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苏联政府自新中国成立起,就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正义斗争。苏联与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合作正是首先从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天,即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否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资格。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95页。

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①。11月23日,苏联出席联大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联大全体会议上发言,支持周恩来外长的这一声明,坚决否认“国民党代表团是中国的代表”^②。

不仅如此,1950年1月7日,从联大回国后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还主动向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建议,由中国外交部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表这个声明,苏联将采取行动予以配合,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③。毛泽东当即同意苏方的建议。1月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当将其从安理会开除出去^④。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马立克提出一项支持周恩来1月8日声明的提案,并发表特别声明:“在国民党代表退出安理会之前,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⑤1月12日,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被迫退出安理会轮值主席地位,但仍赖在安理会不走。1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否决了苏联的提案。为了表示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抗议美国强使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赖在联合国的行径,苏联代表暂时退

① 《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的电文》(1949年11月15日),1949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② 《苏联支持周恩来外长声明》,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

③ 毛泽东:《关于就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发表外交部声明的电报》(1950年1月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④ 《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1950年1月8日),1950年1月9日《人民日报》。

⑤ 《苏联代表支持周外长声明》,195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出安理会。

也就在1月13日,维辛斯基外长再次主动向还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建议,中国要向联合国去电,提出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的代表^①。因为就国民党代表资格问题安理会斗争激烈,苏联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所以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毛泽东再次同意维辛斯基外长的建议,并用电话和电报同周恩来、刘少奇磋商了首席代表人选。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通知联合国,中国政府已经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安理会首席代表,要求第四届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回答何时开除国民党非法代表和新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参加工作这两个问题^②。由于美国等国的阻挠,国民党政府代表未能被开除,张闻天首席代表也一直未能赴任。

读了上述这些材料,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不难发现,苏联1950年1月提出的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建议和举措,是中苏两国在正式结盟之后采取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联合行动,只是因为遭到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无理反对,这一联合行动的目标才未能实现。由此可见,要把“北京拒之联合国门外”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后来的历史事实则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每年都要在联合国带头提出提案,要求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其他机构的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非法代表。1961年以后,苏联政府继续要求立即恢复中

① 毛泽东:《关于向联合国派出我国代表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年1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② 《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和秘书长赖伊的照会》(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1950年1月20日。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每年都对恢复新中国席位的提案投赞成票^①,直到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领衔提出的18国议案,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决议为止。尽管这期间中苏关系已经逆转,发生了从结盟到对抗、从盟友到敌人的巨大变化,但苏联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与此相反,美国则一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投反对票,直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二)1952年中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没有分歧

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注意到,“在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谈判者们的种种讲话和访问结束时发表的中苏公报,都异乎寻常地对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只字不提”,联系到当时朝鲜战场上正在举行的停战谈判,该书推测这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对朝鲜停战问题意见相左”^②。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中苏两国不仅在朝鲜停战问题上没有矛盾,就是在整个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也是密切合作,基本意见一致。所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1952年中苏对朝鲜停战问题意见相左,是又一个违背客观事实的主观猜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实际上把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变成了两个阵营在朝鲜进行较量的局部战争。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因此,中苏两国都坚决站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边。当美国军队1950

① [俄]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0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96页。

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陆,10月4日大举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之际,中国被迫直接动用武装力量援助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部队进入朝鲜,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11月1日,苏联战机从中国沈阳和鞍山机场起飞,投入到中国安东——朝鲜新义州地区和安州地区的空战,打响了苏联空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入朝后,接连发动三次战役,把美国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过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朝鲜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在双方力量对比趋于均势的形势下,中苏不仅在军事上密切合作,还再度展开外交斗争,在国际舞台上密切配合,用一个声音说话。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行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提出解决朝鲜武装冲突的建议:“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①这一建议立刻得到中国和朝鲜的响应。美国因在战争中损失惨重,这时也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随后谈判在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问题出在双方控制的战俘数目悬殊太大。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鲜籍战俘112000人,俘虏中国籍战俘20800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4417人,南朝鲜籍战俘7142人。双方俘虏人数之比为11.5:1。为强行扣留朝中被俘人员,1952年2月7日,美方竟然违背国际法关于遣返全部战俘的规定,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中苏两国坚决反对美国的这一主张。

^①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6月23日的广播演说》,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仔细阅读俄罗斯公布的 1951 年 6 月以后毛泽东、斯大林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几百份往来电报,不难发现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中苏是观点一致的,没有意见分歧。倒是当美国在 1952 年 7 月 13 日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 70000 人增加到 83000 人之后,中国与朝鲜对美国的提议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周恩来 1952 年 8 月 20 日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介绍了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他解释说,问题在于中国反对而朝鲜准备接受美国关于同意遣返 83000 名战俘的建议。朝鲜方面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耍花招,因为在 83000 人中只有 6400 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 13600 名中国志愿军战俘。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还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就中朝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意见相左,斯大林坚决支持毛泽东。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①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9 月 19 日,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第三次会谈中,再次支持中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重申苏联与中国同样主张“遣返全部战俘”^②。在斯大林的参与下,朝鲜方面随即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与中

①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8 月 20 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 1996 年 10 月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285、286 页。

②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9 月 19 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 1996 年 10 月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294 页。

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一致。由于美方和朝中方面都不让步,关于遣返战俘问题在 1952 年 10 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朝鲜停战谈判长期休会。这种情况直到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的突然逝世才得以改变。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为稳住失去领袖后的政局,于 3 月 19 日在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正式提出:不能“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要从苏联、中国和朝鲜三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在朝鲜停战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①。朝中方面经过考虑,同意了苏方的建议,有条件地接受了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从而导致战俘问题的解决,为 1953 年 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朝鲜战争的结束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谓 1952 年 8 月、9 月周恩来访苏期间,中苏领导人“都异乎寻常地对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只字不提”,是不准确的。可能是作者只根据双方公开发表的会议公报,而没有看到有关的会议资料。因而,据此推论出中苏就朝鲜停战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更是不可靠的。比较正确地说法应该是:关于朝鲜战争和朝鲜停战谈判问题是周恩来这次访苏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上苏联与中国不仅没有意见相左,还协调解决了中朝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关于遣返战俘问题上出现的分歧。

五 中国对斯大林的逝世并不感到“庆幸”

中国对斯大林的逝世“感到庆幸”,这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战俘遣返问题提案的决定》(1953 年 3 月 19 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 1996 年 10 月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311 页。

史》这部有份量、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提出的一个最令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严重违背事实的主观推测。该书说：“1953年3月5日斯大林之死肯定会开始中苏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北京官方不得不表示吊唁，但它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而对此事件感到庆幸。”^①事实远不是该书作者想象的那样。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 1953 年 3 月 5 日的逝世，属于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同苏共中央一样，事前没有多少思想准备。3 月 4 日，毛泽东、中共中央闻讯斯大林生病，立即分别致电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问候病情^②。毛泽东还和朱德、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斯大林病重表示关怀和慰问。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原定 3 月份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延期举行^③。

3 月 6 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一、自 1953 年 3 月 7 日起至 3 月 9 日止全国下半旗志哀；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同一天，毛泽东在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的唁电中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297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6 页。

③ 同上书，第 88 页。

估量的损失。”^① 3月9日,毛泽东发表署名文章《最伟大的友谊》,赞扬斯大林发展了马列主义,是列宁之后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②。

为了与莫斯科3月9日中午12时的斯大林葬礼同时举行,中国特意把斯大林追悼大会安排在北京时间下午5时召开^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所有在京的中国领导人和60万首都群众出席和参加了这次大会。全国其他12个大城市和2000多个中小城镇亿万人民在同一时间举行了追悼会^④。为一位外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逝世举行如此规模的悼念活动,这是迄今为止的唯一的一次。“专程吊唁,表达中国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深切悲痛”的中国代表团^⑤,由周恩来率领,在莫斯科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采取了极不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105页。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如何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说,这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不过为了需要而歌功颂德同“感到庆幸”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吴冷西的回忆,见《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172页。

③ 《悼念伟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首都各界举行追悼大会》,1953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④ 《全国广大城市和乡镇亿万人民追悼斯大林同志》,1953年3月11日《人民日报》。

⑤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寻常的举动。从3月7日到10日,一连4天的所有版面全部刊登有关悼念斯大林的消息、文章、函电及图片,其他与此无关的消息一律不登。3月10日以后的好多天,仍然发表大量的文字和图片,悼念和怀念斯大林。

上述中国政府悼念斯大林的规格是空前的和最高的。在中国只有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时才出现了可以与之相比拟的规格与场面。所以,中国对斯大林的悼念,决不仅仅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说的出于外交礼仪没有真挚情感的“不得不表示的”“官方吊唁”^①。

我们并不否认在1956年苏共20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一度经常批评或抱怨斯大林。但决不能把1956年以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一些话,同1953年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对斯大林逝世的态度简单地联系起来、等同起来,甚至对立起来,以为当时中国政府表面上在做悼念斯大林的官样文章,实际上对他的逝世感到高兴。因为即使是在1956年以后毛泽东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时候,总的说来,他对斯大林仍然是肯定和赞赏的。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毕竟是位杰出人物,毕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多次同斯大林打过交道的周恩来在1960年研究与总结中苏关系时,是这样评价斯大林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② 1956年毛泽东也说过,从抗美援朝起,斯大林打消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97页。

②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了对他的怀疑,相信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他“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①。正因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功大于过,在中苏正式结盟之后对新中国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所以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始终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情结。1953年3月4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传到中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当天晚上彻夜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②。仅此一桩史实,就足以说明斯大林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力量。

中国文化是情理性文化,受此文化熏陶的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在一个曾经给予中国革命以巨大帮助、对新中国怀有友好感情并给予巨大援助的人尸骨未寒之时,就对他的去世产生“庆幸”之感。如果抓住1956年赫鲁晓夫揭开斯大林盖子之后毛泽东批评斯大林的某几句话不放,来推测中共领导人在1953年就对斯大林的逝世“感到庆幸”,不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参加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爆发并延续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确实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所说是“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③。它不仅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严重影响,而且对战后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是值得很好研究的重大事件。

对于中国为什么参加朝鲜战争,作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承

①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② 《我国人民深切关怀斯大林》,1953年3月6日《人民日报》。

③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86页。

认“毛泽东不可能有意让他的国家卷入战争；‘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中国煽动起来的’；另外，也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参加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①。但是，作者对朝鲜战争过程的描述却片面地引用西方评论家的话，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到第五次战役末期，已经“精疲力尽”、“有时溃不成军”，“成排、成连，甚至成营”地放下武器投降^②，这很显然不符合实际。如果是这样不堪一击的对手，美国为什么要坐下来谈判呢？特别是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作者认为，它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这种实惠”（指抗美援朝激发的爱国主义热潮）^③。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为此，我们感到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根据准确的史料比较详细地阐明我们的观点。

一 从准备解放台湾到巩固东北边防

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为巩固国家安全，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的重大斗争。但这场战争并非中国愿意看到的，更不是有预谋的，而是被强加的。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所承认的，就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中国“对台湾的关心大于对朝鲜的关心”^④。

确实，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新中国的军事战略重心放在东南方向。这是解放战争一个一以贯之的完整过程。进军东南沿海并解放台湾，是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战局的发展而逐步提出和确定的。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就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宣布：“绝不容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7月1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信中指出：“我们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87～288页。

② ③ 同上书，第292页。

④ 同上书，第288页。

必须准备攻台湾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中共中央准备从苏联购买飞机,并请苏联代培飞行员,在一年之内组成攻击力量。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同斯大林就此事进行了商议,8月18日草签了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底,解放大西南战役结束,全国大陆除西藏和少数地区外基本获得解放。国民党军正规军大部被歼灭,仅剩50余万部队逃到台湾及东南一带的海岛上。

解放台湾,需要有一定的海、空军力量。当时,人民解放军虽有强大的陆军,但尚无可供使用的海军和空军。国民党虽是溃败之军,而海空军还基本完整,拥有90余艘舰艇和近300架作战飞机。

对于解放台湾,中共中央的设想是分为三步:第一,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制空权;第二,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第三,大致在1950至1951年,发起解放台湾的渡海登岛作战。

上述计划一步步得到实施。

海军建设方面: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誕生日。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海军正式成为解放军的一个新军种。新成立的人民解放军海军建成了拥有一百余艘舰艇的舰队,全力投入了攻台准备。中国政府准备将苏联对华的3亿美元贷款中的一半用于购置海军装备。

空军建设方面: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成立日。中国一面从苏联购进作战飞机,一面在苏联帮助下突击培训飞行员。半年中,训练出两个歼击机团和一个轰炸机团的全部空、地勤人员。1950

年5月,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第四混成旅成立。

1950年4到6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解放了海南岛、万山群岛,驻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望风而逃。

这时,中央军委确定,解放台湾的时间,初步定为1951年春夏之交或夏季。1950年5月,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个意见》,决定以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华东军区拟定了渡海作战的训练方案,计划到1951年4至5月间举行三军两栖作战联合演习。

6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彻底解放台湾和西藏等所有国土,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会后,粟裕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台湾战役的各项准备情况,要求从其他野战军再抽调4个军配属第三野战军解放台湾。并提出,由于台湾战役将对整个太平洋及东南亚局势起极大影响,建议中央派刘伯承主持台湾战役。总之,1950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重心放在东南方向,攻台作战已如箭在弦上。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整个形势为之一变。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公然干涉朝鲜内政;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宣称要“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7月31日,所谓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抵台,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达成《共同防卫协定》。9月,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福摩萨问题”案,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由于美国的介入,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成为一个带有国际性的内政问题。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军侵入台湾海峡,使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难以实现。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在一份指示中说,“形势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新的麻烦,因为有美国挡着”。所以中央决定“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7月,中央军委决定,抽调人民解放军

第 13 兵团等部组成东北边防军,保卫东北边防,任命原攻台作战的前线指挥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8 月,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第 9、第 19 兵团分别置于津浦和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位置,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而第 9 兵团即原确定的攻台的主力部队。

这时,中共军事斗争的战略重心逐步从东南转向东北。9 月 15 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仁川登陆,随即跨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推进。中央军委正式下令:推迟进攻金门、台湾。这样,中国军事斗争的主要任务就从“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转变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推迟并进而中止实行台湾战役的作战计划,这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美军的侵入台湾,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构成巨大障碍;而美国向中朝边境推进,又使中国特别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东北面临着直接的现实威胁。当时,中国不可能在陆地和海上同时与美军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二 抗美援朝决策的作出

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织“联合国军”非法侵朝的决议。1950 年 9 月,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迅速向朝中边境推进,使朝鲜局势严重恶化。这时朝鲜党和政府向中国提出了出兵援助的请求。经与订有同盟条约的苏联的数度磋商,中共中央经过多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最后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当北朝鲜对闪电式胜利的希望破灭而局势开始转向有利于联合国和南朝鲜部队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似乎缓

慢地,也很勉强地与金日成政权共命运了。”^① 这种概括有几分相似之处,但又不够确切。

中国出兵援朝,确实是一项不仅关系到新中国内政和外交的战略全局,而且极大影响全球局势的大事。朝鲜战争事实上演变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就国际而言,这一战争成为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焦点,并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就中国国内而言,举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决策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方面探讨,提出许多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就参与了战争策划和准备,中国出兵朝鲜是事先与斯大林、金日成密谋好的;还有人认为,中国决策出兵援朝是迫于苏联压力的结果,本质是为苏联战略服务的。近些年来,俄罗斯公布了关于朝鲜战争的部分国家档案,上述两种不同观点似乎都可以在这些档案中找到印证。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俄罗斯公布的这些解密档案远非全部档案,仅依据这些档案中的某一部分就下结论,显然不能得出准确客观的判断。分析这一问题,一方而要参照各有关国家的全部档案资料,同时也要结合客观的历史实践进行分析。

我们认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朝鲜,并不是事先与苏联、朝鲜早有预谋,中国出兵实属迫不得已;同时,中国出兵朝鲜也不能归之于苏联的压力,出兵朝鲜与意识形态,与处理同苏联、朝鲜的关系相连,然而最根本的,还是出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遭受长期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需要恢复,新区土改亟待进行,新生的政权需要巩固,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88页。

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需要建立和维护,剿匪、解放边远一些地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局势,以保证国内建设的顺利进行。曾饱受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宝贵,最积极地拥护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没有再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的丝毫需要,更不可能主动地在国家周边地区挑起事端和冲突。当时中国无暇顾及朝鲜半岛的事务,也无意去干涉朝鲜的内部事务。

这一点,从已公布的各类档案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同斯大林数次谈话,其内容主要是国内局势稳定、解放台湾及经济建设等问题,以及国际范围内的和平问题。一些说法称,当时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在探讨世界范围内兴盛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然而,并无可靠的档案根据。对朝鲜半岛问题,新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态度相当谨慎。毛泽东虽然赞同朝鲜实现民族统一,但并不赞成用军事方式立刻解决这一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前,毛泽东不但没有同斯大林、金日成一起共同策划统一朝鲜问题,而且在金日成1950年5月中旬秘密来华通告统一朝鲜的计划时,毛泽东也没有作出支持的承诺和保证。一些著作中提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在中国的一部分朝鲜籍士兵被送回朝鲜,由此说明中国参与或至少是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当然,这批朝鲜籍战士回国,客观上对朝鲜人民军的实力有所增强。但是,至今没有材料证明此事是毛泽东的有意安排。档案表明,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并未赞同通过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

那么,在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局势逐步恶化后,中国又是如何作出出兵援朝决策的呢?

应该说,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做出的最困难的决策之一。据所掌握的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曾先后三次作出决断,又因故作了延缓,到第四次,才正式作出出兵决策,其艰难审慎程

度可见一斑。

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行将相遇的对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军事、经济强国。新中国成立不久,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军事实力处于劣势。从经济上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848亿美元(另一说为1507亿美元),钢产量为8772万吨。而中国,同期的工农业的总产值为574亿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2:1的比值计算,相当于28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0%,钢产量为60.6万吨,相当于美国的1/144^①。从军事上看,美国有着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不仅有强大的陆军,而且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中国军队则基本上是单一的陆军,武器装备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兵朝鲜,势必承担极大的风险,付出重大的牺牲。

正因为这样,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时,中国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中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林彪是反对出兵的。他说,为了拯救一个朝鲜,而打烂了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原子弹,还有很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也够我们受的。林彪还表示不愿出任志愿军的统帅^②。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终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策。毛泽东下决心出兵的依据,首先出自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同时,也考虑到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①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二版,第3页;《各国概况》,人民出版社1972年3月版,第870页。

② 雷英夫:《抗美援朝几个重大决策问题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第一,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美国侵略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朝鲜,更主要的是要侵略中国。周恩来说:美军侵略朝鲜,是要“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①。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个指示中说:“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②

第二,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不仅对中国构成潜在的威胁,而且已经对中国东北构成现实的军事威胁。1950年8月27日,美国空军作战飞机5批共13架次对中国东北地区侦察扫射,打死打伤居民数十人。以后,又有更多美机接连不断地侵入中国东北地区。毛泽东说:“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面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③当时,中国的重工业企业绝大部分在东北地区。如果敌方控制了南满电力的重要来源——鸭绿江上的水丰电站,东北一批工厂就要停产。

第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派兵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这表明,中美交战不可避免。朝鲜、台湾是两个互相连接的战略整体。在朝鲜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界之际,解放台湾不仅不能实现,中国大陆还有南北两面受敌打击的危险。彭德怀说:“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④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950年10月。

③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3日。

④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258页。

第四,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面对美国的进攻,也必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在中共中央讨论出兵问题的会议上,面对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说:“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①

第五,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既然中美较量不可避免,就有一个作战方向和战场选择问题。出兵朝鲜,在朝鲜与美军较量,比较而言,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更为有利。当时,中国面临美国军事威胁的战略方向主要有三个,其一,朝鲜;其二,台湾;其三,印度支那。三个方面比较,朝鲜方向对中国的威胁最直接。朝鲜紧邻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与中国仅隔一条江。而台湾与中国大陆毕竟隔着一道宽一百多海里的海峡。至于印支方向,当时主要在进行抗法斗争,虽然法军也得到美国的支持,但第一位是法国,与美国的对抗是间接的。同时,朝鲜方向也是与美军较量最为有利的战场。后来,周恩来分析说:“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看是选择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是决定于帝国主义,但同时也决定于我们。帝国主义决定在朝鲜战场,这个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也决定来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想一想三个战场,大家会懂,不论从哪条来说,如果在越南作战,更不要说是在沿海岛屿作战了,那就比这里困难得多了。所以比较起来,最有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质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还有最便利于我们取得苏联的间接的帮助,这不论从哪个条件看,这三个战场来比,我看你们大家今天会同意最好的战场还是在这儿。”

第六,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就作战时机而言,既不能

^①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1950年10月2日。

过早也不能过迟。过早,美军没有越过三八线,我国出兵的条件就不成熟;过迟,美军占领了全朝鲜,战火就有可能烧进中国东北。毛泽东历来主张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既然中美对抗不可避免,与其坐等美国进逼东北,并在东南放蒋出笼,我四面受困,不如主动迎敌,御敌于国门之外;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安心搞建设;与其将来在中国国土上打,不如在国门之外打;与其示之以弱,不如示之以强。

这里,还有一层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重大问题可供思考。中苏之间订有军事盟约,战端一旦扩大到中国东北境内,东北地区又可能成为苏美交战的战场,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民遭受战火荼毒的惨状。那时即便战争不再继续扩大下去,而被局限在中国东北地区,但战争的结果,将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进而又迫使蒋介石订立城下之盟占有中国主权的历史。总之,出兵朝鲜,将战争制止在中国境外,在当时这是最佳选择。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不仅分析了中国出兵援朝的必要性,而且分析了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中国参战虽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但也具有许多有利因素。中国师出有名,士气高涨,“铁少气多”;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战线短,兵员足,后勤保障充分;中国人朝预先有所准备,有可能争取到苏联援助;中国军队具有以弱胜强的作战经验,战略战术灵活,敢打硬仗。美国虽然拥有较强的军事、经济实力,但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铁多气少”,失道寡助,且远离本土作战,难以持久。总之,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①。

以上可见,从中国当时的情况和利益来说,新中国的领导人本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0月13日。

无意与美国兵戎相见。美国的步步进逼,使中国除了应战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毛泽东说:“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①“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②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这种被动性,一些比较客观的西方学者也是承认的。英国政治学家吉廷斯写道,这个决策不是中国自己作出的,而是逼到中国头上来的,是因为中国所有其他的努力都已失败^③。1989年5月5日,美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到中国军事科学院进行学术交流,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的。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五分钟内就会决定派军队去的。”我们认为,这是客观的评论。

三 抗美援朝战争的得失和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共进行了两年零九个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作战双方的不同是很自然的。学者们的不同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评价就是我们不能赞成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

① 毛泽东对《中央关于目前时事宣传指示稿》的修改,1950年10月。

② 毛泽东:《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23日。

③ [英]约翰·吉廷斯:《世界与中国》,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版,第203页。

史》说：“朝鲜战争使中国和美国都蒙受重大损失，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当然，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并且帮助巩固了新政权，但是，这只能视为偶然的副产品，干涉行动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这种实惠。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又被联合国打上‘侵略者’的印记，从此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达20年之久。它也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插手而无限期地延缓了解放台湾的目标。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未受侵犯，那简直不是什么纯收入。”^①

而我们的评价则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中朝人民团结一致，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的侵略。这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东方，对世界，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论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时，在一份提纲中写道：“英雄的人民战争。”“胜利：（1）三八线；（2）军事经验；（3）政治觉悟；（4）推迟了大战的时间。如果敌人再要打，我们现在就更可以打了。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②

到底哪种看法更在道理，还是让客观事实来做公正的评价吧。

1. 伟大的军事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现代局部战争。以美军为主的侵朝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帜，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能力等各方面都远远胜过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先后投入了近二百万兵力，其中包括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近半数，运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装备，实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占有装备上和技术上的巨大优势。其地面部队，一个师的美军装备有各种坦克149辆、装甲车35辆，各种火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92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报告提纲，1953年9月。

炮 794 门,各种汽车 3800 余辆。整个“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投入的坦克,最少时 880 余辆,最多时 1540 余辆,各种火炮最少时 1.08 万余门,最多时 1.6 万余门。美国海军和空军一开始就投入了作战。朝鲜战场上的作战飞机最少时为 1100 余架,最多时达 2400 余架。各种舰、船、艇最少时 110 余艘,最多时达 300 余艘。

与此相对照,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基本上依靠步兵和少量炮兵、坦克兵作战。每个步兵军编有各种火炮仅 520 余门,汽车 100 辆左右,通信设备落后,指挥联络困难。整个战争期间,中朝方面没有海军参战。战争后期空军参战,但飞机数量较少,只能用来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和局部的空中作战,不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志愿军空军,连同苏联空军在内,飞机最多时为 500 余架,最少时仅 200 架左右^①。

军费方面,美国 1950 年度为 130.1 亿美元,1953 年度为 504.43 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军费开支仅为 28.01 亿和 75.38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 11% 和 7%^②。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抗美援朝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首先,志愿军入朝后扭转了战局,将战线推回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志愿军入朝时,美军已接近鸭绿江边。经过数次战役,中朝军队将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一度打到三七线。随后,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在双方处于相对均势的情况下,经过谈判,实现了停战,结束了战争。

在三八线附近实现停战,不能被认为是战争的平局。因为弱者与强者打成平手,实际上的胜利者应是弱者一方,这是公认的常

① 军委作战部 1953 年 9 月 8 日关于朝鲜战争几个数字的统计。

② 《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04 页。

识。何况从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到三八线,志愿军前进了 500 公里以上,而美军则后退了 500 公里。

衡量战争结局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要看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就中国而言,抗美援朝的根本目的,是以有限的作战行动达到保卫国家安全的目的。据此衡量,抗美援朝粉碎了美国占领全朝鲜、威胁中国大陆的企图,维护了世界和平,中国的根本目的达到了,中国当然是胜利者。

其次,从双方战争消耗、损失的对比来看,中朝军队的胜利是相当辉煌的。

朝鲜战争中,据我方公布的材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 109.3 万人,其中美军 39.7 万人。志愿军共毙伤敌军为 71 万人。志愿军击毁和缴获敌军大批武器装备。其中有飞机 4268 架、坦克 1492 辆、装甲车 92 辆、汽车 7949 辆,缴获(不含击毁)各种炮 4037 门、各种枪 73263 支。美国开支战争费用 400 亿美元(另一说有 830 亿元)、消耗作战物资 7300 余万吨。

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减员共 36.6 万余人,其中牺牲 14.8 万人。损失飞机 231 架、坦克 9 辆、汽车 6060 辆、各种炮 4371 门(含被击毁)、各种枪 37557 支(含被击毁)。中国开支战费 62.5 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 560 余万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伤亡、失踪、被俘 62.8 万余人。

关于美方损耗的数字,可以从美国、南朝鲜官方宣布的有关数据中得到印证。朝鲜停战后,美国官方曾经公布称,美军阵亡 3.36 万人,战伤 10.32 万余人,失踪和被俘 0.51 万余人,共 14.2 万余人(每个美军师编有 2500 个南朝鲜人,此处可能未计美军编制中伤亡的南朝鲜人)。另外,美军还有 2.06 万人因事故或伤病原因死亡。

这样,总计美军在朝鲜共伤亡 16 万余人。韩国国防部公布南朝鲜军阵亡 22.78 万余人、战伤 71 万余人、失踪被俘约 4.5 万人,

共 98.84 万余人^①，美国同南朝鲜公布的伤亡合计共 115.6 万人，比我方公布的还多 6 万余人。1953 年 10 月 23 日，美联社发布消息称，“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的人员损失为 147.4 万余人。

美国军方曾长期宣称，在朝鲜战争中共杀伤中朝军队 142 万至 150 万人，其中包括 92 万中国军人，这里大大高估了自己的战果，或者是把伤亡的平民算作军人了。实际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中，阵亡的人数为 11.6 万人。除此以外，还有在医院中因伤致死者 and 病亡者，共 3 万余人，总计死亡者为 14.8 万人。志愿军各医院共接受伤员 38.3 万人次，这些伤员有的是多次负伤，必然会造成统计上的重复，而实际伤员数应为 22 万余人。作战中，志愿军失踪人数为 2.56 万人，除 2.1 万人被证实是被俘外，约有 4000 余人下落不明，可能是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经综合考证，志愿军战斗减员总数为 36.6 万人。

按照中朝方面的统计，中朝军队与“联合国”人员伤亡损失对比为 1 : 1.7。志愿军伤亡与所歼灭敌军之比为 1 : 1.9。

新中国为抗美援朝作出了重大的牺牲。然而，综合双方力量对比和作战的损耗和结果，不难得出结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军事胜利。

2. 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巩固中国国家安全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挽救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抗美援朝的结果，使中朝边境局势趋于平稳，美国从朝鲜半岛向中国施加压力及入侵的威胁得以减

^① 韩国战史编纂委员会编：《韩国战争史》中译本，《朝鲜战争》第五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 页。

轻,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其次,严重教训了美国,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提高了人们敢于同国际霸权主义势力作斗争的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仗其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到处侵略扩张,不可一世。然而,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却遭到了惨败。这是美国自1776年宣布独立以来第一次受到的严重的挫败。美国著名的将领马歇尔元帅深有感触地说:“神话已经破灭了,美国原来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一个强国。”^①这一教训对美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虽然实行战争升级轰炸越南北方,但其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北纬17°线。当时约翰逊政府的一位主要官员说:“我们考虑过中国干涉的可能性。我们肯定是非常深刻地牢记鸭绿江的教训。”事实向全世界表明,战争的性质对战争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坚持正义战争,弱国能够打败强国,武器装备落后的军队,完全有可能打败优势装备的敌军。美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对于它的侵略,只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可以把它打败。

第三,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确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为和平而战,为正义而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力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不论是当时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能不对新中国刮目相看。美国军政首脑从此不能不承认新中国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之一。苏联对中国在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出乎意料,因而一再表示钦佩,中苏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某些变化。毛泽东后来评论说:“当时,曾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从何时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

^① 转引自《世界知识》杂志1953年第16期,第7页。

援朝打击了美国之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①战争期间和战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了过去援华不甚积极的态度,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从而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场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54年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理所当然地邀请中国参加,这说明,要解决亚洲的重大问题,没有中国参加是不行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只有15个国家,并且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国家。到1957年初,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29个。

第四,提高了全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激发了爱国热情,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地要付出巨大的物资消耗。然而全国广泛开展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1951年中国消灭了财政赤字。1952年底,经济恢复计划提前半年完成。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24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水平。抗美援朝战争为我国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我国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朝鲜战争爆发时,南满工业准备搬迁。战争的胜利使搬迁计划得以部分取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又作为建设重点。假如中国不出兵朝鲜,仅从经济上讲,搬迁南满工业,在漫长的东北中朝边境长期设防,所付出的代价必相当可观。同样不可小看的是,战争胜利所促成的国内安定和振奋起的民族精神,在经济建设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抗美援朝战争,也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巩固了中国国防。

① 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巨大的。当然,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也受到了损失,付出了代价。在战争中,中国花去的战费相当于中国 1950 年全年的国内工农业总产值。1950 年后中国向苏联借款共 56 亿旧卢布(约合 13.4 亿美元),其中 30 亿旧卢布用于朝鲜战争。随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对苏联的出口中,很大部分用于还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使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局势更为复杂和不利,中国被联合国拒之门外长达 20 年之久。对这些负面影响,不承认是不客观的,但作出过分夸大的估量,同样是不客观的。而且应该着重指出的是,这些负面影响,是美国侵略所造成的,并非中国造成的。抗美援朝战争是维护正义、反对强权的重大行动。它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对降低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次战争,作为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将被永久地载入史册。

第三节 中国为什么提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但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却对这些原则的提出背景等问题作了模糊不清的说明。比如,没有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领导人首先提出的。作者只是写道,在 1954 年中印签署的联合公报的前言中,包含了关于国际行为的五项准则。“在周恩来—尼赫鲁 6 月份的会晤中,这几点被重新肯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又变成了中国政府外交声明的主要内容。”^①也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299~300 页。

没有对这五项原则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给予应有的阐述。这种说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这五项原则是由中印领导人共同提出的。显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此有必要首先加以澄清。

一 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确定了联苏抗美的战略,而 50 年代中期,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边倒”的方针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其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来说,是统一的,互相联系的。但就其解决问题的侧重点和包容性来说,又是不同的。两相比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更为有利。

我们在第一节中着重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决定采取“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总方针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既然如此,为什么在 50 年代中期又要提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外交总方针,而取代“一边倒”的方针呢?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思想的发展引起的。

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第一,朝鲜战争的结局表明,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在全球处于均势状态。两大阵营由严重对峙逐步演变为冷战共处。这使不同制度的国家间有了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的可能。美国、苏联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都开始倡议“缓和”。尽管它们各有企图,“缓和”从未真正实现,但对国际局势由两极严重对峙逐步趋向两极冷战共处,这对相对和缓国际局势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种局势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相处,需要制订新的更适宜的方针政策。

第二,两大阵营内部各国的独立自主倾向开始发展。就社会主

义阵营而言,南斯拉夫率先迈开了一步。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方针,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而苏联的大国利己主义倾向又使中苏分歧逐步积累。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标志着苏联凭借斯大林的个人声望在国际共运中享有绝对支配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就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调节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能。西方国家也非“铁板一块”。英、法、意、西德等国希望维持既得利益。它们倾向于使形势和缓,倾向于东西方来往。这就是说,不同阵营的国家间有了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可能,对外政策也相应有了进行调整的必要。通过朝鲜战争,中国深刻认识到,世界“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对立”,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并不统一,应该区别对待。这样,当朝鲜停战实现后,中国即开始致力于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

第三,朝鲜停战后,美国继续在亚洲推行其“遏制政策”。它积极拼凑从东北亚经东南亚到南亚、西亚的对华包围圈。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美国建构所谓“防御链条”,不过是它继续实行侵略政策的具体步骤。要突破这种“防御链条”,必须在世界上采取更为务实的更有兼容性的对策。

第四,50年代中期,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些亚非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就为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拓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诬蔑宣传,加之旧中国政府曾经实行过错误的对外政策,一些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对新中国还存有疑惧心理。为了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就要制订适合于同这些国家交往的新方针。

这样,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改善国家安全环境,顺利进行国内建设,有必要调整对外关系,由“一边倒”的格局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毛泽东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

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后,已经提出了包含五项原则中主要内容的外交方针。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①新中国一诞生,就主张把自己与各国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和平、平等和互利等原则的基础上,并遵循这些原则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尤其是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在妥善处理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争议问题的过程中,新中国的外交原则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而得以确立。

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在中印谈判的第一天,即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就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②印方同意以周恩来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谈判的原则。经过讨论,周恩来提出的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于1954年4月29日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序言中,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①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② 《周恩来外交文选》,人民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在1954年4月25日至7月23日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于1954年6月底首次访问印度。他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在记者招待会及向印度人民的讲话中都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世界和平事业上的密切合作和经常接触,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就能够使两国间的关系获得不断的加强和发展”。在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重申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①。可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印度领导人则接受了这些原则。

访问印度后,周恩来接着应邀于1954年6月28日和29日访问了缅甸。周恩来向缅甸领导人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中国执行的是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友好相处。在6月29日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指出:两国总理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②。

公开出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是中国政府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但这项外交方针的决策则是由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作出的。1954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的乌玛·尼赫鲁夫人时指出: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随后,当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时,毛泽东再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强调,应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指出: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或是国与国之间,都必须是互利的。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同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阐明了实行五项原则的长期性。毛泽东说:“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①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能和平共处。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说:“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②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③

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特别是在1955年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领导中国代表团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影响这两次国际会议,取得了巨大成功。在日内瓦会议中,新中国主要努力与以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和平共处,改善与这些“维持现状派”^④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文化关系,同它

① 毛泽东:《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1954年12月11日。

②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

③ 毛泽东:《中国和巴基斯坦应该成为好朋友》,1955年4月27日。

④ 《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们协商解决国际争端问题。通过在日内瓦的会上会下的积极工作,新中国首先成功地推进了中英外交和经济关系,同时也增加了对西欧其他国际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而冲破了几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开创了同西方国家扩大接触的新局面。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新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原则成为“万隆精神”的核心内容。

中国领导人首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一,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该受到侵犯;第二,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其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第三,在和平平等的政治基础和气氛中,各国之间就可进行互利的通商和文化交流活动,共同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着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五项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鸿沟,主张世界各国在相处中都应平等对待,互相尊重,友好相处。凡主权国家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五项原则精神指导下和平相处。五项原则中的四个“互”字,表明世界各国是相互联系的,应实行对等的、平等的原则。任何一方不能压迫、剥削、歧视另一方,各方都应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互利的基础上和平相处。

其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核心,并在国家关系上对和平共处的内涵实行了全面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丰富而严密。其第一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五项原则中基本的一项。主权是在一个国家内的最高统治权力;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是世界上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也是各国进行平等自由交往

的必要前提条件。“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第一项内容的引申和保证。“平等互利”是指主权独立的国家间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平共处”，是前四项内容的结论。

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七大原则基本精神相符。两者最本质的共同点，在于都倡议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与和平解决争端等。其不一致的地方在于，联合国宪章在倡议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同时，不排除在必要时可以运用军事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二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如认为第四十一条规定之方法（和平方法如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海陆军行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主张以和平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宪章对违反宪章精神的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戒方法，它赋予安理会一套完整的充当监督机制的权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施则没有监督机制和手段作保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兼有法律性和道义性。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有效性，可以建立在两种保障机制之上：一是法律上的约束，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国与国之间还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扩大为集体和平公约；二是道义上的约束，各国通过彼此来往，可以发表声明，签订协议，发表演说，强调反对侵略和反对殖民主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实行，对于巩固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即在对抗之外，还有对话；在斗争之外，还有妥协；在贯彻既定战略路线的同时，还要采取灵活的策略。事实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对维护国家安全所能起的作用，与增强国家军事实力一样，都是十分重要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提出时，不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当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彼此实行的是国际主义原则。但是，后来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普遍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表示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这些原则。于是在1956年10月波匈事件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对外关系政策和理论上的一大飞跃,对巩固中国国家安全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国际局势缓和,保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发展;它有利于改善周边安全环境,捍卫国家主权;它推动了中国国际交往的扩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处理与两极格局中各方国家的关系中,也获得了新的理论武器。

通过考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过程及其意义,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原则是新中国从成立起就开始奉行的外交方针。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实质,在各个时期、各种形势下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然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却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是新中国在某一时期奉行的外交路线,以替换另一时期实行的“好战”外交政策。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只能被认为是此书作者的偏见。

三 如何理解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发言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断言,从1954年至1957年下半年之前,中国领导人奉行和平共处的万隆路线,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放弃“温和的外交政策”而采取了“好战”的外交姿态,并断言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中国放弃了万隆方针”^①。此书作者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特别是关于“东风压倒西风”、关于不怕核战争的观点等,1958年炮击金门、马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01、306页。

祖,中印边界战争等,都是“好战”外交路线的具体体现。作者关于自1957年下半年起中国领导人放弃和平共处外交方针,转而采取“好战”政策的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下面,我们将扼要地考察上述事件。这里先对莫斯科会议前后中国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看法,谈一点我们的理解。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并结合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观察,来阐述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点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中国领导人提出,当时的时代特征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反对和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

在出席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谈到会不会发生战争问题。毛泽东说,估计不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很强大。他又说,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总之是力争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敌人是侵略者,我们是保卫者^①。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他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又指出,美帝国主义顽固地要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在中国干涉解放台湾,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它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的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2页。

这种疯狂侵略政策,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①。

在1957年11月18日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还谈到如何对待发动核战争的帝国主义者问题。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全世界27亿人,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他强调: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他说: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说如果发生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讲了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观点。

以上引用的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几次讲话中的观点,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中共中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战略方针。这些观点并没有表明新中国正在抛弃和平姿态而实行“好战”外交政策。因为,毛泽东首先强调的是,中国致力于搞建设,希望和平,不想打仗。这是中国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但是,国际形势的发展并不是由我们单方面的愿望决定的。因此,任何政治家在作决策时,都不能不考虑到其他国家、特别是敌对势力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又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是战争狂,会随时发动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又要准备应战,特别是准备对付核战争。这怎么能说是“好战”呢?

当然,在莫斯科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的确有点过于乐观。比如:“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下得早了些,对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看得过于薄弱。然而,毛泽东并没有由于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认为“东风压倒西风”了,就得出向资本主义世界采取进攻战略,发动世界革命的冒险战略。

因此,如何全面而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四节 为什么要炮击金门

对于1958年8月,中国大规模炮击金门的事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给予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该书说,炮击金门“有一系列目的,最好的结果是,趁美国军事力量专注中东危机时,夺取这些岛屿,即使这些目的达不到,那么炮击也可以迫使华盛顿给予北京对台湾的权利以应有的尊重”。而“事情的发展显然与毛的期待相反”。“毛的失算不仅带来了中美军事对抗,而且严重恶化了中苏关系。”甚至说炮击金门在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说,是以丢脸而告终等等^①。这样的评论很显然是不顾客观事实的偏见。

一 炮击金门决策的作出

1958年8月,毛泽东决策第二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在4个月中,解放军对金门大规模炮击7次,与国民党军空战13次、海战3次,发射炮弹数十万发,同时还向金门发射宣传弹近6000发,空飘球2000多个,散发宣传品1.65万公斤。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大规模炮击呢?既有军事目的,又有政治目的。

1. 挫败美国永久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23、530页。

1955 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做出过多方面的努力。在与美国进行大使级会谈的一段时间里,停止了对金门国民党军的炮击。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美国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承认美国在台湾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力。中国的立场是:愿意同台湾谈判,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实现祖国统一;但是,这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中美之间的外交谈判,应以解除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武力威胁为目标,中国决不承认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1957 年 12 月,美国单方面宣布中断会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要继续推行对华三原则,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

美国的做法,使毛泽东开始怀疑 1955 年以来,中国对美实行缓和政策的正确性。在 1958 年 6 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1954 年曾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自己一贯的想法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这是显示中国人民能否站起来的问题。帝国主义侵略我们 100 多年,不能忘了。要利用美国对华三原则,关起门来,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毛泽东还说,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革命人民绝不能示弱,你越怕鬼越不能活。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挫败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国炮击金门的根本目的。

2. 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扩大中国的战略同盟力量

随着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1958 年 5 月,黎巴嫩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夏蒙政权的统治。同年 7 月,伊拉克人民经过斗争,推翻了费萨尔王朝,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并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这时,美国派出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英国军队进入约旦,并在地中海集结大量军队。美英武装干涉中东地

区民族独立运动的战争冒险行为,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抗议。

毛泽东一贯重视亚非人民的革命斗争,把亚非人民的斗争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兴的战略同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干涉黎巴嫩的横蛮行为,抗议英国的侵略行径。毛泽东认为,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上的支援。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召集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领导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时,一再强调了这一点。毛泽东指出: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国际反帝力量是联系在一起的。中东人民的斗争,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就支援了中国。敌人是共同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由此就形成了统一的战略整体。作为战略家,毛泽东总是着眼于事物的整体,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上考虑问题。就笔者看来,毛泽东精通斗争的艺术、牵制的艺术,虽然妥协的艺术略显不足,但是他在战略上的谋篇布局却是一气呵成,有高屋建瓴的气势。第二次台湾危机中,毛泽东提出“绞索”政策,正是其国际战略思想在联盟战略方面的生动体现。

3. 惩罚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军,挫败美蒋对大陆的军事威胁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之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积极备战,试图“反攻大陆”。国民党将金门、马祖地区确定为“战地政务区”。1956年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为1亿100万美元,1957年又增加700万美元。1956年1月美台签定军事协定,美国帮助台湾建立陆军后备与补充制度,扩编了在台美国军事顾问团,同时还派遣“斗牛士”战术导弹部队进驻台湾。

国民党海军将其巡逻线不断向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扩张,对大陆沿海港口的禁运封锁不断加强。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空军加紧侵扰大陆,实行武装挑衅。据不完全统计,仅1955年3月至8月的5个月中,国民党空军即出动飞机2009批3550

架次,到福建、浙江、广东空袭骚扰。美军战机混在国民党机群中,多次侵犯中国领空。1955年至1957年6月,国共双方发生多起大规模海战、空战和炮战。1957年6月22日发生在金门和厦门之间的炮战,是最为激烈的一次。1957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南海域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军队也在“反攻大陆”的口号下举行了全岛军事演习。

1958年,国民党在金门、马祖岛上驻兵10万人,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美国为了加强对台湾的控制,于1958年5月成立了“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将它在台湾建立的17个侵略机构合并在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下。他们在中东制造紧张局势的同时,又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气氛。8月,美国“援助”台湾的第一批F-100型战斗机运抵台湾,接着第13、第17航空队和导弹部队进驻台湾。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台湾“国防部”于8月6日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8月8日,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美国海军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沿海登陆。美蒋勾结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所以,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不是炮击金门引起的。恰恰相反,是美蒋制造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才会有炮击金门的决策。这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是不能够颠倒的。

面对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严惩蒋军。后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国防部长文告中指出:“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国民党当局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他们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注意。”

4. 显示中国独立的战略立场

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线”,赫鲁晓夫试图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的轨道。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提出“东风压倒西风”,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害怕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

人民。中东事件发生后,苏联提议召开苏、美、英、法、印和联合国秘书长参加的首脑会议,以便采取可能的措施,结束已经发生的冲突。但美、英对此反应冷淡。在中国领导人当时看来,苏联的提议是胆怯的表现。毛泽东要以自己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不怕鬼,尤其是在这个“东风压倒西风”的时节。

5. 与国内形势相呼应

1957年,中国进行了“反右派”斗争。195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开始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认为,适度紧张,可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化解矛盾,激发人民自立自强的热情。后来,毛泽东说道:台湾的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件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①

6. 表明中国对解放台湾问题有充分的主动权

美国的武装干涉也好,苏联的缓和战略也好,都不能干扰中国行使自己的主权。

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在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任务的会议上指出,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帝国主义则有牵制作用。后来他还说:“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

^①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1958年9月8日。

然,整个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蒋介石逃离大陆后占据着中国两部分地区,一部分是金门和马祖等沿海岛屿,一部分是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两部分统称台湾地区。当时,台湾驻有美国军队并受到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保护,如果打台湾,就会为美国参战提供口实,也会引起一些中立国家的不安与误解。而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则不同。那里没有美国驻军,也不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限制,打金门可以不和美国人直接交锋。如果美国出面干涉,只能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它的侵略立场,使它政治上陷于被动。对于苏联,中国在对金门实施炮击前,未与以往一样向苏联通报,而是炮击金门开始后向他们表示了中国的立场。这充分表示了中国的主动权。

毛泽东决策炮击金门,要达到的直接军事目标是什么?综合分析关于炮击金门的多类档案,我们认为毛泽东要达到的军事目标,起初是试图逼迫或歼灭金门蒋军,占领金门;以后随形势变化而改变方案,有意将金门保留在国民党手中。

金门炮战的前一阶段,毛泽东的设想是:逼退国民党金门守军。如果美国能说服国民党军从金、马撤退,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对台湾不使用武力。这一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再度开始时,在中国方面建议中已经透露出来。其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后来,林彪在1959年的军委会上也曾说过,最初的直接作战目标,是准备用围困的方法,把国民党赶走。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合乎当时实际情况的。

炮击金门,在中美关系上会引起怎样的结果?中美之间会不会

爆发战争？这是当时国内外人们普遍关心的。苏联不支持中国采取强硬方针，其理由是，如果中国采取这样的方针，势必引起美国人参战，而美国的力量是“可观的”，“力量表现在导弹上”。他们还告诫中国政府，“目前不宜于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没有必要投入这场战争。

毛泽东的观点是：第一，中美之间不会打起来。理由是中国不希望打仗，美国也害怕同中国打仗。毛泽东分析说：“我总是觉得，它（指美国——引者注）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是不敢来的。”第二，毛泽东认为，万一打起来也不可怕，他说，“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第三，毛泽东承认美国有实力，特别是拥有原子弹，认为这是美国的优势，也是中国无法比的。但是，他强调，力量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还应该看到：“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美国“力量有限，困难甚多。”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及世界各地，因此，造成力量分散，处处兵力不足；美国国内厌战空气甚浓，人民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西方各国中也不都支持美国的政策；全世界都在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反帝斗争一触即发。所有这些，都于美国不利^①。

估计到上述各点，毛泽东断然决策进行炮击金门作战。金门炮战开始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于1958年9月8日向毛泽东发出电报称：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毛泽东复电说：“我认为：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

^① 参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

来；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①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中国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必须讲究策略，寻找最有利的斗争方式。对于金门炮战，毛泽东提出两条方针：第一，要斗争；第二，要讲策略。其意图：既要达到施加压力的目的，又要防止美国真的卷入军事行动。在审阅中央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时，毛泽东在指示稿第四项“由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的斗争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斗争，不得自作主张”一句中，加写了：“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等项内容，一切由中央直接掌握^②。这里还有一个生动的小插曲。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的王尚荣回忆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前线总指挥叶飞向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汇报前线准备情况和炮击部署时的情景时说：“毛泽东突然问叶飞：大规模炮击会不会打死蒋军中的美国人？叶飞说，会的。因为当时蒋军营级即配有美国顾问。毛泽东感到此事需要斟酌。这天晚上，我给叶飞送去一张条子。条子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主席很关注如何避免打美国人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对美稍加暗示。当时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当时所有看到林彪条子的人，都认为林彪的建议与力求在突然的炮击中给蒋军予重创的作战意图背道而驰，因为向美国透风，无异于直接告诉蒋方。……第二天，毛泽东拍板按原定的突然炮击计划打，时间定在8月23日17时30分，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③这些都说明炮击前毛泽东考虑很周到，没有什么

① 毛泽东：《关于台湾局势等问题复胡志明的电报》，1958年9月10日。

② 毛泽东在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上的批语，1958年9月3日。

③ 《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页。

“失算”。

二 炮击金门作战的若干特点

炮击金门是对踞守在金门诸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惩罚性作战行动,这属于中国内政;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侵入台湾和台湾海峡,美国为金门国民党军护航,造成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又带有国际斗争性质。金门炮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在金门炮战准备和进行过程中,有以下特点:

1. 精心准备,选准战机

炮击金门之前,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统帅部及参战部队对战役进行了精心准备。毛泽东曾说,金、马局势那么严重,“每个环节都是我和(周)总理搞的,美国第七舰队护航,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这样的事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①。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部署,人民解放军组成了前线指挥所,参战的地面炮兵、海岸炮兵、高射炮兵部队和空军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舰艇部队以及其他保障部队,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隐蔽地进入指定位置,做好战前的准备。

关于作战时机,毛泽东作了精心选择。金门炮战前,从8月8日到22日,解放军空军在马祖空域与国民党进行了持续半个月空战,击毁国民党飞机50余架,约占其空军作战飞机总数的三分之一。解放军海军出击马祖海域,把国民党三分之二的海军力量胶着于此。上述动作,使解放军掌握了制空权,完成了战场准备,同时在进攻方向上造成了敌军的错觉。

1958年7月27日,毛泽东就掌握炮击金门时机,在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写道:“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

^① 毛泽东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9年9月15日。

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搞(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①

大规模炮击的时间,最后定在1958年8月23日,即联大紧急会议讨论通过阿拉伯各国要求美国从中东撤军提案的第二天。这是独具匠心的选择。美国从中东撤军的提案通过后,中东局势即缓和下来。这样,国际关注的热点就可能转向台湾地区,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斗争。

2. 猛烈突袭,造成强大震撼力

金门炮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8月23日起至10月5日止,以炮兵为主,实行陆海空军联合封锁。

炮击的发起,具有很强的突然性和震撼力。

8月23日晚6时30分,举世瞩目的炮击金门爆发。顷刻间,人民解放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2小时内共密集发射炮弹4.5万发,摧毁国民党军许多阵地,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三位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当即被炸死。参谋长刘明奎也受重伤。这天晚上6时30分,金门防卫司令胡璉在翠谷水上餐厅设晚宴,招待美国顾问。胡璉和美国顾问晚到,而侥幸躲过了炮击。这次炮击的火力密集程度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解放军海军部队也封锁了金门,以切断其

① 毛泽东:关于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58年7月27日。

所有外援。24日午时,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发射炮弹3.6万发。25日,由5艘国民党登陆舰与货轮编成的运送补给品的船队驶入料罗湾,准备抢滩卸下补给品。解放军鱼雷快艇队迅即出击,击沉敌两艘登陆舰。金门海上运输线被解放军截断。

猛烈突击形成强大震撼力,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台湾学者写道:“在连续遭受七天炮击后,大、二担不到一方公里的土地,至少每五公尺见方落弹一发,每五分钟落弹五发。我军不能入睡、进食,战斗力大衰,地面工事全被打平,地下工事也受中等损失,三个加强连已损失1/3。”台湾当局十分惊恐,国民党政府机关准备搬家,其“经济部”已经搬到乡下。为了稳定台湾局势,8月27日,陈诚在台北发出呼吁,要求绝对信赖蒋“总统”定可渡过难关。由此可见,突然炮击对国民党造成了强大的心理震撼。这次炮击单从军事上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不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说它以人民解放军的“丢脸”而告终,有什么事实根据?

3.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把中美之争限制在战争边缘

炮击金门,中国不想和美军直接交战,美军也不打算与中国直接交战。美国实行所谓“战争边缘政策”,一方面是要对中国实行军事讹诈,一方面又想避免直接卷入军事冲突。毛泽东指示,要以边缘对边缘,既达到作战目的,又避免与美军直接交锋。

这一问题,在进行作战准备时,毛泽东即已作了部署。1958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批示说:“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毛泽东还指示,对援助金、马的台湾空军进行反击,追击时不要超过金、马线^①。为了避免与美军直接冲突,毛泽东明确规定,敌机未进入我领海时,我机不得出领海,不打美机;如美机侵入我领海、领空时,我必须坚决打击之。毛泽东在询问了前线指挥员,炮击是否能打到美国人之后,才作出了炮击金

^① 毛泽东在广州军区给军委的报告上的批示,1958年8月18日。

门的决策。

对于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行动,台湾当局和美国一时不摸虚实。美国政府内部就是否帮助国民党保卫金门、马祖一事展开了争论。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宣布“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金门、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可是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美国并不打算为金门、马祖这些岛屿而同新中国作战。美国之所以发表这样一个声明,是采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让共产党猜不透”的建议。这实际上是一种战争讹诈政策。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作出了相应部署。陆续调到台湾海峡地区的美军,共有航空母舰6艘、船只130艘、飞机500架、海军击战队员3800名、地面部队军人5000人。

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本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9月7日,美国军舰为国民党军舰船护航,进入金门海区。毛泽东指示: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然而解放军一开炮,美舰丢下国民党舰船退至料罗湾5~12海里处,观望避战。9月11日,美蒋混合船队再次驶近金门,解放军炮兵开炮轰击,美国军舰仍一炮未发即退向外海。美舰护航并未缓解金门的供应补给危机,护航开始以来向金门的海运行动连连失败。解放军的炮火严密封锁了料罗湾的机场和码头,台湾的运输船队根本无法立足,运输机亦无法起落。

这就使我们看清了美国战争边缘政策的特点和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限度。后来毛泽东评论说:“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

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毛泽东风趣地说：“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了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作声，不要我们赔。”毛泽东认定：美国虽然是强国，但它霸占的地方太宽，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①。

毛泽东对作战精心指导，既打击了国民党军，又避免了与美国直接冲突，同时摸清了美国的底细，指导是非常成功的。

4. 打谈结合，使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紧密配合，达到作战目的

炮击金门中，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进行了坚决而又灵活的斗争，在外交战线上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活动。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世界各国，除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外，几乎都不赞成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民族主义国家，齐声谴责了美国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9月5日和8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他说：“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毛泽东在讲话中重申了中国同美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彼此争端的愿望，表示对中美华沙大使级谈判寄以希望。

^① 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的谈话，1959年5月10日。

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制造“两个中国”,对金、马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不愿意放弃对台湾的支持,又不想为金、马而直接卷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于是,他们表示,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9月9日,美国政府照会中国驻华沙大使,表示美国准备“随时”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方面予以响应。毛泽东在接见即将返回华沙的王炳南大使时讲:在同美国大使谈判时,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1000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断9个月后,于华沙复会。会前,毛泽东就谈判作出指示:“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①美方在谈判中提出:台湾地区立即停火,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谈判。同时,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中也表示,美国“希望很快地停火”。这种说法混淆了中美之间的国际矛盾和国共之间的内政矛盾。中方代表针锋相对地提出美国从台湾等中国领土撤军,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建议。对此,毛泽东致信周恩来说:“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要形态。”^②对美方的“停火”要求,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予以驳斥。10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③。

为了配合华沙谈判,9月13日毛泽东指示:“白天黑夜打零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1958年9月13日。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黄克诚信,1958年9月19日。

③ 毛泽东同保加利亚等国代表团谈话,1958年10月2日。

炮,每天廿四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料罗湾三里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利,至少有中利小利。”“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校准炮位,黑夜如法炮(炮)制,似较有利。”^①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的意见,并指出:“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②

军事斗争与外交紧密配合,使美国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既不能用军事恫吓达到目的,又难以通过谈判缓和局势。万般无奈,对金门的政策只有从“协防”转为“脱身”。

5. 利用美蒋矛盾,对台湾问题实行“一揽子”解决

炮击金门,使美台之间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蒋介石两次致函美国总统,要求美方对协防金、马给予支持。台湾当局声称要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甚至提出要美国与其并肩作战,反攻大陆。然而,美国政府却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美国的主张遭到台湾当局的坚决反对,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他们甚至公开互相指责起来。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确实有了相当可靠的“停火”保证,在金门、马祖岛上保持这批为数不少的部队就是“愚蠢、不明智和欠谨慎的”,并称美国没有保卫金门、马祖这些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表示这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台湾没有任何义务遵守它。

这时,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先逼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军,把台湾同大陆隔离开来,以制造“两个中国”;面后,由联合国托管台

① 毛泽东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给周恩来、黄克诚的信,1958年9月13日。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58年9月22日。

湾,踢开蒋介石,使台湾成为美国的战略基地。这种企图,不仅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也不能接受。在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海峡两岸存在着某种共同点。

美台在金、马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决定调整原定先解放金、马,后解放台、澎的方案,让金、马继续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以后金、马、台、澎问题一揽子解决。毛泽东指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①随后,中央军委制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作战方针。

10月6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但以没有美国护航为条件。从1958年10月6日至1959年1月,是金门炮战的第二阶段,即打打停停阶段。第二阶段作战,鲜明地表现出政治斗争的特点。

就军事而言,这时实行了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限期隔日炮击,除几次大规模炮击外,逐步形成逢单日打、双日不打的规律。炮击只打沙滩,不打民房和工事。如由于特殊情况需要炮击,则事先通知。同年11月2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等,指示:11月3日,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同时使国民党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同时,毛泽东为厦门前线写了广播稿:“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明日,十一月三号,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这种做法,单从军事上看起来十分奇特,而且难以理解,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挫败美国迫蒋从金、马撤军的阴谋。打是为给国民党军以拒绝撤军的理由,不打是为了能让其悠然固守。这在战争史上是一种近乎戏剧性的安排,但却是以军事手段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出人预料的卓有远见的举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58年10月5日。

措。毛泽东说：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就政治而言，与军事斗争相呼应，我方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等文告，阐明了下述思想：

第一，“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中国人之间“三十六计，和为上计”。第二，“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一个东太平洋的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第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着险恶的阴谋：孤立台湾、托管台湾。毛泽东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的历史事件为殷鉴，提醒台湾当局当心美国人的毒计，不可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被人丢到大海里去。

这场轰动世界的“台海危机”，以众人都未预料到的方式，即炮击金门以长期化、经常化，单日打、双日不打的特殊方式进行着，大陆和台湾被炮火联接了起来，打炮成为传递政治信息的特殊手段。这种情况持续了20年。

以上对金门炮战特点的分析，几乎覆盖了金门炮战的全过程。然而我们应该承认，上述各点与一般战争相比较，确实有其独特之处，可以称之为罕见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归根到底还是由战争性质的复杂性决定的。

三 金门炮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一，挫败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阴谋，同时严惩

了国民党军。它表明,中国必须统一。

第二,突破了苏联“缓和”的束缚,体现了中国自己独立的战略地位。

第三,打乱了美国的侵略计划,调动和吸引了美国海空军 20 余万人。即使美国远程奔波,又减轻了中东人民的压力,支援了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第四,通过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分歧。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实行危险的“战争边缘政策”,除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外,其他各国,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日本和菲律宾,都表示不能赞同,它们更不愿意同美国一起卷入台海军事行动。日本有关人士表示,金门沿海岛屿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最好不要干涉。英国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配合行动,而在远东台湾地区问题上则反对美国“介入”。在美国国内,反战空气十分浓厚,甚至像曾经积极帮助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那样敌视中国的人都认为,美国政府是在执行一种“自杀政策”。

第五,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国第一次宣布了自己的领海线,这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在旧中国,由于统治者腐败无能和缺乏近代海权观念,一直没有宣布过领海线。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中国政府决定以苏联等国为例,确定领海线为 12 海里。中国政府的声明发表后,美国宣布它只承认 3 海里,英国和日本政府也做了同样的声明。但是在中国方面的严正立场和炮击金门的果敢行动面前,英、日等国船只事实上以后都遵守了 12 海里的领海线。美国海空军在后来的活动中,也注意到不越过这条领海线(偶然越过时中国政府都提出严重警告)。事实证明,当时的领海声明,维护了中国的海洋权益。

第六,通过炮击金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摸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重估了美国的对台政策,从而改变了先收复金、马等沿海

岛屿,再收复台、澎的战略构想,形成把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同美国的“两个中国”图谋作斗争,待时机成熟,将台、澎、金、马一起解决的对台政策。由此,中国在对沿海岛屿问题上,实现了从局部军事斗争向全面的政治、军事、思想斗争的转变。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再表示:只要蒋介石能够守住台湾,不使台湾与祖国分离,大陆就不会改变对台既定的政策和两岸关系。

当然,与许多重大作战行动都会存在正负两面影响一样,炮击金门的行动也会存在某些负面影响。例如今天回头来看,当时国际的总体形势是趋向缓和的。中共八大提出了正确的路线,国内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并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在这种情况下,用大规模炮击的形式沟通大陆与金、马的联系,并以此振奋民心,是否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办法,尚可研究。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角度上,应肯定炮击金门无论从军事的还是政治的角度,都是成功的,积极效果是主要的。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

第五节 中印边境冲突为什么会发生

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紧张和边境武装冲突,以致爆发短时间的局部战争,是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对此没有用专门的章节,而是放在第十一章中苏分裂的四个阶段中作为单独的小题加以论述。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同中苏关系的紧张与分裂是存在某些关系的,但前者并非从属于后者,而是有着自身的特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承认1962年的边境战争是由于“1962年上半年,印度巡逻队推进到喜马拉雅山边境有争议的地区建立前哨据点”引发的。该书说:“10月20日,在印度超过

麦克马洪线进入没有争议的西藏领土时,人民解放军在边境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一次协同进攻。”这本来是比较客观的。但作者却又说,印军的这种越境,“与先前人民解放军的推进相似,但往往落后于他们”,又有点是非不分的味道了。甚至对中国单方面采取的归还全部战俘和武器的宽宏大量的友好举措,作者也给予反面的评价,说“北京给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①。这就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单列一节,加以比较详细的说明。

一 中印边境冲突的由来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睦邻政策的重点。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印度当局对中国西藏少数上层分裂分子的支持,却给中印关系投下了阴影。

早在 50 年代初,印度乘新中国成立不久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机,向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地区推进,侵占了中国的大片领土。随后,又建立起“东北边境特区”,单方面修改印度官方出版的地图中之中印边境国界线,企图使侵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固定化、合法化。对此,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政策。

1958 年末,印度当局在怂恿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叛乱的同时,开始挑起中印边界争端。

1958 年 12 月 14 日,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致函中国总理周恩来公开提出片面主张,声称中印边界已经确定,不存在边界争端;要求中国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修改中国出版的地图,接受印方关于边界线的主张。1959 年 3 月,西藏爆发武装叛乱后,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正式提出了领土要求。其中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被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554 页。

印度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和中段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印度领土,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在中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也是印度的领土。事实上中国同印度之间的边界线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过,只存在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而印度提出的要求,大大超出传统习惯线向北扩张。印度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的面积,相当于一个福建省。这些无理要求当然遭到中国的拒绝。

对于印度政府的种种言行,1959年1月28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印度某些政界人士中出现了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希望“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将迅速消除”。5月6日,毛泽东在接见苏联等11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发表谈话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这时,中国对印度总的态度还是争取改善两国关系而不要发生边界冲突。但印度采取的并不是同样的态度。

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就中印关系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一份谈话稿。其中对印度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关系中出现不正常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毛泽东对中国外交部答复作了修改。其中指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

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①。

然而,印度为他们的扩张野心所驱使,在中印边境步步进逼,甚至制造流血事件。当时印度深入中国境内布置了100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有的楔入中国边防哨所之间;有的距中国哨所仅几十米甚至几米;有的竟插到了中国哨所背后。这浓浓的火药味,吸引了中国决策层和军方的注意力。1959年8月,印度军队在侵占中国领土朗久后,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毛泽东决定,我军不挑衅,不示弱,印来攻,即击退之,不追击不出击,看印度如何。10月,印度又在中印边境西部的空喀山口,袭击中国边防部队,打死打伤中国士兵多人。11月3日,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解决中印边境问题。毛泽东提出避免冲突的方案:“整个边境线,各退或者十公里,或者十五公里,或者二十公里。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不要武装人员,非武装人员按照习惯线,各人管理各人的事情。”毛泽东还说,如果印方答应两国总理会晤,在北京或新德里都可以。他说: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②。据此,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1月7日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中印双方的军队从实际控制线全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停止巡逻,但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尽管如此,中国仍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在己方实际控制线一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在20公里内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当劝阻无效时,依照国际惯例解除他们的武装,经说服后,即发还武器,让其离去,尽量不使事态扩大。然而,中国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得到印度当局的响应。

① 毛泽东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1959年5月15日。

② 毛泽东在杭州工作会议上的谈话纪录,1959年11月3日。

对印度实行避免冲突和团结争取的方针,毛泽东的考虑主要是:第一,印度同中国一样,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有共同的基础;第二,对我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南方向而不在西南方向,不能两面对敌;第三,印度在民族独立国家中有较大影响,争取印度就可团结其他一些国家;第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总体上看还是较好的,双方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是,应该承认,这一时期中国对印度扩张主义的斗争,也有不够的一面。这不够的一面不是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多次提到的中国“好战”,而是让步过多。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国家安全应该是全部领土主权的安全。印度虽然是民族独立的国家,但其扩张主义倾向已十分明显,并且这种扩张主义具有很强的对邻国的渗透性及炫耀武力的地区霸权性。对于这种扩张主义,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在其萌生之际,便给以有力的杜绝和遏制,否则其得寸进尺,最后仍需要以武装冲突来进行历史补偿。国家安全有重点,这是不错的。但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没有让步迁就的余地。这不是一代人的事,不是短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体系下的事,而是千秋万代的事。

二 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与结束

1962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的时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国防部里,一个将中国军队清除本属中国固有领土却被尼赫鲁圈入印度版图区域的罪恶计划“里窝那”计划,最后定型了。

在这次秘密的作战会议上,印度国防部部长梅农首先声明,这个计划是在总理尼赫鲁赴伦敦参加英联邦总理会议前,亲自授意他拟订的。印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帕利特准将叙述了“里窝那”计

划的内容。他说：里窝那是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名，因此时的印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那里作过战，故名之。

该计划的作战要点是：在边界东部，印军要占领塔格拉山，将此处中国军队赶走；在西部，要拔除中国军队的 21 个据点，全部占领有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为了加强东部的军事力量，拟在最快时间内组建特种部队第 4 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亲赴东北边境地区任前线总指挥，并兼任第 4 军军长。

该计划遭到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上将的反对。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个轻率的计划，是出自只善于哗众取宠、纸上谈兵的考尔中将之手。他认为这样仓促地向中国境内推进，只会把印度推进坟墓，并可能导致中国反击并进入印度国土。但除了个别人默认他的观点外，几乎所有的与会将军都认为他怯懦得荒唐。于是“里窝那”计划顺利地通过了。

10 月 2 日，尼赫鲁公然声称：印度将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此刻，印军在边境西段，集结了 5600 多人；在东段则集结了 1.6 万余人。10 月 10 日上午，印度入侵中国西藏扯东地区的一个营，超过克节朗河上游，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14 日，印国防部长梅农发誓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并飞赴边境的提斯浦尔城运筹作战。

据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回忆：“这些情况送报中央后，引起毛泽东的深深思索：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交往历史，又都是为世界称道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印度为何非要在边界以兵戎相逼，不惜流血和刀枪相向呢？他连续几天睡不安稳。

“周恩来察觉到毛泽东的锁眉苦思，亲自责成总参作战部负责中印边界问题的副部长雷英夫，与总参防突小组（即：研究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专门小组）就此进行研究，拿出看法，供毛泽东参考。雷英夫和当时任防突小组副组长、作战部部长的我、部分组员及作

战部边防处的参谋聚议了几次。

“实际上当中印边界的局势益发紧张后,我们就常在我的办公室里,探讨和研究相关的情况和对策。在那段日子里,我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很晚才熄灭。我们认为印方之所以敢在边界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近和制造流血事件,主要原因有五:

“一是印度政府不愿放弃原英国政府的扩张政策,不愿放弃对中国西藏的领土野心。尼赫鲁认为,只要把据点修在了中国的领土上,就有望作为既成事实,进而争得国际上的承认。

“二是印度认为大的国际背景对其有利。美国一直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50年代末,中国又同北面的邻国苏联交恶。中国面对着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威胁和经济封锁。

“三是印度有在南亚地区充当霸主的欲望,以在中国边界咄咄逼人,显示其威风。

“四是近些年印度国内经济发展迟缓和社会问题上升,因此引起的不满情绪,可通过边界的战事转移。

“五是错误地估计了军事形势。印度方面认为:中国的主要正规力量在东南,用以对付美国扶植的台湾国民党的反攻;自中苏关系交恶,特别是塔城、伊犁边民暴乱外逃事件后,北面的中苏边界又吸附了中国的大量军力,以致东、北两线即占去中国全部兵力的90%。中印边境一带是薄弱环节,新疆、西藏除少数边防部队外,几无正规部队。再则中国尚未从3年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复苏,没能力支撑战争,更难顾及遥远的西南边陲。印军的推进,不会遭到强有力的打击。印方甚至将中国对印方战略归纳为‘只叫不咬’。

“当毛泽东见到雷英夫,向他提出尼赫鲁为什么非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头上时,雷英夫将防突小组研讨的意见,说了出来。毛泽东说前四点他也早已想到,对第五点尤为赞赏。显然,不予迎头痛击,印方的进逼将永无止境;而打骄横无准备之敌,是易操胜券

的”^①。

1962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否对印军在中印边界武装挑衅加以反击,进行最后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等。

关于这次决策会议的情况,据王尚荣说:“在由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介绍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的反映后,周恩来总理对之做了综合分析,得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结论。

“毛泽东主席接着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在讨论中、印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和胜负率时,毛泽东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得赢打不赢呀?’

“印度军方一向高估自己的战斗力,早年就声称印军和中国军队作战可以以一当十,在朝鲜战争期间,印度军方到前线参观后,看法有些转变,但仍称可以以一当六。然而张国华不信那个邪,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

① 《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283页。

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

“在场的军方将领们，都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说，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布置。会议同意了由总参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制的反击作战计划，以及总参提出的 10 月 20 日反击的时间。

“10 月 20 日凌晨，印军首先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全面进击。中国边防部队，在张国华主持的东段指挥部和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主持的西段指挥部指挥下，于东、西两段奋起反击印军。至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时，东段作战部队全歼印军第 7 旅，俘虏了旅长达维尔准将；西段作战部队，拔除了印军建在中国境内的 37 个据点。

“2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同日周恩来还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三项建议做出积极响应。并于 28 日，全线中止反击作战。

“然而尼赫鲁不仅拒绝了中国的和平建议，反而在国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积极备战。并又将 3 万印军置于中印边境地区。新组建的第 4 军军长考尔中将，也亲临一线，要同中国军队决一雌雄。

“11 月 16 日，中国部队在印军又一次发动全线进攻后，实施反击。仅仅 3 天，中国的作战部队，就打到了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附近，来势汹汹的考尔军长，差一点成为俘虏。至此，印军共被歼灭 3 个旅及另 3 个旅的大部。”^①

印方已经无险可倚，无隘可恃，中国军队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完全可以顺势长驱直入，追歼逃敌。印度朝野震动，了解边界

^① 参见《共和国要事口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4 页。

战事的印度人,此刻大多神情抑郁,十分担心中国人会不会打过来。而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最高统帅部表现了统观世界全局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睿智。毛泽东并不准备像1949年横渡长江追歼国民党军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出人意料地采取就地停火,退避三舍。随后,又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军,归还所有缴获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使全世界感到惊奇,也让世界和印度都感觉到中国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这怎么能说是对印度的“最后的羞辱”呢?真是看问题的角度和衡量是非标准的差异,使对同一事物的评价达成共识,真的是很难。

不过历史的积怨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特别是涉及像领土和主权这样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中印关于边界问题的分歧和斗争,也不是短时间内或用一两次大的战斗就可以解决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边界纠纷和冲突重起的威胁会依然存在。作为世纪的遗留问题,但愿能在新世纪里早日获得解决。

第六节 中苏同盟为什么会破裂

自1956年开始,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和外交政策等方面不断出现分歧。正是这些逐渐增长和日益扩大的分歧,最终导致中苏分裂,使中苏由同盟关系变为对抗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仍然处于基本良好阶段。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当时世界上最高军事机密和最高技术含量的“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发展到最

① 《中国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评苏联政府8月3日的声明》(1963年8月15日),1963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高点。两国关系的逆转则始于1958年。以后的关系在复杂的交往中曲折发展,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决裂。对1958年以后中苏分歧逐渐加深和中苏同盟逐渐破裂的过程的研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史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倒是比较实事求是,基本上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用词比较谨慎,留有余地,其态度是应该肯定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不足、不当之处。故有必要加以补充和说明。

一 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北京的前因后果

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北京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次访问的原因、内容和结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勾画的:“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北京的秘密会谈,是中苏双方首先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接着在美军黎巴嫩登陆问题上采取不同立场而产生分歧之后举行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最高级会议是为了解决紧急问题而匆忙举行的”,事后中苏双方“都没有披露会谈的任何具体细节”,“双方分手时,中苏关系可能比以前更坏”^①。随着大量材料的发掘和整理,我们可以拨开历史迷雾,把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北京的前因后果比较清楚地显现出来。

根据已经公布的资料,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问北京,与同年早些时候中苏两国在批判所谓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和反对美军武装干涉黎巴嫩问题出现的些微差异无关,完全是苏联1958年连续提出的两项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引起的:这年的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提出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建议由中苏合资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14、518、521页。

在中国共建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预算费用 11000 万卢布,苏联负担 7000 万卢布,中国负担 4000 万卢布^①,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长波电台是使用长波波段的发信台,是岸上指挥所对潜艇和远航舰艇编队实施指挥的主要通信设施。中国海军当时同样迫切需要建设这样一座长波电台^②。随着我国海军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海训练任务的增多,我军原有的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但因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主权,中国方面采取了慎重的态度。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就中苏共建长波电台谈判事宜报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彭德怀在报告中说,关于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在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方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③。6月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彭德怀的提议,但提出下列原则:建台的“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④。

①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

②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③ 彭德怀1958年6月5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注释[3]。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统一认识之后,彭德怀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正式答复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但是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欢迎苏联在技术与装备方面提供帮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可是,苏方对中国婉转提出要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没有重视,在7月11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共有。中方再次提出修改意见,明确建议电台由中国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自行解决的,向苏联订货;技术方面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①。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关于“共建长波电台”谈判尚未了结之时,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苏联此时提出这个问题,其手法与生意场上的交易很相似。当时,苏联在华军事专家出于好意曾不断向中方谈到现代海军舰艇的发展趋向和苏联试制新型潜艇的情况,建议中方向苏方订购新的海军装备。6月28日,根据这些专家的意见,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请求。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帮助制造核潜艇的问题之后,又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向毛泽东表示,苏联沿海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挥核潜艇的作用,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潜艇舰队,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②。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也就是说,你

①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② 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脚注。

们强迫我们合办。毛泽东把苏联关于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看作比建立长波电台更严重的问题,认为是苏联要同中国在军事上搞“合作社”,坚决拒绝。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国其他主要领导人主动约见尤金大使。在谈话中明确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的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请求。毛泽东指出,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对尤金大使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并明确要求“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①。

来华解决因苏联连续提出两项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利益的建议而产生的分歧,这就是1958年赫鲁晓夫急急忙忙从莫斯科飞到北京的真正原因。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代理外交部长库兹涅佐夫的陪同下第二次访问中国,就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两项建议向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说合资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并同意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②。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中国于1965年8月自行完成了这一长波电台^③。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之事,赫鲁晓夫一口咬定是不懂军事的尤金大使传达错误而造成的误会,苏联没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329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③ 杨国宇主编:《当代中国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有提过，“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①。这样的解释，虽然比较勉强，但由于苏联领导人坚决否认，中方当时还是接受了。

1958年夏季的这场风波，不论对后来的中苏关系留下了多大一片阴影，至少在当事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看来，还只是一片乌云掠过。7月3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一次会谈后，中苏关系已经晴空万里。直接利用这次会谈记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一书指出，在8月1、2、3日举行的第二、三、四次会谈中，双方在所有问题上的意见是“基本一致”或“完全一致”。会谈中，毛泽东、赫鲁晓夫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以至秘密开始的赫鲁晓夫第二次北京之行在公开中友好结束。中苏对外发表的会谈公报宣布：会谈中双方“进行了全面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②。所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时，中苏关系没有“比以前更坏”。不过，由于苏联提出的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有损中国主权，刺伤了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自尊心，使得中苏关系中的诸多新老问题此后变得复杂和敏感起来，实际上成为两国关系逆转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二 1960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关系 有过短暂的好转

赫鲁晓夫1959年10月第三次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在关于释放在押美国犯罪分子问题、台湾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叛

①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②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1958年8月3日），1958年8月4日《人民日报》。

乱问题上发生争论。1960年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进行面对面地激烈争吵。特别是1960年7月,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单方面决定撕毁已签订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这些都严重地毒化了中苏关系。但历史是复杂的,此后的中苏关系也不是直线恶化,至少在1961年大部分时间里,中苏关系没有出现如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认为的那样的局面:中苏关系“从有限的友好变成某种程度的敌视”^①。

1960年中苏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中国领导人,还是苏联领导人,都未必寻求并下决心自此破裂中苏同盟关系。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就在互相指责对方的同时,又在努力寻找共同点,最后相互让步、达成谅解和妥协。同年12月1日到12月9日,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在苏联访问。苏方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活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全程陪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和伊尔库茨克4座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冒着严寒和风雪,热烈欢迎刘少奇,表达了苏联人民希望中苏能够继续友好下去的强烈愿望。在访问中,双方领导人都说了许多友好和感人的话^②。大量历史事实表明在1960年11月到1961年10月近一年的日子里,中苏两党停止争论,中苏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受到损伤的中苏同盟一度有所修复。

政治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真诚欢呼苏联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1961年4月12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号”宇宙飞船在外层空间首次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06页。

^② 《人民日报》社论:《最亲密的兄弟,最伟大的友谊》,196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环绕地球飞行。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宋庆龄、聂荣臻、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科学家纷纷向苏联致电祝贺。中国各地人民非常振奋,奔走相告,热烈欢呼,《人民日报》接连几天予以报道。中国领导人的贺电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为苏联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赋予极大的政治意义。认为它开创了人类征服宇宙的新纪元,表明了苏联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再一次无可争辩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大大加强了中国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大大鼓舞了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①。8月6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二艘载人宇宙飞船,中国再次提高祝贺规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电贺苏联领导人,全国各地再次扬起欢呼声,祝贺苏联征服宇宙空间的新成就,欢庆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科技事业的高度发展。

外交上,1961年中苏两国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发生重大争论并在某些领域予以合作。这一年,除了中国在德国和西柏林问题以及世界裁军问题上同苏联采取一致立场,苏联在台湾问题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继续支持中国外,中苏两国在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上进行了密切而又有效的配合。1961年1月,中国允许一架苏联飞机一次性飞越中国领空,空运物资援助老挝中立派。5月9日到7月3日,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第一阶段,为协调立场,对付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了35次磋商。另外中国、苏联、越南和波兰四国代表团团长举行了56次磋商^②,从而保证了关于老挝问题的

① 《人民日报》社论:《人类进入宇宙的新纪元开始了》,1961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转引自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9、240页。

日内瓦外长会议的第一阶段获得成功。

经济上,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克服暂时困难和准备对中国继续提供经济援助。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苏联方面要通过贷款形式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①。中国方面接受了50万吨糖,但出于自尊和对困难估计不足拒绝了100万吨粮食^②。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的中苏贸易中方出现逆差,对苏联欠账28800万卢布。经过谈判,1961年4月8日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宣布:“苏联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暂时困难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5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谢的心情接受了苏联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方式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50万吨糖的建议,糖将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③。经济合作和科技合作也在继续。6月19日中国和苏联经济合作和科学技术协定在莫斯科签订。经济合作协定规定,过去苏联承诺援助中国的304项成套设备项目,除已完成的120项和基本完成的29项外,只保留66项,其余项目撤销。科学技术协定则在1954年中苏科技合作协议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没有具体规定合作项目。对于这样的谈判结果,中苏两国政府在6月22日发表的谈判公报中“表示满意”^④。鉴于中国严重缺乏外汇,这一年苏联还用自由外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② 同上书,第397、400页。

③ 《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年4月8日),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④ 《关于中苏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问题谈判公告》(1961年6月22日),1961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三 中苏同盟实际上结束于 1962 年

正因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中苏同盟关系在 1961 年有所修复视而不见,所以该书认定中苏之间“1960 年的公开与私下的论战,加上莫斯科撤回经济顾问和取消经济援助,实质上结束了中苏同盟,只剩下工作关系”^①。这是不够准确的。我们认为,说中苏同盟实际上结束于 1962 年,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1961 年 10 月中苏虽然在苏共 22 大上再次争论,但赫鲁晓夫只是影射攻击中国,并在遣词造句上注意分寸。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经济极端困难,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即使是亲自负责“1960 年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那些“主要声明”的毛泽东,也不得不降低斗争热情,对苏共领导的批评留有余地。1962 年 1 月 30 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对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②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1962 年 2 月 22 日苏共中央来信,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549 页。

② 这段话在 1966 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信,苏联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等批判苏联的内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37、46 页。

场的问题。信中指出：“应该停止就那些我们之间有不同见解的问题进行不必要的争论，不再发表那种不能缓和而只能加深我们分歧的公开声明。”4月7日中共中央复信响应，并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我们两党之间存在着某些原则性的分歧”，“是能够通过协商来解决的”。

以上中苏双方的主观态度和前文论述的1961年中苏关系有所好转的具体事实，已经证明了中苏同盟在196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仍然继续存在。尽管1962年4月至5月份，苏联煽动中国新疆大批居民外逃，重新恶化了中苏两国关系，但我们也应看到，直至1962年的7月至10月份中苏双方仍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遵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有关规定。作为中苏结盟“总纲”^①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规定是：缔约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侵略，并对有关两国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彼此协商^②。只要中苏双方还在贯彻，哪怕是部分地、十分勉强地贯彻中苏盟约的主要内容，我们就不能贸然断定中苏之间已经实际上结束了同盟关系。

例如，1962年7月2日，赫鲁晓夫在广播电视演说中，针对以美国为后台老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利用中国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准备冒险，致使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发表声明：“谁胆敢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谁就必将受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和整个社

① 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1950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②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1950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会主义阵营的毁灭性回击。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要有任何怀疑!”^①虽然美国总统肯尼迪早在6月27日就说过美国反对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之类的话,赫鲁晓夫的声明有马后炮之嫌,但这番讲话对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威慑力。说明此时的中苏同盟还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制止侵略”的功能。

台湾海峡危机暂时化解后,中印边界局势又紧张起来。中国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有关义务,事先向苏联通报了即将开始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②。1962年10月8日,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③。站在同盟立场的苏联随即作出反应。10月14日,赫鲁晓夫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表示:“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将和中国站在一起,”“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④。赫鲁晓夫这个表态,虽然与苏联在可以预料得到的并即将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希望中国这个军事同盟国在苏美对抗时,采取行动给美国施加压力,作战略上的配合有关。但从周恩来的通报和赫鲁晓夫的表态看,当时中苏两国都还是把对方作为同盟国看待的。

1962年10月20日、10月22日,中印边界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相继爆发。在这两大震惊世界的事件的初期,中苏同盟仍在发挥作用,两国互相声援对方。10月24日中国政府就中印边界战争发

① 《赫鲁晓夫谴责美国鼓励蒋匪帮准备冒险》,1962年7月4日《人民日报》。

②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页。

④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表声明,建议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①。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登中国政府声明,并配发社论斥责导致中印边界冲突的“麦克马洪线”是“声名狼藉的”,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是“从未被中国承认过”的^②。同一天,中国政府就古巴导弹危机发表声明,“完全支持”苏联政府 10 月 23 日宣布的“将尽一切力量粉碎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图谋”的立场,并表示中国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战争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③。

1962 年 10 月 25 日,中苏两国在同一天分别发表支持对方的正式文件,是我们现今能够发现的中苏同盟还在发挥作用的最后一个直接证据。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古巴导弹危机都在高度紧张之中,局势随时都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所以中苏两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发表的文件决不是普通的官样文章,完全可以视为中苏之间当时还保持着同盟关系的重要证据。

然而,中苏之间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在意识形态、国家主权和对外政策上出现的分歧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导致中苏双方在 1962 年 11 月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战争结束之后,再也不存在战略一致了。而到这时中苏同盟友好同盟才真正名存实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2 年 10 月 24 日),1962 年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

② 苏联《真理报》社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普遍和平》(1962 年 10 月 25 日),1962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报》。

③ 《中国政府关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关于战争挑衅的声明》(1962 年 10 月 25 日),1962 年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

第七节 怎样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外交新理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虽然没有列出专门的章节论述毛泽东在 60 年代提出的外交新理论：“两个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但在对这个时期各种历史事件的论述中却颇多涉及，而且有不少误解和不适当的评论。如说：“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北京试图抵销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①等等。这就使我们感到很有必要专门谈一下，毛泽东关于外交政策的新理论的准确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评价它。

一 怎样理解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理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在文中提到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但对这个理论的由来和基本含义却不太了解，自然也就难以作出科学的评价。而“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是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和平外交路线的重要内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1～232 页。

容之一。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对这个理论的提出、演变及其在中国外交实践中的贯彻作一概括的考察。

毛泽东于60年代确立的“两个中间地带”论是他40年代后期提出的“中间地带”论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上形成了以美、苏对峙为特点的两极格局。毛泽东在承认两极格局现实的基础上,很快提出独到的“中间地带”理论。他在1946年8月6日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是把英、法等西方国家也包括在“中间地带”里。后来,毛泽东接受了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理论,认识有改变,把英国、法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纳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

此后,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毛泽东在约六七年的时间没使用“中间地带”这个概念。50年代中期以后,他重提这个理论,同时又对它作了新的修改和发展。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时说:“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特别强调美国与其他西方大国如英国等之间的矛盾,同时,又把中国排除在“中间地带”之外,使之与苏联并列作为同美国对立的另一端^②。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强调,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后来,他还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这块中间地带^①。毛泽东说: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

总之,在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论述里,又毫不含糊地把英、法等西方大国也划到“中间地带”中去,而且突出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不用“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这个概念。因为,通过对日内瓦会议、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等重大事件的研究,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夺殖民地的矛盾更大些。他还进一步断言,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但是,当时他却仍然使用与美国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概念。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认为,当时已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

进入60年代以后,毛泽东因中苏两党发生公开论战而作出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的结论,并且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的理论。实际上,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预见,认为“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那是在美国控制下的团结,是在原子弹威胁下,要小伙伴们向美国交纳贡物、磕头称臣的团结。这种团结,“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②。的确如此,西欧

① 《环球同此凉热》,第4~5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1页。

联合和独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1956年,由法、德、意、荷、比、卢6国组成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1959年戴高乐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后,立即表现出强烈的独立倾向,不听美国的指挥。1963年初,戴高乐宣布法国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不再参加美国的所谓“多边核力量”计划,使美国十分恼火。1964年初,法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西欧联合独立趋向的增长,尤其是法国表现出的惊人的独立精神,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从此,中国领导人开始把法国作为西方大国中的首要联合对象,大力发展与法国的全面关系。通过法国反对美国控制和干涉的这一典型事例,毛泽东又引申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理论。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此后不久,在同日本社会党领导人佐佐木更三等谈话时,毛泽东又将“第二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

以上是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论并将其发展为“两个中间地带”论的过程。在“两个中间地带”论中,毛泽东把中国也归入“中间地带”(即“第一中间地带”)。这是由于中国已从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从国际统一战线策略上看,毛泽东从60年代初认定苏联为“修正主义”后,就开始把苏联也当作一个主要的国际斗争对象(仅次于美国)。在两个中间地带里,中国把“第一中间地带”作为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而把“第二中间地带”作为可以争取的力量。争取“第二中间地带”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的最大敌人——美国。因此,就“中间地带论”的本性来说,是一种为维护中国的国际

地位和更好一些的国际环境而不能不采取的防御性理论。其本质是和平的而非好战的。当然,这种理论在实践上也可能产生一个误区,导致外交策略的失误,这就是“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姿态,反而置中国于不利地位。这方面的教训也是值得重视的。

二 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

60年代末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在面临北部苏联百万大军陈兵边界强敌压境的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积极寻求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发展和改善关系,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70年代初,国际力量的大分化、大改组,促使毛泽东对几十年来主张的国际战略作出重大修改,提出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但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却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极重要的外交战略没有专论,而且有颇多误解和不当之词,这是一大缺憾。我们不能不在评论它时,予以弥补。

在中美关系取得重大突破的形势下,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一条线”战略。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可以从美国、日本、中国,经过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搞一条横线”,形成联合反对苏联扩张的统一战线。“一条线”外交的主要含义,就是为了对付苏联扩张主义,中国要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结成一定的战略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不再反帝与反修“两个拳头打人”,而是把苏联作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头号敌人。这在外交策略上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但这个改变并不是对美国本质和地位的认识上的根本改变,而只是斗争策略上的改变。

不久,毛泽东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外交战略思想。197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

三世界”^①。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会见卡翁达总统时，又向客人详细解释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学说的由来、背景等。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副总理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首次向世界公开而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邓小平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同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就更清楚地阐明了“三个世界理论”的实质。

三个世界思想是对战后流行的冷战战略和两个阵营理论的超越，反映毛泽东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并以此来观察世界、制定国际战略的倾向。这在战后的外交理论上是一个新创造。三个世界外交战略把美国和苏联视为第一世界，认为它们都在实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但是，毛泽东实际上已把苏联当作头号敌人。因为70年代以后，在美国实行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的情况下，苏联反而采取了战略上全面进攻的姿势，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认定是全球的紧张局势和战争危险的主要策源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规定了中国外交的主要打击对象、联合和争取对象，以及主要依靠力量，也为第三世界国家指明国际斗争的大方向。当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交战略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当时美国虽然也被列入第一世界，但毛泽东仍把它当作可以联合的对象之一。总之，提出三个世界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形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以此作为中国想当亚、非、拉第三世界各国的领袖的根据，甚至说这是中国想让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为中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601页。

国政策服务的工具”等是不符合实际的,站不住脚的。

进入 80 年代以后,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战略思考,对中国外交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1982 年 9 月,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这就实际上改变了过去依据“三个世界理论”确定的外交战略,而正式确定了新时期中国的外交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过去长期强调战争的危险性。而邓小平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新的判断,认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这使得在较长时间内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在和平的国际条件下,中国更应该集中精力加快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在肯定和平成为世界的一个主题的同时,又指出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另一个主题。为了加快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他提出了对外开放战略。这是对应新的国际形势而产生的一个正确战略,也是对毛泽东时代一度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左”的片面做法的纠正。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当代世界上已找不到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产品,也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拥有发展本国经济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所有的先进技术,即使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因此,世界各国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正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而制定的。

总之,中国在进入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后,外交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页。

政策上有了重大调整和创新。这是对新的形势、任务和历史经验分析和总结的结果。新时期外交政策虽然作了重大调整,但并没有抛弃建国以来始终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是以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科学分析和总结,使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第八节 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方法论评析

注重方法论,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大特色。相对应的,我们也专门列了一章,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一起探讨历史观和方法论。这里只限于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领域的方法论问题。此书作者试图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外交决策中意识形态与利益因素的作用等视角来分析问题,并得出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结论。我们对此书作者重视研究问题的方法这一点表示欣赏,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对其他各种方法论不太重视。但是,作者对方法论本身的解释并不都是完整的科学的。而当运用这些方法论解释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史实时,又往往出现我们难以赞同甚至不能不加以指出和批评的各种问题。

一 内政与外交间的关系应如何看待

在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演变过程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就是考察内政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以及外交对内政的反作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著名作者之一艾伦·惠廷认为:“除了外交政策这个独立的外部因素外,内政

在决定中国的对外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①他从这个视角出发分析了反右运动、“大跃进”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然而，他对内政的含义以及内政与外交之间的具体关系，却语焉不详。同时，他在运用这个方法论解释具体史实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他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作者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此书作者对内政的定义显然不太严密。比如，惠廷在前面似乎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内政之外，但在后面又把经济因素如“大跃进”的后果等作为内政^②。因此，首先必须把“内政”的含义搞清楚。我们认为，内政是同一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对应的整个内部事务，主要包括该国执政党的大政方针、重大政治举措、经济建设和政党关系等内容。

那么，内政与外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根本上讲，内政决定外交，外交为内政服务，而不是相反，由外交决定内政。同时，外交和对外关系又对一国的内政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影响又相当巨大。

内政决定外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外政策为国内政策服务。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都强调要有和平的外部环境。因为，中国革命和建设都需要有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根本目的，正是要实现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战略目标。国内政策出现严重问题时，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都要受到巨大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中国在国内进行“文化大革命”时，极“左”的内部政策导致对外政策的极“左”化。而极“左”的外交政策，使中国对外关系急剧恶化。特别是在1967年出现了火烧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处等严重事件。

然而，50年代末中国对内政策“左”的倾向出现时，并没有像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07页。

此书作者断言的那样,促使中国对外政策开始“好战”化。作者认为1958年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和马祖,导致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紧张加剧。这个判断本身是不准确的。我们已在第四节中论及。而且不能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内政决定外交的一个例证。因为,这在基本上是属于国共两党相争的国内事件,同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一样。当然,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时也有支援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把美国视线从中东转移等外交意图。讲内政影响外交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而不同的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是不相同的。有些内政如反右运动、“大跃进”等对外交的影响就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硬要去讲就显得很牵强。

第二,国家的内部状况决定一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旧中国执政者的腐败无能和国内一盘散沙的状况,决定了弱国无外交,决定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使中国在上世界上重新站立起来。但是,中国经济上极其落后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又严重制约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的作者提出外交对中国内政的重大影响作用,特别是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外交起源。这样从全球范围更广阔的视角研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此书作者的某些具体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需要深入钻研的问题,我们在另章有专门论及。这里只想指出,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层极其不信任。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是他自1957年以后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理论,特别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集中实践。这些是导致这场灾难发生的决定性内在原因。中国学者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内部原因,已经做了比较多的研究。

然而,对这场运动发生的外部原因,则较少予以注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则非常重视探讨“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国际原因,并提出了若干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比如,作者“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外交政策的起源”,包括:“把修正主义概念从中苏关系向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扩展(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头脑中),由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干涉和中国领导层关于如何对此事作出反应的争论,使“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时间推迟;这些事件与外交政策中的其他争议问题对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的影响。每一个方面都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复杂混合在一起的最好的例证。”^① 这个论断当中既有符合实际的有启发意义的成分,也有根据不准确的事实而作出的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判断。例如:

我们在肯定该书作者从国际角度分析十年动乱的起源的同时,还要对他们的以下看法加以商榷:第一,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他们还说,“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难以为继的外交困境问题上引开^②。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年,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并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周恩来总理1963年到1964年间出访亚非14国,十分成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恰恰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蒙上极“左”色彩后,中外关系包括中国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才迅速恶化的。第二,此书作者说,毛泽东本来定在1965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但这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被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打乱了,只好推迟到同年11月。作者还提出,1965年9月3日发表林彪署名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当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的文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23页。

^② 同上书,第230~234页。

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相辅相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两发“信号弹”^①。后者,即姚文元文章,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发动的明确信号,而林彪的文章只不过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一篇重头文章,并且也不是林彪本人的作品。无论从分析的角度,还是从史实考据的角度,都难以找到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的确证。姚文元的文章也并不像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标志,而只是一个舆论准备,至多不过是一条导火线。

二 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 和利益因素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对国家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都具有重大作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考察了这两大因素对中外关系特别是中苏关系的影响,得出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结论。但是,同考察内政与外交间的关系一样,此书作者的若干具体观点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这里加以指出和分析。

在评析该书作者的某些观点之前,有必要对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在对外关系中的地位略加说明。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主要指一国对社会制度的选择和维护,执政党的指导理论和思想,以及国家的宗教信仰等。新中国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选择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在全国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但不信奉任何宗教。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主权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等。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况之中,国家主权受到极大损害,中外政治经济关系很不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23、227、230页。

平等,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也没有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另起炉灶”,重新在世界站立起来,国家尊严、主权和经济、战略利益得到了根本保障。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外交状况是有根本性变化的。在国际交往过程中,任何国家一般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意识形态虽然起着重要作用,但不是影响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新中国始终把维护国家这几方面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地位,不允许任何外国,包括意识形态与中国相同的外国,损害本国的根本利益。但是,新中国决不向外扩张,决不做出损害别国利益的事情。新中国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来处理与各国(包括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关系。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着重讲了影响中苏关系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因素。他们的一个观点就是,1962年以前国家利益问题是促使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而在1962年以后,即在1962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发表宣言,而中国回应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之后,中苏争论的“重点转移到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这预示了一个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它由北京发起,向莫斯科提出挑战”^①。我们赞同作者前一观点,即认为60年代初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但不赞同后面的观点,即说1962年后是由于中国企图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导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因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1958年至60年代初,中苏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主权利益方面,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建立指挥潜艇的长波电台、搞“共同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第二,在国家战略利益方面,苏联单方面撕毁原先已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协议,并且要中国服从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46页。

苏美妥协、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要求；第三，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等涉及中国领土利益的事件中，苏联站在中国的对立一方的立场上说话；第四，1960年苏联单方面宣布从中国撤退专家顾问并撕毁有关的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建设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使中国经济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这些重大因素的影响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消失的。当然，60年代初以前中苏在理论观点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分歧，主要是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等。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1962年以后，中苏之间爆发了空前激烈的公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这确是客观事实。应该承认，意识形态因素在这一时期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作用大大加强，起码在表现形态上确实如此。这大概同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都特别重视理论上的正统性和纯洁性有关。当时苏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跟不上形势；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则开始把苏联共产党看作修正主义党，甚至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也已经发生质变，资本主义在那里已经复辟。

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发起的，并非北京挑战、莫斯科应战。就总体而言，争端反而多是由莫斯科挑起的。公平地说，两党对此都应负责任。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大论战，主要因为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企图调动各国共产党来包围和压服中国共产党。面越是这样，中国共产党越是要高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1961年12月至1962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作了有反修内容的报告。邓小平在会议上说：苏共22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反阿尔巴尼亚、反华，这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总暴露。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面临一个分裂问题,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和苏联的分裂。中国党要考虑自己的责任:究竟是随波逐流跟着已经被修正主义统治的苏共走,还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中共中央决定要高举马列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①。但是,高举反修旗帜,并不是讲中国共产党要取苏共而代之,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因为中共并不想过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而是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工作”^②。可是在苏联大举反华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不能放弃原则,必须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进行反击,进行一系列的理论论战。当然,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理论观点也不都是正确的。这里意识形态的考虑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两党进行大论战及论战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切实感到了苏联对自己国家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一,在1962年中印大规模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继续站在印度一边;第二,1963年苏联同美国、英国一起签署禁止试验核武器的条约,试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大国,拥有核战略防御能力;第三,1964年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苏联不断在中苏、中蒙边境集结重兵,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总观中苏分歧和论战的全过程,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威胁和损害,是导致中苏关系从50年代末开始的几十年里长期恶化的主要原因。既是50年代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也是60年代以后分裂的主要原因。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同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谈话中指出的:“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 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482页。

② 同上书,第490页。

题,这方面现在我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另一个重要论点是,1962年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②。此书作者在这里断言,中国从60年代初开始,不仅向外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而且要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甚至开始推行对外扩张主义。但是,书中并没有举出足够的事实作为依据。因此,这样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当时,中国确实在大力支持亚非拉国家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反帝正义斗争,但这主要是为了发展反帝反修统一战线以抵抗两霸进攻的需要,并不是想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更不是打算对外扩张。中国向越南及其他亚非拉国家提供了大量无私的援助,而没有以损害受援国的主权和其他利益为条件。当然,“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国的极“左”思潮也严重影响了对外工作,“四人帮”和康生等极力要把中国当作“世界革命的中心”,但这些极“左”做法并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方针,而且时间不长就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不久就得到了纠正。

尽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具有这样那样的我们难以赞同的观点,但他们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对中国对外关系影响的视角来研究问题的做法,我们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295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31页。

三 外交与外贸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外交与外贸之间的关系,是讲中外政治交往和经济贸易交往之间的关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虽然没有如同对上述两个方法论问题那样强调这两者间的关系,但也在一些地方有所阐述。比如,提到中日外交与中日贸易、中苏外交与中苏贸易,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外交对中国外贸的影响等。我们认为,外交与外贸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应当作为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角度,加以深入探讨。鉴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对两者的关系只是稍为涉及,并没有予以展开,我们打算在此比较集中地考察新中国对外关系中政治与经济贸易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外交与外贸关系时确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外交决定外贸,外贸为外交服务。建国之前,毛泽东就决定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向世界宣布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要倒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与这个重大外交方针相适应,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将中国对外贸易重点转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方针。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往来的重点一直是面向西方,而且受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很少。因此,实行外贸重心的转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为了外交上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做出极大的努力来实现外贸重点的东移。1949年底至次年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期间(后来又让周恩来总理赴苏),在与苏方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相条约》的同时,也就贷款及大力加强两国贸易关系达成协议。经过努力,1950年中苏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所占的8%跃升为29.8%,1952年又上升为49.9%,同年中国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

义阵营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72%，真正实现了对外贸易重点从西方国家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转移。此后，中国与苏联东欧等国的贸易额一直占绝对优势比重。这种重点的转移，在 50 年代初的特定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是有益的，虽然也有消极因素。随着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对外贸易重点又从苏联东欧阵营逐渐重新转回到西方国家。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提到了新中国把贸易与外交紧密联系的倾向，因而在书中写道：“有一项变化值得注意：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从 60 年代初开始一直在摆脱苏联和东欧，转向西方工业国家（当然美国除外）。”此书作者还注意到，中国对外贸易与北京外交政策的“总方向是一致的”^①。这种看法接触到中国外贸服从外交的实质，是比较深刻的。

新中国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时，同样遵循外交决定外贸、经济服从政治的原则。建国前后，中共中央根据“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决定把对外经济重点转移到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方面，但并不排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保持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因此，建国初期中国不仅同苏联东欧等国迅速发展了贸易关系，同美国、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没有减少，有的甚至比建国前还有所扩大。只是，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中国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与西方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才迅速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中美贸易关系自 1951 年起断绝，一直到 70 年代初才恢复。50 年代初，中国与西欧、日本等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一落千丈。应该说，西方的封锁和禁运，在客观上也迫使新中国不得不加速了既定的把经济贸易重点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转移的进程。这可能也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倡导者们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 258、259 页。

所始料不及的。

在 50 年代里,除了美国等少数国家以外,英、法等西欧国家和日本出于发展本国经济的客观需要,都迫切希望与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朝鲜战争结束后,英国、法国和西德等都要求放松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而中国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需要,也正在努力扩大对外贸易的交往面。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比利时等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同中国改善了贸易关系。特别是英国,还同新中国改善了外交关系,决定互设代办处。英国工党领袖又率代表团访华。这样一来,中国也以更积极的姿态促进同西方大国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发展。1957 年 5 月,英国冲破美国的阻挠,单独宣布放松对新中国的贸易禁运,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欢迎,中英贸易关系得以快速发展。

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分化西方阵营,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鉴于英国在西方国家中占据的非常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 50 年代把英国作为争取的一个主要对象。建国后中国长期保持香港的现状,在外交上正是出于这样的策略考虑。在 1954 年 7 月 7 日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美国已经相当孤立,而且这种孤立还会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分化很厉害,从日本到英国的中间地带国家被美国压迫得要死。中国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发展与英国和其他“中间地带”西方国家的关系^①。此后,中国政府就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来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英国的关系。

但是,改善同任何一国的外交和外贸关系,都是一件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做到的事。改善中英关系也不能仅靠中国单方面的努力。当时为了保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不准备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向中国的立场靠近,特别是英国坚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① 《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第 34~36 页。

台”的错误政策,不准备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针对英国的这种外交立场,新中国一方面拒绝英国希望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对英贸易往来上也保持不冷不热的关系。在某些时期,如1956年英国侵略埃及和1958年英国与美国一起出兵中东时,中国在贸易方面还对英国实行一定的制裁,取消一些贸易谈判和互访活动。当然,中国并不准备对英“贸易绝交”,而是采取了“冷而不断”的方针,待时机来临再主动恢复与加强中英贸易关系。采取“冷而不断”的贸易方针,是为达到既在经济上充分利用英国市场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又符合政治上分化英美、孤立美国的目的^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到,50年代中期,新中国在对日外交和贸易两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姿态,但在1958年却突然中断对日贸易。此书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外交方针由“和平共处”到“好战”的一个重要表现。作者的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美国,新中国一直坚持争取日本的外交方针。由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由于日本政界的状况,也由于美国的坚决干预,日本长期无法像英国那样以较大的步伐改善对华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积极促进对日贸易往来,特别是同日本民间的贸易往来,以贸易促外交,以民间促官方。1952年,中国政府同日本民间贸易代表在北京签订第一次中日贸易协定。但由于日本政府的极力干扰,这个协定只落实了一小部分。随后至1958年春,中日又签订了第二、三、四次贸易协定。1954年底至1957年初,日本鸠山内阁和石桥内阁都主张要推动日中关系的发展。但是,甲级战犯岸信介1957年2月出任日本首相后,公然打出反对新中国的旗号,并在上台不久就访问台湾,表示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他在国会答辩时提出,他主张奉行“政治与经济分

^① 中国驻英国代办处:《1956年商务工作总结》。

离”的政策,即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可以做一些贸易。可是,在中日贸易往来方面,岸信介政府也设置了障碍。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1958年春的“长崎国旗事件”。日本右派极端分子公开撕毁悬挂在长崎市的中日贸易办事处门前的中国五星红旗,污辱了国家尊严,而日本政府并不处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决定对日断绝贸易关系。中国政府的主张是,经济贸易不能同政治分离。岸信介的所谓“政经分离”是“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一把”。只要岸信介政府不取消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贸易就不予恢复^①。总之,1958年中日贸易的中断,是由于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结果,而不是由于中国政府改变了“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转而采取“好战”政策的结果。这样的因果关系是不应颠倒的。

① 解建群等:《贸促春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史(1952-1994)》上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1995年版,第118页。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的再认识

“文革”发生在中国，其影响却扩展于国外。很多西方学者为了破译十年“文革”的谜底，做了许多深入细致得让我们中国学者感到惭愧的研究工作，有关专著就达百部左右。《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就是这种研究成果的体现。无论在有关问题上我们多么不同意西方学者的某些观点（当然也有许多观点是我们所认同、欣赏和钦佩的），但我还是要对他们的这些严肃的学术成就表示敬意。

或许是立场和世界观的分歧，或许是研究范式及方法的语境差别，或许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实际情况（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心理和情感）不可避免的隔膜，或许是材料收集和使用的限制，尽管他们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对“文革”中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 and 结论，我们仍觉得牵强，有些则是有偏见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辨析和争论的必要，因为在争鸣中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也才能够帮助大家从“文革”的教训中学到更多应该学到的东西。

第一节 “文革”成因的再反思

自从“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有关“文革”的起因问题就一直困惑着很多人,也一直激发着许多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着矢志不移的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见解。这些见解见仁见智,观点不一,至今还没有(或许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有)一种为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结论。正像美国研究中国当代史和毛泽东思想问题的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所言:“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纭。”^①应该说,这种“众说纷纭”对于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深入研究和理解“文革”的起因,已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争鸣的必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家学者不可避免地也涉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想对他们的这些分析谈谈我们的理解,权且把这种理解叫做“再反思”。

一 “文革”发动者的主导因素 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关于“文革”发动者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或者叫主导因素,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一直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即便国内学者的观点分歧也很大。但国外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文革”发动者的主导因素是非理性的。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作者也基本上是持这样的观点。比如,作者认

^① 参见《大变动的局限性: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位》。伦敦:《中国季刊》1986年12月。

为：“尤其是在讨论毛泽东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也就是说，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其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①并引证一位中国学者的分析进一步说明这种非理性的根源是：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泽东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越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越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作者的意思是，毛泽东晚年关于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与其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影响，但有主导性影响的因素是阶级斗争，即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这种非理性的因素，而不是辩证法思想的变化这种理性的因素。而这种作为非理性因素的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毛泽东把凡是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一律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加以批判，甚至“不惜冒险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了40多年的政治机构以便从中清除他的这些敌人”^②。不管作者多么力图用客观的态度去分析这一问题，但仍然因袭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的分析思路 and 模式，即如同把中国革命胜利等同于几千年来王朝兴替、把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乃至一切政治动态的原因都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一样，也把“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这种政治偏见的确影响了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因的更深层的探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导因素是理性的。这种理性并不一定是说毛泽东对发动“文革”有多么充足和成熟的理论准备，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第87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也不是想说“文革”发动的主导因素不是作者说的毛泽东晚年关于阶级斗争思想的变化而去强调相反的一面,即强调是其晚年关于辩证法思想的变化方面,而是强调毛泽东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关注和对其实现方式的执著探索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他在发动1956年整风运动和后来的“四清”运动发现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后,不惜在73岁高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良苦用心所在。如果脱离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带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理想而不息奋斗的历程,而仅用“清除政敌”和其他一些非理性的所谓“心理因素”来解释“文革”发动者的主要动机,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尽管在“文革”中吃了苦头至今依然对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充满敬意,并真诚地把他继续当作自己的领袖来看待。

毛泽东为实现人民主体地位而奋斗的主线,就是对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之路即“民主新路”的艰苦探索。无论毛泽东在“文革”前对党内国内的形势和现状的分析多么不合实际,对当时既存的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判断多么不准确,但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良苦用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早就提出并一直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模式,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永不蜕化变质,永远是社会的公仆,使权力拥有者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使其永不脱离群众,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直接管理社会事务的目标,永远铲除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滋生蔓延的土壤。毛泽东在其晚年敢于用“文革”这种方式来正视和揭露他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存在的阴暗面,并矢志不移地力图寻求一种新的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反映了他作为人民领袖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气魄。尽管这种探索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而遭到了沉痛的失败,但我们仍然对这位历史巨人的胆略和气概肃然起敬。

事实上,早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开始十分关注这一

问题了,党外一些知名人士对这一问题也很关心。1940年5月至6月,身为“不官不党居第三者地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归国考察了重庆和延安后,深深为中共所开创的一代新风所打动,并预言“假如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正因为他从此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所以他也极其担心中共日后是否能倍加珍惜这种延安精神,会不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他坦言:“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有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① 1945年7月,为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苦苦奋斗了数十年的黄炎培先生应毛泽东之邀访问了延安。这位时年已68岁,深谙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亲眼目睹国民党内部腐败和延安中共新风的老人,在访问结束以后,对毛泽东感慨万端地说:我生60多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朝历代,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事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日久天长,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罢这一席耿耿诤言,郑重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那么,毛泽东所找到的这条“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

①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台北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163页。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负责”的“民主新路”究竟是什么呢？这条路究竟“新”在何处呢？

首先，这条路“新”在毛泽东试图找到一种不同于、并且能够超越苏联模式的中国式的民主方式。1956年2月苏共20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震动是很大的。就在苏共20大召开2个月后，毛泽东便及时告诫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并指出：“任何一个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旦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之上，而不是置身于其中；一旦脱离了群众，他就不可能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事情。”“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变成领导阶级和执政党。然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却为多方面的官僚主义所侵袭，面临着运用国家机器而采取任意专断的行为，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恢复命令主义和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因此，我们要避免陷入这样的泥坑，就必须更加充分地注意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决不允许哪怕是稍微的疏忽。”^①

其次，这条民主“新”路更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道路。毛泽东一生对完美社会主义信念和理想的执著追求决定了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只会采取否定的态度。尽管他在谈到斯大林的专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时，说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说明他对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约作用有一定的认可，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毛泽东准备在汲取斯大林教训的基础上，要去借鉴西方的议会民主形式。毛泽东历来认为，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总统制和王国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这些东西都是形式，而内容和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

^①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

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主要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虚伪形式根本不屑一顾,他要寻求一种自信能使他的人民真正实现当家做主的主体地位的新型民主形式。这种新型的民主形式在毛泽东看来离不开群众运动。革命战争时期对旧制度的破坏和对敌人的斗争,群众运动曾显示出了它巨大的生命力,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独创的有效的对敌斗争活动方式,并在这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革命首创精神的群众运动中,培育形成了中共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从这些成功的经验中获得了坚定的自信:既然群众运动可以成为战胜敌人的法宝,那么在革命胜利后,群众运动也一定可以成为战胜官僚主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真正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历史周期率的得力工具。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要跳出历史上兴勃亡忽的周期律的支配,必须坚持和发扬光大群众路线的传统和作风,坚持与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而须臾不可脱离群众。但毛泽东相信,坚持群众路线,使党和国家政权保持革命本色、永不蜕化变质的最有效方式,并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而是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靠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的“不断革命”,正像他所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以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①。

那么,毛泽东对由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这种群众运动的民主方式是否就满意了呢?或者说,他相信这种由中共自上而下组织领

^①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导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能达到他要实现的目标吗？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客人谈话中谈到：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1961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可能变颜色……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1953年冬到了1954年，斗了高、饶，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文化、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你们也是知道的，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这种思路，1957年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讲话中就有所体现。他反复强调说：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他说，我们党在1949年、1950年、1951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1952年以后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的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淡，当时在干部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一起吃穿住，现在就有些脱离群众了。他重申，国家机构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一贯的。1958年他甚至提出过废除工资制的建议，他说，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

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 20 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总之,毛泽东在其晚年的政治哲学思考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人民的国家主体地位如何实现的问题一直为他所深深关注并为之困扰着。一方而,他对建国后不久即开始实行的薪金制、工资制、按劳分配以及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都认为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认为是个人主义,认为与黄炎培、陈嘉庚等大批党外人士都极力推崇的延安精神不相符,应当取消;另一方面,在中共执政后,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确实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在滋生蔓延,这更为毛泽东所难以容忍。这两方面的因素使毛泽东感到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脱离群众的危险在日益扩大,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体的理想的实现日益艰难。他尽管发动全党领导了一个又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和大批判运动,但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自上而下的运动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随着他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无限扩大,随着他把官僚主义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等量齐观时,甚至最后把谁反对他、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和主张、谁不执行他的意见和主张,都作为敌我斗争的划界标准时,他越加感受到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感到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威逼、党和国家变“修”的灾难迫近,以至于他对现存的党和国家权力结构彻底失望了,认为这些权力机构已经蜕变为不仅不能再有资格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而且成了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对立物,成了必须发动革命加以推翻的对象。在这种情势下,他认为以前那种由各级党组织发动领导的群众运动已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了,惟有抛开这些权力机构,充分利用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

以自己的形象来代替他准备打倒的既存的党和国家政治机构的形象,直接将自己的意志诉诸于人民群众,发动他们与自己一起进行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大革命”,才能力挽狂澜,使他的国家和人民免遭资本主义复辟的灾难。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毛泽东所探索到的,他坚信既能避免斯大林的错误,又高于资本主义议会民主,能够一步到位地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理想,可以从根本上清除产生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源,能够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支配的“民主新路”,是这样一条道路:即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政治运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大民主”之路。而“文化大革命”便是这种“大民主”的最有效方式。

当然,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惊天动地的“大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实践证明,这种“大民主”并不是能超越原有一切民主模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新模式,而是对民主的反动;这种群众运动中的“大民主”权力是领袖人物赐给人民的权力,而不是人民出于保护自身主体利益的内在要求的权力;群众的这种政治参与也是领袖发动的政治参与,而非社会发展中自然提出的要求。毛泽东期望把他的祖国和人民带向他设想的幸福天堂,结果却使他们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这是一幕沉重的历史悲剧。但是,不能因为这场社会大实验的必然失败面得出发动者的主导因素或意图是非理性的结论,更不能因此而说“文革”是发动者主观随意的产物(比如认为是为了清除政敌消灭异己、为了搞个人崇拜、为了掌握更大更多的权力等等),即便发动者有这样一些非理性的因素,那也是主要为他的理性的社会实验目标服务的、发动者认为必需的、有的是迫不得已的政治手段而已。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其他一些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也许更能说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导的理性动机,他说:“毛泽东不仅为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而且还承担了掌权的重任,并努力缔造一个革命国家,

同时改造社会和经济^①。还说：“不管人们如何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着实令人叹服的是这位《民众的大联合》的作者在半个世纪后仍然以年轻人般的火热激情（也许带有年轻人的天真烂漫）孜孜不倦于确保中国人民的改革事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深刻，中国社会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辉煌灿烂。”^②

二 对外关系因素对“文革”爆发的影响和作用

在研究和考察中国对外关系因素对“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影响时，中国学者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即都认为中苏两党的论争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该书作者对此问题的思路是：中共建国初期的惊人成功，使党迅速控制了社会的各个阶层。1955至1956年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共以其精湛的组织技艺，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苏联用了好几年付出了无数生命才完成”的使中国五亿农民集体化，并很快完成了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使中共决定放松对国内的政治控制，而把注意力从意识形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企求通过发扬民主谋求全社会的凝聚和团结。就在毛泽东努力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时，出现了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国内也出现了群众集会游行的情况，一开始毛泽东对此的反应是汲取苏共和匈牙利的教训，用百花齐放和整风运动来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方法，解决党在执政以来已经存在的问题，缓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毛泽东改变了这种尝试，在随后的“大鸣大放”中，他发现社会上“阶级敌人”的数量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敌视程

① 《施拉姆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② 同上书，第419页。

度都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因此,他一方面用反右派斗争来打击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另一方面,力图用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来增加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而大跃进的失败以及这期间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和毛泽东对判定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震惊,不仅导致了中共最高层之间的裂痕,而且促使毛泽东的激进主义思想日益增长,首先表现为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这样,毛泽东从一开始的汲取斯大林的教训,转向关注于汲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即中共若不采取激进的、紧急的措施,中国将跟随苏联走上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并且这种急迫性还表现在毛泽东愈来愈想到自己的死,害怕若不动彻底的外科手术,和他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就将变成一场徒劳^①。也就是说,正是苏共的反面教训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生前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清除中共内部他认为业已形成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确保中国人民沿着正宗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应当说,这种分析是有相当道理的。有关中苏论战和期间中苏关系的研究以及中苏关系对“文革”爆发的具体影响的研究,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以来,又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1995年9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春明教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和1999年5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对这些问题都有新的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在此想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会那样轻易地改变了对斯大林集权独断、破坏民主和法制教训的理性反思以及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转而在激进的“左”倾错误道路上越

^① 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二篇“后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一章“中苏分裂的原因和后果”。

走越远,直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结局?我认为该书作者对此问题的阐述是不够的。

毛泽东轻易改变对斯大林教训的反思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批判和防止苏共的“修正主义”,很快改变对发展人民民主改善党的领导方法的探索转而发动反右派斗争,除了中苏两党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和事件上日益加深的齟齬和国内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整风运动中对中共的肆意攻击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外,最深层的原因是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对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从根本上是肯定的。或者说,当时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是在不涉及改革苏联社会主义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前提下的反思,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是在充分肯定中共借鉴苏联经验而刚刚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的探索。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必然的,但它确实很容易导致这种反思和探索,会因任何被认为是有悖于这一制度的外部事件和思潮而发生改变,而这些事件和思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常常会激化。

早在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 50 年代初,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和别的可以借鉴的模式,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把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样板,也自然看作是中国社会主义应当学习和借鉴的榜样。但在 1956 年前后,苏联制度内部长期积压下来的问题和矛盾逐渐暴露和被揭露了出来。首先是重工业发展比例远远超过农业和轻工业所造成的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紧张,继而是 30 年代肃反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接下来就是 1956 年 2 月苏共 20 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这一系列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开始对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重新认识和探索,并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当时,尽管中共中央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的方式,但对苏共 20 大敢于破除斯大林迷信的积极

方面还是做出了很高的评价。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苏联共产党20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英勇的斗争。”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批评是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在接见澳大利亚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也指出，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个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改变了1955年12月提出的应继续反对右倾保守的指导思想，而专注于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于1956年5月前后形成《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继而中共八大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于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方面做出了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规定。就在八大召开前后的6月和10月，东欧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中国也发生了农民要求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事件。该如何来认识在共产党执政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和解决的课题。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首次提出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只是其性质和情况与旧社会这些矛盾根本不同，它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以上是

中共提出“以苏为鉴”后所做出的一系列探索的成果。那么,这些探索为什么在以后的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逆转呢?毛泽东为什么会轻易放弃这些探索的成就而把注意力转向了与这些探索相反的方向呢?当然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如前所述的对斯大林教训的反思没有触动也不可能触动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共所有领导人所理解和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依旧是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政治体制。这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从理论上讲,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然有不相适应的方面,需要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需要采取正确方法来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而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应该如何去适应刚刚建立起来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当时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牺牲历尽千辛万苦才终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刚诞生就要对它进行手术呢,并且当时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病症。事实上,毛泽东和当时的一代共产党人对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极为自豪和兴奋的,谁也没有也不会怀疑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有什么弊端和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曾使毛泽东兴奋得彻夜难眠,他对秘书田家英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①。因此,毛泽东及当时的一代共产党领导人不可能把斯大林的教训归因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而找不到这个根本原因,就难以避免以后的

① 见逢先知等著:《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5页。

转向,甚至走向反面。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这样的分析: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而个人崇拜的原因则是小生产的经济基础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波匈事件以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反思中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即他的行动和政策,不只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认为,铁托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它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现代工业化国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缺点,专政过火了,这还是可以原谅的。斯大林并未破坏全部法制,他只破坏了一部分法制。拿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说,基础是所有制,是好的,上层建筑是政法等机构,是有缺点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体分析。如果说,苏联社会主义的官僚机构能建设社会主义,能打败希特勒,那这种官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我们并不为社会主义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辩护,我们承认有。但克服官僚主义,并不要求改变制度。《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铁托的结论作了更明确的回答:“斯大林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很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

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就必然成为妨碍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真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文章认为,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斯大林后期的错误之所以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而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只是因为他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这样,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就最终归因于个人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而不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毛泽东在论述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基本上没有谈到如何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着重强调的是反对主观主义,而方法是整党整风的历史传统。因此,八大结束后不久,当贯彻八大路线的一些具体的灵活政策比如允许个体经营和私人经营、市场调节付诸实施,有人提出对制约这些政策贯彻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单一公有制的经济体制要求变革时,就自然被认为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加上当时极少数右派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和攻击,促使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转而发起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以捍卫这一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在激进的“左”倾路线上越走越远,直至发展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应该说,1957年的整风运动不仅仅是毛泽东对匈牙利事件和非斯大林化的一种被动反映,仍应归于毛泽东对人民主体地位实现的一种探索,首先是基于本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考虑,他想在不触动党从苏联借鉴来的传统治国方式(即党通过单一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来

实现对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的领导,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基石而不可更改,认为这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中国人民建立幸福美好未来的根本保证而不能动摇,任何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的尝试都只能以此为上限)的前提下靠不断改变这种上层建筑的具体实现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来实现。中苏关系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到对制度本身的反思;开始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是归因于个人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于是在整风运动中主要就是要克服和避免斯大林犯过的这些方法和作风方面的错误;后来转向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反思,认为关键就是赫鲁晓夫企图改变这种制度,而在中国避免修正主义的途径是通过传统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来铲除修正主义分子,重振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来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即便在“文革”中毛泽东号召造反派打破了各级地方权力机构,他也决不是要真正改变单一所有制和一元化领导,而是找到这种领导体制更好的实现形式而已。实践证明,不改变高度集中的传统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再杰出的领袖有再良好的动机也只能最终走向其反面。

另外,关于对外关系因素对“文革”的影响,书中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前夕作为发动这场运动的重要理由之一的打倒罗瑞卿事件,是就日益升级的美越战争应做何反应一事因为罗瑞卿与林彪的意见冲突所致,该书作者对此似有误解,我已在另篇文章中有详细辨析^①。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关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从1961年起,美国对越南发动了所谓“特种战争”,支持吴庭艳傀儡政权。1964年8月,美国以所谓其军舰被袭击的“北部湾事件”为借口,把战火燃到了北

① 参见张志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若干史实辨证》。本书附录(一)。

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并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南部边疆。1965年春,更陆续派遣大量陆、海、空军参战。这一事件对毛泽东影响很大,使他放弃了徒步考察黄河的计划,开始准备打仗。此后,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多次在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这就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主要口号“反帝”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上的依据,使中国人民增加了美帝国主义威胁着社会主义祖国的急迫感,为当时的政治狂热增添了催化剂。也就是说,美国对越南不断升级的侵略战争,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火上添柴的作用。

三 “文革”诱因主线导析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与党对和平建设时期日益繁重复杂日益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领导方式要求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某人头脑中主观臆想的产物。但是,虽然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深层原因,并不是说一定会爆发文化大革命的。因为,同是这样的体制,为什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种现象,而唯有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会爆发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大动乱(其实是一场形式特别的极端的群众运动)呢?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是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最直接的原因是有毛泽东这样一个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领袖人物:高度集中的体制必然导致将党和国家的命运系于少数人直至毛泽东一人之身,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分析和估量,包

括在此制度基础上他想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的不可协调,还有使毛泽东最后采取“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他自认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谓“大民主”的群众运动形式,这一切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果毛泽东不是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如果他不是一位为了探索实现人民国家主体地位而无私无畏孜孜奋斗的人民领袖,如果他有为巩固自己权威和中国共产党统治地位而有意掩盖矛盾、回避矛盾的任何私心杂念,就不可能会有“文化大革命”。所以,离开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问题的结论,离开他在坚持而不是改革这种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上对人民当家作主、对人民群众国家主体地位的实现形式的探索这条主线去探讨“文革”的诱因,是困难的。不管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1956年前后取得了多么大的成果,也不管他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有多少可取之处,但他的思考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予以超越。他那样极端地厌恶和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认为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决不意味着毛泽东要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抛弃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体制而另辟蹊径(像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所做的那样),相反,他认为赫鲁晓夫的“罪行”恰恰是离经叛道,是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所创建和发展的正宗的社会主义,而中国要防止的正是这种离经叛道的“修正主义”,所要维护和捍卫的正是这种正宗的社会主义,这被当作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至此,沿着毛泽东对实现人民主体国家地位、对“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防止中共重蹈历代王朝“兴勃亡忽”历史覆辙和苏共修正主义覆辙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探索主线,应该可以理出从1957年整风运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基本脉络: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群众国家主体地位的根本制度保证,这种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美好的、最能集中代表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即高度集中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制度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党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是党集中代表人民的利益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文革”前夕当毛泽东怀疑党代表人民利益的可靠性时,他就把自己变成党的化身,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他的一元化领导)。而保证党和国家权力机构能切实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凌驾于社会之上、不出现像苏联那样的新生资产阶级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民主。他认为,这种民主既能克服斯大林的错误,也能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所找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民主。这种民主机制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什么事情都要通过大搞群众运动来解决。基本制度、领导方式、监督机制,以上这三个方面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不能改变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就变成修正主义了,中国人民就丧失了赖以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了。从1956年到1966年,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的政治生活在不断发生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变革,但以上三个方面并没有受到实质上的触动,仅仅是在形式上变得极端了一些罢了。在“文革”初期计划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仅是被打乱了、失控了,而不是被变革了,重建后反而更加集中了;领导方式只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监督机制只是从过去的靠各级党组织发动的群众运动变成了由毛泽东个人直接发动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和管理现代社会的要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而毛泽东发现了这些问题但却没有找到(也许在当时也不可能找到)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于是就试图用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的办法(即由认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般群众运动方式强化为觉得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用他自己的英明正确的领

导来纯洁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国家主人地位的实现。

其实,1956年前后,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已经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想发动群众帮助中国共产党来整顿作风,想通过整风运动来更好地重振全党的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以解决党在执政以后与人民群众日渐脱离的问题,以巩固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促使共产党更好地代表人民实现对社会的领导。结果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现社会上有大量的阶级敌人时刻想把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国际上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更加重了他对这种危险的忧虑,于是发起了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想通过政治上的攻势和经济上的成就来巩固人民政权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大跃进的后果和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交恶,促使毛泽东把注意力日益集中于阶级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彭德怀上书而引发的党的高层争论,更使毛泽东把这种阶级斗争从党外引进了党内,认为党内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继续,而且是更严重更危险的阶级斗争。随着1962年毛泽东这种阶级斗争理论在党内居于支配地位,“左”倾实践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不归之路了。为了进一步清除被认为是存在的党内党外大量的阶级敌人,于1963年发动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当运动中发现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当毛泽东发现中央一线领导人在经济调整中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背离他所坚持的正宗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些政策使他觉得党和国家权力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并且发现中央一线领导人与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冲突越来越大时,他判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不仅已经渗透到了党内,而且重点在党的最高层,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出现了“吸工人血”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

级分子”，他们已经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变修的危险，所以运动后来的重点就变成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发现阻力很大时，毛泽东更加感到党和国家变质变色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人民的国家主权就要被这些党内新生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吸人民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被这些修正主义分子所复辟，他必须要在生前找出从根本上解除这种危险的途径和方法。而“文化大革命”就被认定是这样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是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分析和判断失误，并因此而采取了错误的方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毛泽东之所以想发动就能够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关键是因为体制的保证：高度集中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和“人治”色彩浓厚的一元化领导机制，使毛泽东这样的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的领袖人物，很容易在受着浓厚封建传统政治文化残余影响的党内党外借助个人崇拜树立起自己集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于一身、可以号令一切的最高权威，很容易摆脱宪法、党章、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制约，可以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意调动和支配国家的一切物质资源，可以利用一元化领导机制随意支配各级党的组织、各级国家权力机构、各种舆论工具，尤其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毛泽东调动军队全力支持他的战略部署。这样，毛泽东就拥有了可以发动“文革”的全部条件。而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一篇貌似普通的大批判文章，就成了这场运动的导火索。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第二节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谓“政治联盟”之辩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对“文革”的剖析和叙述,力图按照“文革”中形成的多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来展开其主要事件及其整个进程。这种分析方法与恩格斯关于创造历史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精辟见解有着相似之处,有很多分析和评论也是有说服力的,比如对“政治体制的重建”即“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过程的论析、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化”的揭示和解剖等都让人耳目一新,给人的启发很大。但对毛泽东赖以发动“文革”的所谓“政治联盟”问题的说法,尚有辨析的必要。

该书作者认为,毛泽东为发动“文革”而从1964年起开始铸造自己的权力基础,并于1966年“文革”爆发前形成了赖以发动“文革”的所谓“政治联盟”(political coalition)。这一“政治联盟”有三支力量所组成,“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和经济政策而非人为操纵所产生的,这些政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disenchanted)的人。第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江青的指挥下,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国防部长林彪在部队中组成的。在1964年至1966年间,这三支力量有组织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在毛的领导下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地位牢固的党的机构”^①。对这样的论断,我们认为大有分析的必要。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21~122页。

一 没有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联盟”

要发动和领导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空前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发动者确实需要拥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和政治能量。在前面分析“文革”成因时已经阐明,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后,随着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及党内民主的破坏,本来就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并掌握着党政军最高权力的毛泽东,到“文革”爆发前已经拥有了足以发动这场运动的绝对权威。即便是中央一线领导人与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议,即便是后来被毛泽东称作“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和被称作“阎王殿”的中央宣传部,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谁也不敢对毛泽东的任何指示表示反对。而对毛泽东做出的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战略部署,虽然他们“不大清楚、不大明白”为什么和应该如何去搞这场运动,虽然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但党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和党的各级领导者,一开始也是想极力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来搞好这场运动,而不是要对抗这场运动的。所以当时的客观形势并不需要毛泽东在1964至1966年期间去组织一个由他领导的、由江青为首的“激进知识分子”和林彪的军队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这三支政治力量所组成的政治联盟来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反对地位牢固的党的机构”。他所需要的仅仅是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突破口来引发这场运动,并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能接受他的决定,从而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经毛泽东批准的在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为发动这场运动制造了时机和意识形态领域这一突破口;林彪、江青两集团在此期间为了其政治目的相互利用,揣摩并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引发这场运动并使其合法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红卫兵运动则使“文化大革命”的星星之火燃

成了燎原之势。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政治联盟”的话,林彪和江青在此期间的相互勾结和利用倒是有这样的迹象,不过确切地说这也很难叫什么联盟,充其量只是一时的政治勾结而已。这一时期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的标志就是在1966年2月江青利用林彪提供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机会所做的讲话,即后来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份纪要实际上是针对当时彭真主持拟定的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二月提纲》针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后来经张春桥挑拨被毛泽东认定是針對自己的,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对这个提纲的态度。就在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研究和拟定《二月提纲》的同时,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从上海来到苏州与林彪密商。1月22日,林彪口述了给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由当时的“林办”主任叶群电话传达到北京。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1966年2月2日至20日由江青出而,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很奇特,召集会议的江青既无军职也无党政领导职务,只能用林彪个人委托的名义。会前连解放军总政治部都不知道要座谈什么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江青发表了她的一套文艺观点和对文艺形势的估计。会后,参加会议的成员整理了一份准备向总政治部汇报的会议纪要。江青看后很不满意,又把这份纪要交给并无军职的张春桥修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专程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修改。毛泽东对这个纪要稿先后修改过三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

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批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纪要》判定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毛泽东支持江青搞的《二月纪要》而不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反映了他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而这个纪要是继姚文元的批判文章点燃运动的导火索之后,为“文化大革命”的火焰从文艺界烧起而提供的历史和理论的借口。后来江青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她当时找到林彪,是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要利用林彪在人民解放军中的特殊地位实现自己的野心;而林彪也是想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以获取毛泽东的更大信任,以得到更大的权力。由此看来,即便是林彪与江青两集团之间也不存在什么政治联盟问题,他们只是为了在“文革”中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在特定的利益比较一致的时期所达成的某种默契和政治交易而已。

至于谈到青年学生,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群体。他们反映着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不同利益要求和各种矛盾,从来没有结成过统一的组织,甚至仅北京一个地方的红卫兵就有三个司令部。他们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其他政治力量达成什么政治联盟。毛泽东要发动青年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要去组织他们去加入什么政治联盟,凭借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兼之长期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锤炼,只要有毛泽东的一个号召、一

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大批青年都会义无反顾地去追随自己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便是赴汤蹈火也会在所不惜。另外,林彪江青这些阴谋家集团也不会屑于去和青年学生结什么政治联盟,他们只会去利用年轻人的激情来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文革”后来的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青年学生之所以能听从林彪和江青的煽动去掀起造反狂潮,关键还是他们认为这两个人由于其特殊地位和关系所代表的是毛泽东的指示和精神,而决不是在结成什么政治联盟之后为达到发动“文革”的目的而有意识采取的行动。

二 对参加“文革”最积极的群众的组成及其动机的评论

作者在谈到所谓“政治联盟”中的群众基础时,强调群众中造反最积极的那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机,除了“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年代中期似乎正困扰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但毫无疑问,这些人“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运动而带来的地位和权力”。这些人主要由中国社会中那些自认为“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所组成,而这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和幻想的破灭主要是由60年代实行的教育政策和亦工亦农制度造成的,亦即,一方面,注重家庭成分和政治表现而无视学习成绩的教育政策,使那些出身于干部和军人家庭的学生成为幸运儿,使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从中获益,而使出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成为受害者,因为他们上重点中学、上大学和安排理想工作的机会减少了;另一方面,本来是为了缩小工农差别的亦工亦农政策,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社会紧张;因为许多国营企业把原本属于正式工的工作分配给亦工亦农制的工人,首先就产生

了这部分“深感不满的工人下层阶级(他们虽然与正式工干同样的活,收入却更少,更没有工作保障)”。其次,使得工厂里的学徒工因为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干的许多工作而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升迁的机会。还有就是即便是正式工人也面临着被送往农村变成合同制工人的危险。所以,“当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爆发时,由于群众性大规模抗议受到鼓励,这些团体的愤懑和个人的痛苦就形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燃料”,“红卫兵运动中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出身‘较差’或‘一般’、感到他们往上爬的机会逐渐减少的学生以及在经济分工的阶梯上位置较低的工人一起向党的机构发泄他们的愤怒”^①。换句简单的话说就是,该书作者认为:1966年“文革”爆发时,最积极的造反者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深感不满的工人下层阶级”,而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机除了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之外,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参加这场运动而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权力。

不得不说,这样的分析和结论有些过于想当然了。

首先,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那部分群众,并不是作者所说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亦工亦农制的工人(即所谓“工人下层阶级”)。为“文化大革命”鸣锣开道的红卫兵运动,所参加的青年学生不仅不是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相反是只有所谓“红五类”才有资格参加的,也就是说,是只有出身好的学生才能加入的红卫兵组织。无论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还是其主要骨干力量,都是作者所说的60年代教育政策的幸运儿和受益者,例如,最早建立红卫兵组织并写信给毛泽东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成员,基本上是革命干部子弟。按照作者的逻辑,他们是最不愿意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积极参加“革命造反”行动的,因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会失去既得的地位和权力,但事实上,他们恰恰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26~129页。

是红卫兵运动中最积极去冲锋陷阵的部分。而那些作者认为最应该积极参加红卫兵运动、最应该积极造反以从中改变自己社会地位和获得权力的出身不好的学生,不仅不是红卫兵运动的主要骨干力量,而且他们在运动开始时连参加红卫兵组织的资格都没有。尽管中共中央在当时并没有对有关如何组织红卫兵和对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出身等问题做出过正式的政策性的规定,但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和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氛围,在以家庭出身的阶级性纯洁为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红卫兵组织自己从一开始都规定,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能加入,才有资格当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历史不清”的学生是不能当红卫兵的。但他们常常跟在红卫兵的后而去参加扫“四旧”、贴大字报等活动,当时这些学生被称作“红外围”。

1967年初,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爆发的所谓“一月革命”,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更大规模动乱的开始,“文化大革命”从此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它也是中国工人造反派登上“文革”历史舞台的标志。当时上海有两大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一个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另一个是“上海工人赤卫队”。虽然没有对当时参加这两大造反派组织的人员构成做过详细调查,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两大造反派组织的最积极的骨干力量不是亦工亦农制的工人(即所谓“工人下层阶级”的临时工),而是国营企业里的正式工人。作为当时力图保护中共上海市委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应该不在作者所说的企图通过参加造反而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和更大权力的最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者之列,这里暂且不加辩说。就拿一心想造上海市委反并夺取上海市委权力、阴谋在造反中攫取地位和权力的“工总司”骨干分子而言,他们也不是作者所推断的“工人下层阶级”。“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工总司”的其他发起人和骨干潘国一、陈阿大、黄金海也都是国营厂的正式工人,而不是亦工亦

农制的工人。在工人造反派登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之后,参加各种造反派组织的工人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国营企业的正式工,其中一些最激进的分子不可能是那些从农村被招进企业的“工人下层阶级”。毕竟这些亦工亦农制工人的人数及其在企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是很有限的。或许他们中有些人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期望通过参加造反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发泄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愤慨,这在任何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中,都是正常的现象。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不可能替代国营企业的正式工人而成为工人造反派的骨干和主力军。

这里需要指出,当时临时工是起来造过反的,而且也成立过自己的组织。但是,很快就被中央宣布为反动组织,而遭到取缔。可见他们不是依靠力量,而是被视为异己力量。

其次,对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和群众来说,他们的动机和初衷是真诚、纯洁和善良的,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保卫自己拥戴的伟大领袖和老一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也是为了使自己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以使自己成为经得起革命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积极参加造反的。多年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氛围,使那一代青年的思想变得极为单纯和幼稚,他们无论如何也还没有学会盘算着通过参加造反会获得什么地位和权力。这种念头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有谁对他们做出这样的解释,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亵渎。无论我们对红卫兵运动做出怎样的结论和评价,但我们没有权力对那一代人为了理想而献身的真诚和热情抱有不敬,更不能任意曲解和否定这种真诚。因为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历史,而不能对历史作主观的不符合事实的任意解释。而当时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因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就常常跟在红卫兵后面参加一些造反活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是出于理想的初衷,只是为了清算自己出身的“原罪”,他们有时会比出身

好的学生表现得更为积极,某些做法更为极端,以表现自己的革命坚定性,表明自己的界限分明,以获得红卫兵组织的信任,期望能像出身好的学生一样能早日成为一个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也许他们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但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奢望能够通过参加造反可以发泄对党的教育政策的愤懑,可以借此获得好的地位和大的权力。这在当时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排除人的思想会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很多人会随着最初的理想主义破灭而转变,也确有少数人企图利用造反来达到个人私利,这种情况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是难以避免的。但这种别有用心的人确实是极少数,他们不能代表那一代青年。

三 林彪与“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应作区别

尽管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由于林彪所处的特殊地位,他的极“左”言行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确实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但把林彪与“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放在一起作为“文革”中的同一个政治力量是不妥的;而对“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所犯的一些错误,也有必要与林彪的阴谋活动区别开来。从企图利用“文化大革命”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势力、阴谋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以达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相同的政治动机而言,把掌握“文革”指挥机构的林彪集团与“四人帮”集团放在一起作为“文革”中的一支政治力量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尽管他们二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也时有发生,但就他们在“文革”中政治动机、所起的作用以及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来说,这两个集团是基本一致的。

的确,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毛泽东赖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正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早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即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

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不久就在军队中大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军队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毛泽东对林彪及其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对其思想的忠诚也日益信任。“文革”开始后,人民解放军在贯彻支“左”命令的过程中,也确实试图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支持“左”派群众,尽快完成夺权斗争,并维持社会秩序。但他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如何在多如牛毛的群众组织中,分清谁是“革命左派”和谁是“反革命右派”的问题。实际上,人民解放军是在承担着一项既要帮助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又要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这样常常是自相矛盾和冲突的棘手使命,在二者之间不得不做出取舍时,军队为了稳定局面宁愿去支持“保守的”或不太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而对肆无忌惮地冲击国家和军队机关的激进造反派进行镇压,并为受这些组织冲击和迫害的地方党政干部提供“防空洞”,这就不可避免地违背毛泽东关于“支左”的命令,犯压制所谓“革命群众”的“错误”。可以看出,这些“错误”与林彪的阴谋活动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有些“错误”也是林彪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上,当“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全局失控的状态之后,就是毛泽东也没有办法让人民解放军完全按其战略部署行事,更何况林彪。鉴于毛泽东在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中的威望,人民解放军只能是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工具,林彪在“文革”中的阴谋活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去对军队施加影响,而决不会相反。换句话说,林彪在“文革”中只能扮演被毛泽东利用的角色,即便没有林彪,毛泽东也会找到其他人来代替他的作用。而一旦发现林彪有企图利用解放军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目的的用心时,毛泽东是不可能容忍的。当时报刊上曾有一个提法,即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毛泽东立即敏感地指出: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林彪很清楚,即便他自己在军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与毛泽东决不可同日而语。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自己对解放军的指挥权也是毛

泽东授予他的，他的任何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只能依靠其集团中的个别分子加以实施，而不可能支配整个人民解放军跟着他的指令行事。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从毛泽东的指示中把林彪当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时，林彪对军队的支配和控制力也许是很大的，这种情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表现得比较突出。在这次会议之后，一旦毛泽东发现并决心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时，只要他在南巡中同地方党政军领导“吹吹风”，林彪身上所有的光环和影响力就即刻消失，人民解放军最终只会绝对服从毛泽东的指挥。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途中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说得很清楚：一九七〇年的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底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底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几次不同。前几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吗。什么“顶峰”了，“一句顶一万句”了，你说过头了吗。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现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毛泽东9月12日结束南巡返京。林彪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最后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罕。而人民解放军依旧岿然不动。可见，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

下,把林彪同人民解放军等同起来,看成一个政治力量,也是不对的。

四 “文革”实际进程是当时多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从1967年开始超出了发动者的预料,这一结果确实是由当时形成的多种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所致。这使人联想起恩格斯在分析历史事变时关于“力的平行四边形”的精辟见解: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都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形成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中,有六个决定和左右“文革”命运和结果的政治力量,它们是: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掌握“文革”指挥机构的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人民解放军;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群众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61~462页。

织；以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全国各民族的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这六种政治力量本身并非统一和始终一致的，其间的关系更是复杂多变的。这只能是一种大体的区分。

作为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既要坚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要把运动控制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当时他是希望人民解放军支“左”之后，能迅速控制“天下大乱”的局势，恢复“革命”秩序，让造反派组织在军队帮助和支持下，尽快达成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尽快完成全国全面夺权，尽快把广大“革命干部”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尽快在全国建立革命委员会，并逐步恢复党的各级组织。

人民解放军在此时承担着既要“支左”，以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和各项指示，又要维持社会和经济秩序这样常常是相互冲突的使命。但是军队为了维护稳定，时常宁愿去支持保守的造反派组织，而对肆无忌惮地冲击国家机关和军队机关的激进造反派组织进行打击，并为受这些组织冲击和迫害的地方党政干部提供“防空洞”。这就难免有违毛泽东尽快完成全面夺权的意愿。

各地造反派组织一旦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阶段，其动机与当初参加“文革”时的动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更乐于打倒尽可能多的干部，以使其在夺权中享有更大限度的自主权，尽可能在“三结合”中得到参加革命委员会的更多席位，掌更多的权。因此，他们更加无法无天的造反和夺取行动，不仅与部队和广大干部的冲突日剧，而且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和不安。更让毛泽东担心的是，这些造反派组织不仅不去设法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反而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派性，以致酿成了势不两立的武斗，很多派别之间甚至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就促使毛泽东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等办法，逐渐削弱了造反派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造反派作为一种

力量,始终并未消失。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虽然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是反对破坏和混乱,特别是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的。他们为维护党的领导,维护国家的尊严和社会的正常生活,进行了千方百计的斗争。1967年的“二月抗争”是一次集中表现。他们是党和人民的脊梁。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绝大多数干部是忠于党和人民的,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在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形成了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终于战胜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保证了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极力想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来打击陷害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并极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势力,图谋最终夺取最高权力。他们惟恐天下不乱的阴谋活动,加剧了其他各支力量的分歧、矛盾和冲突,是使“文化大革命”得以延长十年之久的主要因素。当然毛泽东是以上各种政治力量中起协调和控制作用的主导性力量,尽管他也有一段对局势失控的时候,但从总体上说,十年的局势始终在毛泽东的把握之中。

正是由于这多种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和一些政治力量内部各种利益、意志的分歧冲突和交互作用,才使得“全面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进程显得错综复杂,充满了艰辛和苦难。而其后的“文革”进程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是与这多种政治力量的嬗变直接相关的。

第三节 关于“文革”后果的评价

中国学者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时,一般都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述的,即在思想信念方面造成了空前混乱和信仰危机;在政治上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机构的严重削弱;在经济上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在文化方面造成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严重摧残;在社会上造成了道德风气的严重毒害,……“文化大革命”至少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倒退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在论及“文革”后果时也基本上都谈到了这些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应该说同国内学者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是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他个人的权威使他有能力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控制它们。随着群众运动逐渐演变成暴力、派系斗争和骚乱,毛认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能拯救国家的观念被证明完全错了。毛本希望文化大革命能成为他对中国和马列主义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贡献,结果倒成了他晚年的重大错误”。“由于毛具有操纵中国的能力,所以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虽然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破坏不如大跃进严重,生灵涂炭的情形也不如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日本侵略时期和共产党革命时期,但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事业的中断、精神的崩溃以及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都具有毁灭性。这场运动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恐怕要几十年才能消除”^①。这些看法应该说是具有相当见地的。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16页。

一 “文革”对中国社会的暂时影响和长远影响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把“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后果,分为暂时的和长远的两种。

作者对“文革”造成的暂时的有形的后果分析得比较具体细致,涉及的方面和领域也很全面,并引用了很多当时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比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既涉及了农村的农业生产情况,也分析了城市的工业生产情况,并通过引证统计数据,得出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对农业产量的影响还是对工业产量的影响,在范围上都是有限的,在持续时间上都是暂时的;并且这些影响肯定远远不如1958年“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严重。与国内学者相比,作者对“文革”时期经济情况的分析,给予肯定的成分要多一些,尤其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以及对“文革”时期经济的影响的分析是专业的、也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与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对科学文化教育、对党的组织机构和国家政权机构的破坏,认为这是“文革”有形的即看得见的后果中更为严重的恶果。这些后果中有许多是无法得到补救的,比如大量历史古迹、宗教建筑和文物的被损和破坏,比如科学、文化、教育、党、政、军领域里被迫害致死的精英等。然而,除了这些直接的后果之外,作者还从权变的角度分析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国政治权力分散的格局及其对1969年后中国政局的影响(这是国内学者关注较少的一个方面)。作者认为,1966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所形成的政治权力分散格局,影响了“文革”后7年的权力斗争及其走向,直到1978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这种影响才被清除。作者谈到:1966年至1969年的事件“产生了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机构的爆炸性结合。中央和省领导分成几派:资深的党的官员、解放军军区和主要部队的指挥

员、群众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新上台的低层干部”。“这种权力分散的格局支配了(文化大革命)后7年的中国政治。首先开始的斗争是文职官员与军队领导人针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作用问题。林彪要使军队控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年他坠死之后,力图让人民解放军脱离文职事务的努力收效更好。……而在党的九大选出的政治局里,权力分散更为明显,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官员(如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和指挥者(如江青)、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军官(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层干部(如华国锋),为继承毛泽东的权力而不可避免地展开严重的斗争。总之,1966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带来了七八年动荡幅度较小的岁月,直到1976年10月清洗‘四人帮’和1978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被清除”^①。这种权变分析与第二节谈到的多种政治力量影响“文革”进程的分析有些类似,只是在这种权变的分析中没有提及毛泽东这一最具决定性力量的权力变量,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缺憾。因为“文化大革命”后7年各种权力变量之间的嬗变与毛泽东的意志是有直接关系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影响,作者的结论非常谨慎,认为这种影响目前来看“仍不明确”。不过他还是比较精辟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持续的、目前仍然广泛存在着的后果: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和中国年轻人严重的信仰危机。“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派系冲突严重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斗争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16页。

的俘虏。”而“文化大革命”使年轻人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因为这场革命中止了他们正常形式的学校教育,这意味着他们今后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得异常严峻。“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对此,作者进一步分析说:“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与缺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对其他人,尤其是对那些1966年前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定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和具体政策。”^①关于年轻人的信仰危机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信仰危机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只是局部的和暂时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尽管使当时的不少青年人对过去意识形态中的许多东西产生了怀疑,致使一部分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一时间失去了信仰,但也促使更多的青年人以更加理性的头脑去重新反思: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党应该怎样正确地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对真理的探索。也正是得益于这种难能可贵的理性反思精神,才会有不少年轻人积极地投身到了以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会有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学习和再认识,才形成了探索中国全新发展道路的雄厚的社会基础和积极的改革动力。所以,对长远影响的分析也应该是更全面的,更辩证的。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16~218页。

二 “文革”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应作深层反思

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和评价其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时,很多人习惯于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的探索偏离了党的八大所提出的正确路线,并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走向极端的结果。而这场“十年浩劫”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至少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倒退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沿着八大提出的路线走下去,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步伐就会比现在快得多,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就会比现在高得多。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作为反思这场运动的初步成果,这种评价是比较容易被接受,也是有相当充分的事实根据和道理的。但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而应该对“文革”做更深层次的思考,需要把这场运动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思考和再思考。因为,对自身所经历的灾难和错误太易健忘的民族,决不是一个有前途的民族;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文化大革命”中汲取和学习的东西越多,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就会越快,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文化大革命”实在是毛泽东晚年为后人提供的——一个传统体制、文化、国民性等种种痼疾发育得登峰造极的绝无仅有的范例和标本,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涉及方面最广、复杂程度最甚、运动方式最为独特的社会政治大实验,是毛泽东为实现其自认为正确崇高的理想而发动和领导的悲剧性的庞大社会工程。这场实验的失败决非意味着“文革”的一切都荒诞而毫无意义。对本民族以巨大灾难为代价而进行的独特政治实验,采取不屑一顾或避而不谈的态度,看似超然而潇洒,实际上是低级而昏然。因为,即便是荒诞,有数亿人跟着自己的领袖一起荒诞达十年

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全民族深刻反省的历史性课题。事实上,正因为这场民族悲剧至为深重,“文革”给后人的启迪和警示才至为深刻;正因为不可能再有第二次这样的大实验,所以“文革”这场代价极为昂贵的实验对后人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那么,反思“文革”究竟反思什么?反思“文革”究竟是为了什么?如何去看待和研究“文革”的后果?是仅仅为了罗列它所造成的苦难的种种考据?是仅仅为了避免重蹈“文革”的历史覆辙?还是应该把研究和思考的重点放在,从“文革”的历史教训中去发现旧的体制、旧的模式、旧的思路、旧的方法、旧的方式的历史局限性,着力探索新的体制、新的模式、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方式,以使中国社会能够沿着理性的发展道路逐渐实现民主文明富强的目标?答案当然是后者。对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自然没有责任和义务去完成这一使命,但他们却非常可贵地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思考和探索了这一问题,并得出初步结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或进行得那么快。

该书作者认为:“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运动结束,他们就有助于形成进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可能走得那么远或进行得那么快。”作者进一步对“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尝试着做出某些预测:“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

疫。当然,从80年代的获益来看,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成就可弥补这一损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令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①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即便是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也必须通过改革以实现“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来保证。显然,这还仅仅是国外学者对“文革”后果进行研究的初步成果。对于发生在自己民族土地上的这场空前绝后的大事件,中国学者所应有的就不仅仅是也不可能只是把“文革”作为一个纯客体的研究对象去进行脱离实际的抽象推理式的评论,而必然还应有不可回避的责任和使命。在“文革”结束25年后的今天,就“文革”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应该而且能够做出更深层的思考和认识了。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的意义上,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了解当代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反思,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而且不能以今天已经提供的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更为理性、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刻的再认识再反思,不尽早从“文化大革命”中理性地汲取和学习真正应该汲取和学习的东西,今后中国的社会进步事业将会付出更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重新付出高昂的代价。

当然,对“文化大革命”全面反思是一个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并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18~219页。

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巨大工程。而就“文革”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之一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一直沿着中共八大确立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社会是否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是否就可以真正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进步目标,中国的改革事业是否早在197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取得了远比现在大得多的成果,亦即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发育程度和法治国家建设程度会比现在高得多。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这一结论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必须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在认识上真正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在经济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中的以单一所有制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权的以一元化领导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体制模式为法治模式。事实是,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仅仅限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层面。不仅没有怀疑到苏联模式的合理性,不仅没有触及制度层面,而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问题的观点还进行了批驳。虽然党的领导人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提出并力图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共八大所提出和追求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目标模式,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八大所坚持的政治体制模式依然是以一元化领导为基本方式的高度集中的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模式。这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总纲中都有明确表述,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对此问题也有更为系统明确的回答。这些认识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与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不一致,可以说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共有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即便没有毛泽东,也许不会在以后爆发“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

众政治运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也决不可能有以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运动。而如果既没有这样的改革,又没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以超常方式将传统体制弊端迅速推向极端的“革命”,而是等待传统体制弊端渐进积累到积重难返不得不进行彻底改革时才进行改革,中国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真不知是哪一种情况更大。后一种情况在日后发生的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中做出了最发人深省的注解。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后人也许真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庆幸中国经历了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这场运动。如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初步反思,就不可能有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成就;而没有 10 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将很难从容应对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国内的这场沧桑巨变,风云变幻。正如邓小平在后来所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①

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马克思的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 20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所做的预言。也许,对于这个在近代屡遭磨难古老文明古国来说,对于背负着极为沉重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封建小农生产方式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来说,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而在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迅速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似乎注定要跟着自己的领袖一起经历歇斯底里的癫狂和麻木状态之后,才有可能归于理性和成熟,才有可能实现对数千年传统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1 页。

的质的超越吧！应该说，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即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公有制就是计划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必然要求党对其实行集中和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至少在建国初期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是比较适应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客观形势要求的。何况，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无论对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确实曾经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的巨大成就。所以，当时人们不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论断有根本性的怀疑。甚至还认为，既然计划经济可以迅速把落后的农业国俄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苏联，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国法西斯，那么，作为与俄国有着相似落后农业国国情的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把苏联的基本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模式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要超越这一历史发展的既定格局和认识是需要经过艰难探索和时间，不经过实践磨炼的洗礼，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政治文化传统的民族是很难实现这种扬弃的。而正是“文化大革命”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早扬弃苏联模式，提早探求中国社会发展的全新道路提供了历史的契机和动力。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其实昭示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观没有被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不管毛泽东多么想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管他为了革除中国社会的弊端而对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多么惊天动地的改造和重建，最后只能以惨重的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实质上是以极端惨痛的悲剧结果，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警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此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社会各个方面都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

的严重桎梏,这种体制和社会结构早已步入了死胡同。必须寻找新路,否则死路一条。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警示,中国人民才义无反顾地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才得以在不断深化改革中逐渐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向。从此,中国人民才可能真正摆脱治乱循环的千年恶性怪圈,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和超越。应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国社会近 20 多年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社会今后的文明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依然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反省的全面性和彻底性。

第六章

毛泽东思想遗产的正确评估

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比较重视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在历史的进程中的作用。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这本书中的一句话“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历史的进程”,说出了他们对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深刻认识。知道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把“1949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列为第一章来进行写作。通读全文,可以看出作者也是把这一章作为这本书的灵魂来编辑的。这一章是由西方著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写的。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施拉姆教授写的《1949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章的中文译本,目前至少在5个版本中可以看到。它们是海南出版社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的3个译本中的第一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的思想》的2个译本中的第二部分。施拉姆教授写的这一章的学术价值体现在:首先对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按照提出的顺序进行了论述。这些主要的思想有:统治方式:从人民民主到人

民内部矛盾；探索“中国式道路”；中苏分裂的原因和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其次指出 1957 年下半年是毛泽东思想的转折点。第三是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某些认识和分析。其特点是能从宏观上全面地分析和论述毛泽东思想，注意作一定的比较深入的具体分析，注意资料的运用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的一些研究者的较新研究成果。

我们在评介这一章时，仍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这一版本，并参照英文原版进行。

第一节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施拉姆教授在著作中有这样一个标题——“综合或折衷：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和马克思主义成分”。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综合或折衷。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特点

施拉姆教授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线索。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 1938 年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也将其作为“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概念来使用。尽管它不够完善和准确，但其实质是指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否认,施拉姆在借用这一提法时也吸收了类似的思想。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落后的农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历史遗产相结合。这份遗产在毛泽东看来依然是那么生动。与十月革命模式相比,农民在中国革命中起着更为重要的政治作用,尤其是中国革命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因此,在夺取政权以前,这一理论工程的首要任务是从理论上论述上述两点的合理性。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一直认为,或许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也认为,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将与苏联更加接近。在取得城市和农村政权后,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现代工业方面是成功的,这样便创造了中共自己认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开创了一条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跻身于先进国家之林的道路。施拉姆考察了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并指出:毛泽东在1938年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但到了50年代初便不再提起了,这很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能容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除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理论权威存在。但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是毛泽东所思考的主要问题^①。

但是,通读他的著作,我们发现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主要是指民族主义和中国传统。他说:“但是,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传统根源仍是十分重要的。不过,确切地说,在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初期毛的思想中的中国成分与西方成分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了或是合并成了一个新的综合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两个组成部分中的哪一部分规定了他的整个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页。注:引文参照英文原版,翻译版不够准确。

思想体系的结构?‘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因而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西方化的载体?或者毋宁说,他的思想的逻辑和模式日益中国化?或者根本就没有体系,没有明确的结构,只是在由毫无关联的成分组成的一个笨拙的东西里的两个理论框架在运作,有时相互巩固,有时相互矛盾。”^①这样,他在论述中,就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成,主要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要求相结合。在施拉姆看来,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成分”,与中国传统及民族主义要求这个“东方成分”是两个毫无关联的部分。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应该说,毛泽东一贯重视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提出和努力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这并不完全是毛泽东理论贡献的核心和实质。

这说明施拉姆教授没有理解:“中国实际”中更重要的是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他没有注意考察毛泽东的大量著作,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撰写的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重要著作,如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等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指出谁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谁是敌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及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初步论证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分析了中国当时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革命道路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解放战争时期的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8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进一步深入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在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情况下,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及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为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也就是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当时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迫切解决的重要的问题,提出的正确的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并对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这是根本。而不是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相综合或折衷。但这些著作中的理论、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表达是中国式的,并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这是枝或末。忽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即中国国情和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而追逐所谓的中国传统和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是舍本逐末。我们说,中国实际主要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和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还可以说,施拉姆教授没有理解毛泽东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这些独创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and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关于国家统一、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与宗教、统一战线的理论;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关于国际战略和对外交往的理论;以及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

的立场观点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由。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二 毛泽东思想不能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施拉姆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把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全部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一观点与我们有根本的不同。这主要是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把握与我们不一致。就是说,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意义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深刻,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没有我们认识的清楚。

毛泽东思想从创立之时起,就有明确的科学内涵。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毛泽东思想就有明确的概括: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毛泽东思想进一步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主革命之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①。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包括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也

^① 刘少奇:《论党》,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5页。

包括“党的许多文献”，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从提出时起，就是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而不是作为某一学术和学派提出的。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总结中国共产党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理论发展和运用的经验，对毛泽东思想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定义，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共十二大，将这一概括的第二句，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后面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变成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使毛泽东思想的含义更加全面和准确。

正是从这个正确的含义出发，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在某个时候提出的错误思想。就是说，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那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或者离开中国实际这两个要素的思想，尽管是毛泽东本人提出来的，也不能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内，不能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如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由实践检验证明，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脱离中国实际，所以不能属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一个有科学含义的概念。“思想”这个词，是名词，而不是动词，不是说毛泽东在那里想什么，把他记录下来就是毛泽东思想。即使是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考虑，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学说，是科学的学说。既然是科学的学说，那么，当然有它的逻辑性，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历史上任何一位大科学家和理论家，都不会把不能成为学说因素的东西，放

在他的科学著作里面,也不会把不成为学说的东西当作他的学说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后,对继续出版他的新选集是如此地谨慎。尽管有些人极力地要求他尽快出版,也有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专门班子。

但他仍然慎之又慎,建国后除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外,许多著作和讲话都没有公开发表。这可以说,把哪些著作和讲话作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也是有选择的,而且是非常认真地进行选择的。如果把毛泽东本人的全部文章和讲话以及起草的文件等作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本人也不会同意。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就是说,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学说或学派,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它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社会运动的理论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灵魂。

如果把毛泽东思想仅仅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或学派,作为一般的个人理论研究成果,实际降低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客观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是说,没有对中国历史的深刻了解,没有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深刻了解,特别是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所追求的振兴中华这一伟大事业的深刻了解,就不会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深刻了解,就不会理解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意义;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深刻了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深入了解,就不会理解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因而这样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历史价值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第二节 毛泽东探索的中国建设道路是不是乌托邦

施拉姆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在这个大题目下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是：决定论和乌托邦幻想：“大跃进”的理论^①。这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是“大跃进”是“乌托邦幻想”，二是“大跃进”和“乌托邦幻想”等同于毛泽东探索的“中国道路”。我们不赞成施拉姆的这个观点。

一 不能把“大跃进”简单地等同于“乌托邦”

我们不赞成把“大跃进”与“乌托邦幻想”划等号。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概念，也可泛指不能实现的理想、计划等。“大跃进”虽然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给人民带来了灾难，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个大失误，但不能说它是“乌托邦幻想”，因为他们之间的性质不同。对此，确实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首先是关于“大跃进”的设想问题。在“大跃进”时期主管工业交通方面工作的副总理薄一波，30多年后的1993年，在他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毛主席发动‘大跃进’，出发点好的。……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经济指标，薄一波说：“有些著作对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36页。

会议上,提出钢铁等主要产品产量 15 年赶上英国的口号,采取批评态度。对此,我有不同认识。”经过认真分析后他说:“如果我们按 1956 年八大确定的指标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办事,不搞什么‘大跃进’,那么,我国在 1972 年的钢产量超过英国是绰有余裕的。”“还应该肯定,1958 年进一步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观点,并且推行某些改革,将管理权限下放,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大方向也是正确的。”

其次是关于“大跃进”的可能性问题。如果上面所说是“大跃进”出发点的认识,那么下面的论断则是对“大跃进”可能性的认识:“应当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只要党正确地领导和组织群众,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于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从一个历史阶段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快一些的。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反对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不辞辛劳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①这种实际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 1964 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 1979 年新增炼钢能力的 36.2%,采煤能力占 29.6%,棉纺锭占 25.9%。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是中国在这三年期间建设起来的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占当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21 页。

时全国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二。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此外,科学技术成绩显著、特别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提前达到。1963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①。

我们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确实带有某些主观决定的理想的乃至空想的色彩,但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于“乌托邦幻想”。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大跃进”的错误,带来了灾难,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必须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认真分析的结果,我们认为主要是“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的错误。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步子迈得太大了的错误,也就是在“真理前面又跨了一步”的错误。

二 “大跃进”的理论和“乌托邦幻想” 不是毛泽东探索的“中国道路”

我们不赞成施拉姆教授提出的“大跃进”理论就是毛泽东探索的“中国道路”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理解的“中国道路”是在总体上把毛泽东的探索等同于错误的道路。而实际上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内容是相当宽广的,而其过程又是相当曲折和复杂的,对它作简单化的理解就容易脱离历史的具体状况而失真。

客观情况是,1956年前后,当时中国共产党破除了对斯大林理论观点的迷信,破除了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提倡独立思考,提倡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构想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制定方针和政策。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超前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479页。

工作重心开始转移。从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毛泽东先后对农业和工业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先是找了华北九个省市的书记,然后又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了解工农业生产和基本情况。在此前后,刘少奇为筹备中共八大也听取了中央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周恩来等领导人分别参加了这些汇报会。在这次领导核心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实际上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政治建设问题、文化建设及对外关系等问题。以此为标志,经过精心准备,中共八大的文献,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和写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等,都记录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全面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认识发展和重要成果。这次探索历时20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中共八大前后探索的良好开端阶段(1956—1957);二是探索中的曲折阶段(1957—1960);三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探索阶段(1961—1965);四是探索陷入歧途阶段(1966—1976)。可以说,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今天看,这次前所未有的探索中包含有两种发展趋向:即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①。无论探索过程,还是探索的内容都是极其复杂的,用一个“大跃进”的理论概括甚至等同“中国建设道路”显然是不完全的、片面的。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

“中国建设道路”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道路,就是说,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探索是全面的。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地说,它应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具体表现在:首先,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第二,开始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真正意义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并提出和开始实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第三,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工业化的道路;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方针;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的方针,以及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出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实行综合平衡的方针等。毛泽东等人还在初步揭示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即分两步走: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打下现代工业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五年计划至20个五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还提出初步改革经济体制,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以及“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可以“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①的观点等。

2.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毛泽东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基本任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务,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一,1949年,毛泽东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具体地说,创立和坚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努力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等。第二,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第三,毛泽东科学地提出了正确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正确纲领,并作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的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看来恐怕还是不要搞联邦。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确定下来。为比较好地解决中国的民族宗教问题打下了基础。为坚持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毛泽东还提出了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提出重视民族问题,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倾向,一是大汉族主义,一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提出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并妥善地、从容地采取和平方式进行社会改革等方针。第三,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并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这就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第四,毛泽东提出建立伟大的现代化的人民军队的理论,制定了正确的国防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保证了国家安全、领土和主权完整。

3.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毛泽东提出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平的基本任务和方针。第一,指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确定建立的新文化教育是全国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①。第二,提出和实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发达国家的目标。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领导和关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提出要有雄心壮志,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第三,提出并制定一系列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保证科学和艺术繁荣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提倡必须继承和吸收中国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一切外国的好东西都要学,并为我所用;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体育方面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医疗卫生方面的“预防为主”、“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等方针。第四,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等。

4. 关于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

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外部条件。从1840年以后的中国外交一直是一种屈辱的外交。而194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则是一种新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处理国际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也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其中主要有:第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及其一系列外交方针政策,顶住了冷战时期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中国施加的各种压力,甚至对中国的武装挑衅。1950年出兵抗美援朝,1962年自卫反击印度对我边境的进攻,1969年反击苏联军队对我国领土的侵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主要的是维护了民族尊严,向全世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界表明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第二,毛泽东参与并支持周恩来提出的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提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第三,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积极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第四,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发展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广交朋友,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五,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在各方面对我国的渗透和颠覆的企图。

5.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毛泽东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原则,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执政,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第一,他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原则,即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共产党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力量,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第三,要培养造就大批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中央委员会成员构成的任务等。第四,要防止国家领导人员成为特殊阶层。毛泽东曾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①

应该说以上的各项原则,代表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而“大跃进”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体系则代表了错误的趋向。这样理解毛泽东探索的关于“中国建设道路”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才是全面的,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因此不能得出“中国建设道路”是乌托邦的结论。

第三节 对毛泽东犯错误原因的分析

施拉姆教授用了很大篇幅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并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他的有些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施拉姆用较大的篇幅分析和论述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重大事件。他说,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推行的社会主义发展总体模式的最富于暗示性的象征是“继续”和“不断”革命的理论,“大跃进”的特征也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改造同时进行。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是出自要在农村创立一种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一种考虑^①。他分析说:“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的发生确是出于毛泽东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反应,它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以强调心理改造为标志,而这正是毛泽东思想长久以来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生活态度诸如拜金主义、享乐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在限制还是不限量的问题上,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到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精神”或“灵魂”的斗争等^②。

但有的分析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如施拉姆教授把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当成毛泽东思想的两个构成要素,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偏颇,导致他把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彼此消长的演变过程作为解释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原因,这样得出的结论难免是不准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102页。

确的。他试图从中国古代的“道家”辩证法中寻找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思想根源,从强调国家教化职能的传统政治观念中引申出毛泽东晚年扩大上层建筑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这些都说明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认识停留在抽象的从理论到理论的层次上。而忽视了他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施拉姆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即从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本质。他认为,在晚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陷入了空想、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这违反马克思主义,也违反毛泽东自己一贯的思想。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早年,即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受唯心主义影响有某些联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根据这些就断定毛泽东始终是一个唯意志论者,断言毛泽东一贯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作用,也是唯意志论的表现,这就未免过分了。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违反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这就不能解释,主要在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奇迹般地取得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取得了重大成就,也难以说明中国发生的历史性的巨变。

如何分析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难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时特定的客观条件和主客观原因进行分析。

一 主观方面原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在思想上及时进行由革命到建设的根本转变

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执政党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也要进行转变。就是说:在革命时期是以阶级斗争为主,也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为主。但革命胜利以后,就应

该以建设为主,主要应该着眼于建设。但是,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对此曾有认识,提出过主要任务是建设,但不久,由于对国内外一些突发事件缺少思想准备,也缺少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他就又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到1962年他进一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他还认为要“破”,强调“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进而又发动了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2. 建国后毛泽东没有充分反复认识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毛泽东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深入反复地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因而没有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并从中国贫穷落后这个最基本的现实和客观规律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有的专家所说:这就是,新中国从旧中国得到的遗产中,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这样在建设中就必然遇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殊困难和特殊问题。具体地说,在全社会,几乎谈不上生产社会化,市场经济也不发达,文盲大量存在,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少,缺少管理现代生产、现代金融、现代商业的经验。但当时,毛泽东却认为一张白纸更容易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变革上也急于求纯。

3. 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毛泽东有些问题是清楚的,但也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更多地从马列的书本中找答案。如马列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观点“消灭私有制”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等。而他的理解又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受到其他思潮包括中国古代的“大同”等传统思想的影响,毛泽东逐渐形成他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新社会的蓝图。关于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他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没有始终抓住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4. 理论上和认识论方面的原因

毛泽东是大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但是在晚年,他在哲学原理的运用和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主要是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方面,他更偏重于辩证法;在辩证法中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斗争性,过分强调分歧,忽视了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在运用辩证法时,也存在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在物质和精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方面,他扩大了精神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在阶级斗争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上,忽视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忽视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试图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从认识论方面讲,毛泽东晚年没有始终坚持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二 客观方面原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国虽然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但几千年封建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封建社会的专制传统、民主缺乏、人身依附等残余普遍存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等级制、特权、领导职务终身制、家长制、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现象都与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在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特殊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如毛泽东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

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①

2.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从世界上看,社会主义不成熟,搞社会主义也没有成功的经验。理论的成熟程度首先决定于理论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发展的成熟程度。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国内十分艰巨、艰难的建设任务和非常薄弱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缺少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缺少在全国执政的经验。没有建立起适应建设的科学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尚未健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中存在的“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想法互相影响,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急躁情绪互相影响,这些导致社会上过热的舆论导向,而过热的舆论导向又膨胀了人们的过高期望。比如国际上的压力,美国对中国实行包围、封锁的政策,并占据中国领土台湾,苏联的大国主义政策,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应有的地位等。这些都是客观现实。

3.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权力过分集中和民主法制的健全,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如果仅仅是个人认识上的错误,而没有组织上的错误和体制上的弊端相伴随,那么,错误也不是不能纠正的。实际上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上有较大缺欠,给毛泽东的个人专断造成了条件。特别是封建残余的影响,造成了毛泽东在晚年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人民群众。毛泽东一生强调要联系实际,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但到晚年,他的调查研究已经不能与民主革命时期相提并论了,这与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也与当时保卫制度有关。毛泽东本人也为此苦恼过,他也有办法去解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调查研究的主渠道应该是依靠各级党政组织系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主渠道反映上来的情况有时不真实,甚至大打折扣。毛泽东的头脑是个思想加工厂,下边提供的材料有问题,加工的方法又出了偏差,得出的成果必然离实际越来越远。这样,就形成了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的恶性循环,造成毛泽东错误的升级。最终导致全局性的错误。

4. 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

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一贯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安全,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但在变幻不定、复杂尖锐的国际形势中,有时也会作出不准确的估量和过度反应。当时在国际上,中国面临两大矛盾:中美矛盾和中苏矛盾。中美矛盾一直是影响中国外交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毛泽东终生关注的。从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角度分析,有直接影响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对美国实施对华和平演变战略的警惕;二是对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警惕和平演变,清除其土壤,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标。而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把战火烧到中国南大门,这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和事实的根据。中苏分歧和矛盾造成的直接影响,一是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反修防变”的严重危机感;二是推动毛泽东对“反修防变”理论作进一步的思考,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三是加快了毛泽东对选择接班人的考虑。

总之可见,抛开上述种种复杂因素,把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都归之于唯意志论,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平的。

第四节 其他若干观点

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即从1917年到1976年的60年间,每十年为一个阶段,共分为六个阶段。这种分

期方法也是比较勉强的,理由也不充分。这不仅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割裂开来,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本身发展的实际。

施拉姆教授在著作中还多次提到,中国5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把毛泽东原来的著作修改得面目全非。应该说,在50年代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是对某些文章进行了若干删改,这应是作者的权利。施拉姆的说法有些夸张和失实。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在研究毛泽东思想时是不应该忽略的。

1. 关于建国和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节节胜利,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和建设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摆在面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衔接的问题也迫在眉睫。所以,在1949年前后,毛泽东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是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建国理论和革命转变的理论。毛泽东在这方面创造的主要理论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适当的时候向社会主义转变;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和接管城市的理论和政策;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衔接的理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部分质变的理论”;实现国家工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同时并举以及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等。

这些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息息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施拉姆教授只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进行了论述,而对其他理论,或没有论述或论述不够,这不能不是研究中的缺憾。实际上社会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衔接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在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提出的“两次革命论”和以王明等为代表提出的“毕其功为一役”的“一次革命

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直接衔接的观点。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他进一步探索和解决了两个革命的衔接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政治上,通过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各级政权;第二,在经济上,通过打倒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有,建立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第三,在文化上,通过改造旧的文化机构和人员,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文化。这样就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衔接了起来。

关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对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即在土地改革后,不失时机地把小农经济引上社会主义道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实行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等过渡形式。包括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主要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并实行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步骤,即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不是采取一次解决,而是采取逐步过渡的理论观点也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关于工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同时进行的观点,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思想。按照传统的观点,改变生产关系是革命,而实现工业化是建设,两者应该是分阶段进行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讲,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然后才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可毛泽东却设想这两项根本性的重大任务是可以结合在一起来完成的。中

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作出决定：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①。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思想来源。即在1952年底毛泽东建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有价值的思想也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

2.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研究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论述不够，是施拉姆这部著作的一大缺憾。特别是他没有对毛泽东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为专有一章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施拉姆在论述毛泽东关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注意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忽视了毛泽东的一个更重要的哲学方面的理论贡献，这就是他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他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②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科学的，反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49年3月13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15页。

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他揭示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意到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才能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并找到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也可以把握毛泽东在1957年后思想发展的脉络,还可以探寻毛泽东从正确的命题出发,但走向失误的原因。

3. 其他若干遗漏

第一,施拉姆对毛泽东在政治建设上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不够重视:如他对毛泽东提出和论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生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以及建立和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等没有给予阐述。

第二,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和宗教的若干理论观点不够重视。如他对毛泽东提出和论述的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

第三,施拉姆对毛泽东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系列理论观点重视不够。如对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和教育人民,要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迷信思想等,在科学和文化建设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吸收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了科学发展的十二年规划等论述得也不充分。

第四,施拉姆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论述不够。如他对毛泽东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将来还要

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错误的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等^①,几乎没有论述。

在近八十年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在这漫长的八十年的历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理论成果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被称为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自己的行动指南。科学地概括毛泽东思想的遗产,这就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从总体上看,施拉姆教授对毛泽东思想的遗产的概括只是初步的,比较粗线条的。虽然他是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学者,但是他还是犯了三个过低估计的错误。一是过低估计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整个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二是过低估计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思想观念的影响;三是过低估计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影响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部专著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应有阐述。这是不能不令人遗憾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第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的第二编标题是:“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①,这样一来就把1969—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写成是一种继承权的斗争,亦即权力之争。这种所谓“继承权(权力)之争”论,实际上是西方学者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他们认识问题的标准,或者说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内的权力更替。他们往往把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扭曲为共产党专政,把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变化原因,几乎全部说成是“中国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这种观点随处可见,用这种观点理解中国政治变化的作者也非常之多,第二编第4章的作者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过分强调“党内权力斗争论”,并以此作为核心框架著书立说,在西方是比较盛行的方法,但它是不科学的。事实证明主要用这种观点来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起码有两大缺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9—1982)》,第313页。

欠。一是限制了作者的眼界,造成忽视历史发展进程中更重要的内容,导致作者舍本逐末。如本书第4章,为继承权而斗争写的是1969—1982年的中国历史,这一阶段历史特别是其中的1978—1982年历史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发生了它在20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这一历史性巨变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但却被淹没在所谓权力斗争的标题下。二是影响了研究的深度。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必然要把历史上的社会变化根本动因归结为中共党内的权力之争,这将影响作者去寻找历史发展变化中更重要的原因,也与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总结历史经验的宗旨相背离。实际上一种本末倒置的方法。这两个缺欠将导致对历史研究的扭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研究成果的价值。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就没有注意到这段历史(1969—1982)中发生的伟大历史巨变,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转折的意义,没有注意到这次会议是中国第三次伟大历史巨变的起点,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起点。还没有注意到中共十二大关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等。而这些,在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上,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上都有论述。作为一部西方的权威著作,把一部伟大而生动的历史、民族复兴的历史巨变写成了少数人为权力而斗争的历史是难以让人们理解的,也让我们感到较多的遗憾。

第一节 “为继承权而斗争”不是 1969— 1982 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

纵观 1840 年以来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主题是实现现代化,它贯穿 1840 以来的中国历史,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而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推翻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扫清道路;二是经过艰苦创业,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从它建立起,继承以往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努力,就一直领导全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历经 28 年的前赴后继的奋斗,终于在 1949 年领导全体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由此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并从 1956 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虽然历经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挑战,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着巨大考验,为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巨变进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

一 两个历史阶段不能混淆

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决定的主要任务不同,作为划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准,是为中国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学家采用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也是比较科学的历史分期方法。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把中国从 1969 年至 1982 年的历史称为“为继承权而斗争”。这就混淆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一个是“文化大革命”阶段;一个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阶段。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以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应该把 1969 年至 1982 年划为两个内容不同的历史

阶段。

1. 1969年至1978年,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

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段来具体描述。从1969年4月到1976年对江青集团进行隔离审查为一段;从1976年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一段。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束,标志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的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后七年,即从1969年4月至1976年10月,可以看成是“文革”的后一段。在中共九大,毛泽东提出“斗、批、改”的任务,并向全国推广他亲自抓的“六厂二校”经验。随后,又提出政府和国家体制的重建问题,试图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想。在中共中央、特别是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从1969年开始,国内局势有所好转,国民经济也比“文革”前三年有了好转。1970年至1971年,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协助下,粉碎了林彪集团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自1972年起,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倡导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各项政策,各方面的工作开始出现转机,特别是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标志,对外关系有了明显好转,尖端科技也有较大发展。1973年至1974年,周恩来、叶剑英和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江青集团妄图利用四届人大“组阁”和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为了实现四届人大重申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主持了对各个领域进行的整顿。全国形势再次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整顿被迫中断。但是,人民群众日益认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工作的成效,也日益认清了江青集团的真面目。在1976年春天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

社会基础。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起着主导的作用,他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忽视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他的巨大威望和权威,当时整个国家的各项工作基本上还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江青集团继续作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代表人民的意愿,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江青集团。“文革”十年内乱至此结束,也把中国带进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重要的选择:一是有限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基本上坚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其结果是回到“左”的路线上去,这条路线的代表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二是全面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继续为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其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总起来看,粉碎江青集团后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进展,但毛泽东晚年的“左”的指导思想还没有根本纠正,全国各项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因此,这两年还处于徘徊前进的局面,这种局面到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结束。

2.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成果,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恢复了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提倡正确对待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任务;制定了正确的外交战略和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次全会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时期的标志,是20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开端。

从1978年12月到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初期。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在三中全会路线的指导下,中国继续推进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果断地进行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9年3月,邓小平正式提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改变了过去急于求成的“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从1979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总结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分析和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明确地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以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1982年,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在广大农村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这两项改革的实行,以及国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的措施,再加上以中国著名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等新兴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这又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迅速发展。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农村改革积极推进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也开始进行。一是实行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

年10月这项改革从四川的6家企业开始,到1980年发展到6600个企业。改革使企业开始初步建立和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企业之间展开了竞争。此外,商业、物资、交通、建筑、邮电、军工及农垦等部门,也开始实行利润留成或亏损包干,这些改革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二是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并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三是开始实行政企分开,并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四是开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

这期间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加大对外交往力度、扩大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又推出了两大举措:一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二是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实现了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向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向各方面改革的伟大转变。我们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中国开始20世纪历史上的第三次伟大巨变的时期,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中国内乱的时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混淆,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大失误。

二 “文革”不是为“继承权”而斗争

美国每四年都要举行一次影响全国的大选,选举新一任美国总统。两个政党为了总统宝座,每四年都要进行激烈的争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而且花费的人财物越来越多,耗费的时间越来越长,对全国的震动越来越大,并在这方面不断地创造着新的纪录。

但历史学家并没有把美国的历史写成是一部争权夺利史,特别是严肃的历史学家更注重美国的经济、金融、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它的国际战略、外交政策的变化等。而政治权力的争夺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说,美国大选虽然对全国影响很大,但如果把美国历史写成“争夺总统史”将是片面的,特别是在美国这种高度发达的国家,把一部人民开拓创业、创造经济、科技奇迹的历史,写成是一部分政客的“争权夺利史”,那将是对历史极大的歪曲,可能会有绝大部分美国人不同意。同样,从1969年到1982年,在中国也有争夺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家,如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等,他们也搞阴谋,对全国震动和影响也很大,但这决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其历史主流也不是为“继承权”而斗争。而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后,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搞经济建设,就更不能说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为“继承权”而斗争了。

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也会发现“为继承权而斗争”并不是十年历史的主流。

1. 从毛泽东的主观动机来看,“文革”不是为“继承权”而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来说,他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这个全局性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族人民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从大量的材料分析,从毛泽东本人看,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权力之争”,或是为了挑选或改换一个接班人显然是不正确的。说“文革”是权力之争,是对中国政治状况缺少深刻了解的反映。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如日中天,而当时的个人崇拜也日益盛行,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产生领导人的程序,也

不可能使任何个人得以违反众意,夺取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或者说,没有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敢做“彼可取而代之”的梦。如果说,毛泽东想搞掉他的公认接班人刘少奇,那么,在“文革”刚开始时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不到210个字,就把他“打倒”了。按这种说法,“文革”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但实际上又搞了十年之久。实际上对当时拥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来说,要撤换几个领导人,没有必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大运动。对毛泽东来说,他又一直反对那些有野心,伸手要权的人,无论林彪、江青还是其他人,谁伸手要权,都没有好结果。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文革”不是为继承权而斗争。那么,“文革”是什么呢?

毛泽东不惜重大的代价,甚至造成个人的历史悲剧来发动这场政治大运动,就他的主观动机而言,主要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立文明富强的新中国。客观地说,其性质是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不是他有权力欲,为个人争夺什么“继承权”。如经毛泽东修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第一条所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是一个大战略家,他是主张不断革命的,在建国后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分为不同阶段的思想,有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技术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继续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这位“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列宁来不及完成的伟大任务,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行划时代的伟大发展。他要全面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完整地、彻底地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①。应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解决“继续革命”这个他认为是最重大的课题。他有如此宏大的目标和伟大的理想,当看到当时他信任的林彪、江青等干脆不把他的宏大目标和理想放在心上,而积极为了争夺个人领导权而斗争。毛泽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厌恶,而且始终没有把实权交给他们。其原因就是毛泽东经过观察他们的表现,担心他们担不了这个重任。

2. 从周恩来等人的所作所为来看,“文革”不是为“继承权”而斗争

我们不否认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个人野心家和品质恶劣者,如林彪、江青、康生之流是为了权力而争而斗,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重任的,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毛泽东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愿望。从1969年开始,特别是从中共九大以后,他希望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走向正常,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制定新的宪法,再次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②。粉碎林彪集团后,尤其是在中共十大后,他也十分希望“以安定团结为好”^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④。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忽视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这就是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化,总有一批真正的中国共

①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见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② 报头语录，1968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页。

④ 同上书，第410页。

产党人,始终没有放弃为现代化而斗争这一大目标。这一大批真正的共产党人如中流砥柱,始终把党的宗旨,即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具体地说就是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放在心上,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放在心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主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是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仍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团结党内健康力量,如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各级领导人,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们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所谓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主要就是延续从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在这方而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这一工作的延续性。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始终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利益为重的周恩来等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不是为了“权力之争”,而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呕心沥血地工作。

还有一大批曾被“打倒”,1969年后又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同周恩来一样,以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不顾个人的政治安危而忘我工作。邓小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的“最痛苦”的时候,每天到一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期间,“抓紧时间,勤于攻读”,平民生活使邓小平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开辟新道路的思路已经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酝酿。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5年初四届人大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下,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果断地对军队系统、铁路系统、钢铁工业等为重点的工业系统、党的领导、文艺政策、农业系统等全方位的整顿,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由于整顿直

接针对“文革”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遭到江青集团的极力反对。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整顿夭折了。但是,整顿的理论和实践结果,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邓小平为了减少“文化大革命”期间给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扭转全局性的错误,不顾个人安危,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如果仅仅是为了争夺权力,或保住权力,他没有必要去与毛泽东相对立。谁都知道,特殊情况下造成的特殊环境,与毛泽东对立的结果是什么。

历史事实说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全面整顿时期不顾个人政治生命(第二次被打倒)甚至身家性命安危的周荣鑫、万里、胡耀邦等一批共产党人,不是在为权力而争,而是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争。

3. “文革”客观上是中国 20 世纪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酝酿

觉悟的中国人民深深地懂得中国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1976 年清明节前后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的“四五运动”,实质上就是人民群众支持周恩来、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反对江青集团逆历史潮流、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次群众运动。当时参加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的群众喊出了并用鲜血写出了“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①的心声。这实际上也是历史发展主流在特殊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体现。这次群众运动虽然被错误镇压了,但人民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客观上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基础。从更深远的意义看,它酝酿着历史性的巨变,即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去实现强国富国的愿望。

^①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见 1976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

第二节 被忽视的伟大历史性的转折

1969年至1982年,这13年中最有深远意义的是“文革”的结束和新道路的开辟。《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由于忽视了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所以,它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纠正“两个凡是”错误的认识是不充分的、不深刻的、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也影响到他们正确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

一 “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的启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原想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办法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天下大乱的方法,达到“天下大治”。可是事与愿违,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首先是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延长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间。错误理论及其指导下错误实践,造成思想上的空前混乱和对马列主义信仰的严重削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削弱;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摧残;社会思想和风气严重倒退。总之,“文化大革命”没有带来任何意义的进步,只是带来了混乱、破坏和灾难。所以必须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

事与愿违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下大乱,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弱点、缺欠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问题和弊端,充分地暴露出来,从反面给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去深入思考。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

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部实践,就是郑重地对待自己所犯错误,并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迅速而科学地学习了许多东西的最好证明。从总体上看,“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如下的启示:

第一,科学认识、准确判断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经过短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的历史特点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一客观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可以越过对于工农大众来说是痛苦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并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中国必须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甚至是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向高一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认清中国国情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离开这个出发点,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对时代特征也必须有科学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要科学地认识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选择中国的发展道路,应该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又有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色。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从指导方针的角度去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的产物。这是一个背离客观规律的重大偏差。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总的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社会主义的某些具体制

度和体制及运行机制方面还存在弊端,这需要的是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或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这种改革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绝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对部分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通过法制办法予以解决。

第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没有有效的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的机制。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及时纠正自己错误的手段和能力。

第四,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能倡导“造反有理”和“无法无天”。

“文化大革命”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具有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不可侵犯的权威,使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力得到切实保证;中国共产党等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一级党组织和它的领导人都不能有超出法律之上的权力;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的特殊党员,同样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破坏宪法和法律,等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得出的论断。

第五,必须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或失败。恰恰相反,它从反面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反的,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不能违反的。中国所以遭到这场大灾难,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时期对理论学习和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正

确把握的结果,也可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一种惩罚。

二 纠正“两个凡是”的意义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没有认识到纠正“两个凡是”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一个遗憾。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试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集团成员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这个作乱多年的集团。这是当时中央政治局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立的巨大功勋。但粉碎江青集团后,怎么办?则是当时摆在中央领导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1. “两个凡是”的提出

华国锋和汪东兴等想稳定局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是符合历史要求的。但他们提出了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实行“两个凡是”,实质上是想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坚持“两个凡是”,将束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中国将无法摆脱“文革”的灾难,也就无法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立即认识到“两个凡是”的实质和危害。1977年2月,公布“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一发表,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对。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王震、胡耀邦、耿飚、姚依林、王净等分别相约,要提出邓小平同志工作问题和天安门事件问题。会上,华国锋在讲

^① 《学好文件抓住纲》,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

话中重申“两个凡是”方针,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这些同志仍然不顾高压,仍照会前约定,在各自的小组上发了言。虽然陈云等的发言没有上会议简报,但可以说是对“两个凡是”方针的一个重大的冲击。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可以说,这封经过邓小平仔细考虑的信,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由于这封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全党,其影响是相当大的。5月,他再次指出“两个凡是”不行。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恢复工作。他郑重地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①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主动要求抓“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工作,在这些方面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但是十分艰难。如:推倒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还要根据迟群笔记本中记得不全的毛主席的话;恢复高考,有人又抬出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不得不从反面提出问题,机智地解决了这一重大的难题。

1977年3月胡耀邦被派到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他仍时刻想着“中兴伟业”,首先抓清理思想理论上的是非,在抓开学准备的同时,他积极筹备创办《理论动态》这一刊物,实际上停止了批邓;再抓《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为平反冤假错案大造舆论。并为抵制“两个凡是”,实现中兴伟业寻找突破口。在布置中共党史和哲学教学与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实践标准”,成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先声。

^① 《江泽民同志致悼词》,见199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

由于拨乱反正困难重重,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在多种场合强调“实事求是”。“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可以说“实事求是”代表了人心民意,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2.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的一贯教导,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于是,当时又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现象,就是经过邓小平等人的提醒,华国锋等人当时也在多次讲话中,不能不讲到实事求是。如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1977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都提到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要“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等等。就是说,当时不同主张的双方都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都谈“实事求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但在实际工作中,当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在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内进行整顿时,有人出来反对,说某某事是毛泽东定的,某某案是毛泽东批的。在当时谁想动毛泽东定的案,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拨乱反正障碍重重。当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组织教学人员研究中共党史教学时,遇到许多不好解释和判断的问题:如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二月逆流”、“三项指示为纲”、“四五运动”、“五七指示”等问题,以及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和其他的历史是非问题等,以什么作标准?是以毛主席语录做标准,还是以中央文件作标准,或以别的什么做标准。胡耀邦到中组部当部长,领导进行平反冤假错案时,也有人出来干涉,说某某案是毛主席定的,等等。当时实际上形成了双方各有各自理解的不同的“毛泽东思想”。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呢?人们不得不进行思考。

如何解决这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把中国从“文革”灾难中摆脱出来,实现历史的转折,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不但需要政治勇气、理论勇气、道德勇气,更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智慧。在邓

小平等老一辈政治家的支持下,胡耀邦可以说也是一个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政治家。他率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在组织中共中央党校教学的过程中,胡耀邦等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并组织人撰写文章。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全文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主要报纸,均相继转载。这就是在全国开展起来的,由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和党政军高级干部积极参加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开始之初,遭到了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的强烈反对,但邓小平、胡耀邦、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扭转“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决支持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也表示支持。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拨乱反正发展的必然逻辑,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实现的最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由于这场大讨论直接针对“两个凡是”,又与当时的政治大局相关,是在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所以其意义是重大的。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就能科学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认识国情和时代特征,认识主要矛盾,主要任务,而要完成主要任务,也只能选择改革开放的道路。历史能按照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发展并实现伟大转折,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反对“两个凡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带来的混乱,将国家引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现代

化建设之路。从这个角度说,当时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实现党的宗旨,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是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实现现代化而斗争的继续,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巨变发生前的酝酿。其中和后来某些人,包括华国锋等的职务发生变化,决不能是历史的主流,而只是历史大潮扩展的必然结果。

三 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我认为,过分强调“党内权力斗争”,会忽视历史发展过程中更主要的内容。这表现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既没有把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发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为重要章节来写;也没有展现和肯定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是以如下事实为根据的:

1.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准备

真理标准讨论的进行,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这期间邓小平的南巡和北巡,特别是东北之行期间发表的重要谈话(讲话要点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用先进技术和方法改造企业》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为在会议上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做了大量工作,也为会议实现根本指导思想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具体情况是:

华国锋对经济建设表现出很高的热情,11月10日,他在开幕式上说:这次会议将首先讨论中央关于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

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后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急切地希望在经济上“大干快上”。但是思想路线不解决,极“左”的错误政治遗产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分组讨论中,陈云在11月12日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他说:他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主张,同时他也提出为实现安定团结,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决定,解决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和历史遗留的问题,平反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普遍响应。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以及查明的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会议还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事求是和“两个凡是”两种思想路线等问题进行了争论。叶剑英建议中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当面把理论问题搞清楚。“他批评有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就是不怕中国贫穷落后,就是不怕二千多年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就是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①。会议提出了为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陈云作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的发言。会议还就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批评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失误。

还有很多人在大会上起了作用,如胡耀邦在西北组有四次发言,邓颖超、王震、胡乔木、赵紫阳等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27日,会议转入讨论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继续讨论工作重点转移以及改革开放等问题。

^①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但由于有些理论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缺乏认识,思想上还没有从“两个凡是”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在会议讨论中表示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以来出现的活跃局面表示担忧,发言说现在报刊上发表的有些文章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影响安定团结。这又在会议上引起了新的讨论。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不能把纠正毛主席晚年的某些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来为“两个凡是”辩护。多数人趋向于: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二十几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要求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能对这个问题表明态度。

在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先后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这次会议的成就,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两个凡是”的提法固然是从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出发,但说得绝对了,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这个责任应由我承担,我应做自我批评。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等。

在会上对工作重点转移已经形成基本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①。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以大局为重,为维护党的团结,维护中国党和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提出了中央政治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页。

局只进不出的原则,增选了四名政治局成员,显示了他既了解中国国情,又具有世界眼光,以及因势利导、驾驭复杂局势的领导才干。他不赞成纠缠其他问题,他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

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这次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时期,也是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的时期。这一历史性“巨变”或“革命”,是在继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把一个屈辱、落后、贫穷的中国转变成一个解放、独立、统一的中国的基础上,再将其转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起点。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来把握这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具体地说: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首要的成果。它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严重破坏,并导致一系列的失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误,也导致毛泽东晚年的悲剧,“两个凡是”是这种情况的延续。这次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的公报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实行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①邓小平的贡献在于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这一创造性的发展,使这条思想路线更为完备。这条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解决中国面临和将要面临的需要探索的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②

(2)会议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讨论中,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质疑,认为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会议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③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了早在50年代中期已经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提出却一直没有完成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3)会议重新恢复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全会实现了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包括多方面的内容。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针对从1957年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个人专断开始发展,民主集中制开始遭到破坏,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人专断发展到极端,对民主集中制的破坏更加严重的情况,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充分发扬了民主,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意志能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达,最高领导人的错误也能在中央会议上得到纠正。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制度和原则一经恢复,就为党和国家正确地进行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使执政党有能力、有希望通过民主集中制来预防错误的发生,及时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或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会议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乱斗乱批的那一套,恢复党的解决党内矛盾的优良传统,决定健全党规党法,并强调实行集体领导。会议还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向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会议还要求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提倡党内一律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恢复和确立正确的组织路线,使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有了组织上的保障。

(4)会议提出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

全会是中国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端。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 三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全会公报上也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①“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②。公报还强调，“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对于几亿农民“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③。这对于启动中国农村的改革起了积极作用。可以说，通过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已经确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开始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并走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5) 会议解决了若干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这次会议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的历史问题，实现了历史是非方面的拨乱反正。在会议期间，对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历史问题和重要领导人的历史是非问题进行了清理，实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还要抓紧解决”的任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天安门事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就是说，不仅给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陶铸、薄一波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冤假错案平反，而且也给“文革”前形成的错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

③ 同上书，第 7 页。

案,如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平反。全会公报还宣布要在适当时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这就为后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条件。

(6) 会议强调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次会议讨论了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关系中国政局稳定和今后发展的问题。与会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为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应该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既要纠正错误,又要维护旗帜。这两方面是一致的,不能对立起来。与会的同志说:革命导师、领袖也难免犯错误。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高度概括了与会人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刻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①邓小平又指出:“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②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② 同上书,第149页。

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①从这些基本论断出发,既可以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能客观地尊重党和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而不丧失继续前进的立足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智慧。

(7)是创造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开端

这次全会澄清了长期以来特别是粉碎江青集团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实现了这些方面的拨乱反正,特别是会议在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同时,也指出毛泽东的错误,这就为创造新的理论扫清了障碍。全会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毛泽东逝世后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逻辑的发展。这种创新意识的体现,不仅体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也体现在全会提出和研究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中央解决这些问题的各项决定中,说明党已经立足于新的实践,开始创立新的理论。这种新理论,就是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8)肯定外交路线和统一祖国的方针

会议公报提到了不久前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刚刚达成的中美建交公报,实际上肯定了当时确定的外交路线,标志着新时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页。

期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开始实行。由此开始进一步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并逐步开始作出关于战争危险、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和外交战略的新转变,并为国家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会议公报还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几天后,也就是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的立场和态度,使集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中国人民的三大历史任务。

(9)在这次会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表明党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保障的理论,确立了立国之本。

(10)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总之,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摆脱了长期的“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搞清了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以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路线,开始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和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和全方位的开放,由固守成规到各方面的改革。这一切说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因此,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史的专著中,如果忽略了对这次中央全会的论述和肯定,都是不可原谅的重大缺欠。

第三节 被忽视的历史主题

我们认为过分强调“为继承权而斗争”，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中的一大缺憾，还体现在持这种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学者因过分关注谁是否掌权，而忽视历史发展的主流，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人类社会本身发展的规律。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国历史的主流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期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人民群众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愿望，从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再认识，在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全面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新道路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发展新路

在1978年底的中央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致赞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全党团结起来，“为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①！

在三中全会期间，老一辈有经验的领导人就谈到因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提出了要进行调整的建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议。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979年1月,中央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集中精力对国民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和讨论。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的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于1月1日和5日两次作批示说: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6日批示说: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对1979年计划进行了调整。

1979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陈云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把‘实事’搞清楚。我国有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三年的调整时间。”^②邓小平也在会上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③这次会议是坚持实践标准,在经济建设上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决定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一次会议。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的八字方针。

从某种意义上说,贯彻新的“八字方针”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和探索经济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从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再到真正“从我国实际出发,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

①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1页。

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①，表明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这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的解决，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了三年经济调整和以后进一步的努力，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局面。这表现在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基本协调，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其他各项主要比例关系也保持基本平衡。尤其是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的第三产业，也有一定发展；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稳定迅速增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打破了多年停滞局面；经济发展与经济效益同步发展。

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中国国民经济以及整个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为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上一个大台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国民经济要调整，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自身规律的，往往是呈波浪式发展的。这次调整无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是对指导今后经济建设的实践，都是很有益处的。

二 果断积极稳妥地推动改革开放

实现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就可以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抓住主要矛盾，认清根本任务。而要完成根本任务，必须进行改革开放。这既是开辟新道路的需要，又是新道路的主要内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根据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任务。在实际工作中，也开始推动改革开放的进行。如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城市搞企业扩权让利的试点，安徽和四川等地农村也开始搞农业生产责任制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6页。

方面的改革^①。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的最基本国情,尊重农民的创造所进行的战略选择。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三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件(试行草案)》等文件,其中虽然说“不许包产到户”,但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管理方式。比过去实行“集中劳动”、“平均分配”等管理方式有所前进。实际上,实行生产管理体制变革,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在某些基层领导的默许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些农村就实行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也在秘密状态下实行,比较突出的是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三中全会后,包产到组的管理形势开始发展,包产到户只在少数地方实行。到1979年底,在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发起的学术讨论会上,安徽的代表介绍了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凤阳县实行“大包干”的经验,引起了与会者和新闻媒体的极大注意。特别是凤阳县小岗村“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②的大包干经验,会后为广大农民所接受。这种承包形式也开始发展。

1980年,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提出“不要与搞包产到户的农民群众对立”的问题。9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在中央的文献上首次正式提出:在中国当前的具体条件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

①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166页。

② 同上书,第174页。

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这一重要论断,打碎了二十多年来套在“包产到户”头上的枷锁。此后,“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实行。到中共十二大召开前,全国实行“双包”的农村生产队已达87.6%。以1980年四川省广汉等县进行人民公社政社分开的改革试点为起点,开始在全国进行政社分开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并在几年内完成。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工人和基层领导干部也强烈希望改变当时的状况,积极支持并进行改革。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进行试点。主要是包括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初步改变了企业只能按国家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不关心盈利亏损的状况,开始建立和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企业之间展开了竞争。此外,商业、物资、交通、建筑、邮电、军工及农垦等部门,也实行利润留成或包干,取得了一些成效。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发展。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期间还进行了政企分开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这些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为继续改革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

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也在进行,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这实际

上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并首先是对权力过分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革,同时对领导职务终身制进行了逐步改革,在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性机构,逐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对官僚主义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弊端进行了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外开放的总方针。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方面也开始迈出了两大步,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台、华侨众多等有利条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采取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形式,以吸收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经济特区条例。

三 确定国际战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评估了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工作的新进展。三中全会前后是中国外交比较活跃的时期之一,这期间中国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的关系。全会公报说:“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完成,为亚洲

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① 仅从1978年2月到1979年6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就访问了50多个国家,中国接待了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来访。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得到加强的基础上,中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加强友好关系的同时,也加强了经济合作。派出了经济考察团考察了西欧一些主要国家,学习借鉴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设备、资金,洽谈合作。中国同许多西欧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民航、海运等方面签定了合作协定。1978年和1979年还与欧共体签定了贸易协定和纺织品协定。1980年起,欧共体给予中国普遍特惠制的待遇^②。

三中全会后不久,为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79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进行边境自卫还击战,惩罚越南霸权主义,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

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在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同时,与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有了良好的发展,并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不懈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 把祖国统一大业提上日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精心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同时,也在筹划推进祖国统一的大业。全会公报明确指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307页。

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的建设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①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告台湾同胞书》,把和平统一祖国提上日程。由此引起逐步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来和平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如邓小平在接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所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②

为表示中央政府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的当天,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命令,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停止了对台湾的海飘和空飘活动;并倡议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和各项交流工作。随后又落实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释放全部在押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落实对台胞、台属的政策,解决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共产党还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鼓励和欢迎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旅游、考察和投资经商等。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祖国统一确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经过与英国政府的艰难谈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判和斗争,终于解决了恢复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随后,经过谈判,澳门问题也得到妥善解决。

这样,通过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三大历史任务,都得到积极推进,并取得重大进展。

五 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全面拨乱反正

三中全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在继续进行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

1. 进行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部门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到1982年召开中共十二大之前,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平反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这主要有:继续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如刘少奇等;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平反,如中宣部、中联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对各地发生的事件、冤案进行复查平反。如武汉“七二〇事件”等;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判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等进行改判或平反;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和恢复名誉;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对“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纠正和平反,如1959年所谓的“反右倾运动”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汉年案等。

2. 调整社会政治关系

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调整社会政治关系。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是恢复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定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政治协商会议；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恢复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落实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政策；为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调整和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为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落实政策等。在调整社会政治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信任，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3. 调整中央领导体制和领导职务变动

思想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而组织路线又是思想政治路线的保证。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胡乔木、姚依林为副秘书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设立书记处，胡耀邦为总书记。免除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政治局委员职务。8月，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率先提出不再担任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职务。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决定赵紫阳担任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12月5日连续开了九次会。在这次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会议在指出华的错误后，认为：他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他对军委主席的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在1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适宜。他主动建议由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六 开始全面总结历史经验

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在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以后的经验。1979 年 11 月,在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央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来抓这项工作。他为决议的起草提出了三条关键性的意见: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二是对建国 30 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以达到“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①。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反复修改,将初稿交给 4000 名高级干部讨论,集思广益,集体修改,集中了全党智慧,终于把大多数同志的意见集中统一起来,定下了决议稿的基本轮廓。随后,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时期创造的新鲜经验。决议指出:建国以来 32 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是,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1~292 页。

“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了判断,指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并分析了“文革”所以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的直接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指出,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不可磨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全面概述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认为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分析和批评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初步概括了粉碎江青集团后,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个要点。

决议既反对了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错误倾向,又抵制了对毛泽东的言行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不愿正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并且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的倾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完成。历史决议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它总结和回答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历史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它的历史作用是巨大的。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1页。

七 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报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把继续全面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大会确定: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大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要在经济工作中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大会报告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中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大会报告说: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会还提出了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并且修改和通过了新的党章。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中共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结束不久,1982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审议和通过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总之,从1969年至198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始酝酿和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期,历史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逐渐觉悟摆脱错误并开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艰苦创业和英勇奋斗;这段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继承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期;是中华民族找到既有中国自己特色,又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的发展道路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

中国是世界文明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对如此伟大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人类崇高的理想前进的所展现的世界上最生动、最复杂、最宏伟的篇章,落笔过于吝啬,而过多地渲染所谓“为继承权而斗争”,不能不降低这本西方的权威著作的学术价值。这不仅是外国学者的经验教训,也是所有从事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人士的前车之鉴。

第八章

“分离省份台湾”的历史真实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分离的省份”台湾被单独列为一章,题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作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进修学院讲师拉尔夫·克拉夫。

在这一章中,作者以时间跨度为框架,分四个阶段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记述和评价。虽然就篇幅而言,本章在全书中仅占3%,但其重要性不容忽略。编者将台湾定位为“分离的省份”,并收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表明他们对暂时处于分离状况的台湾省在法理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的肯定,这就为客观地研究台湾历史确立了基本的前提,这种尊重历史事实的研究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尽管由于东西方在文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尖锐对立,作者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有待商榷的(本章将就几个专题作一讨论),但不可否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台湾问题的全新参考,是值得赞赏的。

第一节 台湾的历史地位

台湾省是我国美丽富饶而又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一个省份。台湾省由三组岛屿组成：一为台湾本岛及兰屿、绿岛（火烧岛）、龟山岛、硫球屿、彭佳屿等 14 个附属岛屿；二为澎湖群岛，包括 64 个岛屿；三为钓鱼群岛，包括 8 个岛屿。加上其他一些岛屿，共有岛屿一百多个，在地理上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全省陆地面积约 3.6 万余平方公里，其中主岛台湾岛面积 35798 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岛屿。它位于东南大陆架上，东濒浩瀚的太平洋，南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距约 300 公里，东北与硫球群岛相距约 600 公里，西隔台湾海峡与我国福建省相望。

据近代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后发现：台湾岛远古时期与大陆连为一体，其山脉为大陆东南侧的“界缘山脉”。在地质史上，由于地壳板块活动而形成的“造山运动”，使台湾山脉与大陆山脉隆起，其间形成低地。而由于海水的涨落，低地又经常为海水淹没。正因为这样，历史上台湾与大陆曾发生过数次的连接与分离。后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海平而因冰川融化而上升，台湾遂离开大陆成为一个海岛。台湾岛与福建省之间的台湾海峡宽处不及 200 公里，最近处仅 130 公里。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台湾岛在地形、气候、土壤、植被等方面与隔海相望的福建十分相似，有人因此送给台湾一个雅号——“浮福建”，意思是说，台湾岛是福建省漂浮在海上的部分^①。根据国际法“大陆架的主权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台湾自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① 张崇根：《台湾历史与高山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 页。

台湾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最先发现、占有和开发的。考古学家指出：据 1968~1970 年间分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长滨文化”和“左镇人”化石，证明“台湾已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活动场所”，从而把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推到二三万年以前。在我国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据《三国志·吴志》记载，黄龙二年（公元 230 年），吴主孙权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万人去台湾（当时称“夷洲”）^①。这是我国古籍中有关大陆居民到达台湾的首次记载。当时丹阳太守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中也详细记载了“夷洲”的地理条件、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从隋唐到宋元的七八百年间台湾曾被称为“流求”、“留仇”、“流虬”。元朝曾在澎湖设巡检司，属泉州同安县管辖。当时澎湖居民约一千六百余人，商船数十艘常与泉州贸易，有“泉州外府”之称^②。明朝末期大陆居民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公元 1662 年（明永历十五年），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有计划地开发和经营台湾。1684 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正式设立台湾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1895 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受日本殖民统治达半个世纪。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国际法准则来衡量，台湾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早在 1943 年 12 月中、美、英三国共同发布的《开罗宣言》以及 1945 年中、美、英、俄等国共同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均得到确认。对这一事实的肯定是世界各国与中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提，也是任何国家学者研究或撰述台湾历史

① 《三国志》卷六〇“全琮传”，卷四七“孙权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384、1136 页。

② 《元史》、《澎湖厅志》及汪大渊《岛夷志略》均有记载。周托、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时必须尊重的客观史实。

第二节 正确评价日据时期(1895—1945) 台湾社会的发展

1895年由于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年间台湾物质条件与台湾人民态度的诸多变化,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为此,在本章的开始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作了简略的回顾。

总的来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第三者的角度记述了一些客观事实。例如:

日本统治者非常严厉,有时甚至是独裁,但他们在台湾创造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环境。这种情况与20世纪前叶中国大陆由于内战、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本军事入侵而形成的局势截然不同。

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台湾人民。但是,其发展过程却使台湾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到1945年,台湾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大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日本人大大改善了台湾的公共卫生条件,扩大了初等教育,修建港口与公路,并开始建立工业基地。他们通过土地勘察、明确土地所有权,革除了大规模逃避土地税的旧习,从而理顺了公共财政,并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人通过扩大灌溉设施、引进新的

耕作技术、组织农业协会,使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①

但是显而易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些记述缺乏应有的背景材料,显得过于表而化。

对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外学者都有广泛的著述。以矢内原忠雄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为代表的战前日本学者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研究成果,将台湾经济定位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明确了占领殖民地台湾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将日本资本之称霸台湾与日本的国家权力活动及其性质联系起来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冷静与透彻的考察;同时系统地论述了台湾的殖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但是由于他们是以本国——日本帝国主义为研究的对象和中心,并且对殖民地台湾的传统经济史认识片面,因而采用的基本概念和方法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而以涂照彦、柯志明等为代表的当代一些台湾学者则能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结构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日资企业和传统经济部门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两者之间的“压迫与拮抗,支配与弱化的过程,说明台湾经济殖民地化的本质”^②。大陆学者的著述一般集中强调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殖民统治和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英勇斗争,而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的研究则略显不足。由于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缘故,西方学者在资料的选择和运用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即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较为客观的史学专著,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也难以避免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861、863页。

② 涂照彦、柯志明:《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第一章,东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我们认为,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发展变化作一全面客观的评价时,是不能离开对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的考察的:

一 台湾经济发展的目的

对于宗主国来说,殖民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初级产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日据时期台湾对于日本的作用,很重要的就是它向日本提供了粗糖和稻米。日本殖民者大力发展台湾经济,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完全是为了日本帝国主义自身利益,即把台湾变成日本的重要的原料基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及侵略战争服务。为此,殖民当局通过推广农业技术、发展水利灌溉等措施,提高了甘蔗、稻米的产量,并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在工业方面,则奖励、扶持日资发展新式制糖厂,以制糖业为中心,发展了一定规模的现代制造业。虽然,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述,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台湾逐渐沦为日本资本的重要输出地和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台湾工农业的增长都是为着适应宗主国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事实上,以米糖为主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台湾经济的主体,台湾经济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殖民地经济的特征。

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笼罩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也不例外地被卷入。日本军国主义确定了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南进政策,台湾遂成为南进的跳板,即所谓“大东亚圣战的前进基地”。台湾的经济政策也开始被修正,转向以军需产业为重点的“工业化”,实质就是全而为战争服务的军需现代化。由此可见,台湾经济的发展变化完全是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需要,“台湾经济是在日本资本主义统治下进行殖民地开发的,其成就的根本意

义是对日本资本主义的贡献”^①。

二 推行殖民政策的野蛮手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是轻描淡写的：

日本人早期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偶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中建立法律和秩序。日本人首先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建立广泛的警察机构和行政、法律制度,以保障台湾社会的和平与安定。^②

事实上,日本殖民者在推行其殖民政策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种种残酷、野蛮手段在中外学者的各种著述中都有记载。例如,在日本殖民者占领台湾初期,全岛爆发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武装起义。于是日本殖民者出动大批军队、宪兵和警察,组织讨伐队,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和焚掠,台湾人民遭到空前的大浩劫。在北部,仅被第七旅团在短短时日内杀害的就有 2454 人,整个宜兰平原大半化为灰烬;在中部,云林地区 4000 余房屋被毁,6 天之内,烧掠了 70 多个村庄。“杀良民之父、夺其母、害其兄、又杀其子、杀其妻、害其弟,……且又将其家屋及所有财产焚烧一空,使其无寄生之所。”制造了血腥的“云林大屠杀”惨案。在南部,日军对潮州和恒春进行镇压,“被害者达 2053 名,伤者不计其数”,被焚房屋 5813 户,连日本

① 隅谷三喜男等:《台湾之经济》,人间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26 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 861 页。

人自己也惊呼：“讨伐被害意外之多。”^①与此同时，日本殖民者颁布《匪徒刑罚令》，以此作为镇压台湾人民反抗的法律依据。根据这一血腥法令而惨遭屠戮的台湾同胞，仅从1898年至1902年短短的四年间，便达11950人^②。

凡此种种岂只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所称的“严厉”和“独裁”，简直是骇人听闻，残酷至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如此轻描淡写之后，又立即从正面加以肯定说，他们（日本人）在台湾创造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环境”。这样的评价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三 台湾同胞对殖民政策的反抗和对祖国的向往

自从日本殖民者进入台湾岛开始，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就拉开了序幕，而且自始至终贯穿整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初期的反抗活动集中表现为武装抗日运动。以简大狮、陈秋菊、林李成、柯铁、林少猫等为首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者。初期武装抗日运动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回归祖国是抗日民众的共同心声。例如，陈秋菊、胡嘉猷等人在檄文中公开宣布：“此次征倭，上报国家，下救生民。”他们使用清廷“赏戴蓝翎”头衔和光绪年号，并称“诸国皆我清朝和好之国”，以恢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为诉求。柯铁等人在起义大旗上书写“奉清征倭”四个大字，明明白白是以回归祖国相号召。至于南部义军，则准备“进攻嘉义，歼灭日

①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351页。

② 据日本人后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的不完全统计。王晓波：《台湾史与台湾人》，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4页。

本军,以回复清政”^①。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台湾人民强烈的祖国意识。

日本殖民统治秩序基本确立后,日本资本渗透到台湾产业的各个领域,警察力量深入全岛各地乃至穷乡僻壤,台湾人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普通民众遭受压迫,部分乡绅的既得利益也不免受侵害,于是又爆发了一系列反抗日本资本压迫及警察统治的武装暴动。较著名的如北埔事件、林(汜)埔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西来庵事件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抗运动有的源于祖国辛亥革命的影响,有的以祖国军队将进攻台湾作为号召,有的更以回归祖国为目的。

随着殖民统治的巩固,中后期的抗日运动基本上从武装斗争转为非暴力的政治抗争。在世界潮流的影响下,台湾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发动并领导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如林献堂等人参加的台湾同化会,蔡培火等人在东京开展的议会设置请愿活动,以及蒋渭水、林献堂等人倡导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都试图争取一定程度的参政权和有限的地方自治。台湾的民族运动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意识和祖国意识是台湾人民在反抗日本殖民压迫斗争中涌动在心底的潜流。日本人写的《警察沿革志》也不得不承认:“民族意识牢不可拔。……故其以支那为祖国的情感难于拂拭,乃是不争之事实。”即使是以经济斗争为目标的劳工运动和农民运动,也排斥日本内地人及日本资本,此种倾向从根本上说是出自“民族意识的一个现象”^②。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使台湾人民变成“真正的日本人”,日本殖民者进一步强化了在台湾的统治,推出

① 台湾宪兵队编:《台湾宪兵队史》,龙溪书舍复刻本,第200页。

② 《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一册,创造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一个企图使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的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遭到台湾人民坚决的抵制和反抗。例如,臭名昭著的改换日式姓名运动受到相当的冷遇。1940年2月至8月间,仅有168人改名,其中多为公务员、公卖品出售者,他们迫于切身利益不得已而为之。但其所创姓氏不顾“不得使用今姓所源之中国地名为姓”的禁令,大多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如姓陈的改为颖川、姓黄的改为江夏等,以示对祖国故地的怀念。无怪乎日本台湾军司令称:“岛人(即台湾人)阳表忠顺,而阴怀不逞,常有非国民之言行。”^①

四 台湾经济发展的结果和代价

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台湾,除了地缘政治上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台湾丰富的物产。但是在占领台湾初期,为了镇压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殖民当局军事费用支出庞大,反而使经济萎缩不前。为了谋求财政独立,充分地利用台湾丰富的资源为日本经济服务,日本殖民者提出了“殖产兴业”。通过发行公债,筹集资金,兴办铁路、邮电、港口等官营企业及其他民间企业来发展经济。为此事先开展了土地调查、林业调查、币制改革,和建立金融体制、交通体系等“基础工程”。这些措施也许客观上对台湾本地经济有一些积极影响,但比起为日本帝国主义创造的财富来,实在微不足道。

研究表明,日据初人均真实所得较高的台湾地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工业部门仅勉强达国民经济的四成左右。而明治维新后人均真实所得较低的日本,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工业部门已达国民经济的七成以上。国民经济部门结构中,农业部门份额的降低被公认为经济近代化最主要的判别标志。因此很

^①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帕米尔书店1985年版,第256页。

难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它占领台湾时促进了台湾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况且,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以前台湾地区工业部门内部结构超过70%为以制糖为中心的所谓食品工业。也就是说,事实上日据时期(1937年以前)台湾除了制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可言^①。

简而言之,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它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原料基地之一,也为日本国内资本输出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日本殖民者及日本资本成为台湾社会的主导力量。以米糖为主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台湾经济的主体,台湾经济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殖民地经济的特征。

第三节 中外人士对“二二八事件”的不同认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耻地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的规定及《波茨坦公告》的确认,台湾、澎湖主权回归中国,从而结束了日本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国民政府在台北举行受降仪式,正式宣布恢复在台湾的主权。在光复初期,台湾人民是怀着重回祖国怀抱的激动心情迎接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队,而仅仅过了一年零四个月,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二二八事件”。

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湾省烟草专卖局的缉查员和警察

① 资料来源: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经济结构》及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湾商工统计》。转引自杨宜《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载中国史学会、台湾研究会编《台湾史研究论集》,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

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坊”附近查缉私烟时,用枪管将“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激起民愤,混乱中又开枪射杀一名围观者陈文溪。群众拥到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但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次日,更多的群众围攻了烟草专卖局,并拥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宣布实行戒严,军警巡逻时又与群众发生冲突,局势开始失去控制。台北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全岛各地都出现抗官与排外(省)事件,人们冲击警察局和专卖局等部门,甚至阻止正常交通运输、抢劫军用仓库、烧毁公营机构、释放在狱犯等等,并发生盲目殴打外省人的暴力事件。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叛乱罪名进行血腥镇压。大批民众包括许多台湾知名人士被杀,不少人遭逮捕或失踪,或逃亡^①。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当代史上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有关台湾历史的中外著述无不以许多篇幅来记述这一事件,但对于事件的起因、背景及性质却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不同的认识,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所变化。

① 关于被捕、死亡、失踪人数,无精确统计,各种资料记述差异极大。仅以死亡人数为例,从几十人到十几万人,众说纷纭,即使官方统计也是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事件有关各方都夸大自己的伤亡数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外国观察家最翔实的描述是乔治·克尔的《被出卖的台湾》第14章“三月屠杀”。克尔系美驻台北副领事。他估计大陆人死亡约30~100人,台湾人死亡人数可能像台湾作家经常使用的数字那样约2万人。另,他在《台湾:特许的革命》中写道,至少有1万台湾人被杀死或监禁,数千人流亡海外。关于“二二八事件”较为丰富的统计数字,可参见李敖、陈境圳《你不知道的二二八》,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

一 早期对“二二八事件”的定性

早期对“二二八事件”的反应、评价和定性带有浓厚的形势特点和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正在全面内战的战场上同国民党军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电台广播说:“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① 1975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二二八纪念会”上,廖承志仍宣称:“二二八事件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② 而国民党官方曾一口咬定:“……根据档案,该事件经查明系当时中共潜台分子首领谢雪红等,乘国军调离,驻军空虚,及日本投降后自大陆及南洋各地遣返台籍日军返台机会,以台北查缉私烟为借口,渲染蛊惑,鼓动暴动,企图颠覆政府。此乃中共之一贯伎俩。”^③

二 台湾学者对“二二八事件”的分析

台湾学者对“二二八事件”起因的分析,一般强调国民党政府

① 见王芸生:《台湾史话》。此处转引自李敖、陈境圳:《你不知道的二二八》,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3页。

② 李敖:《“你不知道的二二八”序》,见李敖、陈境圳:《你不知道的二二八》。

③ 见俞国华:《“二二八”为中共阴谋事件》、《二二八真相》。此处转引自李敖、陈境圳:《你不知道的二二八》,第184页。

接收台湾措施失当以及陈仪治台政策的失误。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台籍经济学教授萧圣铁认为,中国政府接收台湾后台湾出现社会成就急速下降的情形:

1. 空前绝后的通货膨胀。据当时统计,台湾光复一年间,政府物资的糖涨价 390 倍,盐涨价 1600 倍,水泥涨价 2570 倍,火柴涨价 100000 倍。战后至 1946 年,农、矿、畜牧业虽然开始恢复,但工业指数则下降到 1945 年的一半。

2. 禁止日人书刊等,使台湾光复后短短一年间,日文报纸完全消除。这不仅剥夺了台湾人彼此之间,也包括台湾人与陈仪之间有效的沟通工具。

3. 推行北京话的国语运动使政府内部台籍人士有遭排斥的感觉。

4. 学校教职员工月薪延迟三个月发放,导致老师和学生普遍罢课;此外疫病盛行,与日据时期重视卫生环境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些使知识分子完全失望。

萧圣铁认为,如果当时中国政府体恤并容忍台湾人使用日语,尊重其所受的日本教育,以减少社会成就与社会期望的差距,动乱似乎可以避免;然而考虑当时中国社会领导阶级的半封建性和社会环境,则动乱是完全不可能避免的。因此,除非是台湾独立或美国占领台湾,“二二八事件”将是不可避免的^①。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徐振国认为,陈仪偏执不化的意识形态,使他不能认识工商业者的正常功能,并与之处于一种对立冲突的状态。例如,陈仪当时面临粮荒、失业、生产萎顿、物价高涨、权力分配、省籍隔阂等难以处理的问题,仍野心勃勃地欲建立一个以

^① 见萧圣铁:《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经济与文化背景》,载《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处转引自李功勤:《中国现代史与两岸关系》,美钟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7~248 页。

生产、交通、贸易和金融为主体的“四大公营支柱”，并以王安石变法自励，我行我素^①。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的叶明勋分析认为，陈仪治台的若干失策，导致惨剧的发生：

1. 沟通管道不良。一方面政府放任不负责任的言论报道，对于缺乏判断力的基层群众，极具蛊惑性和破坏性。此外，陈仪与民间领袖之间的各种沟通管道都未能消除隔阂，例如未借重台中望族林献堂，反而视其为汉奸（林曾任日本贵族院议员——笔者注），不仅对个人造成侮辱，也造成台湾同胞因当地名宿未被重视而产生失落感。

2. 治闽用人不当在台重演。陈仪主政福建时，他的幕僚徐学禹、沈仲九曾因经济政策失当而挂冠。而到台湾以后，他们对陈仪的决策依然具有重大的影响力^②。

三 “台独”分子的大肆渲染

“台独”分子对“二二八事件”的定位，完全是不顾历史真相地加以煽动。他们利用“二二八事件”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诬称这一事件是“中国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野蛮屠杀”，或者说成是“台湾人民反抗中国殖民者的起义”。为此，他们不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耸人听闻。

例如，“二二八事件”的伤亡人数一直是众说纷纭，缺乏精确统计的。“台独”分子便以此信口开河，辜宽敏断言为“5万人”，而史

① 见徐振国：《陈仪的困顿和失败》，载《历史月刊》。此处转引自李功勤：《中国现代史与两岸关系》，美钟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② 叶明勋：《闻道长安似奕棋》，载于1989年台湾《中国时报》；《谁知明月照沟渠》，载于1989年台湾《中国时报》。

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居然认为,“1953年的台湾人口中,被认为‘行踪不明’而从户籍上被削除达十几万人”,说什么“无疑的,其中绝大多数就是二二八起义的牺牲者”^①。台湾文献委员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收有访问“二二八事件”时进驻台湾的国民党21师参谋长江崇林的谈话(当时江被问及对有人认为死亡人数逾2万应该如何评估——笔者注):

国军21师共辖2旅5团及直属5营,官兵计有2万多人,坊间却不着边际说从基隆杀到屏东,血流成河,杀了2万人(每人杀一人),请问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所做的调查统计证据何在?……那时,台湾共分为8县9市,除澎湖外,如依“2万人被杀”的传闻来除,每一县市平均要死一、二千人,请问可能吗?且说,谁能在任何一县市列出一、二千位死亡者的姓名来?^②

而根据国民党当局的统计数字,台湾自开放登记以后,到1955年底也不过1476人^③。这离史明的天文数字不免相差太过悬殊了。

四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西方学者的分析

由于不属于当事者,西方学者往往从局外的角度剖析一些客观因素。例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谈到:

①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文版)》,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版,第792页。

② ③ 见李敖、陈境圳:《你不知道的二二八》。

台湾人虽然讲中国方言,并保持着他们来自大陆的祖先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但是,日本人 50 年的统治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来的大陆人的意识。他们会说日语,有人在日本留过学。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音乐、报刊、电影和其他民间文化的影响。台湾人曾希望自己在管理台湾方面比日本统治时期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看到日本人撤走后遗留下来的位子被大陆人占据了,而许多大陆人只顾没收日本财产和中饱私囊,对建立公正有效的省政府不感兴趣。对此,台湾人感到沮丧。^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述对心理因素的剖析是一针见血,也是中肯和深刻的。中外多种著述有的也在这方面作过分析,但很少明确地把问题定位在心理和意识的层面上。正是台湾民众的心理基础及统治者对此的忽视,酝酿了日后难以调和的矛盾。从这一点上来看,事件的发生似乎不可避免。

从以上中外人士对“二二八事件”的分析和评价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受到许多主观因素的左右。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对史料的不断发掘,各方的某些观点和认识也在逐渐发生一些变化。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分析和论断已浩瀚如烟海,在此笔者认为,有两个根本点是不容忽视的。

其一,我们称之为外在因素,即统治政策方面的失误。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后治台策略“主要系靠特殊化的行政体系加上全面性的经济统治,二者相互为用”^②。具体措施包括:行政长官公署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 876 页。

② 郑梓:《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新化图书公司 1994 年版,第 207 页。

制度,由行政长官掌握行政军事一元化的权力;实施统一接收,全面收缴日本殖民者的财产,不让其他势力介入;保持货币稳定,防止大陆的通货膨胀波及台湾。这些措施是由陈仪和一些台籍人士共同研究制订的,目的本在于避免大陆各省事权分散、牵制过多的弊病,以便集中权力,提高办事效率;确保台湾的财政基础,稳定金融市场。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例如,行政长官公署集全省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与大陆其他地区施行完全不同的制度,台湾本地人很难取得参与政治的机会,而且当时还留用了日本官吏和警察,这一切很容易使人想起日据时期的总督府,因而“从名义上、体制上予台湾同胞以不愉快之观感”^①。接收过程中,官吏腐败,贪污盛行,接收被戏称为“劫收”。同时由于缺乏经营现代产业的能力,台湾光复一年多中,经济急剧衰退,失业人口激增,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从结果来看,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政策是失败的。

其二,我们称之为内在因素,又可称为心理因素,即所谓的“省籍矛盾”。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省份都不曾有过的经历。漫长的殖民统治对台湾民众心理的影响,即使不完全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描述的“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来的大陆人的意识”,但如果认为不值得重视和考虑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这种心理、意识层次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不表现在外的,但在一定条件的激发下,则会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而统治者对此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和体谅,因而未在交流和沟通环节上下功夫。这种由于不同的心路历程而产生的隔阂与矛盾由于经济恶化、政治腐败而大大加深、激化了。例如,光复初期台湾同胞对当时中国正处于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统治之下,半

① 陈鸣钟等:《台湾光复和台湾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册,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页。

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号称“五强”之一的祖国怀有过分的期待,以为从此就可以当家作主,扬眉吐气了。一旦发现新的统治者并非和他们想象的一致,反而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便大失所望,甚至认为今不如昔,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叫“狗去猪来”,意思是说新来的“猪”(外省人)还不如走了的“狗”(日本人)^①。而新的统治者面对他们所陌生的经过日本50年统治的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受到日本影响的一切观念和习性感到格格不入,一律当作是“奴化”的表现。况且由于中国人饱受日本欺凌,仇日反日的情绪极为高昂,于是当“看到台湾到处充满着日本风情和日本话,就批判台湾人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毒素,而以去除毒素文化为当时首要工作之一”^②。国民党政府对台湾民众在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所受到的心灵伤害,不但未予疗伤止痛,反而在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由于双方都缺乏必要的理解和沟通,而又面临经济、政治上的一系列问题时,矛盾的激化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笔者认为,对“二二八事件”起因的分析和定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经“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破坏无遗,虽然事后采取了一些“安抚”措施,但根本不可能抚平这道历史的伤疤。

“二二八事件”的恶果之一,是造成了严重的省籍对立。一部分台湾同胞,由于一时未能看到近百年来大陆同胞也同台湾同胞一样受苦受难,反抗军阀政府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其惨烈程度决不亚于“二二八事件”;再加上蒋政权推行歧视台湾同胞的政策,致使他们误将所有从祖国大陆来的外省人都看作是榨取台湾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从而造成台胞和外省人之间的严重

① 李敖、陈境圳：《你不知道的二二八》，第6页。

② 李碧锵：《李碧锵的回忆》，载《二二八事件回忆集》。此处转引自李敖、陈境圳：《你不知道的二二八》，第4页。

隔膜和对立。在事件过程中,曾经出现见外省人就打的现象。这种省籍矛盾的结果就是部分台湾民众在对国民党政府极度失望之余,产生盲目排外倾向及脱离其统治而独立的思想。国民党退据台湾后,也意识到这种省籍矛盾对其统治不利,曾采取各种措施来化解或缓和矛盾,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 40 多年来的省籍矛盾仍一直是困扰台湾当局的重大难题之一。

“二二八事件”的恶果之二,是为“台独”分子提供了口实。战后的“台独”分子利用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大肆鼓吹台湾“独立”,把腐朽无能的统治者与被压迫人民的矛盾蓄意歪曲为所谓“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矛盾”,煽动排斥外省人的情绪,制造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对立。多年来,“台独”分子年年要翻“二二八事件”的旧账,来挑动民众的这种心理,“二二八事件”成为“台独”分子大作文章的好材料。美国人乔治·克尔在其著作《被出卖的台湾》中恶毒地称:“如果台湾人 1947 年 3 月曾做一番类似他们祖先在十九世纪所作的努力一样,那么他们早已把台湾岛上的中国人扫荡一光了。……也许他们可以轻易地向中国人来次大屠杀。”^①在日本的“台独”分子王育德则称,“二二八事件”使“台湾人十足体会到中国人的狡猾、卑鄙和残忍。……使他们在内心立下坚定不移的誓言——独立而后已”^②。而另一“台独”分子史明在其“台独”巨著《台湾人四百年史》中,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台湾人起来反抗外来中国人统治者的殖民地解放斗争”,甚至“与清朝统治时代‘反唐山’的本地人民起义,及日据时代的‘反日’武装斗争同出一辙”^③。

① 乔治·克尔:《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湾独立联盟发行 1984 年版,第 237 页。

② 王育德:《苦闷的台湾》(自由时代系列业书第 9 号),台北,郑南榕发行,无出版日期,第 162 页。

③ 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文版),第 795 页。

在“台独”分子眼中,“二二八事件”成了利用价值最高的宣传资料。这种历史的和心理的诸多方面的影响,是至今在研究台湾问题时,不应忽视的。

第四节 台湾经济、政治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集团 1949 年仓皇败退台湾时,正陷于一种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全面危机之中。当时的台湾失业人口激增、物价飞涨、巨额赤字、外汇严重不足,经济濒临崩溃;阶级矛盾和省籍矛盾异常尖锐;从大陆仓皇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不仅不足以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反而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另外,由于大陆全境已经基本上解放,国民党统治的“法律基础”荡然无存,政治信誉也因此一落千丈,外交方面连遭挫折,一向支持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美国政府也意欲脱身而表露出对其弃之不顾的势头。总之,此时的国民党统治除了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和外交危机外,同时还面临着美国政治学家卢西安·派(Lucian W. Pye)所描述的“六种危机”,即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①。

尽管随着 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重新开始干涉中国内政,公然出兵阻挠解放台湾,从而使国民党统治所面临的军事危机和外交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是上述种种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仍然困扰和威胁着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退据台湾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维护政治稳定,从而缓和、化解这些危机,确立起自己在台湾的统治。

^① 转引自刘明:《彼岸的起飞——台湾战后四十年发展历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 页。

一 经济建设的成就和高速发展的主客观原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努力发展经济是1949年国民党退台后台湾历史贯穿的三条主线之一^①。台湾经济的发展按年代可分为四个阶段:

稳定和复苏阶段(1949—1959年),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了农业生产。稳定物价,控制了通货膨胀。工农业发展平衡,稳步增长。

高速发展阶段(1960—1970年),工业产品出口猛增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业生产占境内生产净值从1960年的25%升至1970年的35%,工业产品在外贸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32%跃升至1970年的79%。

衰退时期(1971—1979年),石油价格的猛涨严重迟滞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工农业增长速度减慢,但进出口贸易总额则从1971年的39亿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310亿美元。

中美建交之后(1980—1982年),台湾经济受到了世界经济衰退的冲击和影响。台湾当局不得不积极寻求新的市场。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从1949年到1982年,台湾经济的发展是过去30多年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台湾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荣昌盛。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五十年代的约200美元,猛增到1982年的1800美元。在

① “自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撤到台湾以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的历史贯穿着三条主线,即要求台湾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斗争;努力发展经济;在情况不断变化的压力下调整内部政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864页。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台湾大大地走在前列。它与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一道,被称为西太平洋的“四小虎”。在发展中国家中,它们以经济的高速发展著称,而这种发展主要靠对外贸易。^①

对于战后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少人认为是一个“奇迹”,中外学者对此已经作过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某些台湾和西方学者甚至提出“台湾经验”(Taiwan Experience)这一概念,认为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和模式可以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普遍样板。《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析了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认为:

其发展之快,是由诸多不寻常的因素结合而形成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比较发达的基础结构;拥有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的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商人和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前15年获得的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政治稳定;上层官员愿意听从专家的意见^②。

中外学者虽各抒己见,广有著述,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上几个主要因素。事实上,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述,台湾经济异常快速的生长,是由许多特定因素共同决定的,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和特殊性。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决不可能上升为具有某种示范意义的所谓“台湾经验”甚至“台湾模式”来加以渲染和要求别人照搬。这里想就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定因素作一个分析,谈谈我们的看法:

1. 日本人留下的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918页。

② 同上书,第864页。

在长达 50 年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基于自身的利益和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地政策,即由殖民地台湾向日本本土输送农产品和初级原料,大力发展日本的工业经济,而台湾所需的工业产品则全部从日本输入。为了源源不断地榨取牛奶,就必须把牛养肥一些。一个贫困、落后、混乱的台湾显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也不利于其殖民统治的稳固。因此,为了使台湾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的“补给站”,日本殖民者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开发台湾经济。例如,进行土地测量,地质勘测,森林资源调查;改革某些旧有的封建色彩浓厚的土地制度;着重推广现代化农业技术;大规模兴修水利、电力设施;修建公路、铁路,发展交通;统一度量衡和币制,建立金融系统等等。这些措施虽然无一不是为殖民统治服务,但在客观上也确实对台湾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建立的这些制度和基础设施,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被炸或管理不善遭到严重破坏,但仍然保存下来一部分。况且被破坏的物质设备基础、规模还在,恢复和重建起来毕竟比创新或从头建设要容易和快得多。另外,殖民者建立的比较先进的管理制度以及大量的数据统计资料也并未随日本技术和管理人员撤走而带走,这也是一大批有形和无形的资产。在此基础上进行重建,可以节省大量的经费和时间。1946 年 11 月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工厂共 5969 家,其中食品工业 2815 家、机械器具业 645 家、化学工业 620 家、金属制造业 116 家、纺织业 109 家,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类日本企业达 775 个。这些工厂计有工业从业人员 25 万人,受过大学或高等技术专业教育的有 1500 余人^①。国民党政府又及时调集了一大批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赴

^① 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台,先实行监理,由原负责人经营生产,然后再逐步接管。因此,到国民党当局迁台之时,台湾经济已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

农业生产技术较为成熟。农产品中尤以稻米、蔗糖产量增长最快。当时人口 600 万的台湾,稻米产量达 140.2 万吨,人均近 470 市斤;而蔗糖的出口量则占出口总额的 60%~70%^①。

工业具有了初步的基础和规模。农产品加工如制糖、凤梨(菠萝)、榨油、制茶等均有一定的发展;一度由于战争的需要,化学工业中的酸碱、肥料工业和重工业中的炼铝、炼铜、机械、修船等工业都已初具规模;造纸业和纺织业也有较大发展。另外由于电力供应充足,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交通运输便利,电力充足。日本投降时全岛已有铁路 3922 公里,公路 7272 公里,还有基隆、高雄、花莲等重要港口和 17 个飞机场。经国民党当局接收后修残补缺,到 1952 年已有铁路 6100 公里,公路 15600 公里。发电量在日本统治时期最高达 12 亿度,1945 年降至 4 亿度,1949 年已恢复至 8.5 亿度。到 1952 年,全岛已有大小发电厂 32 个,大部分城镇已用上了电^②。

教育有所发展。日本统治时期,曾强制推行同化政策,为此修建了不少中小学校。虽然进行的是日式教育,但客观上普及了文化知识,降低了文盲率。据 1946 年统计,台湾 6 岁以上“国民”的文盲率为 55%,属于当时全国文盲率最低的省份。与之相比,当时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15 岁以上国民的文盲率却高达 81%和 65%^③。

除此之外,日本殖民者对土地、森林、矿产等重要经济资源进行了调查勘测,留下一些统计资料;建立了一套农业组织、赋税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同时初步发展了一套金融体系。这些

① ② 刘建兴、黄文真:《台湾经济介评》,中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1 页。

③ 同上书,第 122 页。

都为后来的国民党当局提供了现成的资料,为战后经济的重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那么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价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基础对台湾经济所起的作用呢?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王作荣认为,日本占据台湾 50 年,遗留的经济基础对以后台湾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容许夸大,但亦不应予以抹杀”。日本人遗留下的若干经济基础确实对 50 年代初期台湾经济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不过也应清醒地看到台湾人民为此而承受了巨大牺牲,它实际上是台湾人民的血汗结晶。

王作荣在谈到日本对台湾经济的这一“贡献”时说:“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经济环境的剧烈改变,其重要性 with 适用性自然会不断降低,以至消失,但在最初时期的重要性不能轻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至少要延后几年。……以工业来说,我们先是在日本人遗留的基础上,检修日本人的工业,而未另起炉灶。”^① 据 1945 年被派赴台湾接收日本工矿业 of 化工专家严演存先生回忆,当年成立的台湾肥料公司就是从毁于炸弹的 3 个日本小型肥料工厂修复的。1948 年又将一个日本海军的电石厂扩建成为氮肥工厂^②。

2. 从大陆汇集的大批物质与人力资源

1949 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时,将其在大陆的资本以及大量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一并带到台湾。这批从大陆流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填补了日本人退走后造成的空白,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资金。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宣布“引退”后,仍以国民党

① 王作荣:《我们如何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23 页。

② 严演存:《早年之台湾》,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1989 年版,第 84 页。

总裁的身份密令台湾省主席陈诚和上海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的大批黄金、白银、银元秘密运往台湾。根据 1949 年 12 月“中央银行”的报告,当时国民党当局银行库存黄金 395 万两,白银 1136 万两,银元 398 万多块^①。又据程思远先生回忆:“蒋介石令蒋经国赴沪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发行金元券得来的黄金、白银、外汇等共计 3.7 亿美元秘密运往台湾。”^② 另有资料证明,国民党先后分三批实际运往台湾共黄金 277.5 万两,银元 1520 万元^③。这批资金对于迁台伊始立足未稳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在控制通货膨胀、缓解财政困难、维持 800 万军民的生计等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技术设备。1949 年前后随国民党集团撤退到台湾的军民约 200 万人,多系军人、公务员、教师及其眷属。企业界人士及其资本设备迁台的虽然为数不多,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资本及技术设备,对当时台湾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贡献却极大。“一直到今天为止仍是台湾最主要的工业及最主要的出口工业的纺织业,当时几乎全为大陆资本及设备。其他现在仍占重要地位的工业如木材、化学等,当时也大部分由大陆资本经营”^④。据统计,1953 年前后台湾成立的 11 家棉纺企业,有 10 家来自大陆资本。棉纺企业的纺锤数在几年内增加了近 10 倍,纺织业成为仅次于糖业的第二大制造业部门^⑤。随着这些大陆企业、工厂的迁台,一大批机器、器材、设备

① 刘建兴、黄文真:《台湾经济介评》,中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3 页。

② 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

③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载 1990 年 1 月 8 日《人民日报》,第 6 版。

④ 王作荣:《我们如何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21 页。

⑤ 黄东之:《台湾之棉纺工业》,台湾研究丛刊第 41 种,第 21 页。

及技术也随之带人,对台湾经济最初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人才。西方学者顾志耐(SimonKuznets)曾说:“工业先进国家的主要资本不是其生产设备,而是由实地试验结果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以及人民有效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①与物力、财力资源相比,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意义长远、难以估量。

台湾光复初期,日本在台湾的工矿企业中的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全部撤走,对当时台湾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大批的中基层技术人员、工人都是台湾本地人。另外,国民党在接收台湾之初从大陆调集了一批有学识、有经验的官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到台湾,使得台湾原有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厂矿企业能迅速地恢复生产。在1949年前后,又有一批各行各业的高级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经济行政人员以及私人企业主迁台,他们与1945年接收台湾的技术人员一起,填补了日本人撤走后留下的人才真空,对当时台湾经济的稳定以及日后的“起飞”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割断台湾经济与祖国大陆的联系,曾经无中生有地说,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岛的200万军民都是“光着屁股去的”,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恶意贬低。

3. 美国的经济援助

我们通常所指的“美援”,仅指国民党集团败退台湾之后接受美国的各类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以及国民党退台之前所接受的援助不包括在内。国民党政府最早接受美援是在1948年7月。根据中美双方在南京签订的《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间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由美国政府提供对华援助。由于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美国政府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中美关系白皮

① 李国鼎、陈本在:《我国经济发展策略总论》上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5页。

书》，对国民党政府不再抱幻想，意欲从中国“脱身”，因而原来允诺的 2.75 亿美元援助仅支付了 1.7 亿便停止。直到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的战略地位急速回升，美国决定重新介入，于是在 1950 年 9 月再次成立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从 1951 年起恢复对国民党当局的经济援助。据统计，从 1951 年恢复美援开始，到 1965 年 7 月美援停止，台湾当局在前后 15 年中接受美国各类经济援助共 14.822 亿美元^①。这一数字对当时只有 1000 万人口、经济亟待发展的台湾来说，其作用无疑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美援在消除台湾的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平衡外汇收支方面作用巨大。当时，美援通过相对基金的形式补助台湾当局的预算，总数达 101.9 亿新台币，使台湾不但消除了财政赤字，而且有较大数目的储备，从而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据统计，台湾当局在第一期经建计划期间（1953—1956 年）降低通货膨胀率 7.74%，第二期经建计划期间（1957—1960 年）降低 1.35%，第三期经建计划期间（1961—1964 年）降低 4.11%^②。台湾经济发展初期，物资严重短缺，外贸进出口严重不平衡，经常出现大量逆差。美援的注入，弥补了外汇收支逆差，在出口创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得以进口所需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原料，有时甚至起到救急的作用。例如 1951 年 4 月，台湾的外汇存底用罄，而且还欠外国银行 1000 多万美元，全赖 4000 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才得以过关^③。同时，运用美援进口的大量物资还成功地协助抑制了物价上涨。

① 王作荣：《我们如何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时报出版公司 1984 年版，第 125 页。

②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8～50 页。

③ 刘建兴、黄文真：《台湾经济介评》，中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2 页。

其次,美援刺激了岛内资本的快速增长,加速了岛内投资环境的形成。从1952年到1958年的7年内,占总投资额1/3到1/2的美援实际上成为台湾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来源^①。另据统计,台湾当局运用美援的重心有4项:扩充基本建设占37.3%,增加人力资源占25.9%,发展农业占21.5%,发展工业占15.3%^②。这表明用在电力、运输、通讯等基础经济设施上的美援所占比例最大,而基础经济设施的建设又是衡量投资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可以说,美援为改善台湾投资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广义的“美援”则除了“经援”以外,还包括军事援助、低息贷款、直接投资、“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等。根据一项统计,截止到1980年底,美国等国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台湾的资金累计达205亿美元,“技术合作”项目为1700余件。台湾一高级经济官员曾著文称:“如果没有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合作,那么台湾经济的发展至少要比现在落后20~30年。”^③事实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把台湾作为它在亚洲的一块反共“样板地”以及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重点地加以扶持的。

4. 有利的国际环境

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也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外部环境。50年代末和60年代,是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发展的“黄金时期”,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革命,开始大力发展本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

① 王作荣:《我们如何创造了经济奇迹》,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28页。

② 刘建兴、黄文真:《台湾经济介评》,中信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③ 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形成垂直分工体系。这一时期外国人和华侨在台湾的投资猛增,1965年到1972年投资总件数达1354件,投资总额达7.56亿美元,平均每年近1亿美元^①。台湾利用这一时机,采取开放政策,一方面引进大量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资本及技术,利用台湾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加工和装配;另一方面,把进口替代工业转变为出口导向,将上述产品销往国际市场,从而出现较长时期的出口繁荣景象。1965年美援基本停止后,大量的外来投资和技术输入无疑对台湾经济起到了输血的作用。外资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此外,世界能源及其他重要原料价格低廉,为台湾的出口加工型工业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越南战争的爆发,使台湾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大型“供应基地”,台湾获得大量订单,极大地刺激了工业的发展;美国市场对台湾开放,成为台湾主要的出口地,加上美国经济持续稳定繁荣,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使得台湾对美出口额不断猛增。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不是任何时期都存在的。

5. 台湾当局的政策措施

战后台湾经济发展迅速,除了上述一些外部因素的作用外,内部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这是因为,外部因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历史阶段性,并且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因而作用是重要的但不是无限的。相比之下,内部因素具有一般性、长期性和必然性的特点,是主要原因。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之后,汲取和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利用客观条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狠抓经济建设,并为此制订和采用了一些较为实际的策略和方法。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逃到台湾后,可以说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人口激增,大量失业,财政赤字庞大,物价飞涨,

^① 隅谷三喜男等:《台湾之经济》,人间出版社1993年版,第48~50页。

经济近乎崩溃,同时社会动荡,省籍矛盾激化。以致当时的外国报纸凡提到“中华民国政府”,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一个垂死的(dying)形容词,等待签发死亡证明书”^①。稳定和重建经济成为当时关系生死存亡的首要任务。因此从1949年开始,当局推行了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进行土地改革。

台湾光复后,保留了日据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土地占有不均现象十分严重。56.01%的耕地为只占农村人口11.69%的地主所有,而占农村人口88.31%的农民却只占有22.24%的耕地^②。国民党当局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意识到“允许佃农和长工在地主的剥削之下呻吟,不仅是个土地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局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存”^③。因此从1949年到1953年,先后分三个步骤实施土地改革:(1)三七五减租。耕地租金不得超过其主要作物年收获量的37.5%;(2)公地放领。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国有”土地出售给农民;(3)“耕者有其田”。征购地主超过限额的土地,按公地放领方式出售给佃农,地价可分十年支付。

土地改革的结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稳定和发展了农业经济,从而缓和了农村社会矛盾,巩固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瓦解了农村封建土地制度,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乃至政治结构,为之后的资本积累和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当局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改革币制和税制,

① 梁芝编:《台湾经济剖析》(第二集),香港广角镜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页。

② 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页。

③ 陈诚:《台湾的土地改革》,中国出版公司1961年版,第21页。

实行外汇和贸易管制；加强军工与生活必需品、外销产品及进口替代品的生产；以电力、肥料和纺织工业为优先发展工业。经过这些努力，1952年台湾经济已大致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高水平。

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在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业培植工业”的同时，采取进口替代政策，重点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替代进口，从而节省外汇和增加就业。1953年，台湾开始实施第一期四年经建计划，为此采取了以下措施：对已能自己生产的产品设置高关税进行保护；管制进口；实行复式汇率及外汇管制；限制设厂，防止岛内工业部门盲目竞争，把有限资源集中于亟需建立的工业部门。

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策略大大提高了工业发展水平。1953—1962年间，工业生产总值以年均11.7%的速度增长，其中制造业年均增长12.5%，是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工业占台湾岛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52年的18.0%提高到1962年的25.7%。制造业行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许多新工业产品不断涌现，替代了进口产品^①。

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口替代工业因岛内市场的饱和而产量过剩，使工业增长速度减慢。当局开始采取鼓励出口政策，以岛内过剩的轻工业品出口代替传统的初级农产品。为此采取的措施有：实施《奖励投资条例》、《技术合作条例》，改善投资环境；实行奖励出口、放宽进口的外汇贸易政策；放宽过去的各种经济统制、企业保护和外汇管理，恢复市场正常机能；实现经济运营制度化，创设资本市场等。这些政策和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1960年到1972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从4.61亿美元迅速增长到55.02亿美元，增加近11倍。其中出口额由1.64亿美元增长到29.88亿美

① 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版，第826页。

元,增加 17.2 倍,出口年均实质增长率达 24%。到 1971 年,外贸首次出现了 2.16 亿美元的顺差。另外,在此期间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10.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 154 美元增加到 522 美元^①。60 年代成为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

从 70 年代初期开始,台湾当局在继续大力推进出口扩张工业的同时,积极推动“第二次进口替代”,即在岛内制造业中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替代同类进口产品。为此,主要发展重化工工业产品替代进口,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发展体系。同时大力建设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由于及时进行经济调整,在 70 年代世界经济受到石油危机冲击后出现衰退的背景下,台湾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进入 80 年代,台湾经济受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出口竞争力因能源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大幅上涨而严重衰退。当局开始改变发展策略,转而强调积极发展机械、资讯、电子、电机、运输工具等附加值高、能源密集度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于 1980 年设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吸引岛内外厂商前往投资高科技产业。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从复苏、“起飞”到“繁荣”,是与其坚持一切以发展经济为根本的战略思想,以及采取相应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与措施是分不开的。另外,台湾当局还一贯重视教育,注重后备力量的培养,重用一批技术专家。这些都是促进经济乃至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之,如果把以上谈到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因集中起来加以概括,则不外乎四个字:一是“丢”,即日本人丢下的一点底子;二是“带”,即国民党从大陆带去的一点家当;三是“给”,即美国政府给

^① 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总览》,中国财经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21 页。

予的巨额“经援”；四是“赚”，即台湾当局利用天时地利，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工出口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其中，这最后一条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最后一条，前三条就不能发挥作用。而这些原因的特定性和特殊性十分明显，而普遍适用性显然欠缺，使其很难成为对发展中国家有示范意义的经验或模式。

二 政坛格局的演变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败。

共产党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技术上，特别是在农村，都优于国民党。当蒋介石将其政府撤到台湾时，他知道必须优先建立一个更有效的政府和政党，恢复士气，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和派别之争^①。

另外，“蒋的目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样板省，作为收复大陆进行建设的坚实基础”^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述了台湾政治格局从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初到 80 年代初的发展和变革，认为虽然台湾国民党当局受到政治制度僵化、一党专权、严格限制政治上的反对派等等指责，但经过几十年来台湾政局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调整内部政策或者说渐进的政治变革成为台湾历史的主线之

① Tong, Hollington, Chiang Kai-shek. Taipei: China Publishing Co., 1953. P490. Crozier, Brian,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Eric Chou, *The Man Who Lost China: the First Full Biography of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Scribner, 1976. P353.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82)》，第 875 页。

一。

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加入了国民党,台湾人在党政部门也可担任要职。独立的政治家参与了地方和省的选举,有时还在一些重要的竞选中击败国民党的候选人。自1969年以来,国家选举机构不断增选新成员。虽然仍禁止谈论某些敏感问题,但近几年来允许新闻界争论的问题的范围已有所扩大。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政府内部和政治反对派之间都造成一种共识:政治改革必须加速进行^①。

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没有发生过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的困扰,也极少发生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那种政治动乱及其他社会骚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认为,经济的进步是台湾政治稳定的主要原因。

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而且有信心使自己的孩子今后生活得更好时,他们就不会轻易被革命的花言巧语所煽动,去参加对抗或使用暴力,以强制手段进行政治变革;大多数群众就会同意政府强调法制秩序和实行逐步、渐进的变革^②。

此外,作者认为有助于台湾政治稳定的因素还有:蒋氏父子统治的合法性被逐步接受;国民党实行坚定但适度压制性的统治;大陆共产主义的威胁;大陆人和台湾本地人之间矛盾的缓和。这些分析和评论虽然不无道理,但似应加以深化和补充。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865页。

② 同上书,第919页。

对于台湾政治格局的演变,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探讨:

1. 政治体制的转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以政治体制为代表的上层建筑的发展演变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回顾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我们认为其政体的经济基础已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逐步地过渡到公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体。1949年国民党退台时,在大陆时期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的资本未能全部转移到台湾,此时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主要是蒋介石集团的官僚资本。随着台湾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官僚资本一花独放、一家独裁的局面逐步为地方公营资本主义或者说地方官府性的资本主义所取代。这一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50年代。国民党施行土地改革,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村经济土崩瓦解,大批地主将获得的巨额土地资金投入工商业,增加了资本积累,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美国援助台湾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许多低利贷款和经援物资都以私营工商业者为对象。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建立的进口替代时期的“内向型”经济,亦引导大量民间资本投入工商业,从而使台湾的传统工业得以迅速恢复,特别是建立了许多新的轻纺工业,台湾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开始从此确立和急速发展。

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时期。为了建立“加工出口”型经济,国民党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起飞”。在这一过程中,以一批民营大企业为核心所建立的集团企业逐步发展起来,其资本势力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同时,地方公营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起飞”过程中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石油化工、机械、电力、化纤、电子等一大批公营企业建立起来。这种以地方私人财团以及大批公营资本为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就成了国民党在

台湾赖以维持统治的重要经济基础。

第三阶段是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以实施经济“升级”为中心的第二次进口替代时期。这次经济转型以发展国营资本主义经济为先导,着重建设重化工业。80 年代以后逐步发展为“十大建设”、“十二大建设”和后来的“十四大建设”。主要是发展交通、港口、核电、钢铁、造船、石化等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并且以“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为“升级”的基本政策,从而确立了地方国营资本主义经济在台湾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台湾政治格局的演变是统治集团经济基础变化的反映和必然结果。台湾地方国营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使得代表其利益的以台湾本土人士为主体的新生政治力量崛起而成为“主流”。他们不但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甚至使国民党自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强人政治”被迫逐步走向“民主政治”,“一党专制”也被迫逐步让位于“政党政治”。从这一点来看,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而逐步走向被动适应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2. 国民党自身性质的转变

国民党在退台初期是一个从组成上来看基本上由大陆籍人士组成,从性质上来看实际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以及自身的改造,已逐步转变为一个以台籍人士为主流的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一转变过程以国民党的两次“改造”为里程碑。

第一次“改造”是在 50 年代初期国民党退台伊始。这一次“改造”确立了国民党在台湾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领导体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客观上也促使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一定的量变。在“改造”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完整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政客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和基层的领导层,使国民党的成分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理念开始在国民党内

占据一定的发言阵地。由这批跻身政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政客参与制订的政策及相关文件,首次确定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要“以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以民主集权制为组织原则,以实现主义、尊重组织、深入民众、讲求效能、精诚团结为整顿作风的准备,以原则领导、一元领导、民主领导为推动工作,发展组织,执行政策的方针”^①。显而易见,这里已隐约地显现出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另外,国民党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在实际行动上印证了国民党朝着资产阶级政党方向发展的意向。“土地改革”使带有封建色彩的土地所有制基本解体,自耕农在农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而“地方自治”的贯彻实施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分治原则。

第二次“改造”是从1969年至1981年,尤以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为标志。面对“外交”溃败,社会矛盾上升,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局面,为了应变求存,蒋经国开始对内进行政策调整,实施“新人新政”,推行一系列“革新保台”的措施,其核心是促进“本土化”,即向社会内部寻求支持,笼络台湾本土的政治、经济精英,以达到巩固国民党统治的目的。为此蒋经国对“行政院”进行了大幅度改组,吸收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破格提拔国民党第二代,大批所谓“技术型官僚”如李登辉、李国鼎、孙运璿、蒋彦士等进入国民党权力机构。在国民党内部也采取“启用青年才俊”的政策,注意吸收和启用台籍人士。从1972年到1976年,台籍党员人数增加到全体党员的一半以上,国民党成为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党。通过这次“改造”,“使大批在台湾生长的年轻力量涌入各级政府和党务机构,国民党在政治意识、组织形态和年龄结构上都出

① 宋春、于文藻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现明显变化”^①。国民党当局与台湾民众的矛盾有所缓和,省籍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蒋经国个人的权力地位得到巩固和强化。更为长远的影响是,使国民党内部权力机构发生退台后第二次重大改组,具有现代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的数目显著增加,地位也有显著提高。通过这些人推动的“十大革新”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政策,基本上贯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和思想意图,使得国民党进一步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

3. “党外”势力的发展

所谓“党外”,一般是指台湾国民党以外与国民党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分离运动、自治运动、反对运动、社会运动、本土运动和民主运动等不同政治力量。“党外”势力的组成成分复杂,政治主张不一,内部经常发生矛盾,因此在运动中不断地分化和重组。

早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雷震、李万居、吴三连等代表中小企业主和地方政客利益的党外人士组成早期的反对派,以《自由中国》杂志为阵地,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筹划组建反对党。他们虽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因而始终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势力。同时筹组新党的运动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怒和不安,发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群起而攻之,并最终予以严厉镇压。但这一事件打破了国民党退台后台湾政坛的沉寂局面。

到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期,代表台湾新兴中产阶级利益的党外人士,如康宁祥、张俊宏、姚嘉文等人,组成新一批反对派。他们以创办政治杂志和参与选举为主要方式,向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发起挑战,比早期党外运动基础更广、势力更大、手段更高。出现了“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等震动台湾政坛的重大事件。

“党外”势力的崛起与发展反映了民众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

① 范希周:《国民党的政治改革及对其大陆政策的影响》。见朱天顺主编:《当代台湾政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2 页。

治体制日益强烈的不满,对旧的政治格局形成强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从外部促进了台湾政治的多元化和多党政治格局的最终形成。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析台湾政治的发展变化得出的某些结论在今天依然具有实践意义。例如作者认为,只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才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而政治稳定也有赖于可观的经济上的进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对于当前正在进行改革和经济建设的中国来说,是有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的。当然,对于政治稳定的内涵,我们的理解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是不尽相同的。

第五节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决不仅仅是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对台湾的历史,尤其是国民党退据台湾后的历史的研究,是不能忽视美国这一重要因素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美国对台湾事务的干预作了一定的记述。虽然由于立场和价值观的截然不同,作者对问题的见解与我们有很大差异,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研究依据。

一方面,作者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干预的出发点是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例如,作者为美国政府出尔反尔,出兵阻挠解放台湾辩护:

杜鲁门总统及其顾问认为,1950年6月对南朝鲜的入侵是苏联支持的,目的是扩大苏联统治范围,此后苏联还可能在
美国及其盟国所设置的包围圈上的薄弱环节进行试探。总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台湾为共产党集团所控制是轻率的。

而且,他如果继续拒绝共和党参议员支持国民党保卫台湾、防止中共进攻的要求,他所需要的两党对美在朝鲜军事干预的支持将会减弱。^①

从另一方面讲,作者基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就美国对台湾的干预进行分析,则反映了美国的真实意图。

朝鲜战争是美国对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的转折点。种种迹象表明,中苏合作关系密切,美国希望一种中国式的“铁托主义”能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的幻想开始落空。……美国人看来,50年代初期,中苏联盟已牢固地建立起来,并不断发展,对其周边的非共产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美国政府已不愿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台湾,认为台湾是正在发展的西太平洋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台湾位于美国北方盟友日本与南朝鲜以及南方盟友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战略地位重要,对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展具有重要作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1950年夏访台后,提出了一个使人难忘的观点——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为了把台湾正式纳入美国发起的安全体系,并制订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对台经济与军事援助计划,美国于1954年12月与中华民国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②

对照于此,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言行不一、前后矛盾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如果说作为西方学者,作者对台湾的某些研究尚能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868页。

② 同上书,第868~869页。

“旁观者清”的话,那么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所在及扮演的微妙角色的认识上,不免“当局者迷”了。对此,我们认为必须强调以下几点:

一 美国觊觎台湾由来已久

早在 1854 年,美国东方舰队司令 M. C. 佩里曾率领舰队到台湾进行资源调查。他在调查后上书美国政府,力主美国占领台湾,使之成为“美国确保西太平洋秩序的前锋阵地”,因为“台湾在海军和陆战上的有利位置,只要美国能控制台湾也就能控制中国”^①。1858 年,美国与英、法、俄等列强联合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使台湾成为允许外国人居住和通商的开放地区。随后,台湾的安平、沪尾、打狗、鸡笼等港口,先后成为向外国人开放的通商口岸,美国则同其他殖民主义者一起侵入台湾。1895 年,中国因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澎湖被割让给日本,沦为日本殖民地,美国势力也一度被排挤出台湾。

直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圈内又有人重新萌生了染指台湾的野心。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自身卷入了全球性战争,使国内孤立主义势力受到打击,美国开始注重其海外利益;另一方面,日本在远东以台湾为军事基地,给美国以沉重打击,从而使美国开始意识到台湾在其远东战略利益上的重要性。

在对日作战中,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曾经试图军事占领台湾。1942 年,美国军方在制订军事战略时,计划从海上攻占台湾,登陆后即成立临时军政府,对台湾进行托管。为此,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G-2)对台湾岛做了机密的战略测量。1943 年,陆军

① 黄嘉树:《台湾能独立吗——透视台独》,南海出版公司 1994 年版,第 2 页。

部所属空军和海军部也开始制定轰炸目标和时间表。1941年和1945年初,海军部制定了12套相当完备的民政手册,打算作为登陆台湾后军政府人员行动的原则^①。曾先后在陆军、海军及国务院工作并担任过美国驻台副领事的乔治·克尔,于1942年初曾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探讨了战后处理台湾问题的各种可能方式。他主张对台湾实行国际管制,在台湾南部设立警察基地,运用台湾丰富的资源,来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没有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来掌管复杂的经济”,因此“中国将无法负起管理台湾的全部责任”^②。身为所谓“台湾问题专家”的克尔呼吁华盛顿当局确立一个明确的“台湾政策”。他甚至露骨地称,历史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也指出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于(当时)中国大陆诸行省,“如此重要,我们不能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③。1942年7月,美国军事情报局远东部门主管被邀陈示该部门关于占领台湾为整个战略一环的意见,称“总括来说,军事部门认为,战后华府政策决定将以‘开明的自我利益’为依归,美国的长期利益为优先……”^④

由于对日作战中的中、美两国是盟友,美国又希望中国牵制日本,配合太平洋海空作战,因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尚未对染指中国领土的设想予以重视。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共同正式发布的《开罗宣言》规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宣言庄严宣告了中国政府在战后对台湾恢复行使主权。

① 乔治·克尔:《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湾独立联盟发行,1984年版,第13页。

② ④ 同上书,第16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尽管如此,美国军方仍未放弃托管台湾的计划。他们试图“取得中国的同意,由美国单独军政管理台湾,一直到日本投降和战后总解决为止”,“顶多只可答允象征性的中国参与”^①。为此,自1943年12月至1944年11月,美海军着手建立一个相当完备的军官训练计划,培训未来托管台湾的军政人员。曾参与这项培训工作的乔治·克尔写到:“我们需要一些军官准备负责控制和指挥民间经济体制的各部分——警力、公共卫生、医药服务、交通、教育、商业和大凡有影响重大民生补给的工业等。……于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海军军政学院,设立了一个特别研究中心,而就在这里,有一所谓‘台湾组’草拟一套十本民政手册、作战地图和一大集未经发表的训练资料……”^②

由此可见,在对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军方意识到台湾在太平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曾萌发军事占领台湾,并置之于国际托管,实际为美国所控制的企图,并做了许多实际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在关于海军战略攻击方向的辩论中,主张首先攻占菲律宾的麦克阿瑟的意见压倒了主张首先攻取台湾的尼米兹的意见,从而使托管台湾的计划胎死腹中,为此而训练的近千名军政人员也被遣散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俄等大国共同签署了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条重申了“开罗会议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这使台湾主权回归中国进一步得到确认。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接收了台湾。

但是,以乔治·克尔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人对“托管台湾”仍不死心。1946年初,克尔被任命为驻台的副领事,他不断散布否定

① 乔治·克尔:《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湾独立联盟发行,1984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开罗宣告》效力的言论,称《开罗宣言》不是慎重草拟的文书,“而只不过是一种承诺,要分割摇摆在狐疑的中国人面前的战利品而已。它仅是一种表意宣言,答应重划日本人占有的领土”,“无论如何,开罗宣言,就其原文的历史不正确性和其措辞的夸张是值得注意。……(宣言)伏下一个危险的陷阱。对美国利益的损害,有一些将永无弥补的可能”。他甚至称:“总统和总理均没把开罗会议看成很严重的事,……这合约……维持不到十天以上。”^①1946年1-4月间,美国陆军情报部在台湾进行所谓“台湾民意测验”,由美国驻台副领事克尔和情报组长摩根上校主持,最后捏造出的荒唐结论是:台湾人认为“中国不好,美国好”,“台湾人不愿受中国管,而希望美国来管”^②。

1947年2月,爆发了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二二八事件”,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不少人则到美国大使馆避难,个别“台独”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当时美国官方的态度是不介入矛盾,但从那时起有关官员已感到台湾局势不稳,开始主张美国干预。1947年3月3日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什么“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的名义直接干预,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了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同年5月1日,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巴特沃斯致函国务卿,认为台湾人民与他们的国民党“解放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美国“潜在的”利害关系极

① 乔治·克尔:《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湾独立联盟发行,1984年版,第21~23页。

② 《台独的成长与演变》,载1994年10月25日《新香港时报》。

大^①。5月26日,刚卸任的驻台副领事乔治·克尔向国务院远东司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首次提出要准备应付台湾可能为共产党所控制的问题。他称,目前台湾的混乱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对美国不利,轻则至少台湾的物产不能为远东经济所用;重则共产党可能成功地“渗入”,消灭南京代表,对台湾丰富的资源和轻工业潜力进行强有力的控制。为了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台湾必须置于联合国或美国监督之下^②。同年8月,陆军中将魏德迈出使中国过程中到台湾进行了详细调查后,致函国务卿马歇尔称,台湾物产丰富,能源充足,铁路、公路良好,人民教育水平高,与大陆成鲜明对比。他还说,台湾人民曾热情盼望从日本桎梏中解脱,但是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了敌对情绪,“各种情势显示,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美国保护和联合国托管,他们惧怕中央政府会榨取台湾人血汗以供养摇摇欲坠,腐化无能的南京政权……”^③。于是“托管台湾”之声再起。当时,主张对部分中国领土实行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托管者实际上远不止魏德迈一人。

由此可见,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从未减少对台湾的兴趣,时刻觊觎台湾。尽管上述主张当时尚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美国官方对外也一再声称不介入台湾事务,但是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再证之于一年多后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提出的各种方案,说明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构想早在那时已初露端倪:美国主张台湾归还中国,是以中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内为前提。只要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不稳,就意味着这一前提发生变化。后来,在美苏关系

① 沃伦·柯恩:《艾奇逊及其谋士与中国》,载《未定之秋》,第25页。转引自《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载资中筠、何迪编的《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 魏德迈:《事件中心》。载乔治·克尔:《被出卖的台湾》。

日益紧张、冷战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面临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台湾的可能性时,美国果然图谋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甚至背弃《开罗宣言》也在所不惜。

二 美国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

从1948年秋冬之际开始,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节节败退,美国政府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一面考虑从中国内战问题上“脱身”,一面也开始考虑把台湾问题与中国大陆分开来处理。1948年11月,美国国务院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一旦失去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对美国安全可能受到何种战略上的影响”作出估计。参谋长联席会议通过分析,肯定了台湾岛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满洲落入苏联手”,中国大陆又为“共产党控制”,此时台湾如果为其所利用,会使美国在远东的整个防线被打断。因此得出结论: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不让共产党统治台湾,保证其留在对美国友好的政府手中。但当时形势的发展已很可能使美国失去对台湾的控制,于是美国政府从此开始在“分离台湾”上大做文章。

1949年1月美国国务院向总统提出了一份全面对台政策报告,几经补充,到了3月初正式由总统批准,成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该项政策以军方对岛上国、共和当地势力的分析为基础,提出美国的基本政策目标是“不让台、澎落入共产党手中”。“为达此目标,最切实的手段就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分割开”^①。这是美国首次明文确定以割裂中国领土台湾为基本目标。关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国务院和军方曾经探讨过军事手段的可行性。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认为,美国在全世界承担的军事义务已与其实力不相

^① 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称,台湾对美国固然在战略上有重要性,但并不像欧洲一些地区与美国切身安全有关,因此“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的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①。但是军方又建议,鉴于台湾的重要性,可用少量军事力量支持政治行动。军方的意见遭到国务院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会破坏“美国在中国出现的新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小心掩盖我们想使该岛脱离大陆控制的愿望”^②。最后经总统决策,采纳了国务院的意见,暂时排除使用军事手段。但是美国政府并非就此不考虑军事手段了。国务院曾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各种使用武力的方案进行研究,以应付各种其他手段行不通时可能出现的需要使用武力的局面。研究的结果都表明:美国现有的军力难以承担在台湾的军事义务,台、澎的重要性不足以公开用武,即使通过联合国行动,实际上美国的军事卷入不亚于军事占领。总而言之,就是力不从心。对于军事以外的手段,美国政府一度设想根据日本投降条款直接占领台湾,或在台湾取得治外法权,但都未能得手。于是又决定“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还应该“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③。

1949年,中国大陆的形势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全境基本上解放,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国民党政权的残余力量于12月8日全部退据台湾,标志着蒋家统治在大陆的终结。杜鲁门政府基本上承认“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分离台湾”的努力已告失败,决定面对台湾可能统一于新中国的现实,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正式就台湾问题公开发表声明,重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明确表示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政,并且特别申明美国不拟对台湾

① ② ③ 转引自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意见。但时隔不久,美国政府出尔反尔,公然背弃声明,重新走上干涉中国内政的道路。

1950年9月,美国拟将所谓“台湾地位问题”提交联大讨论,其目的并非如其自己标榜的“研究台湾地位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而是力图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空气,使其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合法化,使原来不成问题的事成为问题。美国的这一用心在次年缔结对日和约时暴露无遗,1951年9月美国利用签订对日和约在台湾归属问题上做文章,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在联合国的试探性举动。首先,美国一手操纵的旧金山对日和会,出席者50多国,却利用种种借口将中国排斥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都未出席会议。接着,在和会最后通过的对日和约中,规定日本放弃它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利,但却别有用心地“省略”了将其权利归还中国的话。紧接着,美国政府又迫使日本同台湾国民党当局单独签订一项双边和约,有关台湾归属问题条款必须同旧金山对日和约一致,即只写明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而不写将主权交还中国。美国的这一举动不仅为日后以“台湾问题”为由干涉中国内政埋下了伏笔,而且也使一些觊觎台湾者和“台独”分子欣喜若狂,因为这为他们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是无主土地”等种种谬论提供了所谓“法律依据”。由此可见,所谓“台湾地位问题”完全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凭空杜撰出来的。战后初期美国决策者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态度以及制定的政策影响是深远的,为后继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举措定下了基调,使之在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三 美国从未放弃尝试制造“两个中国”的举动

早在1948年秋,美国就在分离台湾的各种方案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在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从大陆退向台湾时,美国政府试

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鼓动成立台湾“自治政府”,阻止蒋介石赴台,另外在台湾积极培植取代蒋介石的势力,但这些措施均以失败告终。美国驻华的使、领馆还与各种自称反共的名目不一的“台独”分子保持联系。但美国扶蒋反共已力不从心,当然更谈不上支持这些毫无根基的人来既反国民党又反共产党。同一时期,美国经济援助的重点由大陆转向台湾,逐渐加强对台湾控制。在加紧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美国政府为实行“台湾托管”而大力争取国际支持。1949年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政策建议书,重点是立即向联合国提出台湾问题,要求召开特别联大,由美国发表声明,说明《开罗宣言》发表时所预见到的与台湾有关的战后形势没有成为现实,同时中国政府在台湾“治理不当”,已使其丧失在台湾行使主权的权力,因此台湾人民有权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云云^①。不过,美国政府试图以联合国的名义掩盖自己对台湾的野心,而其他国家又不愿替美国出头。没有其他国家支持,这个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也就落了空。

美国政府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尤其是宣布重新支持蒋介石集团后,一方面大力支蒋反共,另一方面也从未放弃制造“两个中国”的尝试。1954年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缔结《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又以秘密换文的方式迫使蒋承诺“显属行使固有自卫权之紧急性行动”外,台湾只在与美国“共同协议”的情况下,才能从台湾、澎湖或其他沿海岛屿出动军队^②。同时胁迫蒋介石从金、马等沿海岛屿撤离,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划峡而治。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巩固和壮大,既不会消失,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美国所希望的那种“转变”,同时美国政府考虑到最终

①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Chiu, Hungdah, ed, *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 New York: Praeger, 1979. P250~253.

有一天将承认中国,但又不能放弃台湾,于是加紧尝试制造“两个中国”。艾森豪威尔是战后第一位公开鼓吹“两个中国”的对华政策的美国总统。1955年1月19日,在中国解放一江山岛的次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纽约时报》记者约瑟夫·洛夫斯特问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把福摩萨和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来的独立国家,互相保证安全,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有何意见。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当然,这是不断加以研究的若干可能性之一,但是你可以看出,事情的双方都不愿对这个建议做认真的考虑。”^①在1955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期间,艾森豪威尔又发表言论说:“从长期来看,除非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美国)可能得接受‘两个中国’的概念。”他并且具体谈到,这可能要等“5到10年或12年”的时间^②。

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言行遭到海峡两岸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美国要中国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就是要中国承认美国侵台合法化,以便继续利用蒋介石集团,造成所谓“两个中国”的形势。“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蒋介石也于1955年2月14日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4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将归于一统。”^③由于遭到海峡两岸的坚决反对与抵制,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未能得逞,但它所奉行的敌视、遏制新中国和扶持、援助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政策,却加剧了两岸紧张的对峙状态,阻碍了海峡两岸统一的进程。

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还表现在朝野对“台独”言行的支持上。如果说美国政府官员在台湾问题上尚能三缄其口,极力掩饰

① 1955年1月20日《纽约时报》。

② FRUS, 1955-1957, I, China, No. 201.

③ 1955年2月15日《中央日报》。

的话,国会议员们在割裂中国领土、支持台湾独立上的言行就要露骨得多,政府官员不敢或不便说的话,议员们却敢放言无忌。由于在美国实行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因而美国政府往往以“议员只作为民意代表发言,并不代表官方立场”来搪塞来自各方的抗议。1959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康隆报告”^①,公然倡议成立“台湾共和国”,促使台湾当局撤出金门、马祖,“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清楚的境界线……”^②。面对各方强烈的谴责与质问,美国政府一再辩解这只是民间学术机构的研究报告,并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不难看出,“康隆报告”作为一个试探性气球,实际上将美国支持“台独”的腹案和盘托出。另外,美国最有权威的外交刊物《外交季刊》也多次刊登大肆鼓吹支持成立各种名目的“台湾国”。许多作者并非普通学者,大多先后在美国政府担任职务,因而他们的观点并不能单纯地视为个人主张,而是反映了美国政府倾向于制造“一中一台”的真意,尤怪乎被“台独”分子称赞为“具有美国健全的开拓精神和良知”^③。

随着大批学生和移民涌入美国,美国逐渐成为海外最大的台湾人聚居地。而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和国会议员支持“台独”的言论,无疑为海外“台独”运动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在发现支持分裂中国台湾的立场上,美国可借重和依赖之处更多。这也就使得从70年代开始,海外“台独”势力逐渐涌向美国,美国从而取代日本成为“台独”分子新的大本营。

① Conlon Report,美国参议院委托著名研究机构——康隆学社,邀五位中国问题专家——康隆、派克、斯卡拉皮诺、彭克尔和史密斯撰稿,发表于1959年11月1日。

② 乔治·克尔:《被出卖的台湾》,陈荣成译,台湾独立联盟发行,1984年版,第370页。

③ 王育德:《苦闷的台湾》(自由时代系列业书第9号),台北,郑南榕发行,无出版日期,第190页。

自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中美共同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政府一再声称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一些实际行动却总是与此背道而驰。反思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台政策,我们发现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美国觊觎台湾之心始终未死。

第六节 台湾问题与美国政府的责任

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先生编著的这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涵盖的时间是从1949年到1982年,而从1982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了,台湾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也是美国政府长期干涉中国内政造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说,“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问题”。没有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就不会有台湾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感到就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有一些看法不能不谈。

一 应该如何对待以往的历史

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做了两件事情,这是使中国人民印象完全相反的两件事:一件是协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是中国的盟友,人们对此留有美好的回忆,中美人民曾结下友好的感情;另一件是协助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打内战,造成难以忘却的恶劣印迹。美国政府基于他们所谓的全球战略和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援助蒋介石,然而最终并未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当然,这毕竟都是历史

了。由于美国政府与当时曾经是中国合法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有过结盟关系,从而在国共内战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这样那样的不友好做法,仍然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原谅的。然而自那时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旧中国已为新中国所取代。新中国自成立到现在已经 50 年了,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已经 20 年了,历史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美国政府却始终没有完全转过弯来,至今仍对这个已经被中国人民推翻最后不得不逃至中国一个小省台湾岛的原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暧昧关系,含情脉脉,难舍难分,甚至在各方面或明或暗地给予支持,阻挠中国统一,这就不可理解、不可原谅了。应该说,这是完全违背国际上公认的关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的。事实上,台湾早就不是美国的“资产”而成为他的“政治包袱”。现在,美国政府是要继续背着这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留下“隐患”呢,还是尽早放下这个包袱、消除中美关系中的这个“隐患”,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重新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真心诚意地发展两国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人们正拭目以待。

二 关于《与台湾关系法》

1979 年 4 月,即中美宣布建交后不久,美国政府又抛出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至今仍凭借这个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关系法的实质,是企图在某种程度上取代被废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台湾一学者曾著文抨击说:“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对我们台湾而言,犹如宗主国片面制造的一个适用于殖民附庸的奴隶法。这对身在台湾的我们实在是最大的侮辱。”^①

最明显的两个问题是:

^① 唐建国:《谁出卖了台湾?》,第 32 页。

第一,1978年12月,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怎么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公报的墨迹未干,就又如此迫不及待地抛出一个与公报原则相违背的《与台湾关系法》呢?

第二,中美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可以用美国自己国家的国内立法,凌驾于中美建交公报之上,对中国的一个地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呢?这又将美国政府置于何地?公理何在?信誉何在?

总之,《与台湾关系法》一直是笼罩在中美关系发展上的阴影,它与中美《上海公报》、《建交公报》、《8·17公报》以及江泽民主席访美时签署的《联合声明》,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个《与台湾关系法》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障碍,一天不废止,中美关系也就无法完全正常化。

三 美国的对华政策问题

应该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首先,它一方面与中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承认“一个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而却又与中国的一个地区——台湾保持着与上述原则不相称的关系,不时践踏自己所承诺的协议,诸如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只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将逐步减少对台湾出售武器直到最后终止等。另外,他一方面一再重申“希望台湾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然而同时又年复一年地卖给台湾各种先进武器使之有恃无恐,拒绝和谈。美国还企图把台湾海峡纳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及“地区导弹防御系统”,这是让中国人“自己解放”,还是促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固定化”?是支持“和平解决”,还是支持和保护台湾“和平分离”?是防止这一地区的“武力冲突”,还是制造

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由此可见，美国的干涉实际上是阻碍台湾问题和平解决、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最重要根源。只有美国政府真正做到不介入、不干预，才能有助于两岸的中国人自己合情合理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对美国并无任何损害，而且会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作出有益的贡献。

四 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

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过去几乎都是朝着同一方向运动的，即中美关系缓和两岸关系也缓和，中美关系紧张两岸关系也随之紧张。美国国内一部分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团结，欲图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的发展。而台湾当局中的一些分裂主义势力则利用美国的这部分反华势力以及美国方面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某种疑忌，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作为美国手中的一张牌被利用，制造麻烦，一心欲图拖美国下水，与自己一起对抗中国统一大业，从而实现其偏安拒和与分裂祖国的目的。

美国国内有些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顾忌实际上是完全不必要的。这是因为，中国提出和实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相当长期的一个历史阶段。按照邓小平的理论，中国大陆已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它已不再以资本主义世界为敌。现阶段不仅对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保存与大陆社会主义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对外实行全方位的和平共处和睦邻友好政策，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中国不可能威胁别国，更谈不上威胁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就美国而言，还有无必要仍把中国视为“潜在敌人”来加以“遏制”？有无必要保持冷战时期的旧观念，把台湾继续当作遏制中国链条中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当作手中的一张

牌,借以牵制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美两国政府已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是敌人却当成敌人,把朋友当作敌人,美国这样做,实际上是不是在国际范围内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重蹈中国在国内的历史错误,到头来将是“自己整自己”呢?再就台湾来说,毕竟都是中国人。台湾人民是有着悠久爱国传统的,随着祖国的日益发展和强大,他们迟早会转变态度。由此可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越是早脱身越主动,否则难免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

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先生编著的这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涵盖的时间是从1949年到1982年。就在本书时间表最后一年的二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如今香港问题已于1997年7月1日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得到解决,澳门问题亦于1999年12月20日按照同样的原则得到了解决。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性质不同,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信一定也能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求得解决。人们要求祖国实现完全统一的历史浪潮是不可阻挡的,一切分裂主义者及其外国支持者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九章

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历史观和方法论对史学研究的挑战

一 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在拜读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后,感慨颇深的一点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在中外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或者仅仅是其中的某一局部、某一片断面前,要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描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论,必须具备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完整地把握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是十分困难的,包括笔者本人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缺少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则历史就常常会被扭曲、变形,以至离历史的真实相距甚远。所以,部分地把握,或自觉不自觉地把握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则是获得一切史学研究成果所必需的。尤其是撰述千古流传的史书巨著,这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它直接关系到撰著的好坏、成功与失败。所以,在史学研究工作者面前,或在史书的撰写者面前,随时随地、也可以说时时刻刻都要迎接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挑战,有时这种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某些作者,曾正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严肃地坦诚地提到这个问题。在我们读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所撰写的《书目介绍 政治挂帅:略论 1949 年后的中国研究》时,曾发现,作者深刻地指出:“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构成中国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向方法论和分析提出了严重的挑战。”^① 这说明,在撰写这部史书时,作者感受到一种挑战,并体察到这是向史学研究工作者或撰写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挑战。这种感受或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从整段话的完整性要求来看,还需要做什么补充的话,我想,如果再补充两点会使这一论述更为丰满:

第一,研究工作者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是统一的。没有孤立的方法论,方法论与历史观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即观察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每个人也都有他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就是他运用自己的世界观来观察历史所得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所以,历史观和方法论从本质上看是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没有孤立于历史观之外的方法论。所以,在上述引文中,作者的提法如果改为“向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向方法论和分析”的挑战,似更完整些。

第二,不完全是资料的问题。作者认为向方法论提出的挑战主要来自对中国研究方面的“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第一手研究资料不充分,各个时期资料的公布和占有不均衡,以及原始资料之间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612 页。

缺乏关键环节的连续性等等,这些在对任何国家的历史研究中都是会经常碰到的,是必须千方百计努力克服的困难。但对方法论而言,这种“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则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其实,占有再浩繁、再具有“连贯性”的资料,也还有一个向史学研究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挑战问题。原因是,在浩繁的、连贯的历史资料面前,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都需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艰苦研究过程,否则就不能把握历史发展过程、本质及其规律性。所以,每位史学工作者,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不论是研究中国史还是研究外国史,都应该力求把握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便达到自己所预想的研究境界和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

二 史学研究中具有成效的科学的 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要点

厚厚的两大本史书巨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说是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诸多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它的主编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参加撰写各篇章的有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校的专家、教授,还有伦敦大学、悉尼大学、日本大学、香港大学等的专家、教授。都是一些学术造诣很深,政治上有独立见地,史料学研究谙熟的学者。然而,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学术历程,要求他们有统一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面提笔对于摆在面前的巨著书写评论的中国学者,当然也只能依据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的指导思想,诚然,这也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

导原则。但作为同上述各国资深学者、专家的学术探讨、问题商榷、著作分析,我们不能要求国际学界朋友们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正如同国际有的学界朋友信奉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而不能要求我们也同样信奉实用主义,并以其为治学指导原则一样。历史观和方法论存在分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逝的。强求一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不过也正因为有分歧,方使交流和商榷成为必要的,对于加强学术界的沟通是有益的。

因此,我想就我们和国际学界朋友可以沟通、可以达到共识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某些要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史学工作者写历史真实、写历史本来面貌。

写真实,记真实,论述真实,这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起码的求实态度。因为,昨天对于今天来说就是历史。昨天以前,有无数的真人真事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沿着历史的轨道或超速飞跃或步履蹒跚地行驶着。而历史事件又是十分复杂、犬牙交错的。人们所追求的是“以史为镜”。若离开历史真实,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离开历史本来而目的研究和撰著,不仅被诚实和正直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而且其最终结果,没有不失败的。

关于书写历史,必须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在这一观点上,我们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地位很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的看法十分接近。在费正清和丹尼斯·特威切特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所撰写的《总编辑序》中,曾谈到认识的事实基础问题:“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

少。”^①这说明,在主导编辑看来,史学家认识历史、思考历史、对历史作出理性的判断,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这无疑是合理的正确的。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正确地批评了那种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而不顾实际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错误倾向。例如,有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作辩护,说正是西方的人侵,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费正清教授批评说:

“我们自我欺骗的程度是不难看出的。在今天,谁在一眼之下都不会支持这样的论点:即蹂躏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实例不是使中国的改革家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优点了吗?……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②作者是在“中国统一的成就”的标题下面谈到上述观点的。他不同意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说明中国过去和现在这样的统一大国的形成与存在。很明显在这里作者是赞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说明中国,而不主张生搬硬套西方的名词术语。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也是我们之间能够取得共识的研究标准。

第二,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客观地观察、书写历史。

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要做到尊重“认识的事实基础”,首要是能够排除主体感情和利害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和扭曲。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总编辑序。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15页。

作为史学家,即书写历史的主体,都是有感情的具体的人。有人提出“抛开感情的因素书写历史”。这种要求不能认为不合理,但要百分之百的真正做到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提出这种要求可以促使史学家更加冷静、客观、自制,努力不使这种感情因素干扰史学研究,更不能偏离历史真实的轨道。出自某种个人偏爱和利害得失,去书写历史,势必持偏执之词而歪曲历史。当然,刚直不阿的史学家,怀着满腔的怒火,揭露社会的罪恶,写出流传千古的杰作,也屡见不鲜。中国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书写《史记》就是一个范例。不过这是一种忧国忧民、以社稷为重的站在人民立场的感情。它同以个人利害为出发,或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为重的狭隘的个人感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对“感情”也还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史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是要排除那些干扰客观地认识历史真实的“感情”。比如,某些人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于对共产党有偏见,感情上不接受或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那么,他肯定不会客观地书写这段历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二位教授所撰写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序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力量和意图构成了这两卷的总布局。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①在写完两卷本巨著,主编麦克法夸尔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的《后记》中写到:“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序。

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①这一方面说明国际学界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友好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该书的主编力主撰史的客观性。与此同时,该书还在有关部分揭露了某些国际学者撰写史书由于感情的偏颇,而出现的对历史的扭曲,而且指出俄国社会学家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德文版名称)一书中“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②。针对这种现象,该书提倡“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③。确实如此,有着不友好的感情,很难客观地书写中国历史。主观地歪曲史实的攻击之词,又能够为严肃的有意义的史学研究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

第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从发展变化上观察和书写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会在哪一个阶段停滞不动,相反地,永远是处在变动之中。“生生不息,变化不已”。这种变动,尽管千变万化,曲曲折折,有时表现为前进的运动,有时表现为后退的运动,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从来没有停止、也没有循环,而总是不断地发展和前进着。同样,历史上的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件,或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历史事件的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如此,历史本身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客观地如实地从变化发展上观察、认识与书写历史。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科学这门学科客观存在的质的规定性。

有关上述观点,我们不清楚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和撰稿者在认识上、在理论上有多大程度上的共识,恐怕很难说彼此完全一致。然而,由于受到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客观导引,却能够在方法论上表现出很多共同性。例如我们看到该书的许多部分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书写这种历史进程的变化,也许是在“跟着历史走”。尽管有的史料不够真实和准确,论述不够客观,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928页。

② ③ 同上书,第972页。

但他们总是在写变化。而且他们是在分阶段地认识与书写这种变化。正如该书主导编辑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章所说的:“我们对现代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了解已经通过一系列很有特征的阶段而有了发展。对这几个阶段的简单的回顾,就是阅读这卷论述人民共和国最初16年(1949—1956)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最佳入门。”^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不仅注意了历史的变化,而且还注意到西方和中国学者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互相影响和史学研究成果的交流。他们认为现在“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②。这当然是中国史学界乐于看到的一种应予肯定的好趋势。

在该书的某些部分中,还正确地指责了那些不从变化发展上书写历史人物与事件所产生的谬误。有的作者指出:“当代中国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领域;当学者结合关于过去事态发展的最新资料进行研究时,就需要不断地修改他们的解释。虽则大多数分析家对资料问题的态度是谨慎的,这个领域偶尔也发生弊端。……例如,研究者在1966—1970年得到的文献,说明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不断增长的冲突和他们在1965—1966年关系破裂的原因。有的分析家孤立地抓住这个材料而忽视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个巨人之间长期合作的记录,着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描绘成敌对的。”^③从这种批评中,可以看出作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612~613页。

者是主张史学家应“描绘”出历史的变化。不过,这种历史变化的“描绘”应该是符合客观的实际状况,科学地估量其发展变化程度,而不能主观地任意夸大或作过分的估量。这样的看法,我们也是赞成的。

第四,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充分地认识和书写出历史的曲折。

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作为一种变化发展过程,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前进的运动。然而,这种前进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有前进,也有后退、复杂多变,呈现出一种波浪似的状态。有谁能找出世界上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笔直的,或者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发展?没有这样的客观存在,也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那么只能是“踏破铁鞋”,也寻觅不到这样的“净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承认“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①。承认中国历史的发展“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新中国进行的改革和建设“将有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②。既然是“试验”,而且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那么曲折和挫折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客观存在的。该书的一些撰写者确实是在努力书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的复杂与曲折。这是很好的。当然,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有些撰写者对这种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描述得不够准确,作了某些缺乏事实依据的主观推测,甚至刻意的评说。应该说在研究别国历史时,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这些现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总是少些为好。

第五,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史学工作者能够严肃地去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总编辑序。

② 同上书序。

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变化原因是什么?这是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变化都不可能是凭空而起的,都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而且这些原因是现实的、客观的。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某种神秘力量指使的发展变化。那种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来自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什么“天命”、“鬼神”、“上帝”等等,这种愚昧和妄想,是不应进入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视野之内的。

当然,要准确、无误地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很不容易的。具体来说,找出某种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以及历史人物行为和思想变化的原因,没有艰苦的努力,没有对大量史料的占有,没有科学的分析头脑,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对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一般说是重视的,并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但就其实际结果而言则表现各异:有些对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事件、人物的思想行为的变化原因作了比较好的探索和论述;有些则论述得不恰当,甚至失真;有的还只是罗列了很多现象,而不分主次,真伪混淆;有的没有摸到历史事件、人物思想行为演变的真正原因,似在进行主观地猜测;当然,也有坦诚地声明这件事的原因还不清楚等等。

作为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我们是和这段历史一起走过来的。这样一来,一方面,作为亲历者,我们不难发现上面所谈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成功和失误之处。因为,许多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来说不仅身临其境,而且至今回顾起来还历历在目;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真正把握各种事变的深层次的内因与外因,对于我们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这中间有个人生活条件的局限,有接触环境与视野的局限,有个人认识水平的局限,以及资料占有的局限等等。由此领悟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国际学界朋友(这里已排除了那种仅以史学为掩护而别有企图的,严格说不能被

认为是史学家的个别人)在研究中国历史、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确切原因时,有论述不当之处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历史变化多端,“历史记载浩如烟海,详尽而广泛”,新中国也不例外。要真正写出新中国的变化发展,探索其真实原因,即各种历史事件处于多方面联系中的内因与外因,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任何事物变化都是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原因、偶然原因以及各种原因又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存在的,因为整个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面对这种普遍联系的图景,去寻找历史链条的某一环节的真实原因,必须要有全方位、多层次的观点。这是要付出艰苦努力去探索和分析的。

在探索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及其原因时,有一个规律性的问题,既是观点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是不应予以忽视的。如果由于批评新中国的领导者所提倡的“斗争哲学”带来的危害,而根本否定上面讲的观点与方法,就意味着没有办法找寻到历史事变的根本原因。

总之,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因为,有正确的历史观、方法论意味着对科学世界观地把握,也意味着辉煌的研究成果的取得。诚然,对它的完全把握是异常困难的,要求中外史学工作者都全面无误地把握和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现实的,也肯定会有许多西方学者不赞成。然而,全面把握的要求,是应当提出的,也是我们应共同力主和努力提倡的。“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有了较高的要求,以及艰苦的努力,即使达不到本来的要求,也还会取得较好的成果。更多地把握,会有更多的成功;部分地把握,会有部分的成功;对其把握,哪怕有一点点自觉的意识和努力,也会有某些优秀成果作为回报。相反地,完全背离和在某些方面背离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研究的结果,势必导致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扭曲和背离。那么,带给社会的不能不是被列入否定的产品,对于个人的艰辛努力及所付

出的代价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三 实践标准没有“否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后记中,麦克法夸尔教授在谈到邓小平“再次出山掌握最高权力后”采取的行动时说:“他否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后已在不断减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在以“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为题的第四章中,麦克法夸尔教授又说:“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找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能解决问题。”^②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作者承认,按照共产党的主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意识形态”,使共产党“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未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而且,他还正确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赋予了毛泽东思想一种“几乎超越自然的力量”,并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提高了,而是“大大地被贬值了”。但是,如果据此而得出结论说,这位美国教授是在赞扬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925页。

^② 同上书,第417~418页。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已经有了正确的理解,那就不恰当了。因为当作者在谈到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当时邓小平的作用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主要是将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实践标准绝对地对立起来,从而歪曲了这一伟大运动,并扭曲了邓小平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

作者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提出”的。这很不准确。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阐明了这一原理。毛泽东还专门写了《实践论》,在其他的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对此也都作了充分地论证与发挥。马克思早在1845年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中,还特别强调:“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②毛泽东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他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③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他又指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④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又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标准问题。他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④ 《毛泽东选读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

理的唯一标准。”^①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是在于,他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神化领袖,把领袖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勇敢地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突破了思想禁锢,并支持和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邓小平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共同努力下,在全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最深刻的转变,使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通过这一场大辩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客观实践说明,坚持实践标准不仅没有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相反地,却是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这样说是否有点强词夺理呢?完全不是。请看以下各点:

第一,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作用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管它如何宣称自己有完全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但客观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统治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得到亿万人民赞同,得到宪法承认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没有被否定,反而受到空前狂热的大宣传。不幸的是,真理被夸大、被宣传到不适当的程度,就会向其反面转化。“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在那一段史无前例的日子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篡改、被阉割,被附加了许多不属于其本身的东西。而且她的社会作用被颠倒,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意识形态,却被变成了制造大破坏、大灾难的护身虎皮。粉碎“四人帮”后,迫切需要拨乱反正。以什么为标准为思想武器,将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颠倒过来?邓小平坚决支持了当时社会上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标准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最核心命题的恢复,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精神的实践理性的复兴。邓小平在一系列场合反复地、旗帜鲜明地阐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讨论的结果,这一伟大的思想被恢复、被广大干部与群众所掌握。有了思想武器,拨乱反正获得了全面胜利,被颠倒了的大是大非又被颠倒过来,从而使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恢复了她的本来面貌。科学的理论得到了完整地科学地把握,这不是否定了它的作用,而是重新恢复与发挥了它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巨大能动作用。

第二,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作指导,意识形态就会沿着正确方向更好的发挥其作用。

邓小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像麦克法夸尔教授所说的“他否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是加强了这一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的思想武器。“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发生,从指导思想上说,就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离。而要从根本上纠正这场灾难及其后果,也必须从端正思想路线做起。如果不肯定、发挥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就不能使人们冲破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的束

缚,不能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对“文革”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进行了历史反思,重新进行再认识。可是,当时有许多人,其中还有领导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思想处于僵化与半僵化状态。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即一直被称为“两报一刊”的最高领导喉舌,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两个凡是”,表达了当时作为党与国家主席的华国锋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不想改变“文革”中的一切,企图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两个凡是”一提出,就受到很多党与国家领导人、广大干部、广大人民群众,以及理论工作者的反对。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在当时的副校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由胡耀邦亲自审阅并定稿。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同天,新华社转发。第三天,《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文章提出必须粉碎“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反复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反映强烈,既有普遍的热烈赞同,也有少数人,包括一些重要领导人的群起谴责,其说不一,但是,“丢刀子”、“砍旗子”、“非毛化”、“反毛泽东思想”等等大帽子一并飞来。于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就在所难免了。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中的正确意见。早在1977年5月24日,他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①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著名论断,即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必须世代地用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在激烈的论争中,面对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所极力主张的“两个凡是”,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性一直坚决支持正确意见。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②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这次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③。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④这样,由于邓小平的反复论证,发挥与发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决支持实践标准大讨论,三中全会又高度评价了这次大讨论,使讨论得以健康发展。通过这场讨论,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有了这条思想路线,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不是被否定,而是能够沿着正确的路线与道路,获得更大的发展与繁荣。

第三,实践标准的原则为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评估提供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

③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客观标准。

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并非唯一的意识形态,在一个多民族的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必然有多种意识形态存在着。因而,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成为建国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方面既有好的经验,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等,但处理不当的教训也很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概否定的极左思潮的严重泛滥,更是产生了十分有害的恶果。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有其糟粕,也有其精华;在研究传统意识形态的专家、学者的著作里,也有着丰富的宝藏。“文革”期间,前者被认为是“四旧”,统统予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后者则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批斗。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动的文化虚无主义。怎样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而不是否定一切,以什么作为判断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呢?只有以实践标准来衡量,在全党明确树立起实践是检验真理、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才能区别是非、优劣、充分弘扬对社会主义发展有利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国内正确对待不同的社会思潮,而且能够在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中,权衡利弊,正确取舍,纳百家文化而为我所用。20多年来,中国的意识形态是繁荣了,而不是衰落了,就是明证。

第四,恢复实践的权威,意识形态各个领域才能正确评价功过是非,以利于鲜花盛开。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涵盖面极广,包括不少部门,如政治、法律、哲学、教育、艺术、宗教等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为了适应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斗争,各种运动,又是持续不断,几乎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一些部门受到错误批判;到“文革”时期,更变本加厉,被说成是一条黑线在统治着。所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学派、学科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冲击。学案之多,涉及面之大,牵涉人员之众多,都是历史所

罕见的。粉碎“四人帮”后,需要对建国以来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批判给予反思,统一思想认识,正确总结经验。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公认的正确检验标准,这一切都无从谈起。现在有了实践是真理标准这一武器,作为反思的“标准”、总结的“尺度”,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公案,就逐渐获得解决,整个全中国意识形态的局面就大为改观了。

第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识别多元文化以及对其作出选择提供了客观尺度。

从当今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大趋势来看,各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没有哪一国可能是封闭的凝固的不变的单一的。各国意识形态的构成只能是日趋多元化。新的成分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复杂的、多变的、色彩斑斓的多元的意识形态,都在各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约束下,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吸取。这是摆在各国面前的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未来只能更复杂。企图在经济上搞一体化、政治上搞一极化,或以一种意识形态统治全球,这只能是与大趋势背道而驰的不可能实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趋势的发展,绝对不允许超级文化垄断世界的局而出现。现在与将来各国都会在地不断地选择适合表现和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

已经坚持改革开放 20 年的中国,正在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不断地融入世界发展大潮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往来交流的日益繁多,各种意识形态的涌入,也出现了不可阻挡之势。当然,不该不加分析地阻挡,也不能阻挡。但却又不能放任不管,任其泛滥。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发扬主旋律,铸造中华魂。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去正确区分良莠,区分优劣,区分先进和后进,区分进步与腐朽,以摄取优秀的意识形态,或者摄取进步的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容,以及某种意识形态的合理内核,摒弃其糟粕与毒素等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取舍的标准,只

能是实践标准,特别是经过邓小平发展和明确阐述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广大人民生活的改善。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一切意识形态,我们就要“拿来”,当然是取其精华。那么,是否真正地做到了“三个有利于”,这不能靠意识形态本身的标榜,不能靠引进者的“宣言”,更不能靠那些无聊的广告,唯一的原则是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只有它能告诉我们真话、实话、靠得住的话,从而为我们分辨取舍指明方向。坚持实践标准,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的意识形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根本保证,也是使党和广大人民永远保持清醒头脑的良药。在中西文化的研究与交流中,如果失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无疑会迷失方向。所以,坚持与发展实践标准,不是否定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是更加丰富与发展意识形态本身,并扩大和加强了它的作用。

总之可见,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没有“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只是否定了那些夸张的扭曲的强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上的不实之词,使这一理论更符合实际、更深入人心,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因而,这绝不是削弱,相反地,正是从各个方面加强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第二节 历史和逻辑、主观和客观 相统一的问题

任何史学工作者都不能不注意的一个原则问题,是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时刻关心主观和客观、历史和逻辑是否相统一的问题。所以要提出这似乎是抽象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在《剑桥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而如果不从原则上达成某些共识,则评析就难以正常进行,自然更难取得共识。

一 为何需要历史和逻辑、主观和客观相统一

第一,对历史的思维应与历史本身相一致。

我们所提倡的“统一”,谈的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问题。这里所谓的“历史”,不是通常讲的清史、明史等具体涉及某一时空的历史,而是一种作为特定范畴的历史本身。不论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历史。在这种过程中,虽然有某些或多或少的人们改造世界的自觉参与,但归根结底任何人的举动都必须服从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凡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就会取得积极成果,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而历史本身,或历史的任何变化和发展,从总体上说都是客观的。

而逻辑则是人类研究历史过程中达到的一种主观认识上的升华。它在本质上的最高要求,应该是和客观历史进程相一致的。不过“逻辑”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通常讲的形式逻辑,是思维的变化发展规律与形式。这种形式逻辑运用的正确与否,并不完全代表客观事物的实在情形。而辩证逻辑,虽然也是思维变化发展的规律和形式,但处于更高的层次,它显示着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我们的这个题目中所强调的是同历史客观发展逻辑相对应的思维逻辑。它必须同历史相一致。

第二,逻辑和历史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是历史科学的客观要求。

作为一种正确的认识,正确地描绘和论述历史,最起码的要求是主观符合客观,即主观必须如实反映客观。而历史的观察与研究也无一例外。作为历史研究,即思考与论述历史的思维逻辑,必须同历史过程相一致,即主观的逻辑必须同客观的历史逻辑相一致。

这是正确的认识方法,也是正确的史学研究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因为在前一节的有关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要点中已作过概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三,“相统一”是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首要问题。

那么,在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诸多要点中,何者居于首位呢?我们认为,居于首位,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无疑是历史与逻辑、主观与客观相统一问题。

因为做任何事情,包括书写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出发点问题。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原则出发?从不同的立足点出发,对历史的考察、描绘、分析、判断,结论会完全不同,而且还会形成尖锐的对立。也就是说,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占有大量的真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作出描绘、分析、判断、结论,以及得到的经验教训,和那种由人头脑中的思想原则所设定的框框出发,去搜集证明这些原则的史料,去分析判断,以至做出结论,总结经验和教训,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研究成果,同一课题可能会书写出两部完全不同的史书。所以,出发点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也是一个首要问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在历史上往往会形成尖锐的对立。例如,宗教家们书写历史是从“上帝造人”的思想原则出发,认为上帝先创造了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加上泥土捏成夏娃。后来亚当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被降到地上,从此这一男一女繁衍了人类。人类是上帝造的,地球是上帝造的,地球上的万物也都是上帝造的。甚至认为,没有上帝的旨意,一片树叶也不会落到地上。从“上帝造人”的思想原则出发,导演出的一系列“创造”,就形成了《圣经》上所书写的人类早期发展的历史。后来,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们从实际出发,考察了天体和地球,考察了人类发展演变的自然史和文化史,提出人类不是上帝造的,地球也不是上帝造的,人类社会有自己的发展史等等。这种今天已成为人们普通常识的正确观点,当年的思想先驱们却为之付出了血的代价。

例如,坚持这种出发点,并为人类带来对真实历史认识的伟大思想家,首先遇到不幸的是主张地球不是上帝造的布鲁诺(意大利天文学家),他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接着,正确考察了生物进化史,指出人是从猿猴变成的达尔文,也遇到了厄运。

因此,史学工作者,能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主观反映客观,主观符合客观,即做到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是能否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献给人类不朽的历史著作的首要问题。我们认为,这也是每个史学工作者(不论中外),都应当遵循的一项根本原则。

二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统一” 原则的尊重和背离

在作了上边的抽象原则议论之后,自然还要回到我们评析的对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们认为,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地方,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努力去寻找反映历史真实的材料,并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对不少人物事件的分析,看来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对历史的逻辑思考与历史本身,主观的论断与客观事实本身在不少地方,是基本上相一致的。比如:当我们读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的开头篇章时,就愉快地看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描绘和分析比较如实。虽然,当时的中美两国还处于互相隔膜、相互敌对的状态,但该书的学界朋友却依据冷静的心情,排除国际关系上的感情干扰,比较客观地真实地书写了我国这一段历史。作者对我国当时的困难有所理解,指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时,国家的新领导面临一些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风气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了巨

大的障碍。”^①这些确实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段时光的人至今仍难以忘却的折磨和苦难。同时,作者也真切地描绘了紧接着所发生的可喜变化。而不像有些在国际上现今流行的著作,包括文艺作品,极力去刻画旧中国的苦难,而且去树立那种模棱两可的形象,似乎旧中国所发生的人和事,刚刚建国时的人和事,同今天的人和事,没有多大变化,依然故我,同样的落后,同样遭受苦难。而该书的作者则不同,很快看到了变化。作者肯定地描绘了到1957年中国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分裂后已经建立。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信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这个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几大步并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即使是适度的、但也是显著的提高;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比较顺利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得到改造。”^②在这里,对于建国初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作了如实的刻画和肯定。而且,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指导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谈到中国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信的提高时,特别提到了朝鲜战争,指出了中国这个弱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也就是美国“打得相持不下”。作者是一位美国人,悉尼大学政治学讲师。他并没有因为民族情绪而掩饰美国的这种不体面的过去,这是难能可贵的。像这样的如实而客观地描绘和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篇章,在这部巨著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为着开展国际学界朋友们的讨论,也为了一旦这部巨著再版时修订得更好,我们这些生活在他们书写对象的这片沃土上,而又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学者,为其提供一些真实的线索和史实,对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55页。

书中的某些论述提出一些质疑,可能不无价值。

尽管该书的作者对我们的国家、人民,以及中国共产党比较友善;在治学方法上也力求客观、公正地把握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但由于这些学者所处的西方环境,以及由此而带给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局限,再加上外国人写中国史,难免有很多地方产生对中国实际的隔膜。由此带来主客观的分离,逻辑与历史相悖之处,也是不少的。从其所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来看,较为突出的问题有:“王朝循环”论;“权力斗争”论;“派系斗争”论;社会“结构论”等等。下边我们就这几种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观点,作一点概要的分析和评论。

1. 王朝循环论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已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是“王朝循环”的继续,而是开中国历史新篇章的角度,对“王朝循环论”作了一些评析。这里再从历史观的角度,补充一些意见。

历史循环论是一种早已存在的不正确的历史观。其所以是错误的,要害是它把历史的过程看作是周而复始的、一成不变的循环。其实,历史发展所呈现出的是螺旋运动,表面上似同循环,像是对起点的复归,实际上是一种前进的运动,是一种螺旋似的上升运动。

历史循环论,包括各种各样的循环论,如灵魂不死论——生、死、生;天道论——日出、日落、日出;福祸论——福、祸、福等等。这其中本来有着自然界和人类的按着本身规律辩证的发展问题,可是,循环论却否认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和变化,只认为是一种神秘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而王朝循环论,则是历史循环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常常把历史的变化发展解释为是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如王朝的建立——覆灭——建立。

我们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遗憾地看到,作者不仅将这种错误的王朝循环论当作正确的理论来遵循,用

它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而且还极力推崇,认为它对于中外历史的发展具有普遍意义。作者竟然将它推到最好出发点的宝座,说:“我们讨论问题最好的出发点是王朝循环的理论和实践。”^①而且认为这是史学工作者研究历史的更为重要的方式,特别是对于今天。竟然说:“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成为以王朝循环论方式解释大事的基础并被这种方式含蓄地表示的种种假设。”^②该书还认为这种王朝循环论可概括中外的历史,连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都可以证明循环论。用作者的话来说“以后的革命阶段似乎证明了王朝循环的理论”^③,而且“这种王朝循环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中找到”^④。

于是,作者认为:“不用去查阅有关王朝兴衰的大量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编史者引作王朝更替和重新统一时期的典型的历史现象。”^⑤这就是一个朝代兴起,然后腐败,然后被推翻,再一个王朝兴起、覆灭、新王朝兴起。因而,他们不是把新中国的建立看作是推倒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结局,而是说成由于旧王朝衰败,“关于改朝换代的民间传说——作为国家合法的神话的天命论——就成了一个自行应验的神话”^⑥。由于字里行间把新中国的诞生,去同封建王朝的所谓循环类比,看作是这一王朝循环的续篇,于是,便把中国共产党比作封建王朝的独裁、专制的党,把新中国当作一个统一的新王朝,把共产党的领袖看成具有统一国家能力的新皇帝。

这样一来,作者笔下的史实,就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真实了,扭曲了革命的性质、国家的性质、领袖的作用。其实,中国人民

① ⑤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 同上书,第9页。

④ ⑥ 同上书,第12页。

历次推翻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受之于天命。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果是结束了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和封建王朝的一个个更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坚持王朝循环论,扭曲了上而的基本史实,不能不造成主观和客观、逻辑和历史的背离。

2. “权力斗争”论

西方有些学者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专制独裁的政党,而把新中国描绘成是共产党专权的国家,从而把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都说成是由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才发生的。遗憾的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某些作者,也受到这种流行思潮的影响,采取了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来书写他笔下的新中国历史。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客观实际,不符合史实,也违反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

其实,在一个存在阶级的社会里,不同利益集团(包括不同阶级的政党和团体)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乃至军事斗争,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权力斗争,而在于从什么动机出发,为谁的权力而斗争,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这些而言又是有很大区分的。所以,权力斗争本身就是一个既复杂而又富于弹性的概念。

共产党人是否不搞任何权力斗争呢?当然不是。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而把社会的统治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里。对这一点共产党人从来是公开声明毫无隐瞒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宣告,共产党人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① 夺取政权这还不是最根本的最大的“权力斗争”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在这方面的问题是：

第一，权力斗争论者，抹煞了不同种类权力斗争的本质区别，而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人（或小集团）之间的利害斗争。这样就必然会混淆事物的不同性质。这种区别，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强调的。例如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① 为党、为阶级、为人民而争权，在我们看来是同西方的“权力斗争论”有本质不同的。

第二，权力斗争论者，常常把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归为权力之争。其实，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的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具体目标、手段等问题主张上的分歧；有的是具体工作中的分歧，比如属于计划安排问题；有的是属于对形势估计不一致；有的是阶级斗争观点不一致；有的是对经济政策、外交政策主张的分歧等等。这些分歧，客观地看来，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包括高层领导，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方法，各自不同的角度，各自不同的经历等，要求他们事事看法一致，做到“舆论一律”，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②。所以，领导人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是一种正常现象。把它们都归之于“权力斗争”，实在是不合适的。好像戴上墨绿眼镜看世界，万事万物都变成墨绿色一样。

诚然，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权力之争，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有的，但这不是该书所一再提出的毛泽东同刘少奇、邓小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相互交错的各种斗争,而是曾出现过的例如高岗、饶漱石的阴谋夺权,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妄图争夺党和人民的权力的罪行,还有震惊世界的林彪“抢班夺权”的密谋等。他们的后果,都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分别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我们认为,“权力斗争论”,是很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因而它为该书的作者造成很多困难,有时不得不寻求其他办法来解释历史。比如,该书曾谈到:“的确,1949年以后,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是一切都进行顺利。领导人之间对于发展工作的速度和形势有重大的不同意见。”^①这里讲的分歧,明明是关于发展速度和形势问题的不同意见,而不是“权力斗争”。又如,在谈到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经过调整后的情况时,作者又说:“争论的具体问题在这几年里是有变化的。1962年前期,对农村已经达到的恢复的程度在认识上有重大的分歧。毛认为,恢复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足以使北京能够掌握主动并重新维护其权威。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不同意,认为党必须继续落实紧急措施以解救危局。”^②这里谈的分歧,又是关于“对农村已经达到的恢复的程度”在认识上的重大分歧,也难纳入“权力斗争”的范畴。可见,企图用“权力斗争”去分析共产党内的一切分歧,常常是“南辕北辙”,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3. “派系斗争”论

“派系斗争”从广义上说,也应属于“权力斗争”范围之内,但却是另具特色的一种。因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派系斗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所以,我们也把它单列为一小目。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仅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为了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即毛派和刘派的斗争,而且在书写50年代的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09页。

② 同上书,第312~313页。

新中国历史时,就已开始运用“派系斗争”论来刻画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了。这样,在“权力斗争”论错误观点与方法的运用,从而扭曲历史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层对历史的扭曲。例如,在谈到大跃进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不同见解和作法时,作者竟然声称毛为控制局面,结成了派系。说毛寻找到了对付具有不同意见的同事们的伙伴:“毛的这些伙伴有他的妻子江青、他任命来取代彭德怀的林彪,以及保卫系统的重要成员康生,他们同主席及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联合起来。”^①作者认为派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最高权利,说:“参加这个联合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其个人的原因,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改变继任顺序,以使刘少奇(或其他像刘这样的某一个人)最后不致于从毛那里接过全部权力。”^②从该书的前后文来看,作者是这样划分领导层的另一方派系,即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德怀、张闻天等等划为另一派。这样一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早已经分裂为各种派系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派系组织的总和,而是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虽然也产生过王明小宗派和高饶集团那样的实际上的派系,但明目张胆的公开的派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从来不存在的。

第二,作者对 1959 年庐山会议的性质似有误解。那场斗争的本质是对所谓“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认识和评价上的分歧,而非派系斗争。关于庐山会议的问题,已有多本专著出版,这里勿需多说。

第三,说参加毛派联合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不让刘少奇接班。如果说是 1966 年“文革”时还有点依据,而放在 1959 年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312~313 页。

② 同上书,第 313 页。

就完全不合适了。当时不仅不存在不让刘少奇接班的问题,而正是要让刘少奇接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时候。正是1958年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席候选人。正是根据毛的提议,一致推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候选人。而在此后的接待外宾谈话中,毛泽东还明确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历史是变化的,是不能任意提前的。作者的论断与历史的真实相距甚远。

第四,对具体人的情况判断有误。比如,刘少奇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的,邓小平也是批评彭德怀的。又比如陈伯达,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就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又曾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很难说他那时就是毛泽东反刘少奇的“伙伴”。

仅从上述几点就可以看出,说50年代以来毛泽东就在党内结成派系是难以成立的。

4. 社会结构论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章中,该书主编费正清教授提出一个“结构论”的概念。什么是他所说的“结构论”?关于这个问题,该书阐明得并不清楚。可是,我们认为,既然是一种“论”,就不同于一般的用语,所以,还是尽力理解作者的原意。反复翻阅和琢磨其中的论述和形象的比喻,似乎有了一点知晓。费正清教授在该卷的第28页中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采取结构论的立场,即中国社会建立在这样的古老结构的基础之上,其社会秩序和政治价值观根深蒂固,迅速的变化也难以很快地改变它们。”^①这是在“现代化的作用”一节中谈到中国社会特点时所说的。意思是说中国现代化遇到了建立在“古老结构”基础上的中国社会,这个结构,“根深蒂固”,很难根本改变。从形象的比喻来看,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8页。

该书第 26 页中这样讲：“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我们因此遇到了一个新和旧的结合体。装有滚珠轴承和汽车轮胎的骡拉大车是更有效率的车辆。外来的事物不得不加以变通以适应本地的用途。”^①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而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僵化和板结，形成了一种阻力，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是缓慢的，逐步的，只能是给这个骡拉的大车装上了滚珠轴承或者是汽车轮胎，作为一种必要的过渡，那么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作者的意思，就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质的变化，而且现代化也不可能使中国社会有根本性质的变化，不可能有质的飞跃，有的只是数量的变化。在骡拉的大车上，加上一点滚珠轴承，加上一点汽车轮胎，使其走得快一点，而不能使其变为汽车，变为飞机。那就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的论断了。如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所讲的结构论是后一种意思，那就使我们想起中国过去的一种理论，即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是不能变的，“道”也是不能变的。其他的变化，只能是在不变的天与不变的道的模式下面的一些数量的变化。这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们希望费正清教授所讲的“结构论”，没有受到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典型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

第三节 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问题

关于“英雄创造历史还是群众创造历史”的问题，是史学界几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现在亦然。不仅在西方史学界存在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26 页。

这种争论,中国史学界也是一样。现在我们的这本专著实际上是一种中西学者的争论。应该说,在学术探讨和交流中,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自由探讨,百家争鸣,互相商榷,是应该提倡和发扬的学术风气。

诚然,《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并没有公开地申明和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而且也曾提到他们书写人民群众的意图。如上面曾引述过的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二位教授在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所作的序言中曾谈到:“关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及知识分子各章的顺序,我们仍遵循第14卷的编排。但除此而外,另有两章我们把视线从北京的决策者那里转落到中国的民众上,看看这场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①这个愿望是好的。但当我们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发现在这里描绘和论述每一历史时期中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以及他们如何推动历史前进,如何决定历史命运的篇幅很少。而多半是撰写英雄伟人,通常所说的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即正反面的大人物,重点是写新中国的上层领导和领袖人物。而这些人物的愿望和要求、思想与理论,在作者的笔下,又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相脱离的。他们的存在与不存在,似乎和广大人民群众不相关联,看不到群众“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相反地,在这部巨著中通常可以看到的是领导人物的个人磨合、携手,或相互角逐、争斗,以及厮杀和火拼。所以,这部大书读后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一部英雄史书。这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的单独列为一节加以评析的原因。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3~4页。

一 英雄伟人、杰出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是怎样体现的

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既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又是至今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上面已经谈到,思想家们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了几千年,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才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回答。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庭》一书中,就已深刻地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科学依据,并进而论述了怎样正确对待个人作用的问题。但是,这只是一种科学的定论,一家之言,而没有成为史学界乃至思想界的共识。这部重要著作出版距现在,已经有 136 年了,情况依然如故。所以,我们今天在拜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过程中又不能不重提这个问题。因为,笔者发现,在观点上,有接近的地方,但也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提出讨论。

我们认为,说英雄还是群众创造历史,这并不是说在历史创造上,只有哪一个起作用,而另一个不起作用。其准确的含义是说在承认二者都在起作用的前提下,区分作用的不同,即谁起决定作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英雄在历史上只能起影响作用,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是起决定作用的。任何杰出的个人都不能决定历史,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长期以来,人们为此而断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正是从历史的主体是谁,谁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意义上来作出的结论,而并不是说个人在历史的创造上不起作用。

历史发展的主力是人民群众。个人,如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英雄豪杰、领袖、伟人等等,能够在历史上起很大作用。这种作用有时表现为推动历史的变化与发展;有时则表现为阻碍历史的发展与

变化。但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群众,为什么?因为,社会历史都是按着它所固有的规律发展的。这一规律归根到底为经济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动的状态所规定。社会的变动,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由此而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随着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全部上层建筑也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变化发展都遵循着这种历程。可见,生产力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变化发展在客观上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而劳动人民群众(包括广大脑力劳动者),则是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关系变革的主力军。正是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

说到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通常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偏向:一种是抹煞群众作用,突出个人,片面夸大个人作用;另一种是借口尊重群众,代表群众,否定领袖和权威的作用。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存在的不是第二种情况,更多的是属于第一种。当然,也不能说它完全抹煞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哪一个作用大一些,哪一个作用小一些;对谁评价得高一些,对谁评价得低一些,而是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即究竟是谁在主宰历史,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是否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主宰作用,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分歧的根本问题之一。

和群众作用相对而言的个人作用,不是指一般的个人,而是指在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的个人。一般来说,是指代表先进阶级的杰出领袖人物或腐朽阶级的反动统帅人物。

唯心史观在谈论个人作用时,不讲个人作用的客观条件和群众基础,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而片面夸大某个人的作用。他们有的表现为唯意志论,公开宣扬杰出人物的个人意志的作用;有的表现为宿命论,宣扬天命、上帝、宇宙精神等神秘力量的作用。世界上唯意志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叔本华,1918年出版了他

的主要著作《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其中说：“没有意志，就没有世界。在我们面前只有虚无。”^①他认为，伟大人物“天才的思想……好像榴红宝石一样，自动发光，没有他，人类就要沦落到迷茫无际的大海里了”^②。

1806年10月法国军队打到德国的耶那城。黑格尔在耶那大学教书。有一天，黑格尔看见拿破仑骑在马背上，巡视全城，耀武扬威。他当天晚上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拿破仑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是马背上的宇宙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宇宙精神”或“世界精神”，是神的代名词。他还认为：“假如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些世界历史个人的命运——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③他说“历史上这一个向前进展的‘精神’，是一切个人内在的灵魂；但是它是不自觉的‘内在性’，而由那些位大人物带到自觉。他们周围的大众因此就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④。我们引用叔本华和黑格尔的话，并不是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也是这样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者，而只是为了把两种历史观的分歧，表示得更鲜明，而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考。

我们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并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正如前边已经谈到的，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歧，不在于承不承认个人作用，而在于如何估量个人作用。每个人都在历史上起一定作用，英雄、领袖的作用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上可能会更大。但是应该看到：（1）杰出的英雄人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客观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所谓时势造英雄。（2）杰出人物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下才能起作用。而在起作用时也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各

① 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08页。

② 转引自《唯心主义先验论资料》选辑第2册，第112页。

③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82～483页。

种制约。如不能脱离本阶级的人民群众；不能脱离客观的可能性；不能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等。(3)个人的能力、智力、品格也起影响作用，其作用的表现形式、表达方式和表达风格，是在不同人身上体现的偶然性。而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某个杰出人物不同于其他杰出人物的独特风采。(4)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民群众。

因此，书写历史，一定要书写广大人民群众，而不能只书写英雄。对于新中国的历史的探讨和研究，视野只停留在英雄人物、杰出人物、领导者的身上显然是不行的。书写社会思想发展史时，可以重点书写代表群众智慧和要求的伟大思想家的思想历程，但书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则是要更多地撰写人民群众。

二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某些论述 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群众的作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毕竟是史学家，他们和那些赤裸裸地宣扬唯心史观的哲学家不同。后者往往把群众说成是“群盲”、“会说话的工具”等等。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没有这种宣扬，有时还注意在分析历史时将视线转向群众。比如：

在追溯中国历史的过去时，虽然作者持有不正确的“循环论”观点，但是，他们却比较明显地看到了改朝换代过程中群众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章中作者说：“最后，当新政体的兴起和旧政体的衰落会合时，民意的突然和加速的转移似乎改变了授权统治的天意。政府的种种镇压活动变得更加不顾一切和严厉，但是赖以进行镇压的忠诚基础却在不断收缩。”^①作者还以股票为例，生动地谈到：“就像股票市场投机商对市场繁荣和萧条的预测那样，民间关于中国政治的假设有助于它的实现。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2页。

民意一旦转变,行将灭亡的政体很快就丧失其统治力量。它的死亡通过武力来解决。”^① 作者注意“民意”,看到了在朝代更迭中“民意”的作用,这反映了作者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一定程度的尊重。

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二位教授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所写的序中,曾谈到:“关于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及知识分子各章的顺序,我们仍遵循第14卷的编排。但除此而外,另有两章我们把视线从北京的决策者那里转落到中国的民众上,看看这场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② 在这种视线转移中,一旦目光落到人民群众的身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就发现,一些中国群众起初对“文化大革命”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的,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当“文革”引发的派性内乱,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的时候,他们“撤回家中,瞧瞧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无秩序状态,思考着这一切对中国的前途将意味着什么”^③。这种看法,比西方有的学者所讲的“文革”是中国人全民性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更接近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该书的作者还看到了后来更多的变化,即当人们对“文革”从拥护到要冷静地“瞧瞧”,又转向了不满,“使安全感和信任感逐渐让位于一种觉得当政者武断专横、惶惶不安的感情”^④。作者在对群众情绪的仔细观察中,特别注意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变化。从而透过现象,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存在。从现象上看“有不少高喊无限忠于毛泽东的浮夸之词”^⑤,而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家庭的关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2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751页。

④ 同上书,第752页。

⑤ 同上书,第760页。

系和彼此的热爱还是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例如,家里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全家人能休戚与共分担厄运,他们面对歧视,全家人抱成一团,同仇敌忾”^①。

当作者将视线转到民众身上时,还看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意义。尽管在对群众路线的论述上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还是正确地指出:“‘群众路线’这个思想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与领导方法上的一个真实而重要的方面,这种理论和方法是以党的经验为基础的。在江西时期,就已开始非常重视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其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假如没有这样的联系,脆弱的根据地就难以生存。”^② 作为一位外国学者,能够看到“群众路线”与党的历史经验、生存和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这反映了他们不是蔑视群众,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史实,具有求实作风的。

三 从总体上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基本上是一部英雄史书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虽然不是在公开、露骨地宣扬英雄史观,即唯心史观,但从各位撰者对于事实的论述、评析、大大小小的论断来看,他们始终没有跳出唯心史观的藩篱。该书从头到尾随处可见以英雄史观分析和评论事件和人物,是一部具有相当浓重的英雄史观的历史书。这表现在:

第一,把中共领导人的状况看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就的决定因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在谈到 1949 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时,不是考察和研究广大人民群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 760 页。

② 同上书,第 4 页。

众当时的革命和建设热情,如 50 年代初劳动模范的大量涌现,以及在抗美援朝中为捍卫新生政权“保家卫国”的英雄战士的业绩,而是一味地考察党内领导者,即书上所说的“党的精英”中间所发生的分歧,而且把这种他们所谓的“裂缝”的大小看作是对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甚至认为 1949 年到 1957 年 8 年内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是在党内精英只发生有限的分歧的情况下取得的。”^①这样的结论未免有失于片面了。当然,中国共产党是一贯重视党的团结的,认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特别是领导层的团结。但是,团结并不意味着党内不能有任何的认识不一致和意见分歧,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领导层内在有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争议,并不都意味着是不团结,或必然为事业带来损害。因为,党的领导者,即书上所讲的“党内精英”,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的不同,阅历的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都有自己的认识上的优势,也都有认识上的局限。于是构成看问题的不同角度。这正是形成互相补充和纠正,以求更接近实际,更接近真理的客观基础。党的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决议,往往都是在各种分歧意见相互争论、相互补充中形成的。工作意见上的某些分歧,常常是克服每个人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的开始。当然,这需要在分歧、争议、协调、一致等每个环节上都有一个正确的处理。这就是说,在分析历史进程的时候,注意观察领导层的状态是必要的,但把一切成就或变化都归结于此,显然是不适当的。

第二,仅从领导人的个人思想动机来阐明历史

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解释历史时,都是认为历史是一部英雄史。他们或者说,历史是英雄伟人创造的;或者说,历史是杰出人物创造的;或者说,历史是领袖、领导者主宰的。于是,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等,活跃在各种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 55 页。

史书中间。而且,这些史书的撰写者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揭示以上少许大人物从事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不必去追究这种动机背后的动因,即社会物质原因、客观原因。《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也没有能完全跳出这样的境界。在这里,常常把领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动机描绘成指挥、支配、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唯物史观认为不是一人的动机,而是许许多多人的犬牙交错彼此相左的多种动机所形成的合力才能左右历史的前进方向和结局。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决定大多数人的主观动机背后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发展的需要、生产方式变迁的要求以及代表上述客观要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才是真正决定历史变迁的动力。而这些却常常被排斥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的认识和所书写的领域之外。比如,庐山会议开始时,一些人批评大跃进,彭德怀上书直接批评毛泽东,其原因是什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抛掉客观原因,一味从参与者的主观动机上去找寻,结果离题万里,违背事实,而且有时竟闹出了笑话。作者说:“关于庐山会议这些年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料,但是有关个人的动机和个人的策略仍然得不到解答。”^①于是,作者就下力气去搜索个人动机。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头号人物毛泽东的思想动机了。书中认为:毛泽东整彭德怀的动机之一竟然是为了一件私情。“彭德怀曾经领导在朝鲜的中国部队,在他的指挥下,毛的儿子在他的飞机被击落时遇了难。朝鲜战争结束时,毛和彭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坏了”^②。这分明是在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整彭德怀,动机之一为着彭在朝鲜战场上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儿子毛岸英,只是个人间的恩怨。这离历史的真实太远了!这种说法,从根本上抹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毛泽东送儿子毛岸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8页。

② 同上书,第324页。

英参加抗美援朝时,同全国人民一样,立誓保家卫国,并心甘情愿做出最大的奉献和牺牲。这里讲的“一样”,说得更准确些,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虽然晚年丧子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毛彭关系。无论在朝鲜战场还是回国担任国防部长,毛对彭都给予了信任和支持。为何事隔多年,毛泽东又为此事要整彭德怀?很注重动机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并没有给人们一个合理的解说。附带说一句,毛岸英是在工作岗位的志愿军总部遭美机轰炸身亡,书里说“他的飞机被击落时遇了难”,是不准确的。

其次,我们再看看作者对彭德怀是怎样说的。该书分析彭德怀上书的动机,列举了十几点之多。从撰写的次序来看:(1)彭与毛有积怨,“彭德怀从40年代起在许多争论问题上和毛的意见不同。那时彭负责和日本对抗的百团大战,其后毛对这次进攻的计划和指挥提出了尖锐批评”^①;(2)毛对儿子在抗美援朝中的牺牲不满,当时的中国部队是彭指挥的;(3)彭谋求和苏联的良好关系,虽然这时赫鲁晓夫已经执政,但“由于他看重苏联军事援助,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②。(4)庐山会议前,彭曾会见过赫鲁晓夫,表示过对公社化等的“普遍忧虑”; (5)由于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个人动机,即对其当时的职务不满,“怂恿彭在庐山批评大跃进”^③;(6)“他觉察到在庐山有一种持续而令人不安的不切实际的态度”^④;(7)毛对他抑制大跃进过分行动的努力正获得适当成效而感到相当满意,“彭的目的也许是要使毛为难”^⑤;(8)“也可能要搅乱毛已作出的让刘少奇继任的安排”^⑥。书中罗列的上述诸多的动机,可以说是没有一件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说对了的,没有一点能够真正说明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确切动机。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24页。

③ ④ ⑤ ⑥ 同上书,第329页。

关于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已经有了很多专著和论文出版,应该说史料是比较充分的。我们不想在这里对上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观点展开逐条驳议。只是希望大家注意,请看彭德怀自己是怎样说的。在以彭德怀 1970 年被困禁过程中写的一份自传式材料的基础上,由别人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彭德怀对 1959 年在庐山上为什么给毛泽东写信是这样讲的:“为了表白我当时写信的动机和愿望,故在这里再次把我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及对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观点说明一下……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但是,是不是在当时就没有什么问题呢?不是。而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缺点或错误的。”^①“首先,我当时对计划工作是有意见的。认为一九五八年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不少工厂返工和窝工,分散了资金,致使必成项目推迟,而形成了原材料紧张。一九五九年并没有加以控制,而盲目地继续扩大基本建设。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注重了加工工业及材料工业的建设和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原料工业。原料工业是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基础,如果基础不巩固,就会影响加工工业的发展”^②。“我当时认为,在计划工作方面的不够实事求是,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彭德怀说:由于大炼钢铁、大兴水利、大放“卫星”,以及几个“大办”,“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说与某些领导部门要求的任务过高无关”^④。“这就势必造成农业缺乏劳动力,而直接影响农业增产,又进而影响到一些工业、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和副食品的供应”^⑤。对“内销服从外贸”的政策,彭德怀看到“出口过多,就会引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0 页。

② ③ 同上书,第 270~271 页。

④ 同上书,第 274 页。

⑤ 同上书,第 272~273 页。

起国内市场紧张,将影响货币回笼和财政收入”^①。在谈到错误的思想根源时,彭德怀说:“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滋长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远的战略性的任务,错误地作为当时的行动口号。”^②“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③。“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④。

我们认为,上面引述的彭德怀自己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才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等“左”倾错误的真正动机。当然,由于它写于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彭德怀又处于被囚禁的状态中,很多问题难于尽言,但彭德怀的基本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而产生这种动机的原因,是因为他深入实际,回家乡作了调查研究,看到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并且,共产党员对人民负责的强烈责任感,使他千方百计努力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急迫要求解决上述问题,这种强烈客观需要的一种反映。

通过上述对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矛盾斗争时各自动机问题的分析,已足以看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般情况了,因此,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恩格斯曾经谈到:“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他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

① ②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③ ④ 同上书,第275页。

律支配的。”^①这就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②“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因为任何另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③。一百多年前伟大哲人概括的深刻哲理，至今仍是有教益的。

第四节 历史观和方法论理解上的几个误区

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主要原则，我们已经在上面三节中作了概括性的评析。但除此之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并非是不重要的。主要有以下十点：

一 “一分为二”讲的不是“不断分裂”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声称，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思想，宣传的只是事物的“不断分裂”。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研究中国的政治系名誉教授施拉姆，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的第1章中，曾正确地谈到：毛泽东的结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④。他还引用毛泽东的论述，进一步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② 同上书，第696页。

③ 同上书，第697页。

④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83页。

明“一分为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说“毛宣称,这一原理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①。施拉姆教授对上述观点的确认,反映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他很好地注意了对于核心问题的把握。然而,遗憾的是施拉姆教授却没有完全理解“一分为二”的准确涵义。紧接着上面的引文,他撰写了以下的话:“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电子也像原子最终要被分裂。但他(指毛泽东——引者注)首先相信的是,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社会范畴和政治力量都会不断地发生分裂。”^②看来,施拉姆认为,“一分为二”的必然结论就是分裂,而且是不断分裂。那么,在“一分为二”中,就不可能得出合、团结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统一的结论了。这样,我们不能不说,作者在对“一分为二”的理解上出现了片面性的误区。这种片面性,表现在:

第一,丢掉了对立面中的统一关系。“一分为二”是毛泽东运用中国古代的哲学用语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精辟表述。“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③。所以,对立统一规律,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矛盾双方,即对立面的相互差别、对立、排斥、分裂、斗争;二是矛盾双方,即对立面的相互统一,亦即对立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某一事物在依据辩证规律运动时,在某一时期、某种情况下会出现分裂的情形,如原子、电子及社会现象、政治势力的分裂。但是,分裂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分裂。因而,我们不能把对立绝对化。在矛盾双方之间,“没有统一”的“绝对对立”是没有的。就是原子也不是像施拉姆教授所说的:“最终”要分裂,而是统一中就有分裂。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8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

正像毛泽东在谈到“一分为二”的普遍性所说的：“你看在原子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①

第二，只看到某些事物处于绝对运动时的部分情形，而无视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事物运动采取两种状态，即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这两种状态，都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引起的。当事物的运动处于第一种状态时，只有量变，没有质变，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量变积累到一定数量达到临界线之后，事物发展到第二种状态时，就发生质变，从而显示出显著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②。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恰恰是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或者对于“一分为二”所涵盖的这一内容没有首肯，从而肢解了“一分为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③。在这种状态下，所出现的团结的破坏，即分裂的出现，仅是质变的一种形态，而不是全部。所以，认为“一分为二”只能得出一个“分裂”、永远分裂的结论，是对本来科学含义的曲解，是十分狭隘和片面的。

在中国也有一种将“一分为二”看作只讲分、分裂、斗争，而不讲合、团结、统一的观点，究竟是谁影响谁呢？是国内影响国外，还是国外影响国内，这无从考察。但是，相互影响恐怕是不可避免地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2页。

存在着。我们把它们说成是同一种思想潮流,总还是可以的吧!讨论施拉姆教授对“一分为二”理解的误区,联想到中国一些人的看法,感到这种扭曲“一分为二”的观点,似乎有一点“中西合璧”的味道。我们同时做些探讨,可能有些现实意义。请看:

有人说:“毛泽东思维方法也是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一分为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就是这么把世界劈成两半的,不属于这一半,就属于那一半,并且一旦作出选择,就一生以这一半去反对另一半。”^①这里引用的关于“拥护”与“反对”的一段话,是毛泽东 1939 年 9 月 16 日同中央社、扫荡报和新民报的三位记者谈话时讲的,是针对汉奸汪精卫的。原话是这样:“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绝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②这里所指是十分明确的,前提和结论是一致的,也是正确的。问题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把这句特指的有特定含义的话,不但广泛化而且绝对化,造成一种误解。我们认为,这是不能由毛泽东负责任的。将“一分为二”说成“把世界劈成两半”,这就不对了。毛泽东在自己的多次讲话与文章中,都反复阐明,他讲的“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说明事物矛盾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实践上,他强调联合,强调组织国内或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只要斗争、反对联合。他甚至与血战十年的国民党重新联合,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将“一分为二”解释成“劈成两半”,既简单化,又有很大的片面性。

国内还有一种说法,即把“一分为二”说成只讲对立,而不讲统

① 《说不尽的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0 页。

一。有人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个叫‘一分为二’，他实际上是认为矛盾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统一是暂时的，对立是永恒的。”^①说“一分为二”只讲对立，不讲统一，这同施拉姆教授犯了同样的毛病，即肢解“一分为二”，抛弃了其中关于矛盾双方除了对立，还有“相互统一”的思想。作者讲到毛泽东的错误，认为它和这种哲学思想有直接关系。这是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与他在实践中的错误混为一谈了。我们认为，这两者应该严格予以分开。

二 “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否“背道而驰”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1964年，中共中央委员、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提出了和毛相反的概念：“当反对他的运动在宣传工具中展开时，党校、大学和研究所对调和论的企图——一如杨所赞同的‘合二而一’的用语所表达的——进行了集中反击；‘合二而一’同毛强调阶级斗争的用语‘一分为二’背道而驰。”^②很明显，作者认为，“合二而一”有调和论的企图，“一分为二”强调阶级斗争，所以，前者和后者相背离。这种看法，实际上沿用了1964年中国发生的那场对“合二而一”的错误批判中使用的“左”的观点。它是不符合实际的。“合二而一”不是矛盾调和论，它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通俗地表达方式。“一分为二”也不是只强调阶级斗争，它同样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通俗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用“一分为二”来概括或用“合二而一”来概括，二者都是利用中国古代的哲学术语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应该说，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通俗化、中国化的一种尝试，都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一分为二”，只是在对这一

① 《说不尽的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493页。

理论作某种片面理解和运用时,才是“只强调阶级斗争”的。把它用来批判“合二而一”,把两个提法绝对地对立起来,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是十分有害的。这直接违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国古人是怎样阐明一分为二的呢?朱熹在《周易本易》中说:“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在《朱熹类语》(67)中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张景岳在他编的《类经》中对皇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注释道:“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

中国古人又是怎样讲“合二而一”的呢?方以智在《东西均》中说:“虚实也,动静也,阴阳也,形气也,道器也,昼夜也,幽明也,生死也,尽天地古今皆二也。两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交也者,合二而一也。”

善于辩证思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远古时代,在没有“一分为二”与“合二面一”的概念时,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在有关伏羲画八卦的传说中,就谈到伏羲创造了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现象的“八卦”。“八卦”的核心概念是阴阳。“八卦”以自发的、素朴的对立统一观念来说明阴阳之间的关系,说明二者是相生又相克,既对立又统一的。与“八卦”观念相对应,中国古代哲人又创造了“五行”观念,认为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形成了世界的万物。万物正是在阴阳分合与“五行”相生相克的有序关联中而不断发展的。“八卦”与“五行”成了古人用来说明世界及其演化的一种整体性观念。老子的一与多的思想,也是说明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体现了古人的整体观念。老子认为,整个宇宙的演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世界上的“多”由“一”演化而来,因而“一”与“多”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内在统一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见,中国人的对立统一观念,早已产生了。后来,人们的认识不断发展,又出

现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概念。毛泽东、杨献珍不过是用中国古人所创造的概念,来表述对立统一规律的。之所以借此来表述,是因为,我国古人表示对立统一规律的这两个概念,很精辟、很通俗,而又恰恰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科学理论。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一开头,就通俗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随后,他又举例说如数学中的正和负、力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等等说明一个思想,即“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这就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杨献珍正是研究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以及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才得出一个认识,即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可以用“一分为二”来表述;“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也可以用“合二而一”来表述。杨献珍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来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

1964年,批判杨献珍时,不顾事实、不顾中国传统文化、不顾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硬说杨献珍提出的“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背道而驰,是反对“一分为二”的,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

彻底的唯物论者杨献珍,无论在任何艰难情况下,都没有终止他的辩论。他恳切地说:“当提‘合二而一’时,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要去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批判‘合二而一’刚开始,就已定了性,说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说‘是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放了一支毒箭’。这是有意陷害诬蔑,把水搅混。因为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中国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代人的一种最原始的世界观,太极图,说它是‘一分为二’也可以,说它是‘合二而一’也可以。”^①

^① 杨献珍:《我的历史罪案》,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1~312页。

既然“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不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批评杨献珍时,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呢?第一,杨献珍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的“左”的错误的,于是,1959年,反右倾,他挨批;1964年,意识形态大批判,他继续挨批;第二,他着实地宣传唯物主义,反对普遍流行的浮夸风,触犯了当时掌权的某些人;第三,在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下,只能千人一面、万口一词,不能容许任何人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理论与概念。所以,理论的扭曲与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时常是很难分开的。

三 “肯定否定的规律”能否改为“否定之肯定规律”

施拉姆教授在80年代所写的《毛泽东和永远革命理论》一书,曾正确地翻译和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否定问题的规律。在90年代撰写《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他还说:“1958年1月,毛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文上署了名。当这份指示以草稿形式转发时,毛有这样的一句话,十年前我是这样翻译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和否定规律,是永远存在普遍存在的’。”^①这段翻译,除个别少字与多字之处,从总体上来看,是正确的。与中国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该文比较,少三个“的”字、两个“地”字;多一个“和”字,然而,原意并没有改变。原文是“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②。当时,施拉姆教授还比较正确地分析了毛泽东所提出的肯定否定的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惯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关系。他说:“这里所说的‘肯定和否定规律’,我认为是一种中国政治和哲学语言中屡见不鲜的省略语句。‘肯定和否定’意在引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否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50~51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4页。

定、否定之否定’。”^①随后,他还对毛泽东的提法作了评价,说:“基于这样的设想,对照其六十年代中期所提出的观点,我随后写到,毛在1958年‘重申了’恩格斯关于三大规律的经典公式。”^②尽管“重申了”的说法没有表达毛泽东提法的新意,然而,纵观施拉姆教授的上述论述,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施拉姆教授在十年后改变了看法,而且连译文都改变了。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他说:“事实证明,刚才所引证的中文表述,实际上应翻译为‘否定之肯定规律’,人们正是这样来理解,而且在当时的中国被当作毛主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造。”^③确实,当时被当作“重大的理论创造”,然而,过去、现在、包括在当时,从来没有人把“肯定否定的规律”理解为“否定之肯定规律”。施拉姆教授认为,在延安曾是毛的哲学研究小组成员的杨超就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在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几个理论问题》一书中曾写到:“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把惯称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否定之肯定规律。”^④我们翻阅了杨超的书,那里明明讲的都是“肯定否定的规律”,而没有一处“改称”为“否定之肯定规律”。当然在两种文字的转译过程中发生某种误差的事是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是否与误译有关。不过,这种表面上看只是文字顺序上颠倒的误译,却使表达的内容发生很大差异。如果这是属于施拉姆教授本人的理解并硬是将这一表述强加给杨超,并强加给毛泽东,那就很不应该了。因为,这种表述的差异,会引起对这一规律理解的严重扭曲。

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方向。当新事物否定旧事物后,它还要进一步发展,结果将被另一个新事物所否定。毛泽东用“肯定否定的规律”来代替原有的提法,充分阐明了原

① ② ③ ④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51页。

意,且又有进一步发挥与发展。而施拉姆教授将其改为“否定之肯定规律”则含义就不同了。表现在:(1)以“肯定”代替原有第一个“否定”,说明否定旧事物的新事物的出现与存在,有其历史的理由,理应被历史所肯定。而经施拉姆教授改动所成为的“否定之肯定规律”,则不能说明这个问题。(2)“肯定否定的规律”,表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对立面斗争。其中的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处于不断的斗争中。当肯定因素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过程将走向更高阶段,发生质变,于是旧事物为新事物所代替。从“否定之肯定规律”中,则看不出这一过程。(3)“肯定否定的规律”指明,否定过程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新事物要保留旧事物中的合理因素,以利于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所谓“否定之肯定规律”则不能说明这个问题。(4)“肯定否定的规律”表明了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循环。“否定之肯定规律”,即否定的事物又回到了肯定的事物。从上可见,施拉姆教授将“肯定否定的规律”更改为“否定之肯定规律”,就把这一规律扭曲为无矛盾论、否定一切论、循环论等。在语音学中,“之”是到达的意思,施拉姆教授的更动,只是说明从否定到肯定的反复循环,是没有矛盾的运动,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从而落入形而上学的法网。这是对“肯定否定的规律”多么大的扭曲!

四 毛泽东否定还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否定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言下之意是,毛泽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对立统一规律就够了。他的根据是毛泽东的两段话,这就是:

(1)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的哲学谈话。其中说:“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

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①

(2)1965年12月杭州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说:“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②

应该说明的是,这两段引文均是根据非正式的版本。因为,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都没有正式发表过。因此,文字的准确性就成为一个问题。不过既然施拉姆教授已经把它公开写在向全世界发行的专著中,我们也只能对这种版本的说明加以评析了。

根据上面的两段引文,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否定了马列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概念与规律。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这里有一个对上述引文理解的误区;同时,对毛泽东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贯思想,包括对这个规律的肯定、发挥与发展,作者的把握,有很大局限。

第一,从引文的内容得不出毛泽东否定“否定之否定”概念与规律的结论。

因为,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实质与核心作用,这当然与他晚年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斗争哲学”有关。从这样一个中心点出发,他认为过去概括的三个规律不够适当,三者不能并列。用他的话来说,这种并列叫做三元

^{①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54页。

论。毛泽东的理由是：质量互变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其准确的意思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所以，三个规律不能并列。而先人将它们并列，把三者的意义与作用说成是一样的，都看成是最基本的规律，毛泽东是不赞成的，他说“我就不相信”。毛泽东正是就这个意义上讲不相信的，而不是说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其他两个规律。毛泽东还认为“否定之否定”的概念不够规范和准确，就这个意义毛泽东讲“否定之否定规律根本没有”。他以“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来表述，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反映事物的发展的辩证规律。因为在发展链条中，任何对前者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于后者的肯定。

第二，从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来看，从来也没有否定质量互变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意思。

毛泽东认为：经过规范化了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永远存在。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说：“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了“永远地普遍地存在”八个字的十分肯定的断语。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和中央会议讨论，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的。这种正式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提法，应该说是比某一次讲话的记录稿、甚至是个人笔记一类更准确些，也更可靠些。

第三，毛泽东认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而不是否定这一规律。

毛泽东在对李达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批注上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

^① 《毛泽东著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①“核心规律”还是一般规律,只是地位和重要性的区别,并非有和无、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区别。这段毛泽东亲笔写下的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思路。

第四,毛泽东指出“否定之否定”表明事物发展过程。

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注中,毛泽东指出:“所谓现实与认识发展之辩证法过程,就是质量互变、矛盾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②在这里,毛泽东是把否定之否定同另外两个规律一道看作是事物发展规律的表述。不过他批评了那种“只看量的变异”的错误,强调:“而重要恰好不在量,而在发展之质的生涯。”^③因为只有过程达到否定的高度,才会表现出质的变化。即“必须当作新生命的出发点,即新规律性之出发点之一定过程的否定,才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真义或本质,否则只是空虚概念的游戏”^④。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质变才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真义或本质”。这是十分深刻的见解。

第五,毛泽东认为“否定之否定”是表明内部联系的理论。

在读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所写的“黑格尔把犯罪当作法律的否定去观察,把刑罚当作犯罪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去观察。在这里,实际上,三段法成为把现实的现象嵌入其中的外的图式”^⑤时,毛泽东批注说:“这样说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甚么也乱嵌进去,这是外的连〈联〉结,表面现象,图式主义,不是内的连结与本质发展的东西”^⑥。正确地来说,毛泽东认为“否定之否定律是论内的连结的理论”^⑦。就是说,只有当客观存在着内部联系的对立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506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

③ ① 同上书,第118页。

⑤ ⑥ ⑦ 同上书,第115页。

统一物,由于内在矛盾变化达到的质变,才能称之为否定。

第六,毛泽东认为“否定之否定”表明向前、向上运动的特定方向。

他说:“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是不相干的两规律性人工的机械的衔接,不是三段法儿戏,而是向特定方向中的发展。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本质。”^①为什么?因为,“这种否定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②。因而,否定“是向特定方向中的发展”^③。

从上可见,不能说毛泽东否定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而只能说 he 补充、发挥、发展了这个规律。

五 毛泽东没有将“对立统一规律” 放在其他两个规律之上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章中,施拉姆教授表明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毛泽东在辩证法的三个规律中,似乎将对立统一规律放在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之上了。他说:“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但在同时,由于把‘对立统一的法则’描述为:具有‘思维的根本法则’的特征,从而暗示有一种新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就这样,他似乎把它放在其他两个范畴之上。”^④

施拉姆教授的理解,可能有某些根据和理由,例如毛泽东晚年

①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② 同上书,第124~125页。

④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8页。

某次未正式发表的讲话之类。但从毛泽东一生的哲学著作中作总体考察,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他对毛泽东所阐明的“对立统一规律”与其他两个规律的关系理解是不准确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把“对立统一”与其他某个规律的关系看作上下关系,他只是强调前者是辩证法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作用只是规定和影响其他两个规律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凌驾于其他两个规律之上的。三个规律是从各个不同方面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规律,表明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质量互变规律,表明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所有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衰退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由量变进到质变的这一过程的内容”^①。这也就是说,没有事物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没有事物中新的、前进的因素去不断地战胜旧的、腐朽的因素而使自己不断壮大,就没有事物的发展。而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其他事物,而是有一个过程。对立面的新与旧有一个逐渐消长过程,从而使事物出现两种状态,即相对稳定状态(量变)与显著变化状态(质变)。事物的变化不是循环,而是一种前进的运动。是在事物对立面的斗争中新生事物不断否定旧事物的运动。即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从上可见,一方面,其他两个规律要呈现自己,都离不开对立统一规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其他两个规律,事物的发展将是难以显现的、漂浮不定的东西。正因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有这种客观关系,所以毛泽东才反复强调对立统一规律的地位和作用。这其中并没有随意的将谁放在上面,或者放在下面的意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2页。

思。况且,关于对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核心的原理,列宁早已有论述,只是需要解释和发挥,毛泽东正是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六 “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观点不是 “斯大林的老式理论”

在由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托马斯·鲁宾逊执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3章中,在谈到“文革”前的中国情况,以及毛泽东的言行时说:“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裂和国家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①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作者提出的论据是子虚乌有。该书证明毛与林搬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理论,依据的是一个文件和一次讲话,即《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和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一个《五一六通知》,一个《五一八讲话》,确实都是表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重要文件,当然是可以作为提出论断的依据的。但是很遗憾,我们反复翻阅了这一通知与讲话,但没有查到“波浪式前进”的上述引文。依据没有的引文而得出的理论,当然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在我们所熟悉的斯大林的著作中,没有一处谈到“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了“波浪式地前进”的观点,这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理论,即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理论,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是另一种形象而通俗的表述。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的(包括社会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233~234页。

的)一切过程,都是“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这个过程,以及人们对它的反映,即认识,都不是直线的,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①。毛泽东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发挥,并进一步提出“波浪式地前进”的观点。他在一些讲话与文章中曾多次阐明了这个问题。因此,把它说成是“斯大林的老式理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对于一个理论来说,新式或老式,并不能成为判断正确与错误的标准。

第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对“波浪式地前进”的理论在理解上出了差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作者说:“我们已经指出,毛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一系列连续的运动为特征,只是间或点缀一些平静的时光。这种模式构成了G·威廉·斯金纳和爱德温·温克勒所称的‘依从循环’。毛自己把这种现象看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②这种理解的错误在于将“波浪式地前进”看成是“依从循环”;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地发展。这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表现在:

(一)毛泽东明确指出“波浪式地前进”不是循环,而是一种前进地上升的运动。毛泽东讲“波浪式地前进”时,特别强调的是“前进”。而且,郑重声明:“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③他还以中国社会为例,谈到这里讲的“总是”的深刻含义:“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58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①但他紧接着说:我相信“中国总是要前进的”^②。所以,仅仅是“近似圆圈”,“有点回归”,但总的是“前进”,而绝不是“依从循环”。

(二)将“波浪式地前进”,说成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的交替,犯了简单化、片面性的错误。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这是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普遍现象。他通俗地列举许多现象。比如,关于积累一年多、一年少的问题,他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做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③毛泽东还举了许多自然界的例子,说:“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④在谈到人类的活动时,他说:“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⑤在有一次讲话中,毛泽东除以走路为例说明这一理论外,还特别谈到社会。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个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⑥于是,在另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总的断语,即“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⑦。“波浪式地前进”讲的就是这种曲折性。所以,将“波浪式地前进”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理解为只是“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之交替,

① ②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③ ④ ⑤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⑥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是把这一论断包含的丰富内涵简单化了、狭隘化了。对准确理解这一规律的普遍性、真正内涵及其重大意义是有害的。

七 毛泽东并不具有“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作者说：“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毛泽东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①作者在这一小段话里给毛泽东戴了好几个莫须有的大帽子：“中国中心主义”、“落后的辩证法”、“主流的毛主义”等。但是，既没有提供事实的根据，也没有提供理论的论证。也许这些看法在西方的某些人中是一种不需作任何解释的共识，但在中国学者看来，这只是一种明显的无知和偏见。而偏见距真理常常比无知更远。这样的错误断语出现在学术巨著中，只能令人感到遗憾。

第一，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落后的辩证法”。这里的毛“所谓的”一语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所谓的”在语言文字学上来说，只能解释为“所说的”。那么，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吗？毛泽东虽然曾指出过，辩证法有一个从自发向自觉的发展过程，从朴素辩证法到黑格尔辩证法，直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但从来没有说哪一个是落后的。请听，毛泽东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11页。

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①在这里,区分了古代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但却认为他们有自己的历史条件或历史理由。而没有认为哪一个是“落后的辩证法”。这里还明明谈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个伟大理论,哪里会有什么“落后”之说?

第二,把“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和“所谓落后辩证法”的观点,硬扯在一起,没有丝毫道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更容易还是更困难?这个问题确实在20世纪初的革命党人之间存在争论。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可以比英、法、德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革命胜利更早些,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经济文化虽然更落后,但在有利的国内条件和有利的国际条件下革命可以早胜利。他们的这种预见,早已为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实践所证实,是一种英明的正确预见。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所谓的“落后辩证法”或“主流的毛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落后”一词,一个是用来形容辩证法,一个是用来形容国家,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

八 头脑的加工厂作用讲的并不是正确思想 “只能”“从领导头脑中产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把头脑是“加工厂”的论断,误解为思想、观念、路线是从领导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作者在《剑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章中,本来正确地引证了毛泽东的话,但解释却出了错误。引证的原话是:“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便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好的路线、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来说,只是一个加工工厂。”^①在这里毛泽东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是说领导的思想、好的路线的制定,是从群众中来的。可是,作者却解释说:“的确,如果没有不断的信息和建议反馈,这个工厂就生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但归根结底,正确的路线也只能从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中产生。‘加工工厂’一词前面的反义副词‘仅仅’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真实,即决策从这里产生。”^②这里涉及一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主观自生的?

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回答: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来自上天、来自上帝、来自“宇宙精神”;主观唯心主义则认为来自人们自己的“感觉”、来自“我思”、来自主观,是主观自生的。该书的作者断言:“正确的路线”、“决策”,“归根结底……只能从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中产生”。这不需要我们来对号,作者已自行人座了。无疑,这种论断是出于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观念。它否定了群众路线的前提、出发点,即“从群众中来”;也否定了群众路线的归宿,即“到群众中去”。在英雄、领袖、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他依据唯心史观作了处理。认为正确的东西来自英雄、伟人、领导者的头脑,而群众是无足轻重的,不能产生正确的思想。它抹煞了领导的正确思想来自人民群众,来自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归根结底,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毛泽东的论述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关系,就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①毛泽东在肯定“原料”来自工农群众的前提下,讲到了“加工”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即制作得好和不好。好就是符合实际,也可能不好,脱离了实际。因此,领导人的头脑,即“加工厂”,也是起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的,但基础和前提是群众,这是十分明确和坚定不移的。毛泽东讲“归根到底”来自群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则讲“归根到底”来自领导的头脑。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反映了是否尊重唯物论,是否尊重历史主义;反映了是否承认思维来源于物质、主观来源于客观,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反映了是否承认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的泉源。

九 群众对领袖的错误并不是“没有人有勇气”敢于直言,而“最终还是要领会和掌握别人的思想”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两大部厚书,足足有 160 万字,可是,提到人民和人民群众的地方很少。偶尔提到“人民”,提到“人民群众”,但是,对它的形象与作用又作了不正确的描绘。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没有勇气、没有胆量、不敢讲真话的唯唯诺诺的下等人,最终只能听别人的。我们从下面的论断,可以充分地看出这种观点。

其一,密歇根大学教授肯尼思·利伯塔尔说:“在他同事的眼中,毛被概念化地当成了中国革命本身。而人民则认为,他可能犯严重错误,因而可能试图通过官僚主义的手段损害他所创始的事业,但没有人有勇气(或胆量)直接就毛对当时形势和党的重要工

^①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作的根本评价提出疑问。”^①

其二,施拉姆教授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虽然正确地引证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经典定义,然而,他却做出了错误的结论。他引证说:“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②在做这一段正确引证之后,施拉姆教授将“化为群众的意见”七个字的下而点上了着重号,然后说:“正像画着重号部分所明确表示的,虽然群众受到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信任,但他们最终还是要去领会和掌握别人的思想。”^③

上面两段引文说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没有真正准确地理解群众的历史作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表现在:

第一,认为中国的群众不敢直言,不敢纠正领袖的错误。这里似包含着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某些误解。确实,像西方群众在集会或媒体上公开抨击领导人的现象,在中国比较罕见。中国人表达意见的方式和习惯,同西方是有较大差异的。这恐怕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在一定条件下,或者在一定阶段,难以表达对领导人的意见,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且群众一旦认识清楚,是不会永远沉默的。他们或者在下而讲,或者通过一定渠道向上反映,或者由他们的“代言人”直陈。比如,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时群众是热火朝天积极地投入了,但是,经过实践很快发现“左”倾错误,以及“大跃进”的破坏作用,为此群众纷纷提出批评,反映到中央。于是,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某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345页。

② ③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4页。

些省、地、县的负责干部,1959年就开始作检讨。众所周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于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干部直接向毛泽东提出意见。虽然彭德怀等遭到错误打击,但“大跃进”中发生的错误,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干部所认识,所以才会有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也才会有毛泽东在1961年6月12日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和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又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大灾难、大破坏,当群众体察与认识以后,他们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给毛泽东上书,书写大小字报,因而,也不断有人被打成“反革命”。最后群众集体起来说话了,酿成了群众运动,爆发了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第二,群众和领袖“最终”是谁听谁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认为,群众“最终还是要去领会和掌握”领袖的思想。对领袖们总结实践经验、集中群众意见,制定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群众是要领会和掌握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统一群众的认识,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但是,说到“最终”,就要仔细分析了。实际上,从认识过程来看,领袖的正确思想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来的,又必须回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认识、发展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①领袖要形成正确思想,需要经过两个认识上的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在社会实践中,无数客观现象反映到领袖的头脑中,得到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材料积累多了,就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然后,又有第二个飞跃。也就是说,领袖的思想认识(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外界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9页。

规律,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就是把第一阶段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人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出现一个飞跃。只有这次飞跃,才能检验领袖的思想认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领袖的一个正确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两个飞跃,都需要在群众的实践斗争中来完成,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所以,领袖的思想认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斗争。在“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要贯彻领袖们所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确实有一个群众领会与掌握领袖思想的问题,但是,这只是过程,而非终结,因为,归根到底,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领导的正确思想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样的来源与检验标准,领袖的思想既不能产生,也不能被确认为真理。所以,最终领袖还是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与呼声,由群众的实践来判定领袖的对与错,即“最终”领袖还是“要去领会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认识路线。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说:“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求教。”^①综上所述,这里有一个最终谁决定历史命运的问题。认为群众不敢说话,认为群众最终只能听领袖的,这无疑是在讲领袖决定历史、创造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无足轻重的。这不能不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是在沿用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唯心史观思考问题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4~845页。

了。

十 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而“群众对待你”并不是 “就像背着儿媳过小溪的公公”一样

“背着儿媳过小溪的公公”这句生动形象的谚语,据说是一位中国基层干部对外国人说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第9章的作者圣迭各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理查德·马德森说:“除了容易受上级公开批评以外,本地干部还经常受群众私下里的抱怨。一个本地干部对威廉·欣顿说:‘群众对待你就像背着儿媳过小溪的公公。他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得到的回报除了咒骂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怀疑他想把儿媳搂在怀里。想拥抱她。儿媳觉得老人放肆无理,儿子认为老爹调戏他的新娘。’”^①作者不加分析、毫无批评地转引这番话,不能不使人认为作者对此是表示首肯,并给予了同情。书中所说的干部的看法或牢骚,不知是否确实,就是确有其事的话,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部历史巨著中,不加分析地做出引证,会引导人们对中国的干群关系状况作出何种评价,也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把个别现象当作全局。现在中国有12亿多人口,6300万中共党员,各类干部有4100多万人。仅仅是干部队伍就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数量多了,什么样的人都可能,什么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不否认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描写的那种情况的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占多大分量,是否普遍地存在。我们认为在广大干部中,为群众做好事,花大力,而挨咒骂的事是有的。但是,蒙受这种委屈的情形,只是在群众对干部不理解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而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剑桥中华人民共和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684页。

国史》的作者,把地方干部即所谓的“本地干部”,说成是容易受上面批评,又经常受群众抱怨,干好事,还受怀疑、挨咒骂。将这不加区别地一言以蔽之为“本地干部”,似乎中国的广大干部经常要成为被制造冤假错案的对象。照《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的說法,这几千万干部整天将生活在一个是非不分的、暗无天日的境况中,他们的频频遭遇就是受上下的夹击。这样,干部还能有什么积极性,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中国基层干部的生活与工作环境的这种分析和判断,很显然是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实际上中国的广大地方干部是经常受到上面领导的表扬、受到群众的赞誉的。远的不说,只举近例。2000年5月8日至15日,江泽民总书记到江苏、浙江、上海考察,还特别表彰了“本地干部”与群众。他说:“江苏、浙江、上海的广大干部群众,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中央的各项部署,结合自己的实际,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好势头,党的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不断迈出新的步伐。”中国的报刊、杂志以及各种媒体对广大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好干部的表扬甚多,群众对好干部的拥护爱戴诸多的可歌可泣的事例不胜枚举。有的还受到经济上与物质上的鼓励。怎么能说干部为群众做好事,“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但得到的回报除了咒骂外什么都没有呢”?一部巨著,宣扬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结论,难道不怕承担挑拨中国干群关系之责任吗?

第二,把群众说得很不讲道理。对少数干部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活动,广大群众是不能容忍的。但是这并没有动摇他们对中共党员和广大干部的基本估量。中国的广大群众是拥护和支持各级干部工作的。把群众说成是是非不分、无中生有地抱怨干部,这虽然不能说是在诅咒群众,但起码是对于群众的贬低。其实群众是懂道理的、有见地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谁个优、谁个劣;哪一个

干部真的为他们服务,哪一个干部是别有所图,他们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①

第三,不任劳任怨的干部,不值得同情。干部主观上想为群众做好事,但实际效果却不一定能完全与主观动机一致。有的由于对实际可能性和复杂性研究不够,轻率拍板,造成不良后果,群众有意见是自然的,也是应该的。也有的由于所处条件的不同,或由于认识的差距,群众有时一下子不能完全理解干部,从而产生抱怨的事也是有的。因此,中共对于干部的要求是任劳任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干部为群众做点事情,就想得到回报,如果听不到群众的赞誉,或者得不到群众给予的好处,就牢骚满腹。像《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引述的那种干部,与中国所倡导的广大干部的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代表群众,必要时还要作出牺牲、奉献的精神,是南辕北辙的。不仅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宣扬、提倡。

第四,对于素质低、没有摆正自己位置的干部,应当教育和提高素质。作者引以为例的那类干部,肯定是素质比较差的。中国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代表人民的。干部在整个社会上的正确位置,应当是体现“三个代表”的精神。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州考察工作时,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从历史经验和展望新世纪的高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也是广大干部的位置,作出的明确而坚定的要求。做任何事情,不论大事或小事,都不能错位。正如江泽民2000年5月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的,这“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所以,“三个代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前进与兴旺发达的客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观要求,这反映了一种客观的必然规律。中国的广大党员与干部,一定要努力按着这一规律的要求来塑造自己。既然广大干部定位在“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就应该积极主动,并愉快地来完成这一历史责任与使命。而要做到这一步,就不能计较群众的一句话或一次抱怨。相反地,却要胸有大志,脚踏实地,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这就要求干部一定要具备一种综合素质。这些素质就是:“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关注世界的宽广视野,把握全局的战略头脑,勇敢开拓的创新精神,统筹协调的组织能力,果断科学的决策能力,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坚实宽广的丰富知识。”^① 这些综合素质,是一个好的党员与干部所不可缺少的。当然,培养和达到这些素质是不容易的,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但要用艰苦的努力去为之而奋斗。对于干部的培养与干部的自我提高来说,有三句古人的话,讲得很好,可资借鉴。即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代郑板桥的“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宋代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作为干部,应当要求自己,不仅听到群众的抱怨,就是听到群众的咒骂,也还该有“千磨万击还坚劲”的精神。这才是我们认为应该提倡的。

① 胡锦涛:《面向 21 世纪努力把党校教育提高到新水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 年 6 月 7 日)。

附录(一)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若干史实辩证

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是，该书在史料运用方面存在不少失实之处，一些不准确的或错误的史料直接导致了错误的或不准确的判断。因此，对这部著作中的若干史实进行辩证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这里仅就《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有关部分史实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就教于该书作者，也供海内外学者参考(此文中所注页码均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该书英文版本为准)。

(一)关于罗瑞卿被打倒问题

“就人民解放军而言，中国对日益升级的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为清洗总参谋长罗瑞卿提供了机会，而罗是能够向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力提出挑战的潜在对手。”(见第123页)

打倒罗瑞卿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引起强烈震动的重要事件之

一，也是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由之一，曾引起各种议论和猜测，上引《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者的看法，也曾是其中猜测之一。但经过 30 多年的历史沉淀和研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有关林彪集团的诸多研究，已使历史真相得以澄清。导致罗瑞卿被打倒的原因，并不是军队领导人对越南冲突应作何反应的争论，而是林彪、叶群的阴谋陷害和毛泽东对诬告的轻信。邓小平在 1978 年 8 月 12 日罗瑞卿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明确肯定：“罗瑞卿同志是大家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当时强加在罗瑞卿身上的罪状主要是两条：一是“极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二是有野心，要夺林彪的权。这两条都是站不住脚的诬陷。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于 1980 年 5 月 20 日为罗瑞卿平反的决定中，也已予以澄清。

罗瑞卿当时确实是主管军队的实权人物，一人身兼多项要职，包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他本是老红军，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转到公安战线，长期任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9 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亲自提名让罗瑞卿从公安部调回军队任总参谋长，说明林彪对这位长期共事的老部下是十分信任的。那么，后来林彪为什么又煞费心机要打倒罗瑞卿呢？理由并不像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冠冕堂皇讲的，是什么“罗瑞卿是掌军权的”，“能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因此，打倒他是“制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不肯为林彪所用，抵制了林彪的某些非组织活动，以至于被林彪视为实现其完全控制军队野心的巨大障碍。使林彪特别不能容忍罗瑞卿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林彪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离京到外地养病，所以，有些紧急事情罗瑞卿就没有通过林彪，而是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林彪对此耿耿于怀。二是因为

工作关系,罗瑞卿同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元帅接触较多,而在林彪看来,贺龙是人民解放军中另一山头的代表,不利于自己对军队的控制,因而引起林彪猜忌,认为是罗瑞卿对他“不忠”、“不敬”。三是罗瑞卿对林彪的夫人,也是林的办公室主任叶群非常反感,认为这个女人“浑身都是假”,对她的飞扬跋扈、无理取闹从不买账,招致叶群的憎恨。于是,林彪和叶群就编造了种种理由,搜罗了一些伪证,骗取了毛泽东的支持,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倒了罗瑞卿。而这些,同对越南战争采取何种反应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二)关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最后在 1966 年的 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人数不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刚过半数。”(见第 124 页)

如果这里是指 1968 年 10 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无疑是正确的。但从时间上看,这是指的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已全而发动,不少领导干部受冲击的极端紧张的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但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却不是刚过半数,而是 141 人,占“八大”选出的总人数 170 人的 82.9%,远远超过半数。其中,中央委员 74 人,比“八大”选出的 97 人少 23 人,占“八大”中央委员总数的 76.3%。而候补中央委员 67 人,比“八大”选出的 73 人只少 6 人。如果考虑到自“八大”以来已有 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去世,还有几位因病因故不能出席,那么应该说是到会人数相当多的一次。这次中央全会的特点不是到会中央委员人数少,而是比正常的中央全会多了一些人,这就是非中委的中央文革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等,还

有些所谓首都高等院校师生的代表,如聂元梓等。这些列席代表多达 47 人。

(三)关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

“在处理吴晗及其《海瑞罢官》一剧的问题上,毛使用了一把双刃剑。一开始他把批判吴晗剧本的任务交给了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该组织成立于 1964 年。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见第 127 页)

根据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史实,这段叙述中有三点是不够准确的。

首先,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判吴晗的任务交给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说不上是毛泽东对彭真的考验,即所谓“双刃剑”。

其次,也很难说这一任务是毛泽东交给江青的,说它是由江青、张春桥等蓄意策划的阴谋,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本来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撰写《海瑞罢官》一剧,是想贯彻毛泽东在 1959 年上海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的。所以,1962 年当江青第一次向毛泽东提出此剧有问题时,毛泽东并未理睬。1964 年康生再次向毛泽东说,此剧与 1959 年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时,毛泽东仍未接受,只是后来才被这些人“说服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 1967 年 2 月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谈话时提到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江青则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江青开始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文章,无人愿写。她便到上海,在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协助下,秘密地开始了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多次易稿,后经毛泽东审定,于 1965 年 11 月 10 日在上海《文

汇报》上发表,题目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

第三,彭真自始至终对这篇文章的背景一无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并没有立即作出反应,而且还让中宣部的人去了解文章的背景。新华社没有立即播发姚文元文章,北京的各大报纸当时也未予转载,以至毛泽东下令上海出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而北京一本也不订购。此事成为认定彭真在北京搞“独立王国”的罪证之一。这些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毛泽东没有交给彭真批判吴晗的任务。

不过,“这一举动将彭真置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倒是真的。就在姚文元文章发表前后,毛泽东曾几次当面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虽然尽力辩解,说明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但不仅未能保护吴晗,反而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的误断。以致在后来毛泽东亲自审改同意的林彪向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毛主席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批判《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战略的一个举措,是一柄多刃剑。

(四)关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至此,两个主要的目标——罗瑞卿和彭真——的最后命运在5月4日至1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最后决定了。这次会议最重要的部分是林彪的即席发言,其主要材料据后来指控是由张春桥提供的。”(见第131页)

这里也有几点是不够准确的。首先是会议时间。党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而不是5月4日至5月18日。

其次,会议上被批判的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四个人,会议对罗瑞卿和彭真的所谓“最后命运”的“最后决定”也就是决定对四人进行专案审查,是于5月23日才作出的。如果5月18日会议就结束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决定了。

再次,给这次会议定下基调的确实是林彪5月18日的讲话,即后来大家所称的“政变经”。不过这篇讲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非“即席发言”。说这篇“政变经”的主要材料是由张春桥提供的,不符合事实。张春桥当时在上海一直忙着帮助江青搞大批判,组织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起草《五一六通知》,不可能由张春桥来给林彪提供这些历史上的政变材料。在后来审判“四人帮”的材料中也没有发现对张春桥这方面的指控。事实上,林彪这篇连毛泽东后来都对他关于政变的一些提法感到不安的“政变经”,是他个人的一个别有用心的“创造”。他所引用的古今中外的政变材料,都是以学习历史的名义指使一些人为他搜集的。而搜集这些材料的人中据了解并没有张春桥。

(五)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和王光美

“更为针锋相对之处在于派往清华工作组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见第137页)

在毛泽东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焰之后,在全国各地首先是北京的许多大、中学校掀起了“造反”浪潮,致使学校的领导工作陷于瘫痪。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下,决定采取传统的做法,由上而下按管理系统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其中派往清华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不是王光美,而是曾做过周恩来秘书,当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叶林。王光美开始并没有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6月19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提出要赶走以叶林为组长的工作组。也正是这一天,

刘少奇委托王光美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6月21日,王光美被派往清华大学参加工作组,成为引人注目的成员。在她的授意下,清华大学工作组领导开展了“反干扰”运动,批判了蒯大富等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光美是工作组的领导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并不准确。因为在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过工作组“领导人”的任命和头衔。

(六)关于红卫兵和“红五类”

“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见第149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组织自始至终都是以大、中学生为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无论地方或是全国都没有统一的规划、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系统。它一开始就完全脱离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产物。但它实际上又一直被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所操纵和利用。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对有关如何组织红卫兵和对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出身等问题作过政策性的规定。但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极“左”氛围,在以阶级性纯洁为荣的历史条件下,红卫兵组织自己从诞生伊始都规定,只有“红五类”才能加入,才有资格当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而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历史不清”的人是不能当红卫兵的。这在当时是一种通行的不成文法。但并没有禁止“红五类”以外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参加某些红卫兵组织的活动的规定。因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跟随红卫兵活动也是革命的象征。于是,这些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也积极地和红卫兵一起去扫“四旧”、贴大字报……,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作“红外围”。

(七)关于陶铸问题

“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及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控制权而被撤销宣传部部长职务。”(见第152页)

首先,陶铸被打倒的时间不是快到1966年年底的时候,而是1967年的年初,即1967年1月4日。这一天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煽动下,公开张贴出“打倒全国最大保皇派陶铸”等大标语,此后,陶铸就丧失了工作权力和人身自由。

其次,陶铸这天突然被打倒的原因比较复杂。当时他虽然是第四号人物,但不可能也不会是企图去“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控制权”。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掌握和指挥下的,是贯彻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重要机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剥夺”中央文革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向毛泽东夺权。这是当时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敢想也不会去做的事。实际情况是,陶铸虽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同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有分歧,发生过多次争吵,甚至和江青当面顶撞。陈云在1978年12月24日陶铸追悼会上致悼词时讲得很清楚:陶铸是因为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积极保护老干部和革命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成为林彪、“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障碍”,才被“四人帮”采取突然袭击的卑鄙手段,捏造罪名打倒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往事如烟难忘却》一文中比较有真实而详细的说明,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外,陶铸当时实际上被撤销的主要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中宣部早已停止工作,属于毛泽东决定要撤销的单位,因此,中宣部部长并不是他的主要职务。另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陶

铸于 1966 年“被捕死于狱中”也与史实有出入。据徐子芳《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记述,陶铸不是 1966 年被捕死于狱中的,他死于 1969 年 11 月 30 日,是在合肥的解放军某部医院。

(八)关于上海 1 月 6 日的大会

“1967 年 1 月 6 日的上海群众集会正式肯定了所发生的事实,撤销了曹获秋及上海市其他官员的职务。同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张春桥由北京回到上海,以建立一个新的市政府,取代已被推翻的市委。”(见第 159 页)

1967 年 1 月 6 日在上海召开过一次名为“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获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并且发出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上海市市长,并且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不过这还只是群众大会上发出的一种要求,还不能成为权威性的命令。事实上也没有中央发出或批准的撤销曹获秋市长和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正式文件。根据已经发表的有关材料,这次大会并不是群众的自发行动,而是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在上海的党羽王洪文、徐景贤等一手策划的。在大会正式开始的前两天,即 1967 年 1 月 4 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就乘飞机从北京赶回上海,并非大会的“同日”,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其一手策划组织的康平路事件所造成的大动乱局面,进行乱中夺权,回上海摘“熟了的桃子”。1 月 6 日大会是他们夺取整个上海市党政财文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会后,8 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张春桥称它为“经济苏维埃”,实际上取代了市政府。随后又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了公安局和法院。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逐步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手里。但是,全市的正式新政权机构并没有能够很快建立起来。2 月 5 日,即上述夺权大会召开的一个月之后,上海人民

公社才正式宣告成立,它是新政权建立的标志。2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九)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变化

“8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被改组。其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王力、穆欣、林杰和关锋——被免除职务。”(见第183页)

中央文革小组是于1966年5月28日宣布成立的一个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机构,其成员共有18人。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他们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成员确定后另行通知。这4名成员后确定为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以上合计为17人。后又任命陶铸为顾问,合为18人。其中从来没有过林杰。据了解,林杰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文革”开始后曾是中央文革小组中较有知名度的一位工作人员。这个人员组成很快就发生很大变动。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组员谢镗忠、尹达、郑季翘、郭影秋、杨植霖、刘文珍和顾问陶铸陆续被排除,到成立一周年时,就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9人。要说清书中谈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所谓“改组”问题,这里需要先弄清楚的是:书中谈到的在1967年8月中央文革小组经历过一次人员变动确实是发生过,不过谈不上是改组。而且讲的情节和涉及成员也不够准确。首先,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8月下旬所发生的重大人事变动问题,在中国通称为“王关戚”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著述。特别是亲自参与其事的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书中列名的穆欣,并不属于这次改组之列。在他自己的回忆录《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1957—1967)》一书中也有详细的记述。

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是：1967年7月和8月，“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连毛泽东都无法驾驭的天下大乱、全局失控的危险局面。正当毛泽东和周恩来想方设法力图稳住局势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则唯恐天下不乱地挑起了新的“内战”。他们指使红卫兵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公然鼓吹“揪军内一小撮”。8月7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的讲话，在外交方面接连制造事端，以至发生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这样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恶性外交事件，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使全国局势更加混乱。毛泽东在上海看到《红旗》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曾批示它是“大毒草”。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和整个局势的极端严重性报告了毛泽东，敦促他下决心采取断然措施，结束这种严重的动乱局面。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稍后又决定对戚本禹暂缓处理），并责成周恩来严肃处理。8月30日晚，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这次变动确实是自发动“文革”以来对日益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重大打击。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中央文革小组已从原来的18人剩下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人了。

最后，把王力、关锋、穆欣、林杰四人统称为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4名成员也是不准确的。激进一词是西方学者的通常用法，按我们习惯的定性则应称为极“左”派。林杰的情况前已述及，他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就不存在所谓文革小组最激进的成员之说了。王力和关锋确实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干将。至于穆欣则根本不是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激进的成员。穆欣在“文革”前长期担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副总编辑。“文革”开始后，他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年6月初，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红旗》杂志副

总编辑。在“文革”伊始,按穆欣在《十年自述》中的话说,他是“在迷惘与惶惑中跟着走”。但后来逐渐看透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阴谋伎俩,“对《红旗》杂志的事,始终采取不沾边的态度”。在中央文革小组,除掉在工作上奉令而做的那些事情以外,在私人关系上一般采取不接触的态度。在内心深处也陷入极度痛苦之中。他打比喻说当时的心情:面对全国混乱,两军对垒,自己趴伏在交战双方之间的一片开阔地里,任凭双方互射的炮火在头上横飞,只能静静地伏在那里,走也走不开,动也不能动,不知道拖延到何时才能解脱? 1967年7月间,穆欣为他的弟弟杜保同向中央转送过七机部四院一派群众组织“新红联”外调组关于蒋匪军委第六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情况的调查材料,其中涉及林彪的夫人叶群(当时名叶宜敬)。原在这个训练班担任教官的欧阳敏纳给林彪写信,说有人调查叶群在“青训班”的历史。林彪对此极为不满,派人追查,结果发现杜保同是经过穆欣转送这份材料的,于是认定穆欣是“黑手”。1967年9月7日,江青与谢富治下令将穆欣关押到北京卫戍区,穆欣从此失去行动自由。1968年1月13日,穆欣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监禁长达8年之久,直到1979年12月15日,才予以彻底平反。穆欣从中央文革小组中被排除,时间上早于王力、关锋,涉及的事情和性质也完全不同,不应混为一谈。

(十)关于“五一六事件”牺牲品问题

“五一六事件的全部五个牺牲品显然都是陈直接控制下的《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见第185页)

这里有三点是需要与作者商榷澄清的。首先,这里所说的“五个牺牲品”作者是指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发生重大变动中“被撤销职务”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林杰,把这五个人笼统地放在同一罪名下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首先,对

“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已经判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错误的、无的放矢的。其次,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以及穆欣被监禁的原因我们在上边已经谈过,都不是因为他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操纵者。林杰更无从谈起。所以,不应当把他们五人说成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本书作者在这里这样说,可能是因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过程中,确实有文件把这时已被审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列入了“五一六”黑后台的名单之中,而穆欣在秦城监狱也被定为《光明日报》社“五一六”分子的黑后台。而这些是不足为凭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也被定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后,连林彪也被称为“五一六”集团的总后台。这只能说是中国当时在极“左”的狂热支配下人为地随意制造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绝不能成为历史的真实。我们总不能因此说陈伯达、林彪也是“五一六”事件的牺牲品吧。第三,说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林杰都是《红旗》杂志的副总编也不确切。据了解,林杰和戚本禹没有担任过这一职务。林杰只是《红旗》的一名编辑,而不是副总编。戚本禹在“文革”前是《红旗》杂志的历史组组长,后调到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局副局长,也没有任过《红旗》副总编。

(十一)关于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他于1966年写给江青的、表达对林彪的行为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见第335~336页)

书中对这段话作了如下注释,“在林彪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至于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林彪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至于毛决定

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销毁;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林彪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见第335~336页)

这段注释所引谭宗级教授《教学参考》(下)中关于1966年毛泽东致江青信的描述与史实有些出入。根据目前我们所调查和了解到的情况,这封信的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给远在上海的江青写了一封内容深奥、文字隐晦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更直接而集中地表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和意图。其中谈到了对林彪“五一八讲话”中有关政变提法的“不安”,认为林彪对他的颂扬之词是“吹”,“吹得神乎其神”,“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表达了“盛名之下”仍要严于解剖自己的愿望。毛泽东写信后,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誉清了一份,毛泽东看后改了几个字,交徐业夫存档,而把原信寄给了江青。当时,周恩来正好陪外宾来武汉见毛泽东,期间,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了这封信。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不安后,表示自己愿意主动找林彪谈谈这件事。周恩来找林彪谈了这封信及毛泽东的不安后,林彪确实感到焦虑和紧张,并表示以后不再那样讲了。江青后来让林彪看了毛泽东寄给她的那封信,为解除林彪的疑虑,江青当着林彪的面烧毁了该信。原件虽然已不存在,但徐业夫誉清并经毛泽东改过的信还在。因此,林彪摔死以后,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政治局作为会议的重要文件印发这封信,当然就很方便了。这里不存在文件的历史真实性的问题。

(十二)关于迟群和谢静宜的职务问题

“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 8341 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他的助手谢静宜,也来自 8341 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见第 345 页)

根据我们所掌握和调查了解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需要澄清的。这里所讲的小组是指 1968 年 7 月中央派往清华大学的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过该小组负责人迟群不是 8341 部队的政委,他仅是 8341 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副科长。江青曾经许愿让迟群当 8341 部队的副政委,但没有成为事实。其次,谢静宜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及 8341 部队的机要员,曾做过毛泽东机要文件的管理工作,可能同时也替江青管过文件之类,但没有做过江青的秘书。

(十三)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酝酿过程

“叶剑英又回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见第 366 页)

该书作者在这里所述的是 1976 年 8 月毛泽东病逝前夕,“四

人帮”夺权活动日益猖獗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里有二点是不符合史实的。叶剑英传记组组长、著名专家范硕将军对叶剑英元帅行踪的把握应该是有权威性的。据他所著《叶剑英在1976》一书所记载:第一,在1976年8月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都在北京,而没有到过广州。叶剑英在1976年“四五”运动后不久,从城里搬到了西山15号楼,在粉碎“四人帮”之前他一直住在这里,并没有在8月份离京回到他的故乡广东。邓小平在1976年4月7日被再次打倒以后,一直被软禁在北京,也从未到过广州。第二,叶剑英在1976年8月前后没有也不可能与邓小平会面并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叶剑英起初悄悄地去看望他,以后不能再亲自去了,就时常让子女去探望。因为当时邓小平已被软禁,而叶剑英早在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中被宣布因“生病”而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自身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二人在毛泽东病逝前夕并没有会过面,邓小平更没有向叶剑英讲过如何同“四人帮”斗争到底的话。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这里所引用的加赛德《活跃起来!》一书中邓小平说的与“四人帮”斗争的话,同在周恩来治丧期间,叶剑英与邓小平会面时的谈话有些类似。据《叶剑英在1976年》一书中的记载,在1976年1月,叶剑英同邓小平曾有如下一次对话:叶剑英说,这伙人欺人太甚,步步进逼,他们趁总理去世,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还不知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下场!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师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叶剑英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邓小平说: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嘱咐。作者是否把这

次叶邓的谈话时间给移后了？

(十四)革命委员会是否经过民主选举问题

“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因为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见第 552 页）

这里有二点是需要与该书作者商榷的。首先，说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或者是传闻的失误，或者是出于西方某些思维逻辑推演而产生的误解，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革命委员会不过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局部夺权发展到“全面夺权”，直到全局失控的严峻情势下，历尽磨难后才在中央的直接控制与指导下，靠军队支“左”与多种力量的平衡才建立起来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原设想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然后实现“三结合”来建立革命委员会，但实践与设想并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之后，结果是越批越对立，越促越混乱，群众组织之间派别林立、武斗泛滥，闹得不共戴天，根本就不可能按行业和系统形成统一的组织或“代表大会”，根本无法实现什么“大联合”，更别说“民主选举”了。按公认的一些准则，民主选举需要有公正的无歧视的选民登记；公开的平等的竞选和自由无压力的投票等，以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力。而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与其说革命委员会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勿宁说它是所谓“大民主”的产物。这种“大民主”的具体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它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对民主和法制的践踏，是对公民权利的任意破坏，是一场无法无天的社会大浩劫。它不仅不能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民主，而且连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权力都无法保障，只能走向民主的反动；不仅不能实现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而只能使中国社会走向大分裂、大动乱。“大民主”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更是造

成了沉重的灾难。

其次,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并没有使“很多权力落到群众组织手中”。毛泽东开始也希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具有崭新的革命作风和有利于人民的制度,所谓“既当官,又当老百姓”。而体现这一切的依据便是“三结合”中有所谓“革命群众”的代表,也就是有各个“造反派”的负责人参加,认为这些人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对各级政权机关可以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就保证了各级领导永远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事实上,这些所谓“群众代表”根本不可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即使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一部分群众的利益,但在高度集权的革命委员会决策机制中,也主要是“三结合”中担任主要负责人的军队干部说了算。据统计,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军队干部,全国共有48000人。其中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所以“群众代表”实际上起不到很大作用。后来,随着省以下各级党委的重建工作的完成,这些“革命群众”的代表在新一届革委会中的比例已大大下降,并且在常委中的比例更小,基本上都没有担任什么重要职务,他们不可能有多少权力。

(十五)关于邓拓之死

“邓拓1966年5月在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也有人说是自杀)。”(见第600页)

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事实真相是1966年5月17日夜晚,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在自己家中自杀身亡。邓拓死前并未被捕入狱过。所谓“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或自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是在经过1966年5月上旬对“三家村”和《北京日报》的批判,自己被莫

须有地诬陷为“叛徒”，北京市委已陷于风雨飘摇境地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之后，怀着悲壮的复杂心情，毅然决定以死抗争的。死前，邓拓在家里给北京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给家人也写了一封信，要求子女永远跟共产党走。有关邓拓自杀的情况，他的夫人丁一岚所写《忆邓拓》、他的儿子邓云所写《回忆我的爸爸邓拓》等文章中都有记述。两文均载《忆邓拓》一书。海外的某些谣传是不可信的。

（十六）关于“四清”运动

“因而，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中共发起了一场‘四清运动’，以清理农村干部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错误。然而，要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见第 565～566 页）

这里似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阶段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 1963 年 2 月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以“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阶段持续到 1964 年底；第二个阶段是从 1965 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主持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开始到 1966 年春，这个阶段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称为“四清”运动。在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四清”仅限于农村，内容是根据河北省保定地区的经验总结的，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来这被称为“小四清”。而第二阶段，社教运动就叫“四清”运动，而这时的“四清”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作者可能将两个不同阶段的“四清”运动及其内容混淆了。

第二，说社教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农村进行的“四清”运动所要

清除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方面的,也有待商榷。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从一开始就有着在中国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明确目的。虽然一开始在农村进行“四清”的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从字面上看似乎所清除的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并且“四清”对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克服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毛泽东提出在农村搞“四清”,其根本出发点和着重点并不在这里。在毛泽东看来,清理经济问题只是运动的着手处和突破口。他最关心的一点是抓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正是由此出发才会逐步发展到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运动的重点。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发起农村“四清”运动的前后的多次谈话中都讲得很明确。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时,提出农村“四清”运动应当学习这些地方整风整社的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6日他对大区书记讲:贫下中农组织一定要搞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会后他又说:如果我们不整风,那些县都要出修正主义。如果我们再不搞,再过10年,中国也会出修正主义。在1963年5月20日发布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这一指导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中,以及同年9月27日通过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中,都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任务,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来看,说农村“四清”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防止和清除“修正主义”,是要清除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史实是论断的基础,也是判断观点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准和依据。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共勉。

附录(二)

解开林彪是否被挟持之谜

——兼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有关记述

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这样谈论林彪在外逃之前的情形：“在北戴河，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后，立即采取行动。她与林立果一起，喊醒吃了安眠药睡下的林彪，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他们焚烧了文件，然后钻进汽车，驶往机场。”^①

香港《镜报》月刊也曾刊登一篇文章称：“12点，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冲进林彪的房间，将已经吃安眠药睡下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并喊：‘快起来，有人抓你来啦！’四个人加李文普一同上了‘红旗’防弹车。”^②

这两段话都是说林彪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叶群和林立果喊醒，并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而出逃的。最近在国外还盛传“林彪叛逃是被迫的，是被叶群和林立果挟持走的”，国内也有一些人附和这种观点。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346页。

② 引自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第6期。

林彪一伙是否对出逃苏联毫无准备？林彪在外逃前究竟干了些什么？林彪是如何上了去机场的汽车的？又是如何上了三叉戟飞机的？搞清楚这几个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这段记载是否准确，林彪是否被劫持就真相大白了。

(一)林彪一伙出逃苏联是事先已经 策划并做了一定准备的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疑忌，不断打探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他们在北戴河接到李作鹏、顾同舟、刘丰密报毛泽东在南方同一些省市领导人谈话的内容后，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并进行了紧张的策划。他们准备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加快实施《“571工程”纪要》，预谋在杭州、上海、苏州附近谋杀毛泽东。同时准备了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第二套方案和准备出逃苏联的第三套方案。

自9月6日起，林彪、叶群等人开始紧张地为外逃做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许，叶群要秘书给留在毛家湾的秘书打电话，叫他们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等书，交林立衡、张清林带到北戴河。晚上约21时30分，叶群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专门给她讲课的参谋：蒙古有哪些大城市？蒙古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10时30分，林彪、叶群在林彪卧室内谈话。卫士和内勤均闻叶群边哭边说：“说我是特务，叫我到农村，没有安眠药怎么办。我要跑，你说走不走……”嗣后，林、叶密谈三个小时。据此，可得出一个结论：9月8日，也即林彪飞机出逃4天前，林彪肯定得知叶群要跑，林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若不同意叶的反叛行为，处置叶群只需喊一声。但林彪没让人看出有任何反

应,这可以证明林、叶均在阴谋之中。是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林立果从北戴河到北京西郊机场给空军管专机的副参谋长胡萍看了林彪的手令,要胡萍“立即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机组人员要挑选对首长感情最深最可靠的”。同日上午,周宇驰要空司航行局长搞一份苏联航班飞机地图,说林副主席提到防止苏联搞突然袭击,要了解一下他们的飞行情况。

9月9日,上午7时,林彪给办公室的人讲,等林立果来后调一架很强的飞机再去大连。吩咐飞机要备飞三小时以上的汽油。并急找叶群谈到中午11时,其间内勤进来,看见叶群眼睛红红的。下午,周宇驰向空司雷达兵部技术处副处长许秀绪(“小舰队”成员)要三北地区雷达部署图和可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12时30分,林彪找叶群。内勤听到叶对林说:“没想到小小的立果活动面那么大!”从此话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林的心理已被林立果所打破。林彪是否也准备同叶群一起“跑”不可妄估,但从林彪接着叶群的话说的几句,已看出林彪已在“跑”与不跑的边缘了:“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此间,林、叶又进行了密谈。

虽然林彪一伙为外逃作了一些准备,但在他们的部署中,外逃苏联毕竟是下策。那他们为什么取此下策呢?原来,9月11日晚,林立果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打乱了林彪一伙反革命政变的部署。这样,林立果等策划的谋害毛泽东的第一套方案即“上策”已经无法实现。他们又紧急实施南逃广州,并拟定南下人员名单,调用了飞机,企图实行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的第二方案即“中策”。可是,这套方案又由于发生两个新情况被完全打破了。

第一,林彪一伙原估计毛泽东可能在13日上午返京,他们在

这之前飞往广州。由于毛泽东 12 日下午提前回京,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打乱了他们行动的时间表。

第二,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发现异常情况向驻北戴河的 8341 部队负责人作了报告。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立即追查 256 号专机飞往山海关的原因并下令把飞机调回北京。林彪在空军的党羽谎称专机有故障、需要检修,因此才把飞机留在了山海关的海军机场。此时周恩来下令,非得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四人联署,该专机不得放飞(李作鹏向下传达时,篡改为四个人中有一人批准即可放飞)。9 月 12 日晚 10 点后不久,林立果接到周宇驰报告,知道了周恩来正在追查送他到山海关这架三叉戟飞机的事。这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已经不可能了,他们提出按第三套方案执行,改南逃为北叛,马上坐飞机夜航去苏联。

上述出逃的一切准备活动,如果说林彪没有参与或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批准或至少是默许,是不合乎工作规则,也不合乎逻辑的。

(二)9 月 12 日夜晚林彪是参与外逃的谋划的

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普通人的命运常常被忽略不计,然而,恰恰是这些微不足道的普通人,给历史的真实充当了不可缺少的注脚。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和警卫秘书李文普等人的回忆,详细地勾勒出林彪叛逃之前的活动:

9 月 12 日下午,林彪、叶群突然决定要林立衡、张清林订婚,并立刻安排订婚仪式。这时,林立果在北京已经部署南逃,并报告给叶群。叶群在北戴河给林立衡举行订婚仪式则是在为逃跑故布疑阵。她通知林立果赶回参加仪式,为林立果飞返北戴河制造了可以掩人耳目的借口。

晚上 8 时以后,按通常规定,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

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去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长时间密谈。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清。

晚8时15分,林立果、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坐256号三叉戟飞机秘密到山海关后,紧急赶到北戴河。

晚9时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林彪密谈。

为了了解三人密谈的情况,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回来告诉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这里还有一处疑问,就是陈占照是否听林彪说过“首长好像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这句话的最初来源是一位当事人的自述:“大约过了两三分钟左右,小陈手中托着一只茶水盘返回来了,见到林立衡就说:‘首长正在淌眼泪呢!’‘什么?!’林立衡一把抓住小陈的手:‘你快些讲,首长和林立果讲了什么?!’小陈说:‘我端了茶水进去时,叶主任和副部长蹲在首长的脚前,说话声音很轻,听不清楚:我见首长一面流泪,一面说……。’小陈一双大眼睛犹豫地看着林立衡,欲言又止。‘快讲,说什么?’‘首长好像说、说什么是民族主义者……副部长发觉我,把我推出来,后面的话没听见。’”^①

此话以后多处传播,“好像”变成了“我起码是个民族主义

① 张宁:《“九一三”事件前夕在林彪家中》。载于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6页。

者。”^①又变成“首长说,他至死都是民族主义者……”^②。但据李文普说:“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也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推翻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并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③

大约晚 10 时 30 分,张恒昌和陈占照商量,准备让林彪休息。正在这时,叶群又到林彪的客厅,同林彪谈话。陈占照便先去吃晚餐,准备吃完晚餐回来再让林彪休息。

大约晚 11 时过后,林彪打铃叫张恒昌,告诉他说:“今晚不休息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

晚 11 时 22 分,周恩来与叶群通电话。据汪东兴回忆,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周恩来问叶群:“林副主席好不好?”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周恩来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一开始骗总理说她不知道。稍稍停了一下,叶群又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脑子反应很快,回答周恩来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

① 何力编:《林彪家族纪事》,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邢杰、胡有廉、孙建宁:《我在林彪家的最后时日》。载于何力编:《林彪家族纪事》,光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4 页。

③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 年第 2 期。

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去北戴河,这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恩来要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更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①

但据李德生回忆,叶群为掩盖阴谋故意给周恩来打电话,称:“林副主席想动一动。”周问:“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叶答:“空中动。”周问:“你那里是否有飞机?”叶答:“没有。”^②

不管是周恩来先打电话还是叶群后打电话,叶群都露出了马脚,明明有飞机在山海关,叶群却说没有,暴露他们想逃的阴谋。周恩来后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时他才断定北戴河那里确实有问题,林彪可能要跑。

晚 11 时 30 分左右,林彪打铃,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到林彪的客厅,林彪叫陈找张恒昌。陈立即把小张找去。林彪叫张恒昌通知叶群,空军疗养院的两个护士(当时在 96 号楼照顾林彪——笔者注)不带了,让人把她们送回去。

晚 11 时 40 分,叶群把警卫秘书李文普找到林彪那里,自己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李文普进去。林彪对李文普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③李文普从客厅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快点调车,越快越好”。

①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05~206 页。

② 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于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 页。

③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 年第 2 期。

晚 11 时 30 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来到林彪的客厅。过了一会,叶群、林立果出来。

林彪打铃,陈占照到林彪客厅,林彪对他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过几天再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这时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

陈占照走出客厅,看到叶群、林立果像热锅上的蚂蚁,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忙着调车,十分着急的样子。

汽车一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出来。林彪走在最后边。走到内勤门口时,他问:“东西都装车了没有?”陈占照答:“没装车。”林彪再没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带,就钻进了汽车^①。

“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林彪语)^②,整个晚上和叶群、林立果紧急密谋,急于出逃的林彪,哪还可能安然入睡?更不存在被“喊醒”之事了。虽然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具体说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死无对证”。但在出逃前的夜晚,林彪没有吃安眠药入睡,也不是被人从床上拉起,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在走前焚烧了文件。至于说有人要去“逮捕”林彪,更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就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前,8月16日,周恩来还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③,毛泽东在南巡时也说过“对林还要保。回北京后,还要找他们谈谈”^④。可见,毛泽东还是想挽救林彪。对林彪等人准

① 参见邵一海:《林彪 9·13 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8 页。

②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 年第 2 期。

③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版,第 1036 页。

④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版,第 181 页。

备谋害毛泽东和外逃苏联等阴谋,中央当时并不清楚,也不可能知道,怎么可能下令“逮捕”林彪?

(三)现场目击者作证:林彪是如何走上汽车的,林彪是如何登上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仓皇逃命的

所谓的“劫持”,通常是指从两旁抓住或架住或是指用武力强迫对方服从。我们且看林彪在北戴河 96 号楼上车时的情景。

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张恒昌回忆:刘沛丰提着三四个皮包,首先上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林彪最后上了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了^①。史学者的文章大都采用这种说法,即林彪是最后走上汽车的。

但据李文普回忆:“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②

当然,至于林彪是先上还是后上,回忆者的记忆有所出入也是在所难免,根据推断,李文普的说法显然更为准确,因为车第三排坐好后,第二排座位才能放好,回忆者都说林彪和叶群坐在最后一排,所以林彪是第一个走上汽车的,坐在第三排好像更为准确。好

^① 参见邵一海:《林彪 9·13 事件始末》,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 版,第 246~247 页。

^②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 年第 2 期。

证明林彪究竟是否被挟持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李文普和林彪同车去山海关机场。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因为林彪原来对李说是去大连，现在听说去伊尔库茨克，是到苏联，李怕当叛徒，想到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不愿跟他们一道走，就突然喊停车。司机当时是听他的口令的，车一停，李便跳下车，车里人向他开枪，击伤左臂，李用右手掏枪还击。李文普在“九一三”事件后，一直这么讲的，直到1980年审理“两案”时，从未改口，最近，针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歪曲和攻击，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打开了“九一三”事件的“黑匣子”^①。

我们再来看看林彪是如何登上飞机的。赵雅辉等五同志,都是林彪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仓皇逃命时的现场目击者。赵雅辉是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周振山是场站机械师,佟玉春是场站参谋长,王学高是场站油料科科长,刘三儿是场站油车司机。1972 年 7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第 24 号文件,公布了赵雅辉等五人的证词——《林彪、叶群等仓皇逃命目击记》:

“我们在现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皇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1971年9月13日零点22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轿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

① 李文普口述、高德明整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赵雅辉、周振山、佟玉春、王学高、刘三儿 1972年4月7日”

山海关机场的这些工作人员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驾驶舱门的小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的。1972年周恩来就曾针对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绑架”的说法指出：“他是副统帅，别人怎么命令他？”1981年初，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工作已经结束，即将解散的全国“两案”办公室收到一份林彪直系亲属的信，声称林彪系被叶群及其林彪反革命集团“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最后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此，原特别检察厅副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将军专门作出批示：“对×××、×××的前后交待材料要作专门的过细的研究。”于是，由解放军司法机关组成专门的调查班子，迅速梳理这件案情。据查：写信的当事人“九一三”事件后的交待材料，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及近年来的言论内容前后矛盾，态度似乎反复无常^①。“绑架、劫持”之论难以自圆其说。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掌握军队实权，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周围有大批警卫部队的安全环境中，竟会被夫人和儿子绑架、劫持走，这岂不是笑话！

^① 参见图们、肖思科著：《震惊世界的77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3页。

通过上述史料的考证、比较,特别是当事人亲眼所见,我们认为已经足以揭示出事实的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林彪在决定是否逃跑时,可能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即使说过不想走的话,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但不管怎么说,林彪最后还是自己走上了外逃之路。林彪必须对外逃一事负直接的责任,这是谁也开脱不了的铁的事实。

附录(三)

林彪外逃中一个插曲的真相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关“九一三”
事件的一则史实辨析

“文化大革命”中，以个人政治野心为基础逐步结成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其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强行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草原上，落得折戟沉沙、遗臭万年的下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当时被外电称为“中国政治之谜”和“亚洲最大的谜团之一”的“九一三”事件。

这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九一三”事件尤其是飞机坠毁的情况，成为国外新闻媒介议论的一个热点。怀疑林彪等人“是否真的摔死在异国他乡”的有之，说他们死于国内某个地方的有之，说他们乘坐的飞机“是被导弹击中后坠毁的”亦有之。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国内，不少人对“九一三”事件的真相也存在种种议论和猜测。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一两年，一些“九一三”事件的知情人和对某些情况有真切了解的人士陆续撰文，多视角、多层次详尽地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还有学者对“九一三”事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严谨精细的考察。这些文章的发表，真

实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有力地驳斥了上述种种不实之词。但有些观点在国内外仍有一定的市场。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就引用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该文认为,林彪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8个小时(应为3小时——作者注),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1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时间,然后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为什么林彪一伙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①

无独有偶,国内最近出版了一本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畅销书。作为该事件的见证人,作者写道:“飞机起飞后20多分钟,留在96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96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场的命令,地而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96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②

这两段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

^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347~348页。

^② 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57页。

去。

在林彪乘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央政治局下达过禁空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第一,这个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当时林彪的飞机在何处?第二,林彪专机起飞后,党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还是要赶他走?第三,林彪是否有要求降落的表示?把这三个事实考察清楚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推论是否能站得住脚,也就一清二楚了。

为此,我们不妨对有关这一事件经过的更多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便了解历史的真相。

《周恩来传》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们经过研究大量第一手的材料写成的,应该是可靠的。该书的记录如下:“对林彪等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一时也并不了解。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音。”^①

对林彪事件颇有研究的专家于南教授在《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一文中也谈到:“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祠也几乎同时到达。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256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开始时航向290度即向北京、大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点46分改航向为310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0页。

度,向蒙古的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①

这些都说明,林彪乘机起飞后,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所以才从地面不断向这架飞机呼叫。而且,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到机场接他,这也算仁至义尽了。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呢?现在我们有幸找到当时亲自用电话向全国下达这项命令的当事人的准确回忆和电话记录,成为解开这一疑团的最有力的证据。请看:

朱秉秀是当年军委空军指挥所的值班作战参谋,“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曾协助李德生参与处理这一事件,他详细地记录自己在空军指挥所亲历这一事件的始末:“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着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情况。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笔作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命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梁(指梁璞,当时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要找他们指挥所值班指挥员亲自接电话,叫航行局局长尚登娥也来,航行部

^① 见熊华源、安建设编:《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门要知道。我与徐心德(当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对方都是首长,接电话、记录、复诵都很费时,作战部副部长郝昌照主动站起来帮我们也向下传达命令。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接着空军在场首长研究,经李同意又向各军区空军指示,要增开地面警戒雷达,严密对空监视,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因此,“禁空令”下达的时间是在9月13日凌晨1时56分到2时20分之间。即使是周恩来直接下达命令给山海关机场,那也只能是在1时50分左右,距林彪起飞的零点32分,已经是1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把不能降落归于1个多小时后才发布的命令,不是有点荒唐吗?实际上禁空令下达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在国境线了。

至于机场采取关闭灯光的办法,恰恰是为了阻止林彪的飞机起飞。林彪等是在晚11点50分离开北戴河住地的。晚上11点45分,8341部队一名副大队长带7个人乘吉普车出发去山海关机场准备控制飞机,但在途中被林彪的高速轿车超了过去。他们到机场后见林彪、叶群正在上飞机,便找到机场调度室,要求制止这架飞机起飞。机场采取关闭灯光和鸣枪的办法阻止飞机起飞。可以清楚地看出,机场关闭灯光,并非是在飞机起飞之后,而是在飞机起飞之时,但飞机还是在黑暗中强行起飞了。

其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三叉戟客机时速超过900公里,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北戴河的96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呢?飞机起飞的山海关机场距北戴河有百里之遥,肉眼根本看不见,又如何“向机场方向遥望”,还能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呢”?这真是太富于想象力了。机长潘景寅对山海关机场十分熟悉,天空并没有关着的大门,飞机上有雷达、着陆灯等先进设备,机场无线电都处于开通状态。如果飞机真的返回山海关机场甚至飞回北京,降落是不会有困难的。针对国内外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不实之词,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最近也撰文谈到:我多次随同林彪

乘坐飞机,飞机驾驶员会听林彪的指示,要飞哪里就飞向哪里。而且,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图为证,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的确凿证据。

历史是客观的,其真实面目也是不能任人涂抹和随意解释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都是外国学者,中国人自己还有不同见解的问题,不能苛求于外国人。我们希望外国的学者注意吸纳这些最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而不要不加分析地引用一些纯属臆测的描述或别有用心的观点,这样才能保持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和可信度。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后 记

历经六个寒暑,经过写作班子全体同志的努力,这部国家社科规划“九五”课题的研究成果——《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终于出版问世了。校过全书清样之后,心情是比较复杂的,既有着完成一次重任之后的轻松和愉快,又掺杂着几分犹豫和担心。我从事理论教育工作已近五十年。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多年来,文章和著作是写得比较多的,担当一本专著的主编也非第一次。学术探讨以至“大批判”文章也写过。但同外国的专家学者探讨和商榷学术问题还是生平第一次。

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个课题,评析的对象是在西方颇受推崇的有全球性影响的学术专著,面对的是一个西方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有较高知名度的权威的专家群体。这样的学术专著,既要充分地肯定这部西方专著的学术成果和贡献,又要明确指出其中我们认为不足和偏差的地方,既要理直气壮地陈述我们的观点和意见,又不要重犯否定一切、一棍子打死的“大批判”式的错误偏差,而真正体现平等的客观的百家争鸣式的商榷。这样的写作对于我和我的写作班子确是一种缺乏经验的崭新尝试。

经验总是要从实践中获得的。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经

验。我们努力实践了。现在回头来看,我认为在基本方针和基本态度方面,我们是把握得比较好的。在每章中都是力求作到客观公正地分析,既充分肯定应该肯定的,但绝不盲目赞扬;又明确提出我们认为不足的,甚至不正确的观点和史实,尽量充分地摆事实和讲道理,绝不笼统地否定和批判。总之,我们认识到的,感到必需谈的,都基本上表达了。从结构上看,有一个重要缺欠,就是没有写新中国的文化教育问题的专章。写作计划上原来是有专门一章的,也请到一位合适的作者,遗憾地是他因生病而难以完成。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让这个缺欠存在了。另外,原计划有一章专门商榷史实方面的问题。后来作者把它在刊物上提前发表了。这样,这三篇文章只能作为本书的附录。

当然,限于我们的研究深度和学术功底,分析不够准确,史料不够充分,甚至个别观点不正确之处,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课题的限期早已超过,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只好把已经完成的作品呈现于读者面前,恳请给予批评和指正了。

当此书出版之际,作为主编,首先要感谢写作班子全体同志的努力;感谢一切给本书以支持和帮助的同志;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特别是要感谢责任编辑曾凡国同志。曾凡国同志一直关注这本专著的写作,经常询问写作进展情况,这对我们是一种激励和促进。

我们感到,同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商榷,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部专著可能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一定会日趋开展和频繁。这有益于学术的繁荣。中国学者应该努力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金 春 明

2001年2月于海口